兩京夢華

宋代卷

孟元老 著

汪 濱 注

中國歷史寶庫

兩京夢華

宋代卷

汪盛鐸著

中華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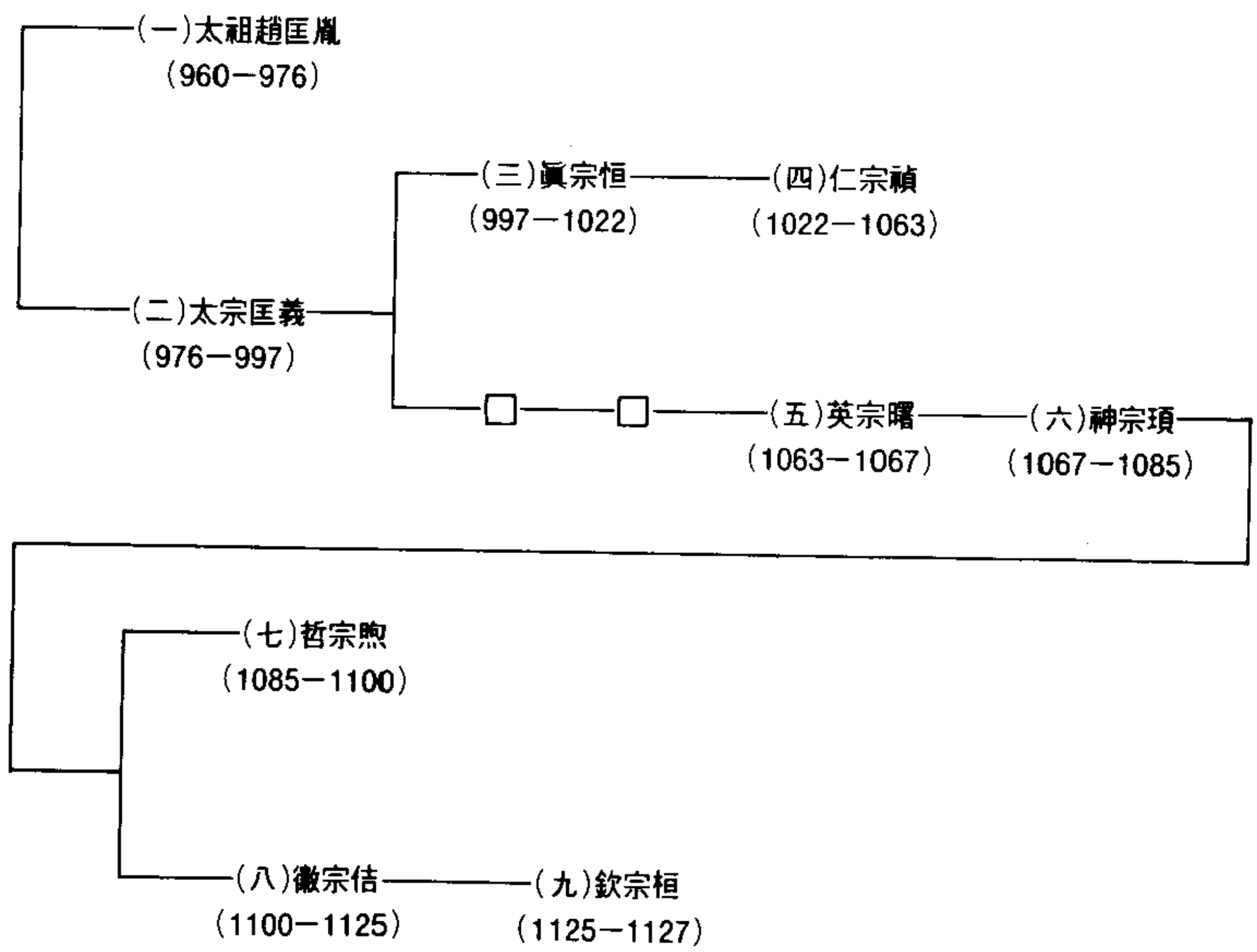
中國歷史寶庫

□主　編：柴劍虹
□叢書策劃：鍾潔雄
□責任編輯：盧建業
□美術構成：Med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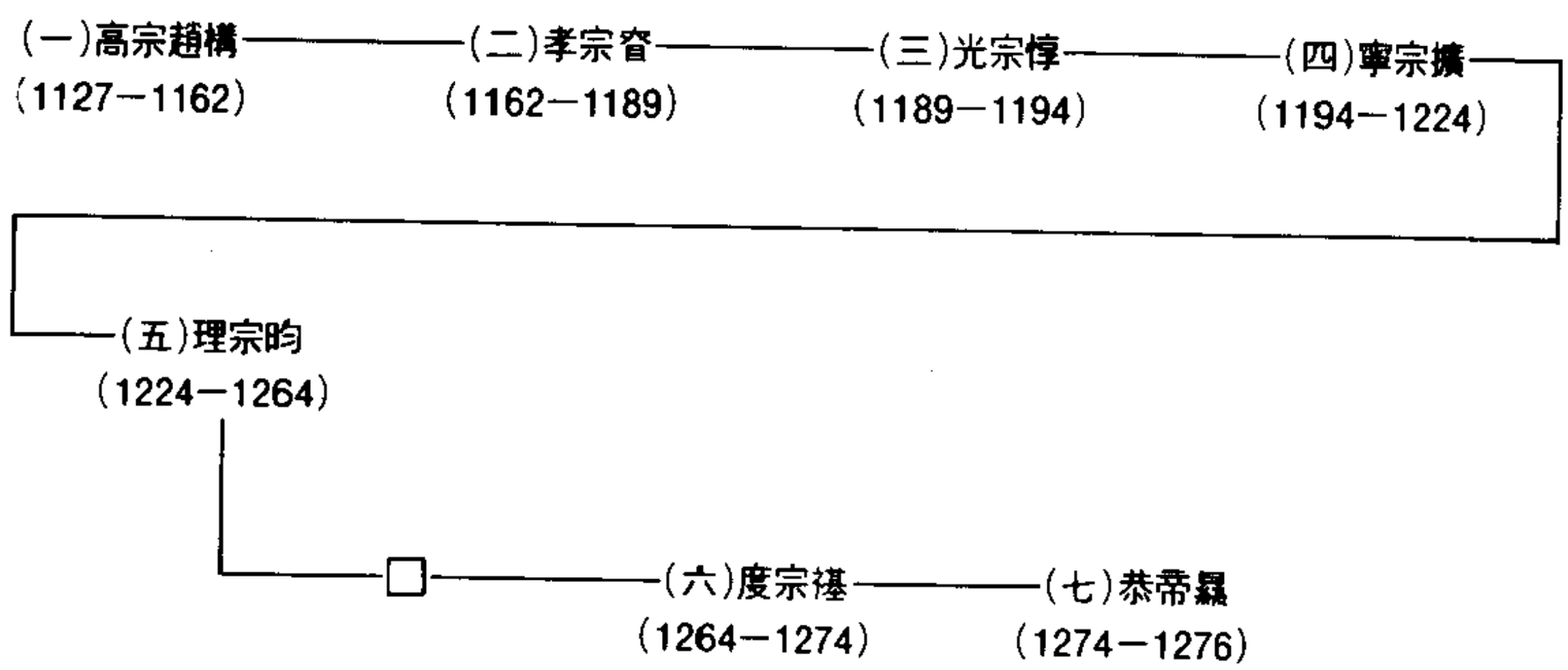
兩京夢華—宋代卷

□
著者
汪盛鐸
□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馬坑涌道5B-5F 2樓
□
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榮業街6號
海濱工業大厦4樓B1
□
版次
1992年10月初版
©1992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國際書號：ISBN 962 231 669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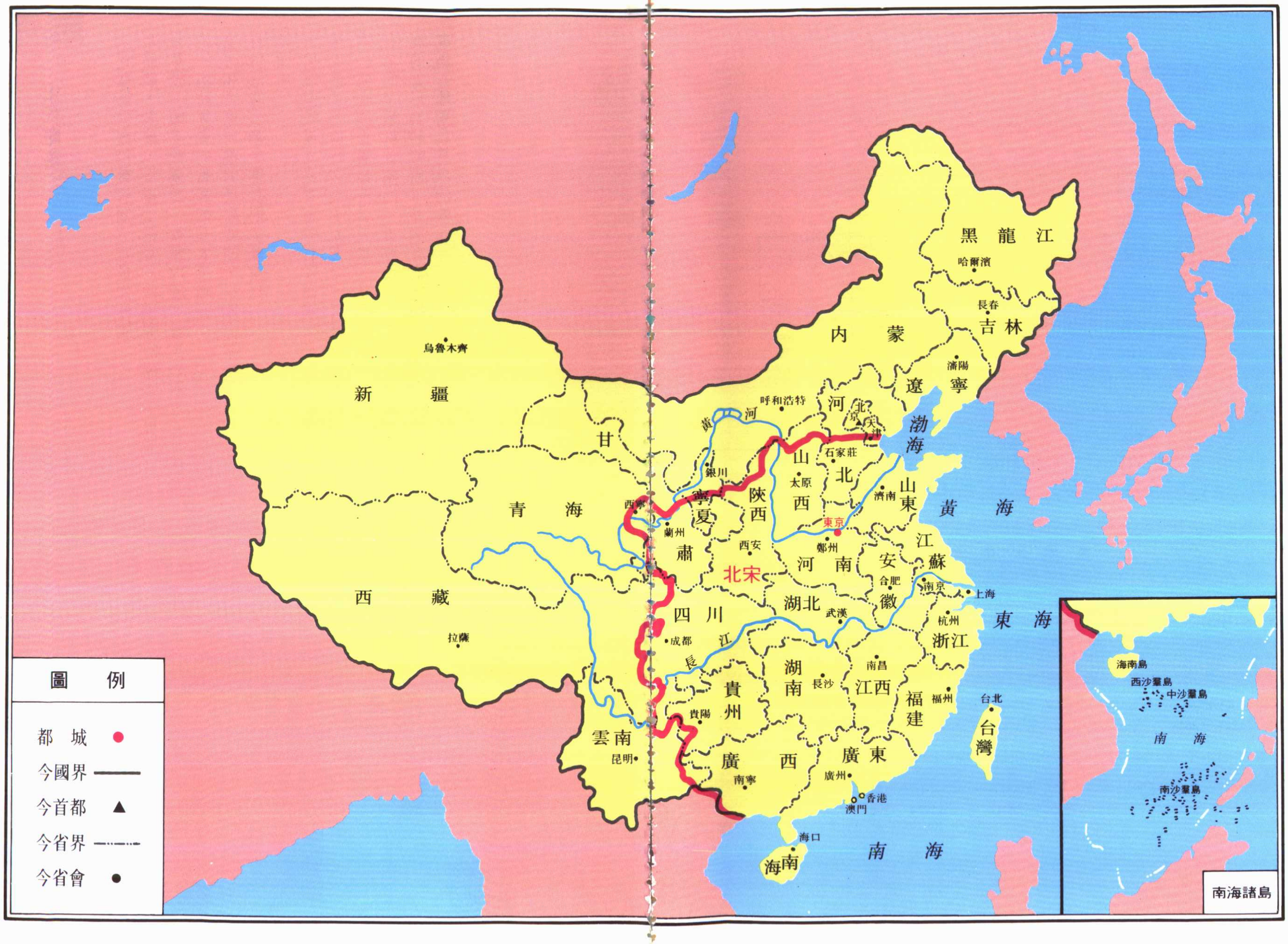
北宋帝系表


(一)太祖趙匡胤
(960—976)
(二)太宗匡義
(976—997)
(三)眞宗恒
(997—1022)
(四)仁宗禎
(1022—1063)
(五)英宗曙
(1063—1067)
(六)神宗頊
(1067—1085)
(七)哲宗煦
(1085—1100)
(八)徽宗佶
(1100—1125)
(九)欽宗桓
(1125—1127)

南宋帝系表


(一)高宗趙構
(1127—1162)
(二)孝宗眘
(1162—1189)
(三)光宗惇
(1189—1194)
(四)寧宗擴
(1194—1224)
(五)理宗昀
(1224—1264)
(六)度宗禥
(1264—1274)
(七)恭帝㬎
(1274—1276)

宋代疆域圖（1111年）


黑龍江
哈爾濱
長春
吉林
內蒙
瀋陽
遼寧
渤海
烏魯木齊
新疆
呼和浩特
河北
京
天
津
黃河
甘肅
山西
石家莊
太原
銀川
寧夏
陝西
西寧
蘭州
西安
東京
鄭州
河南
山東
濟南
黃海
青海
西藏
拉薩
北宋
安徽
合肥
江蘇
南京
上海
湖北
武漢
四川
成都
長江
杭州
浙江
東海
湖南
長沙
南昌
江西
福建
福州
貴州
貴陽
台北
台灣
雲南
昆明
廣西
南寧
廣東
廣州
香港
澳門
海口
海南
南海
圖例
都城
今國界
今首都
今省界
今省會
海南島
西沙羣島
中沙羣島
南海
南沙羣島
南海諸島

宋代服飾

宋代服飾大體沿襲唐制。官員的便服是圓領、大袖、下裾上接有一段橫欄的欄衫，腰間束革帶，頭上戴幞頭，幞頭內襯木骨，外罩漆衫，與唐初的臨時繫裹的軟腳幞頭大不相同。皇帝和官僚所戴的展腳幞頭，兩腳向兩側平直伸長。身份低的公差、僕役則多戴無腳幞頭。

由於幞頭變成文武百官的官服頭衣，平民百姓便很少戴了。這時文人士大夫中，又流行用古代的幅巾，用紗羅在頭上裹出許多式樣。其中最有名的是蘇軾首創的「東坡巾」。它是一個高高的方形烏紗帽筒，外側有低矮的上折檐，成爲一種獨具特色的幞頭。

蘇軾像。
蘇軾頭戴的是
「東坡巾」。

南熏殿舊藏宋太祖趙匡胤像，
其頭衣即幞頭，
左右各長二尺以上。

在宋人畫卷
《雜劇人物圖》中低下層
婦女的打扮

《歷代帝后圖》中的
宋仁宗皇后

宋代婦女的髮式冠簪很有特色，以高髻爲主。當時一般的高髻都在一尺上下。同時婦女的首飾花樣相當豐富，不僅用鮮花插成花冠，還用羅絹、通草、金、玉、玳瑁等材料編織成花冠。從河南白沙宋墓壁畫等宋代人物畫上，都有頭戴衣冠的婦女，可以爲證。

宋代婦女的服裝式樣比較簡單，通常穿的上衣有襦、襖、衫、背子、半臂、背心等。下層勞動婦女往往上身穿襦襖，下身穿裙或長褲。背子是宋代的新服裝，女子穿用最多，她們將背子套在外邊，作爲便服穿用。一般來說，身份低下的婦女，穿的背子比較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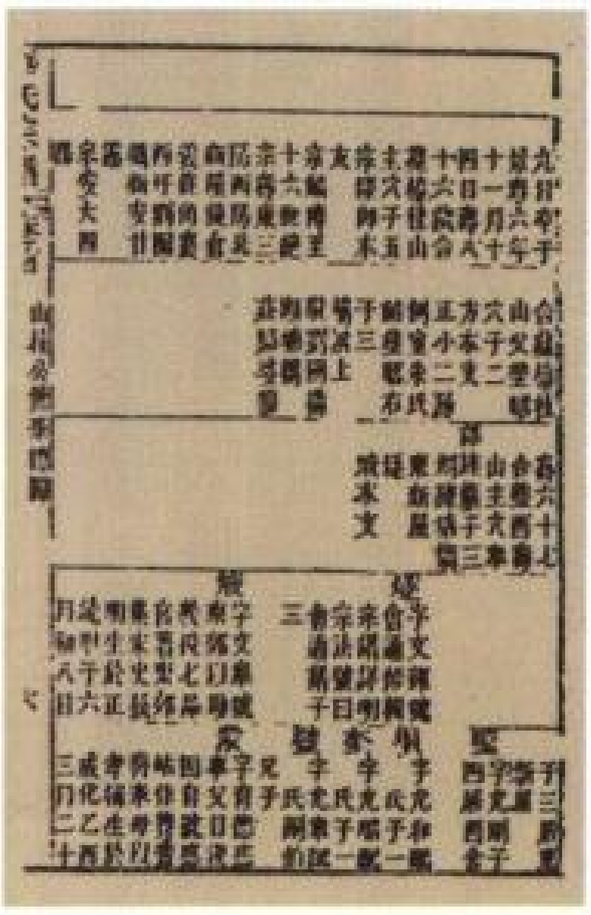
婦女的下衣基本上是穿裙，大多用羅紗製作，加以刺繡和彩畫。而且女裙一般比較寬肥，裙料在六幅以上，最多可用到十二幅。上面做出細密的折襉，例如福州宋黃昇墓中出土的裙子上有六十個以上的折襉。後世的百折裙便沿習了這類衣式。

活字印刷

自晚唐、五代流行雕版印刷以後，逐漸代替了傳統的手工抄寫，對於文化的傳播起了很大的幫助。

宋仁宗時，平民畢昇在雕版印刷的基礎上，發明了活字印刷術。畢昇用膠泥刻字，一字一印，以火燒硬；這些活字，用時便揀出來排版，便可施墨進行印刷。這種印刷原理，與近代流行的鉛字排版印刷完全相同，而且更爲方便、快捷和節省費用，在印刷史上是一項重大的革新。元、明時發明的木活字和銅活字印製法都是在畢昇的泥活字的啓發下創製出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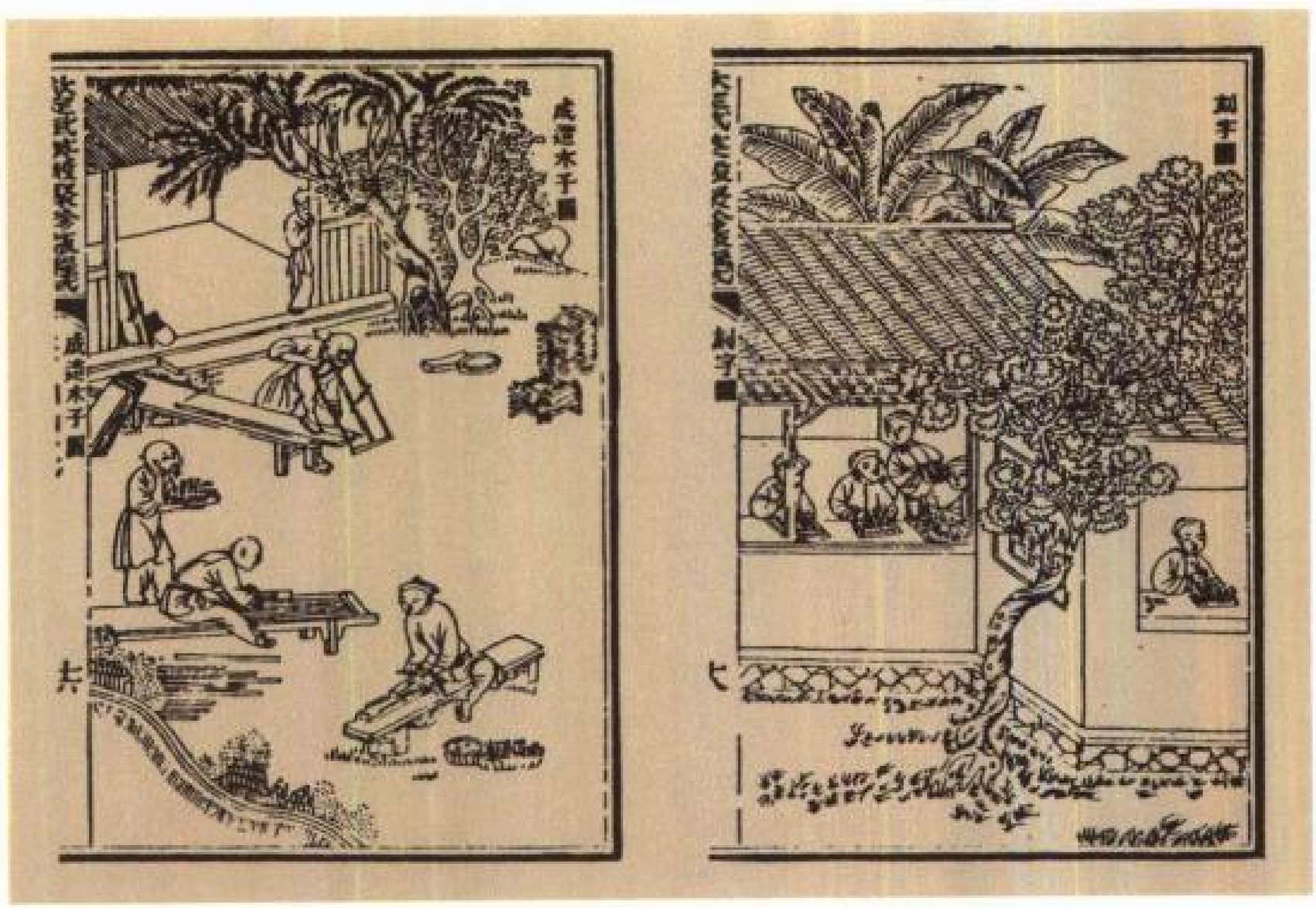
清代(1872年)以木活字排印的書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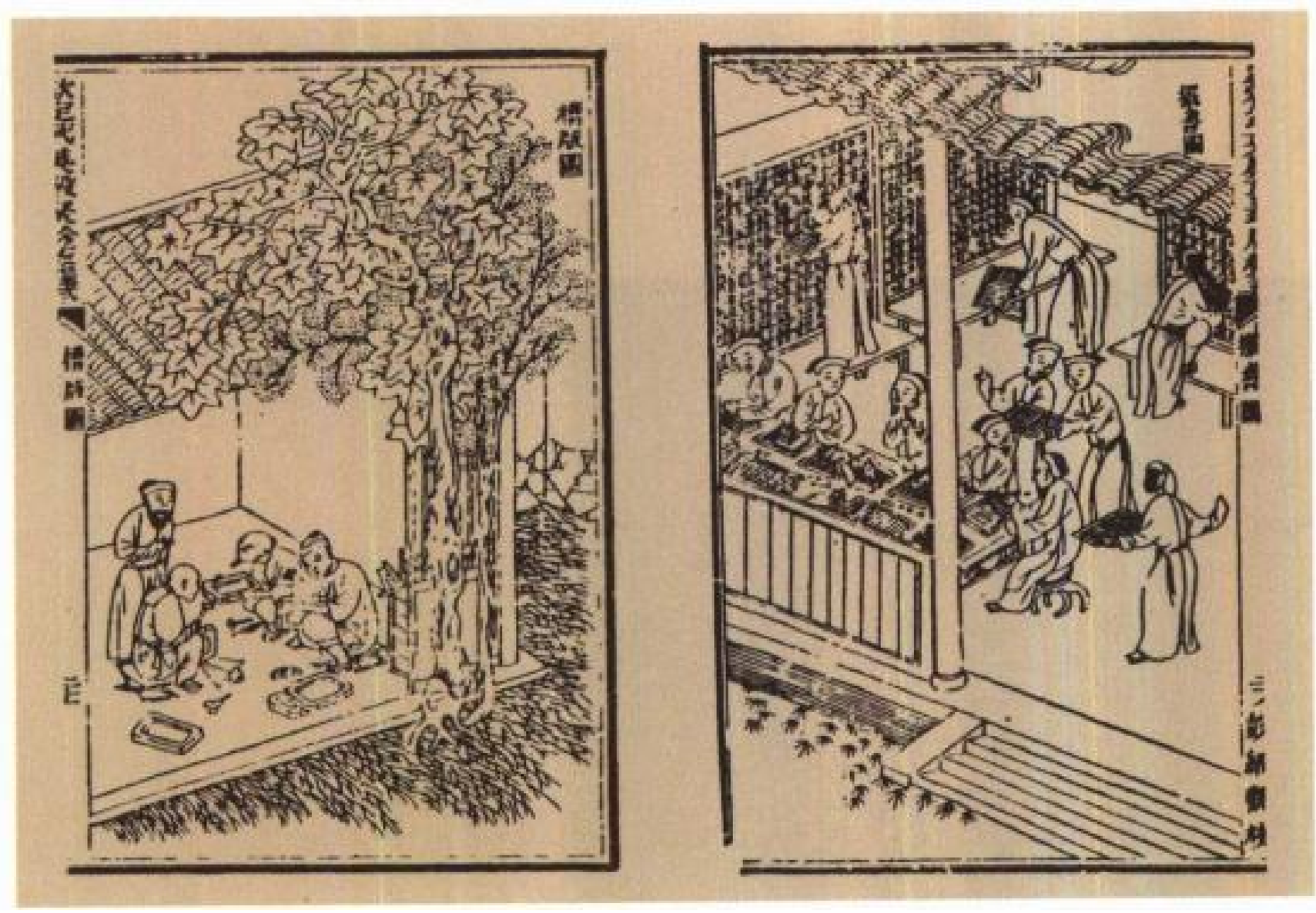
最早版本《夢溪筆談》(沈括)中有關畢昇用泥活字印刷的記載

版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爲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後典籍皆爲版本板中有布衣畢昇又爲活版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脣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版其上以松脂蠟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爲一板持就火煨之藥稍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爲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爲神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纔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板內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爲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訖急可成不以木爲之者木理有疎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粘不可取不若隨土性設再火令藥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爲余舅家得至今保藏

沈括夢溪筆談卷十 雜誌一 活字印刷



成造木子　　刻字



槽版　　擺書

宋代的瓷器

中國瓷器發展到宋代，已達到了歷史上最高水平，是陶瓷史上的黃金時代。並且有八大窰之稱。當時，不僅國內人民已普遍使用瓷器，而且遠銷到世界各地，受到國外的一致好評。

當時名窰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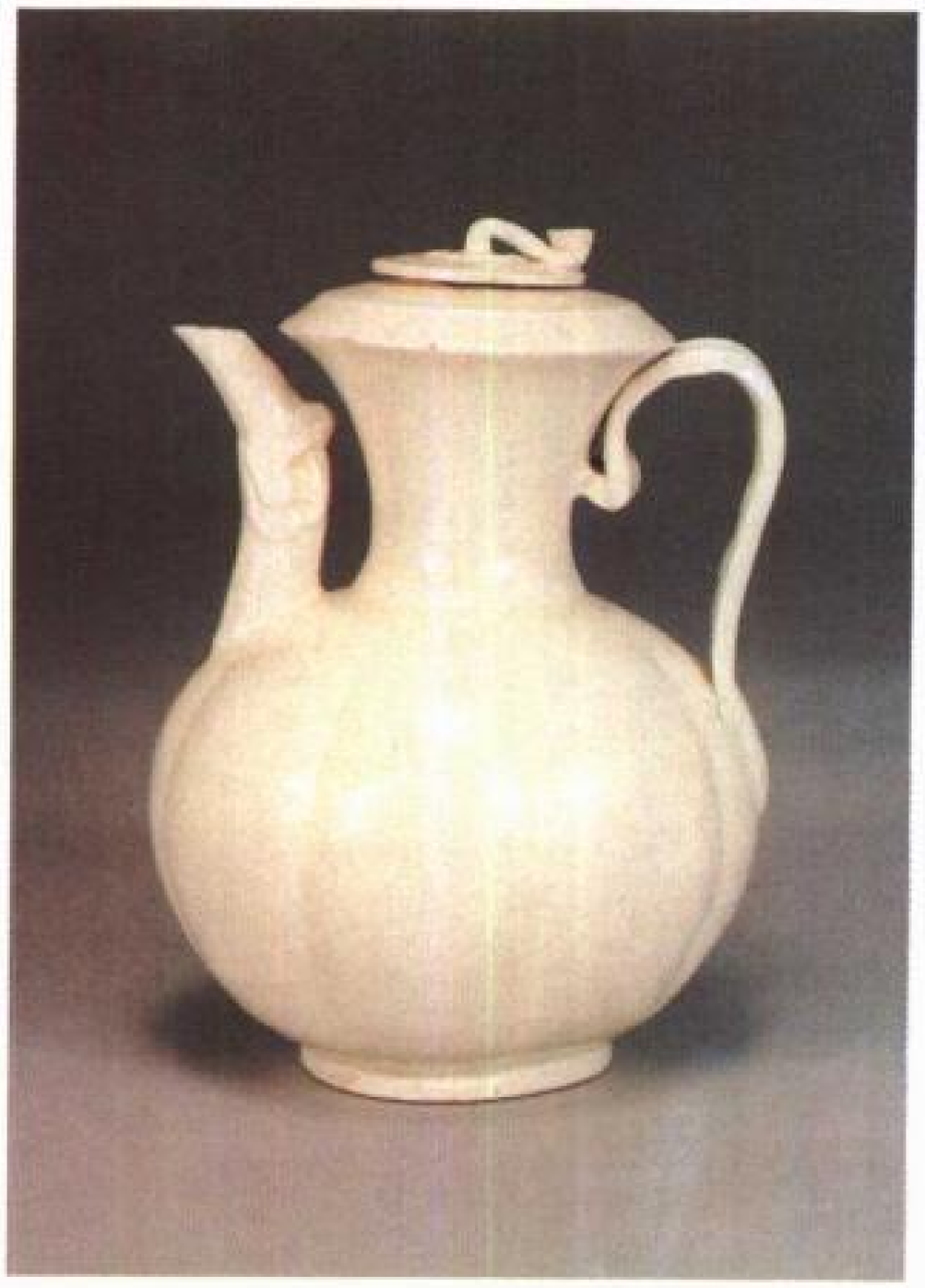
定窰產品以胎薄質細的刻花或印花的白瓷著稱。

耀州窰以刻花或印花的青瓷見長。

官窰產品的釉面多有紋片。鈞窰則以銅紅釉和天青釉相結合，形成獨有的紅紫斑和海棠紅等特殊釉色。

磁州窰花紋以纏枝牡丹、水鳥和魚最多。景德鎮窰燒造一種界於青瓷與白瓷之間的「影青瓷」，胎薄質細，釉色淡雅，圖案精美。龍泉窰產品多屬刻花或印花的青瓷。建窰產品以飲茶用的碗盞爲主，胎重釉厚、口部較薄是建窰的特色。

鈞窰海棠式花盤



定窰瓜稜形龍首注壺

哥窰雙耳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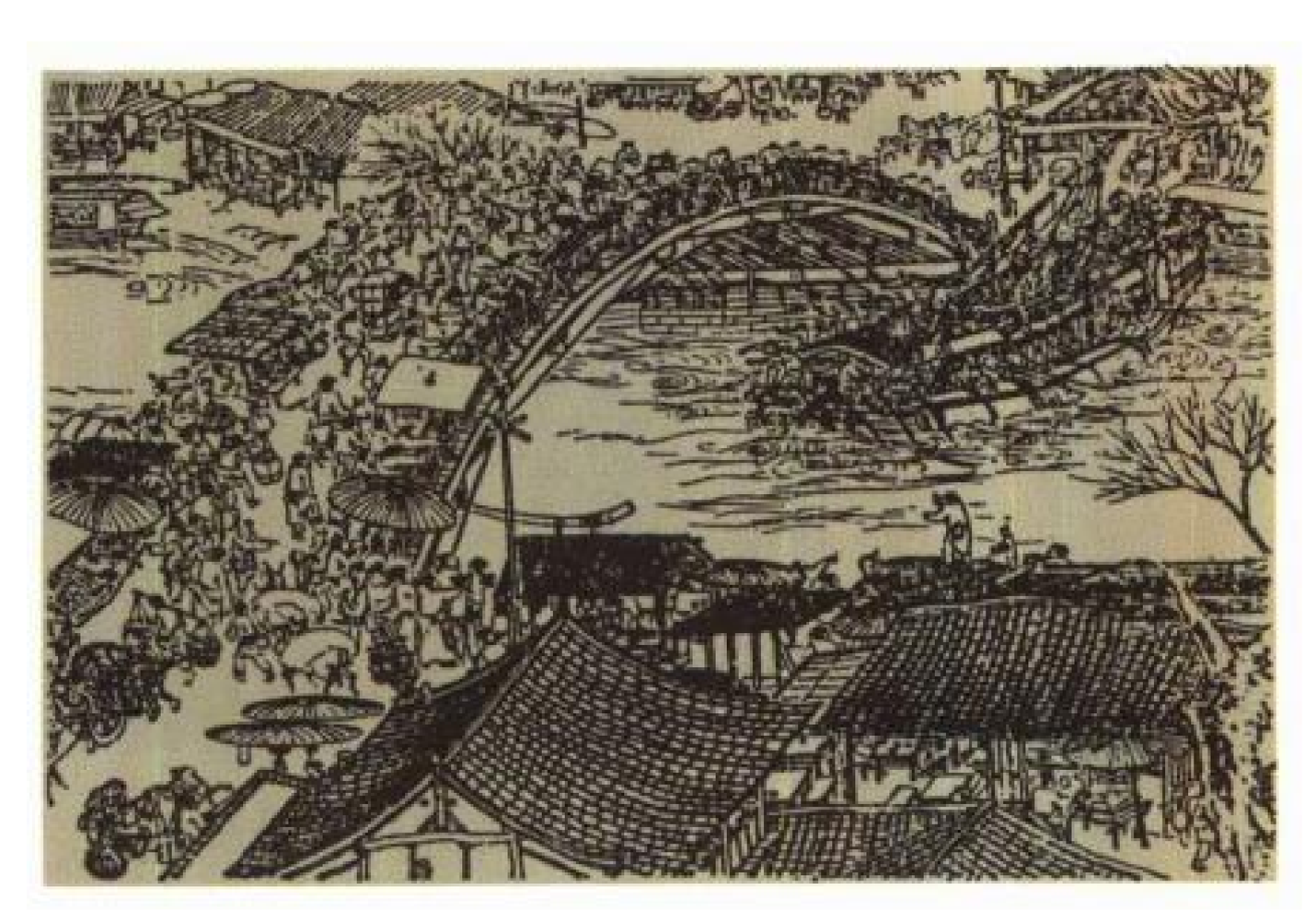
龍泉窰青瓷弦紋蓋瓶

宋代都市風情

北宋的汴京（今河南開封），是當時的國都，也是一個極具都市風情的城市。

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中，商號林立，攤販衆多，水陸兩旺，行人肩摩接踵，各色人等，無論是長衫飄揚的商賈店東，或是短衣褐布的勞者，都顯得生氣盎然，都與這繁華氣度，相互映照，構成了一個熙熙攘攘、朝氣勃勃的熱鬧場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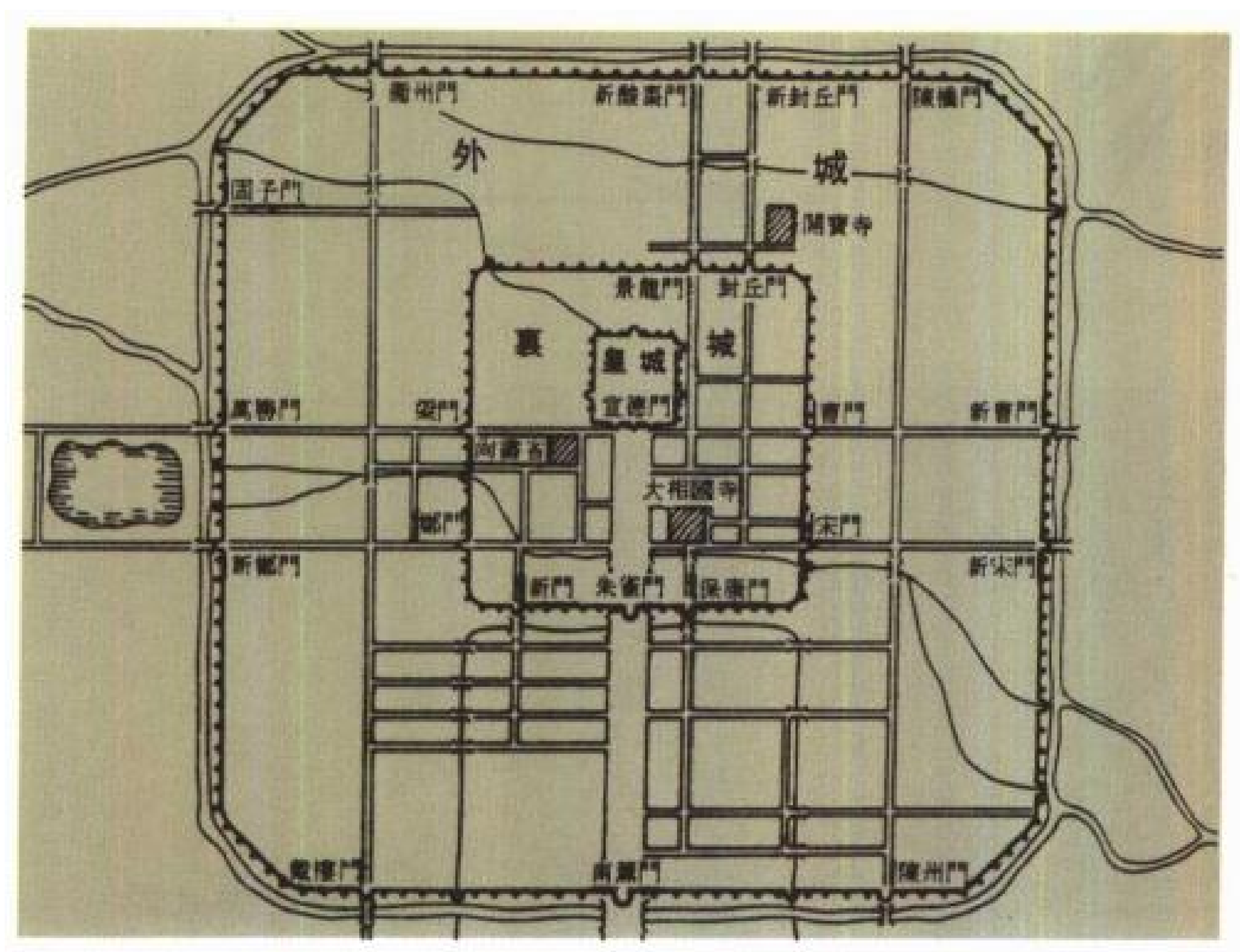
《貨郎圖》，反映宋代小商販買賣情況。



《清明上河圖》，顯示北京汴京繁榮的一面。

汴京的都市風情，在《水滸傳》、《東京夢華錄》等文獻中，亦可窺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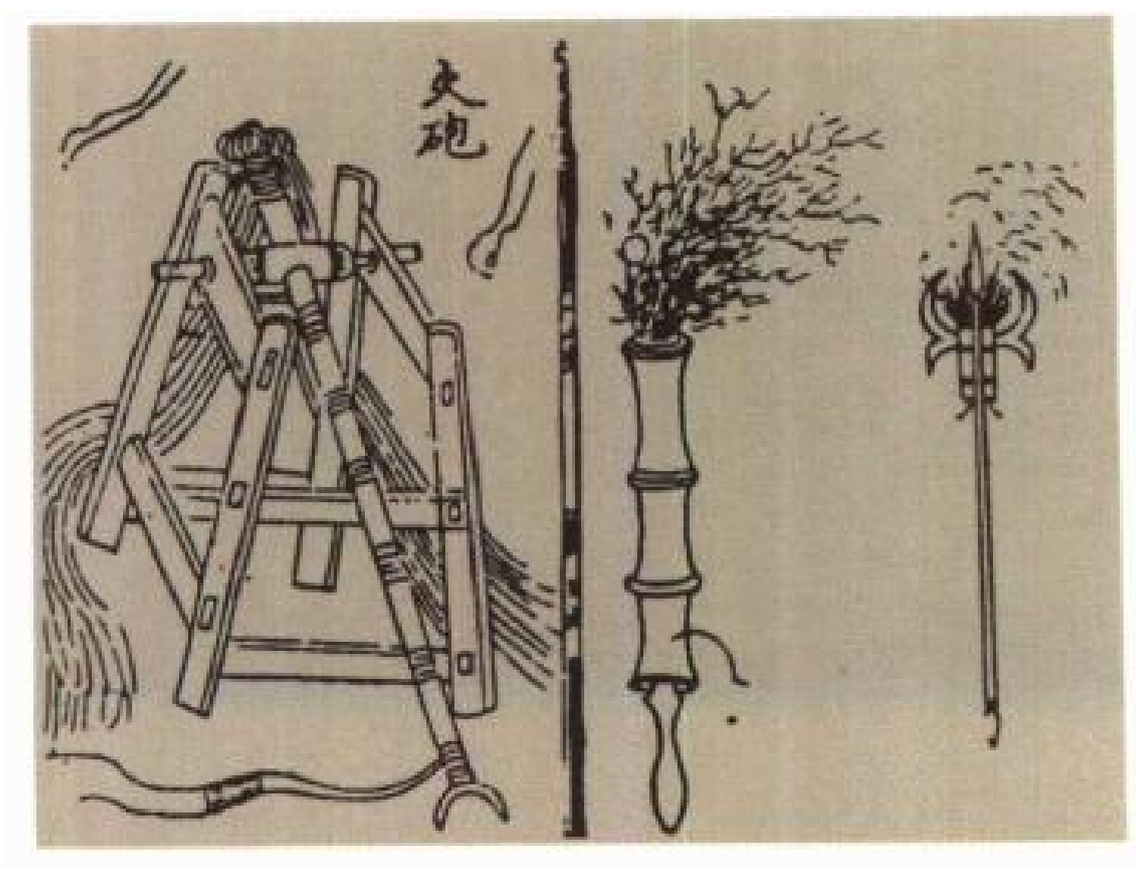
相國寺（河南開封），
位於北宋時
汴京的中心地帶。



北宋汴京圖

火藥火器

火藥是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唐代已經應用，但用在軍事上則要到北宋時期。宋太祖曾用火箭、火炮攻打南唐，火箭是把火藥球縛於箭鏃之下；火炮則把火藥製成球狀，點燃後用拋石機擲出。南宋時，出現了火槍。這種武器是將火藥裝在巨大的竹管內，然後燃點，火焰噴出槍前丈餘。後來再加上「子窠」，是最早能夠發射子彈的火槍。同時，在抗金期間，還使用過一種由火藥、石灰和紙管造成的「霹靂炮」，一度打退金兵。



宋代的火藥武器
「火砲」和「突火槍」

主編的話

當年，孔老夫子站在岸上觀看江流，發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的感嘆。後人大約受此影響，總愛將歷史比喻成「奔騰不息的長河」。可是，這條源遠流長的大河實在茫無際涯，水深難測。自有人類社會以來，從古到今，無論是叱咤風雲的英雄，還是默默無聞的凡夫，無論是識略過人的史家，還是目不識丁的文盲，都既不可能置身於時代的激流浪花之外，踏在某一處河岸上冷眼旁觀，也不可能騰空在宇宙的萬里蒼穹之上，透徹地審視古今或準確地預卜未來。中國古代良史有「秉筆直書」的美譽，其實（恕我直言），他們的著述已含有太多的「水份」，譬如《左傳》開篇的寫莊公入隧道與姜氏賦詩，《史記》名篇《魏其武安侯列傳》中的「灌夫罵座」，都有明顯的虛構。幾位絕頂聰明的美國學者撰寫《世界史》，以尼羅河的沉沙爲開場白來追述古代文明，實際上也是一種「模糊史學」。一千五百年前中國的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指出：修史

者要「表徵盛衰，殷鑒興廢」，「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褒見一字，貴逾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可見主觀性極强。他頗感慨史學家的動機與效果很難統一，故而「追述遠代，代遠多僞」、「記編同時，時同多詭」。可見「實錄」不易，失真度很高。我以爲問題的癥結在於古代許多政治家過於强調史籍在政治上的諷諫與借鑑作用，使修史者不得不有所顧忌、有所抑揚、有所增删，他們在記錄、開掘歷史的同時，又往往掩蓋了不少有價值的東西，將歷史變得單調而又模糊了。二十年前，我的老師啟功先生就曾針對古代正史的弊端寫了一首《賀新郎·咏史》詞：

古史從頭看。幾千年，興亡成敗，眼花撩亂。多少王侯多少賊，早已全都完蛋。盡成了，灰塵一片。大本糊塗流水帳，電子機，難得從頭算。竟自有，若干卷。　書中人物千千萬。細分來，壽終天命，少於一半。試問其餘哪裏去？脖子被人切斷。還使勁，斷斷爭辯。簷下飛蚊生自滅，不曾知，何故團團轉。誰參透，這公案？

這真是一針見血！

宋神宗趙頊在爲司馬光《資治通鑑》所作序的開頭說：「朕惟君子多識前言德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如果我們撇開政治的功利不談，對於廣大的讀者來講，這句話倒可以啟示我們認識讀史的目的，即：增添文史知識，加强品德修養，豐富日常生活。既然歷史是一面鏡子，就不能只反映單調的圖像，只折射出一種顏色。歷史應該是一面絢麗多彩的寶鑑，歷史的借鑑也應該是多方面的。

因此，當香港中華書局約我主編這套「中國歷史寶庫」叢書時，我們很快地達成了這樣兩點共識：作爲雅俗共賞的普及性歷史讀物，一是要把豐富多彩的歷史文化如畫廊精品般紛陳在讀者面前，而避免單一地敍述各朝各代的「階級鬥爭史」；二是作者應像高明的丹青手作畫一樣，融主觀情感色彩於客觀圖像的描繪之中，不拘泥於歷史的成見。這個想法，也得到了叢書作者們的贊同。理由很簡單：歷史的圖卷本來就不止一個畫面、一種色彩。假如去看達·芬奇(Leonarodo da Vinci)的畫展，面對的僅是千百幅一模一樣的《蒙娜麗莎》，即使那微笑的面孔再神秘動人，我相信觀衆們也會興趣索然的。

這套叢書的作者，大多是近幾年來在大陸文史學界成績蜚然的中青年學者。

他們學有專攻，在題材的選擇上自然會有所側重，但同時也都盡量注意了廣采博覽，以力圖反映中國古代五彩繽紛的時代風貌。至於在寫作的風格上，除了共同追求語言的深入淺出、通俗簡潔外，無論是材料的概括、分析，故事的鋪敍、描述，還是與此相關的引證、議論，各人又有自己的一些特色。我想，讀一套書，可以領略寫史的多種手法，這對讀者來講，恐怕也是不無補益的吧。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爲了使這套叢書的內容更完整豐富、形式更生動活潑，更具有可讀性及保存價值，在香港中華書局編輯們的精心策劃與具體研究下，爲本書配置了許多精彩的圖表及簡潔的說明文字。對編輯們付出的辛勤勞動，我們的作者與廣大讀者都是應該表示深深的敬意的。

柴劍虹

一九九一年十月於北京六里橋宿舍

目錄

令人困惑的朝代 …… 一
黃袍加身 …… 六
「杯酒釋兵權」的是與非 …… 一二
太宗繼位的疑案 …… 一八
天書降瑞助真宗 …… 二四
王旦與寇準的遺憾 …… 二九
石介的弄巧反拙 …… 三三
狄青之死 …… 三八
王安石與理財 …… 四四
官制正規化的功過 …… 四八
哲宗與太后之爭 …… 五三

徽宗尊道抑佛……五八
徽宗的風流文采……六三
岳飛如何觸着逆鱗……六八
孝宗敬佛……七四
一段越軌的歷史……七九
「開禧北伐」的錯誤……八五
悲劇性的「端平更化」……八九
開慶之戰與襄陽大戰……九五
海上貿易與蒲壽庚……一〇〇
太祖對士大夫的誓約……一〇六
學生干政與學潮……一一一
宋代的官冗問題……一一六
宗室、外戚所得的禮遇……一二二
火藥在戰爭中的應用……一二七
軍隊經營工商業……一三三
沉重的軍費……一三七

奇特的計量制度——一四三
錢多還是錢荒——一四八
使用紙幣的利弊——一五三
楮幣的產生——一五八
打破闌闌的局限——一六二
商人的復興——一六七
紙的大顯神通——一七一
以茶易馬遺事——一七七
理學出現的時代背景——一八一
幾經磨難的理學——一八七
書院的發達——一九一
科場面面觀——一九六
從蘇軾看文人際遇——二〇一
水運儀象臺的發明——二〇六
發達的印刷業與「江湖詩案」——二一二
金字牌·遞鋪·邸報——二一八

神御殿・景靈宮・功德寺觀 二二三
摩尼教種種 二二八
尚茶、製茶與鬥茶 二三四
宋代風行的運動 二三九
活躍的伎藝人 二四五
多才的官妓 二五一
由葑田看人口問題 二五六
不同種類的節日 二六〇
公職人員的假日 二六五
火葬與風水 二七〇
開放的社會與婚姻 二七五
婦女改嫁與貞節觀 二七九
醫官系統與王繼先 二八四
火德・火災・防火 二九〇
社會保障設施 二九五

令人困惑的朝代

有人說，宋朝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不是嗎？在學術上，宋朝的理學是儒學的真正哲學化。在此以前，儒學中訓詁學佔了很大比重，與哲學相關的內容雖不是沒有，但比起宋代理學來，那真可謂不可同日而語了。宋朝的史學碩果纍纍。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在中國古代史學史上的地位，幾乎只有《史記》才能相比。二十四史中有三史完成於宋代。宋人還編撰了唐、宋、五代三代會要和《通志》，創立了史學著作「紀事本末」新體裁。宋代的文學成果豐盛。唐宋文章八大家中有六家是宋人。宋代的詞在中國詩歌史上堪稱一絕。著名的四大書（《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太平御覽》、《册府元龜》）篇帙浩大，是宋人編撰。

在其他文化教育事業上，宋朝是學生在校人數最多的朝代之一，又是私人書院最興盛的朝代之一。宋代的出版事業十分興盛發達，除前面述及的學

術著作外，還有佛教的大藏經、道教的道藏，也在印刷發行。宋代的戲劇說唱藝術發展迅速，元雜劇、明清小說都是在此基礎上興盛起來的。宋代的科技事業也是成就異常輝煌。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有三項（活字印刷、火藥、指南針應用於航海）是始於宋代。數學上的賈憲三角、物理學上的潮汐理論、天文學上的水運儀象臺的製作，諸如此類，都在世界上遙遙領先。

在社會經濟上，市場衝破了闔闢的局限，從而使都市的繁榮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中國江南地區的開發，使糧食畝產量高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宋朝的銅、鐵、鉛、錫的年產量之高不但在中國古代史上空前絕後，而且在當時的世界上絕無僅有。宋代又是中國銅鐵幣鑄造最多的時期，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廣泛應用時期。

在國家政治制度上，宋朝開創了高度中央集權的新體制，這種體制爲明清兩代所效法，成爲中國近古長期存在的一種國家制度。

如果不是限於篇幅，我們可以具體地、細緻地講出許多宋朝的值得誇耀的事物，指出許多「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生動體現，來證明宋代處於中國古代史上的巔峯地位。

然而與上述意見並存的還有另一種見解，即認爲宋朝是一個最腐敗無能的朝

代，是一個令人感到耻辱的朝代，是一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朝代，是處於中國歷史上由興盛轉向衰落的轉折時期的朝代。

請看，在宋朝與鄰國交戰的記錄中，有幾次是以宋朝得勝爲結局的？很少。宋朝打不過北方强大的契丹（遼），只好給人家年年納貢。在遼朝被金朝佔去大半領土之後，宋朝與遼朝的戰爭卻仍以宋朝的敗北爲結果，以至宋朝不得不用大量資財從金人手中贖回燕京空城。宋朝打不過遼朝，或許可爲之辯解說遼朝是個大國，情有可原，但党項族建立的夏朝卻是只很少領土的小國，宋朝在對夏作戰中也是屢屢受挫，損兵折將，以致也要給夏朝年年輸送「賞賜」。再看南宋的對金作戰，紹興北伐、隆興北伐、開禧北伐，也是勝少敗多，有時簡直可算是敗得一踏糊塗。金朝即將被元朝滅掉時，宋軍去攻，居然還是吃敗仗。至於宋朝與蒙元的戰鬥，那就更加悲慘了。縱觀宋朝的軍事史，簡直可以說是一部充滿屈辱的歷史、一部不堪回首的歷史。

以上是宋朝的「弱」，人們給宋朝歸納的另一特點是「貧」。宋朝的「貧」不是一般的「貧」，而是民貧國也貧。人們講到一個朝代的盛衰，往往首先考察其墾田數。宋代墾田最高額僅爲五百萬頃，這同盛唐時的一千有

四百萬頃相比，乃爲三分之一强。關於民貧，當時無「國民收入值」指標，但宋朝士大夫連篇累牘的有關文字可作證明。兩宋經濟發展大抵以宋仁宗時期最穩定、興盛。宋仁宗時大臣富弼在奏疏中講：「天下民人恩信不及，配率重大，攘肌及骨，悲愁怨恨，莫不思亂。近者凡有盜賊，應者如雲，足見人心多叛。」他說百姓貧困，以致思亂，並非危言聳聽。在他之前，大臣賈昌朝講：「西夏不足慮，而民困爲可憂。」在他之後，大臣范鎮講：「朝廷之憂不在邊陲，而在冗兵與窮民也。」思想家李覯也道：「輟衣止食，十室九空」，「不爲盜賊將何適也」。事實上兩宋局部地區的農民暴動從開國到滅亡大抵從未停止過。南宋文學家陸游的呼籲：「今日之患，莫大於民貧！」應該說代表了宋代許多有識之士的共同心聲。

至於宋朝的國貧，那就更加明顯。在存留至今的宋朝財政年收支總數中，支大於收和支收相抵者遠遠多於收大於支的年度。在主持過財計的人（如蔡襄、蘇轍、張方平等）的文集中，都可見到有關財政吃緊的文字。這種財政的緊張狀態，使宋朝君臣產生了過分注重財計的心理。北宋文人鼂補之上書抨擊道：「廟堂之上、命令之先務，公卿大臣之謀謨者，錢也。刑罰之所重，雖殺人可赦而錢不可赦也。使者旁午、文移急於星

火，譴訶無所不至，惟錢是恤也。」連百官的優劣也以能否斂到錢來區分。南宋時因國貧而濫印紙幣，到後來，紙幣發行量竟達十幾億貫，一貫紙幣買不到一雙草鞋。

此外，宋朝官僚機構效事之差、許多制度有文無實，人材埋沒之嚴重，繁文縟節等等，在中國古代各朝中恐怕也堪稱「之最」。清人顧炎武講：「宋世典常不立，政事叢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近人錢穆講：宋朝是「最沒有建樹」的。今人柏楊講：宋朝「立國精神是抱殘守缺，苟且偷安」。等等。他們所講，或非過甚。

所以，了解宋朝歷史，既應知其值得讚譽之點，也應知其應當痛惜之處，不然就易流於片面。筆者擬在下面的篇章裏，既講好話，也講歹話，實事求是地爲諸位揭示宋朝歷史的各個側面。

黃袍加身

後周世宗柴榮率軍北征契丹，一路順風，連克瀛、鄚、寧等州，正準備直搗幽燕、復唐舊疆之時，忽然病倒。回到東京，一病不起，與世長辭。他的兒子僅有七歲，即皇帝位，乃是後周恭帝。不久，消息傳來，北漢聯結契丹，出重兵入侵後周。後周朝廷決定，派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率軍出征禦敵。

趙匡胤率軍出發，當夜駐軍於離東京四十里的陳橋驛。第二天天没亮，軍隊就發生嘩變。人們吵吵嚷嚷地來到趙匡胤的寢所，趙匡胤的弟弟趙光義進去把尚在熟睡的趙匡胤叫起。趙匡胤出來一看：軍隊的官兵全都槍在握、刀出鞘，儼然像是要同誰厮殺。有人對着趙匡胤高聲喝喊：「願請都點檢爲我們作主，都點檢應當作天子。」趙匡胤還未來得及表態，有人便將黃袍披在趙匡胤身上。接着周圍的官兵全都呼啦一下跪倒行禮，三呼萬歲。然

後七手八腳把趙匡胤扶上馬，大軍掉頭向東京進發。趙匡胤回到東京，逕回自己府第。衆軍將把宰相范質等人找來，趙匡胤見到范質等人，痛哭流涕地講：「發生了這種事，真是上對不住天，下對不住地，也對不起死去的世宗啊。」范質等還沒張嘴。有個名叫羅彥瓌的軍官按劍厲聲喝道：「我們軍隊須有人作主，今日務必要一位德高望重的天子。」范質等人面面相覷，最後只好給趙匡胤下拜行君臣之禮。於是，由范質等人出面，組織了周恭帝禪位給趙匡胤（即宋太祖）的盛大典禮。宋朝的歷史由此開端。

當然，以上關於此次政變的記述是按照宋朝史官的記載敘述的，後人對此種記述提出了疑問：這次政變是偶然發生還是蓄謀已久的。宮修史書强調其偶發性，但有些情況卻令人起疑。如《邵氏見聞錄》載趙匡胤受命率軍出征未行時，「京師之人喧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爲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他州。」京師百姓如何預先得知趙匡胤要作皇帝呢？又如前述趙匡胤推辭之際，已有人將黃袍加於其身，那麼，此必須皇帝才能服用的黃袍又是何人預先準備？且事變發生前後，除侍衛親軍副指揮使韓通（記載中也未言其有反抗表示）被殺外，在京駐軍將領竟全無持異議者。實在令人難以思議。顯然，這次事變很可能是蓄謀已久、組織嚴密的。當然，也有認爲主謀是趙光

義和趙普，趙匡胤對此不甚知曉，不過這只是一種估計，也難得到充分證實。

宋太祖通過政變從孤兒寡母手中奪得政權，被一些人看作是不太光彩的事。這是否妥當，且不去管它，我們必須指出的是，宋太祖這個人，乃是一位極了不起的英雄。宋太祖出身於一位軍官的家庭，年輕的時候，其父趙宏殷在後漢劉氏的親軍中作頂着刺史頭銜的中級指揮官。宋太祖不願在父親的羽翼下過安定日子，毅然出走，獨自去闖天下。他先後到過隴西、湖北等地，幾受挫折。最後投到駐守河北的大將郭威門下，才逐漸得到賞識。後周取代後漢，趙匡胤在跟隨周世宗南征北戰的過程中屢建奇勳，最出色的是他在隨周世宗征北漢時，率手下兩千名士兵奮力衝殺，不但救世宗於險境，而且使整個戰局扭敗爲勝。由於他智勇雙全，戰無不克，年方三十，就晉升爲節度使，這在當時是非常的殊榮。他父親在軍隊中混了一輩子也没撈到節度使的官，此時也在後周軍中服役，級別反而低於趙匡胤。宋太祖憑着自己的努力，從普通的軍校，到後來成爲後周職位最高的將領，這一奮鬥過程充分說明了他的品格和才能都是異乎常人的。

宋太祖當了皇帝以後，緊緊抓住唐、五代「亂由兵起」的禍根，由許多方面進行改革，從而使持續近百年的動盪不安的局勢得到扭轉。這是宋太祖

宋太祖黃袍加身處
（河南開封陳橋驛）

第二個超乎前人之上的了不起之處。

宋太祖在位期間，除平定了後周殘餘勢力的反抗外，又先後掃蕩了南唐、南漢、後蜀、吳越、閩、荊湖等割據勢力。兵鋒所向，大體勢如破竹。這些軍事上的勝利，使宋太祖在位期間的軍事形勢和宋太宗即位以後直到北宋末年的形勢造成鮮明對照。宋太祖的赫赫戰功也使他在中國古代史上的形象大爲增色。

宋太祖還有許多勝過一般君主甚至勝過一般開國君主的地方。例如他不殺功臣、不殺成爲俘虜的前割據政權的君主，對曾因忠於舊主而傷害於自己的大臣、將軍如范質、曹彬等都委以重任，對在外統兵的將領從不輕易猜忌，顯示出他的大度。又例如，他很好地通過嚴懲贓吏而整頓了吏治，使中唐、五代以來吏治混亂的狀況得到根本扭轉。我們這裏不想一一羅列，只想舉一件事例，或許它可使人對宋太祖的才識有進一步的了解。

開寶九年（九七六），宋太祖來到西京洛陽，他向臣下們講了想遷都到洛陽的想法。不過遭到包括御弟趙光義在內的許多大臣的反對，其理由主要有二：一是漕運不便，二是遷都生事擾民。但太祖仍堅持要遷都，御弟趙光義親自來勸，太祖才講明了自己的真實意圖；原來他是想在遷都洛陽之後再遷

都長安，「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後來，太祖認清衆意難違，決定放棄遷都念頭，但仍憂心忡忡地說：「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不管遷都之事誰是誰非，宋太祖對冗兵之費的憂慮是極有預見性的。如果我們了解到兩宋軍費問題的嚴重，回過頭來再思索太祖的想法，就會感覺到他的憂慮是何等的深遠。

總之，古人將「唐宗」與「宋祖」並列，決非虛妄。宋太祖趙匡胤實是可與唐太宗李世民並列的中國古代賢明有爲的傑出君主。

「杯酒釋兵權」的是與非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的故事，幾乎是無人不曉的。當然，大都是僅知其梗概：宋太祖作了皇帝之後，有一天把握有兵權的大將石守信、王審琦等人請來飲酒，酒酣，宋太祖忽對衆人說：「我覺得當皇帝太難了，常常整宿睡不着覺。」衆人問其緣故，宋太祖說：「只因想當皇帝的人太多了。」石守信等人嚇壞了，忙不迭地說：「我們絕不敢有非分想法。」宋太祖卻講：「你們雖無此心，但難保你們的部下都沒有野心。如果有一天有人把黃袍加在你們身上，即使你們不想當皇帝恐怕也不行了。」石守信等聽了嚇得魂不附體，以爲宋太祖要對他們下手了。一齊哭着對宋太祖說：「請皇上給我們指條生路。」宋太祖於是說：「人生如白駒過隙，你們辛苦半生，何不釋去兵權，選擇好田好房子買下來，再多買些歌兒舞女，和兒孫們快快樂樂地過舒心日子呢？你們不統兵，我對你們便無猜疑，咱們君

臣之間永遠相安無事，豈不兩全齊美嗎？」石守信等人聽了跪倒磕頭稱謝。第二天，衆人都打報告請求解除兵權。宋太祖一一批准，另給無兵權的高官，賞了很多金銀財寶。多數人對「杯酒釋兵權」的了解，大致不過如此而已。

但是有些治史者卻不滿足於此，他們對此事作了更深、更細地考察研究，於是提出一大堆疑問：首先，最早記述此事的書籍，都是當時人的筆記，如丁謂《談錄》、王曾《筆錄》、司馬光《紀聞》等，而官修的《太祖實錄》、《三朝國史》等卻全無記載。宋人筆記史料來源大體是道聽途說，對於其中所述，有些不可不信，有些全然不可憑信，有些則真僞參半。那麼此則記述究竟可靠程度如何呢？難免其說不一。其次，北宋人筆記記述此事，均未說明事情發生的具體時間，南宋李燾編《長編》時，把此事繫於建隆二年七月，然而人們發現此年六月宋太祖的母親剛剛去世，依照禮法，宋太祖在新喪時是不能主持或參加酒宴的。又有史料證明，宋人筆記中提到的幾位握有兵權的大將解除兵權的時間前後相差較遠，即不是同時解除兵權的，而掌有軍權的石守信、韓重斌、劉延讓等都是在建隆二年以後才被解除兵權的。再次，宋人筆記中對於「釋兵權」所釋爲何種兵權的記述也互相矛盾，一說所釋

爲所有的兵權，一說所釋者僅爲殿前、侍衛兩軍（即皇帝近衛軍）的兵權，事實上此後上面述及的有幾位將軍到外地任節度使仍有軍權。

不管宋人筆記中有關「杯酒釋兵權」一事的記述有多少不可靠的成分。宋太祖抓住控制兵權這一環節來鞏固和加强自己新創王朝的統治地位，確是史有其事的。這個過程是頗爲複雜的，宋人筆記所述大約是把這個過程簡單化、戲劇化了，作了某些文學加工。宋太祖自己是從殿前侍衛軍首領地位爬上皇帝寶座的，所以對殿前侍衛軍兵權就特別留意。採取的措施乃是把原來統率殿前、侍衛兩軍的屢立功勳大將陸續調離，換上一些資歷淺、易於控制的人擔任其首領。鑒於唐代出現藩鎮割據的歷史教訓，宋太祖又有步驟地削減所謂節鎮官（節度使、留後、觀察使、防禦使、團練使、刺史）的權力。先是逐步地將節鎮使等的權力限制在所駐州府之内，即取消所謂「支郡」，使節度等使的管轄區大大縮小。又在有節鎮官的州設通判，讓通判負責本州的行政與財政事務。然後又派文官去擔任重要縣的知縣，派所謂監當官去負責稅收。這樣就把節鎮官的權力限制在軍事一個方面。最後宋太祖又下令增設專管軍隊的總管、鈐轄等，於是除了少數受朝廷委托者之外，一般節度官都成了徒有其名的空頭銜。

耳上悟於是召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非汝四
之力不得至此念兩曹之德無有窮盡然天子亦大難
難殊不易爲節度使之樂吾將夕未嘗敢安枕而臥也
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矣居此位者誰不欲
爲之守信等皆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
誰敢復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異心其如陛下之
人欲富貴者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爲其可
得乎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
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爲好富貴者不
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兩曹何不
釋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永遠
不復動干戈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

《續資治通鑑》書影　李燾記"杯酒釋兵權"事

實際上取消了節度等使後，爲了彌補在朝廷與州郡之間管理層次上的斷裂，宋太祖和他的繼承者宋太宗又在路（大體相當於唐朝的道）一級設立轉運使。轉運司與唐代藩鎮（節度使等）的主要區別是沒有軍權。它通常被稱爲「漕司」，説明它的主要職責是調運財賦，因而它不是一級完整的理財層次。它又被稱爲「監司」，説明它兼有監察州縣官吏的職能，但僅僅是監察，而不是完全的上級對下級的管理。因而，它不是一級完整的行政層次。這樣轉運司既無軍權，財權、行政權又是不完整的，要在所轄範圍內割據就是難上加難了。

應當承認，宋太祖通過嚴格控制軍權來加强國家的統一和穩定，在當時是很有必要的。宋朝避免了五代時那種短時期内就被别的朝代取代的命運，避免了動輒出現割據的情況，君主對軍權的控制起了關鍵性作用。但是，隨着國家和政權的穩定，本應糾正君主控制軍權方面存在的某些過頭作法，然而歷史卻走了相反的道路。自太宗以後，宋朝各代皇帝仍舊在不斷加强對軍權的控制。君主出陣圖在千里之外遙控指揮打仗，委派宦官作監軍、作大帥，不許將帥與士兵之間彼此熟悉，過分地分散兵權，諸如此類，鬧出許多笑話。宋朝軍隊打仗勝少而敗多，與軍權措施失當有直接關係。

後人評論此事，追根尋源，往往責怪宋太祖，其實是不公平的。宋太祖因時立制，即便有過頭處，主要部分卻是好的。錯誤在於他的繼承者們不知因時立制的道理，只知墨守所謂「祖宗家法」，沿着錯誤道路愈走愈遠。這才是應當受到責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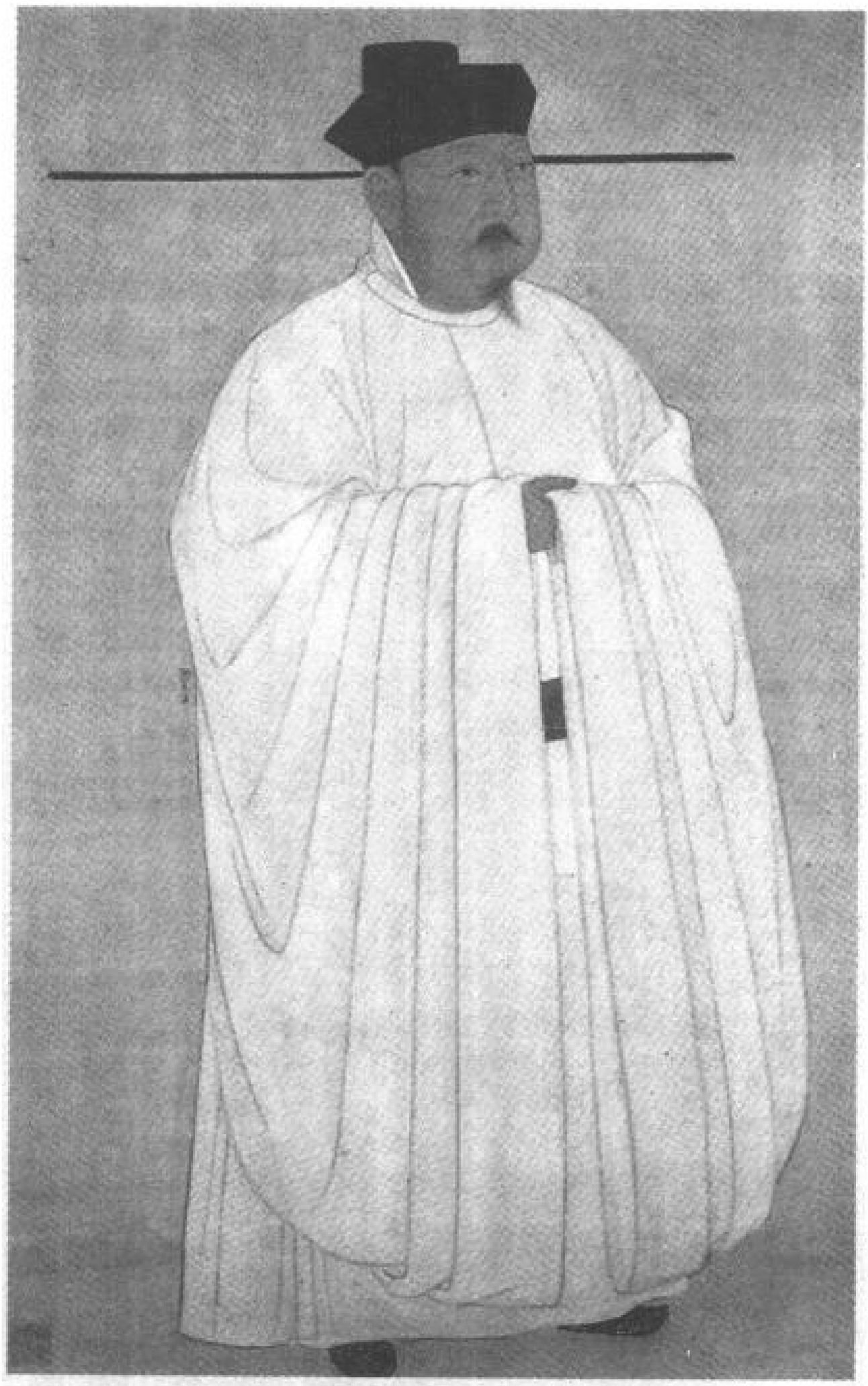
太宗繼位的疑案

宋太祖死得突然（死前不久尚在處理國事，死時年方五十），死後不是由兒子（死時長子二十六歲，次子十八歲）繼承皇位，而是由弟弟趙光義繼位，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懷疑。

宋太宗即位以後，令人起疑的事又一件接一件地發生。

首先，依照慣例，老皇帝故去，新皇帝須轉年才改年號，而太宗於十一月即位，十二月即改元。

太宗即位後七年，太宗弟趙廷美（光美）被告「驕恣」、「陰謀竊發」，因而被逐出東京，隨後，趙廷美又被指控「不悔過」、「怨望」，被安置到房州，次年，他「因憂悸成疾而卒，年三十八」。趙廷美死後，太宗還不罷休，竟向衆人講，趙廷美是自己乳母（奶媽）的私生子，並說他如何陰謀作亂事。真宗、仁宗時期，逐漸爲趙廷美平反，把陷害他的事，歸罪於趙



宋太宗趙光義

普。其次，太祖的兒子趙德昭、趙德芳在太宗即位後不久也都先後死去。太宗即位後第四年趙德昭跟隨他北伐契丹。一天夜裏有人報警，軍營裏頓時大亂，慌亂中找不到宋太宗，有人便提議立趙德昭爲皇帝。此事讓宋太宗知道了，很不高興。回來後，有人提議給有功將士獎賞，宋太宗拖着不辦，趙德昭好言相勸，宋太宗卻厲聲喝道：「等你當了皇帝再行賞也不算遲。」次日，人們便發現趙德昭已自殺身亡。二年後，他的弟弟趙德芳也不明不白地病死，年僅二十三歲。

至道元年（九九五）四月，宋太祖寡妻孝章宋皇后去世，時年四十四歲。宋太宗不爲他的寡嫂舉行國葬，而只把她草草殯在普濟禪寺內，直到兩年後他自己病重將死時才將她葬入皇陵。大臣王禹偁曾對此有所批評，太宗立即指責他訕謗，貶黜遠地。後來有人透露說太宗薄待寡嫂，是因爲宋后在得知太祖去世後，令人召長子德昭入內，圖謀讓德昭作皇帝。而宦官們知道太祖素來想讓太宗當皇帝，私下通知了太宗，他才得以繼位。此種說法雖說明了太宗爲什麼嫉恨寡嫂，卻使人生出新的疑問：宦官們怎麼知道太祖一定想把皇位傳給太宗？宋后此舉是否真的違背丈夫意願？

撰《宋史》者認爲上述四件事（「不逾年而改元、涪陵縣公之貶死、武功王

之自殺、宋后之不成喪」）「後世不能無議焉」。其實何止後世人有議論，當時人已經私下議論紛紛。所以，官方試圖用二種說法來消弭疑問。一是所謂「金匱之盟」的說法：宋太祖母親昭憲太后臨死，問太祖：「你知道你怎麼得天下嗎？」太祖答：「托您和我爹的福」。太后笑着說：「不然。實因後周柴氏讓一個小孩子當皇帝才給你造成機會。」接着又囑咐太祖：「你死後要把皇位傳給你弟弟趙光義，那樣你的兒子也可得到保全。」太祖磕頭應允。太后就命宰相趙普於病榻前寫下誓書，藏在金匱之內。此後許多年，太宗有一次聽信讒言，把趙普逐出京城，偶然發現金匱，打開一看回想起當時情景，又把趙普重新召回任爲宰相。

此種說法實難令人置信。因爲杜太后死時宋太祖三十五歲，大兒子德昭已十一歲，二兒子德芳三歲，她怎麼知道宋太祖死時他的兒子一定尚年幼呢？事實上太祖死時兒子也並不年幼啊！

又有一種宋太宗即位是上應天命的說法：宋初有神降於百姓張守真家，自稱是玉帝派來的尊神，號黑殺大將軍。此後張守真即出家作了道士，常常傳達黑殺大將軍的意旨。乾德年中，宋太宗（當時是晉王）曾請他做法事，張守真傳達尊神的話：「你將來要做太平君主，宋朝的第二個皇帝，

請你當了皇帝後修一座上清太平宮。」（太宗即位後確實建了一座規模宏大的上清宮。）後來宋太祖也請張守真做法事。天神又講了如下的話：「天上宮闕已成，雲鎖開，晉王有仁心」。次日太祖就死了。這種用神仙意旨來解釋太宗繼承太祖皇位的說法最多只能使人將信將疑，況且其中述及的道士張守真又是先與太宗接觸，後被太祖接見的呢！

本來，上述情況正使人們疑問叢出，而北宋的一位和尚文瑩又在自己的著作中作了「燭影斧聲」的描述，其原文如下：「有道士言此夜若陰雪，太祖將歸天，而忽降大雪。太祖急傳宮鑰開門召開封尹（即太宗也）延入大寢酌酒對飲，宦官宮妾悉屏之。但遙見燭影下太宗時或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禁漏三鼓，殿下雪已數寸。太祖引柱斧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是夕，太宗留宿禁內，將五鼓，伺廬者寂無所聞，太祖已崩矣……近臣……瞻聖體、玉色瑩然。」這一記述，又使人們產生了一種猜測：因爲根據記述，太祖死時，太宗就在宮內（另有北宋人蔡惇的記述也可證明），那麼太祖會不會就是太宗害死的呢？須知太祖身邊宦官首領王繼恩、入宮作法事的道士張守真等都與太宗關係非同尋常呀。講「聖體玉色瑩然」，是不是爲洗刷罪證對理呢？於是「燭影斧聲」便好

成了宋太宗是否謀害宋太祖這一疑案的專用名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地爭論了數百年。爲宋太宗辯白者有之，抨擊宋太宗害死宋太祖罪行者有之，認爲宋太宗未害死太祖而篡奪了皇位者亦有之。直到目前，訖無定論。

不管宋太祖是否爲宋太宗害死，但通過宋太宗把宋太祖的二個兒子及自己弟弟迫害致死的事實，我們總可以體會到古代皇室內部圍繞皇位的鬥爭的殘酷。

天書降瑞助真宗

按道理說，一個王朝，它最初的二個皇帝通常是打天下、立武功的皇帝，第三個皇帝則應是興文治、發展經濟的皇帝。但是宋朝的第三個皇帝宋真宗卻不是這樣，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到邪門歪道上去了。

宋真宋獲得帝位多少有點名不正言不順的。依照「金匱之盟」，宋太祖既傳於弟弟太宗，太宗本應傳位於自己的弟弟或太祖之後的。但是太宗把這些本該繼承皇位的人都整死了。太宗的長子在骨肉殘殺中受了刺激，得了精神病。次子被人毒死，這才輪到宋真宗來作皇帝。然而太宗病重之際，又出現了參知政事李昌齡等謀立楚王元佐事，使得真宗越發感到皇位不穩。

宋真宗很想幹點大事以立威信、鞏固皇位，然而咸平三年（一〇〇〇），親自征遼無功而回，景德元年（一〇〇四）再次親征，卻與遼朝訂立屈辱的城下之盟，答應向遼輸送歲幣。事後他越想越懊惱，正在愁苦之際，善體人意

的王欽若來提醒真宗：「您可以舉行一次盛大的封禪禮，就能鎮服海內，威懾外夷。」搞封禪得事出有因，真宗疑惑地問王欽若：「眼下未有大的瑞慶之事，如何封禪？」王欽若反問真宗：「您以爲史書上的河出圖、洛出書都是實有其事嗎：」真宗心扉頓開，一場天書降、聖祖臨的鬧劇由此拉開了序幕。

大中祥符元年（一〇〇八）年初，真宗召見宰相王旦以及王欽若，對他們說：「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半夜，我剛入睡，忽然看到一位戴星冠、服紅袍的神仙來到我面前，說：『你應當在皇宮正殿建一個月的黃籙道場，上天將賜予你大中祥符天書三篇，勿洩天機。』我按神仙的囑咐暗地裏舉建了道場。剛才接到皇城司的奏報，講左承天門的屋角上發現有一束黃帛，大約二丈，其上還繫着一件物品。」王旦等趕忙跪下磕頭賀喜。真宗卻一本正經地對他們說：「天書的內容若是批評國政，你們和我都要虛心改過。若是批評我個人，我也願意公諸於衆，讓大家監督我改過。」隨後真宗即率王旦等人來到左承天門處，發現黃帛所繫天書一封。真宗令執政大臣陳堯叟開啟天書。只見黃帛上書：「趙受命，興於宋，付於恒（真宗名字）。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封內天書三幅，文字頗多，「辭類《尚書·洪範》、《老

子道德經》，始言上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這是第一次天書降，這一天後來命名爲天慶節，同年四月，又有第二次天書降。六月，又有第三次天書降，不過與前二次不同，這次降臨地點在泰山。

與天書降直接關聯的兩件大事一是建玉清昭應宮和天慶宮觀，二是舉行泰山封禪。大中祥符元年，爲了報答上天的恩賜，真宗下令於京師建玉清昭應宮。此宮規模之大，共三千六百一十區，設施之豪華富麗，當時人認爲都超過了秦朝阿房宮。原計劃在十四年內修成，因主持這項工程的丁謂督促施人員加班加點、夜以繼日地工作，結果用了七年時間。大中祥符二年，（一〇〇九）宋真宗又下令各州府軍監關縣建天慶宮觀。玉清昭應宮、天慶宮觀都是遵照道教教義建的，且有道士在其內作法事，這樣，道教因此得到推廣，南宋史學家李燾謂：以前人們對道教不太感興趣，信奉者頗少，自此「天下始遍有道像矣」。

既有天書（瑞貺）屢降，封禪就可舉行了。於是先於大中祥符元年有泰山腳下父老一千二百八十七人及參加科舉的貢士八百四十六人一起到皇宮門前，上書請求行封禪禮。隨後又有宰相王旦率軍民二萬四千三百七

十人上書請求封禪。真宗不願違背「民意」，於是當年十月在泰山舉行了盛大的封禪禮。接着又到汾陰祀后土，到亳州朝謁太清宮太上老君，大抵也是迎合「民意」。

聖祖降臨是在大中祥符五年（一〇一二）十月的一天。在這之前，據真宗講，他夢見曾經宣佈天書將臨的神仙又來到他面前，向他傳達玉皇的命令：「趙氏祖先上卿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將要降臨。你要像唐朝尊崇太上老君那樣尊崇他。」之後的夜裏，真宋又夢見那位神仙向他傳達天尊的意旨，要他爲自己及六位侍從準備座位。準備工作做好後，聖祖便「真的」降臨了，聖祖對真宗說：「我是九位人皇中的一位，是趙氏始祖，先後幾次下凡，最後一次是在後唐年間，玉皇派我給趙氏天下作主，你要妥善撫育萬民，莫要辜負我的期望。」說罷乘雲而去。

由於聖祖降臨，宋真宗下令在玉清昭應宮內建聖祖殿，又在相傳聖祖降生地兗州壽邱和京師兩處建景靈宮（祀聖祖）、太極觀（祀聖祖母），令文人們編撰了五十卷的《降聖記》。宋真宗又親自撰寫了《聖祖降臨記》，記述此事。

自從所謂天書降之後，各地大興土木建造道教宮觀，還不斷地啟建道場。宋真宗東封泰山，西祀汾陰，勞民傷財，給百姓造成極大痛苦，嚴重破壞

了農業生產。晚年農業災害不斷，除了氣候的原因之外，人爲的原因也佔很大比重。宋朝攻滅諸割據勢力後，經濟發展遲緩與宋真宗的倒行逆施有很大的關係。

王旦與寇準的遺憾

從天書初降到真宗去世的十三四年時間裏，真宗與臣民們迎天書、封泰山、祀汾陰、尊聖祖、崇五嶽、謁老子、拜玉帝、建宮觀、撰文章，簡直是忙個不停。用撰《宋史》者的話說：「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在衆人都如醉如癡的狂潮中，難道就沒有頭腦清醒的人嗎？有的，而且並不算少。但敢於站出來反對的卻不多，因爲是明擺着與皇帝作對。這樣的硬骨頭雖少畢竟有，孫奭就是最出色的一個。

孫奭在天書初降時的官階爲工部郎中，職務爲判太常禮院、國子監、司農寺，龍圖閣待制的貼職，品級不是很高，但也不低，屬於侍從大臣一類。當時孫奭以熟知儒家經典而聞名於世。天書初降之後，不少被時人認爲是知識淵博者，如丁謂、杜鎬、陳彭年等，紛紛引經據典證明天書降臨事古已有之，乃非常慶瑞，但當宋真宗徵求孫奭意見時，他卻答稱：「我很愚鈍，只

曉得孔子講：『天何言哉？』上天不會用言語來引導人們，哪裏會有什麼天書？」令宋真宗下不了臺。

大中祥符三年（一〇一〇），宋真宗在東封泰山之後，又想西祀汾陰。孫奭上《十不可疏》，提出十條反對意見。宋真宗派內侍安撫他，他又再上書補充說明不應祀汾陰，並公開批評朝廷不思「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反而「撰造祥瑞，假託鬼神」，把宋真宗的伎倆幾乎揭露無遺。三年後，宋真宗擬祠太清宮，孫奭又上書反對，並明確指責宋真宗效法唐明皇，迫使他不得不作《解疑論》來爲自己開脫。此後，孫奭又上書批評裝神弄鬼浪費財物、揭露天禧天書爲僞造。從記載上看，他是唯一自始至終反對宋真宗天書降天尊觀等活動的人。他的錚錚鐵骨，受到後世人的讚揚。這裏要附帶言及，宋真宗還不算太糊塗，他對孫奭採取了容忍的態度，這確是很不容易的。

除孫奭外，大臣張齊賢、張詠、孫僅及將軍石普等人也都對東封、西祀持反對態度，他們主要集中地反對浪費財物。張詠批評大造宮觀「謁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他痛罵奸臣王欽若、丁謂，公開上書要求宋真宗斬丁謂頭以謝天下，然後斬下自己的頭以謝丁家。石普則上書稱如罷止天下崇拜

祥瑞的道場，每年可節省七十萬貫的開支，利國又利民。孫僅爲陝西轉運使，作《驪山詩》內言「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宮就祿山來」，諷刺建玉清宮昭應宮。此詩被人送到宋真宗手上，他因事故未能細讀全詩，孫僅才倖免於難。

抗拒潮流者始終是少數，大部分大臣、官員或受了蒙蔽欺騙，或迫於形勢，都成了隨波逐流之人，其中竟也不乏宿儒名士。例如名儒邢昺，在知曹州任上，上書擁護東封，並令屬吏部送本州文老詣闕請願。文學家楊億在知汝州任上，申報本州「粟一本至四十穗，麻一本至九百角」，附和祥瑞。然而最令人痛惜的是兩個在宋真宗時任過宰相的人物：寇準和王旦，他們一生以正直聞名於世，卻在天書等事上栽了大斛斗，遺恨千古。

天書初降時，王旦恰任首相。真宗與王欽若謀劃天書降之事，很怕王旦反對，欽若事先找王旦商量，軟硬兼施，王旦勉强表示同意。宋真宗怕他反悔，又單獨召見他，宴飲之後，賜他一尊酒，說：「這可是極好的美酒，拿回去與夫人孩子們一同享用吧。」回來王旦打開一看，尊內裝的竟全是珍珠。一方面是皇帝的天威，一方面是豐厚的賞賜，王旦終於順從了。然而這從此成了王旦的心痛。事情鬧得越大、越離譜，王旦的內心就越痛苦。終日鬱鬱不樂。最後，他在痛苦中死去，「將卒，以不諫天書爲憾，遺令削髮披緇以葬。」

寇準對王欽若等人搞天書降一事也不贊同，且有所表示，但他知道這事有宋真宗的支持，便未公開反對。後來他出任知永興軍，管內軍官朱能報稱發現天書降臨（時爲天禧三年三月，按順序應爲第四次天書降）。有人給真宗出主意：「衆人都知道寇準不相信天書降臨之事，這次天書降臨在寇準管區之內，應當讓他寫奏公開報告，這樣朝廷上下都會相信天書降臨實有其事了。」真宗依從。寇準起初不肯寫奏，無奈皇帝派貼身宦官周懷政去給他施加壓力，只得依令行事。後來寇準被任命爲宰相，有人勸他揭露此事真象以爭取主動，寇準怕丟宰相名位，沒有採納。不料，不久周懷政、朱能犯了謀反罪，僞造天書之事也被揭發出來，寇準因此被貶死雷州。他一生清白，晚年卻被天書事染上污點，豈不惜哉？

宋真宗搞天書降瑞、聖祖現靈等鬧劇，給後人留下了多少可爲感嘆的故事啊！

石介的弄巧反拙

看到湖南岳陽樓，便使人想到「慶曆新政」，滕宗諒、石介都是新政集團的骨幹，但是滕宗諒的事蹟稍顯平淡，石介的表現和遭遇則頗有戲劇性。

要講范仲淹與石介的關係，還須從范仲淹與另一位學究的交往開始。范仲淹在仕途上的經歷，不算太順。他中進士十年以後，才勉强進入京官行列。後來狀況的轉變，大概與他同晏殊的接觸有關。晏殊作了南京留守，聘范仲淹爲府學（即著名的應天書院）教官。范仲淹作教官，認識了一位曾就學於此的孫秀才。孫秀才十分貧寒，竟先後兩次張口請求范沖淹救濟。范仲淹當時俸祿不多，財力有限，但仍盡所能救助他。後來范仲淹了解到，孫秀才乞討主要是爲了養活老母和不廢棄學業，就在府學裏給孫秀才找了個差事，讓他既得俸祿，也可讀書。孫秀才很用功，後來成爲著名經學大師，講學於泰山，他

就是孫復。孫復有一名最得意的學生，即石介。石介與范仲淹結識、至少石介對范仲淹的最初了解，大概都是通過孫復的。

石介與范仲淹的關係同滕宗諒與范仲淹的關係差異頗大。滕宗諒與范仲淹同年中進士，一同在泰州修過水利，又曾在西北一起防邊，可謂多年舊交。石介究竟何時才正式結識范仲淹，這件事都已難察清，恐怕正式往來是頗遲的。石介被人認爲是新政集團成員之一，首先是因爲他的那首《慶曆聖德詩》。他寫此詩時范仲淹尚在西北邊境，朝廷已經下了召范仲淹入京作樞密副使的詔令，但范仲淹因處理某些必辦的事務尚未動身赴京。

這一年是慶曆三年（一〇四三），穩重厚道的章得象、晏殊被任命爲宰相，爲人正直的杜衍被任命爲樞密使，范仲淹、韓琦、富弼同時被任命爲樞密副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被任命爲諫官。這些人作風都較正派，被時人認爲是正人君子。石介簡直爲這種人事安排高興極了，他當時正在京師擔任直集賢院、國子院直講，認爲歌頌此種朝政盛事是自己職責，於是便寫下了長達八百餘言的《慶曆聖德詩》。

此詩表面上是歌頌仁宗聖德，實則指名道姓地讚美章得象、晏殊、賈昌朝（此人後來成爲新政的反對者）、范仲淹、富弼、杜衍、韓琦、歐陽修、

岳陽樓是
宋慶曆年間修建的，
既雄偉又優美，
匾額是著名詩人
郭沫若的手筆。

余靖、王素共十人，其中對范仲淹、富弼着墨最多，各約百字。此詩寫成後，便在京師內外廣泛流傳，造成了相當的影響，當時遠在四川、尚爲孩提的蘇軾便曾見到人們傳寫、議論此詩。范仲淹在赴京途中見到此詩，他對同行的韓琦說：「石介這人怕要壞我們的事了！」石介的老師孫復說：「石介的難怕是要從此詩開始。」

石介熱情地爲新政鼓吹，爲什麼范仲淹反倒擔心會壞大事呢？這就要追述范仲淹被人攻擊爲構結「朋黨」的往事。宋仁宗即位時尚年幼，由章獻太后垂簾聽政。章獻太后對年幼的宋仁宗頗有不尊重處，當他長大後又遲遲不肯還政，范仲淹不畏權勢，曾冒死替宋仁宗公開上書抱不平，給宋仁宗留下深刻印象。宋仁宗親政後，本想破格重用范仲淹，就將他晉升爲權知開封府。范仲淹進京後對官員任用提出一系列批評意見，並舉薦了一批自認爲是德材兼備的官員。可是此舉深深地得罪了當權者，當權者便指責范仲淹「薦引朋黨」。他被外貶，館閣官余靖、尹洙、歐陽修、蔡襄及光祿寺主簿蘇舜欽爲范仲淹辯解，也都被視爲范仲淹「朋黨」，遭外貶。此事發生在景祐三年（一〇三七），說明宋仁宗非常懼怕臣下結爲朋黨。

事隔六年，當范仲淹又一次被宋仁宗重用、且將大有作爲之時，石介的《慶

曆聖德詩》出現了，詩中毫無掩飾地讚美一些人、鞭撻了另一些人，范仲淹怎能不擔心會引起宋仁宗對朋黨的疑忌來呢？更何況石介詩中讚美的人，有幾位就是上次因朋黨事與自己一起外貶的呢！即便撇開朋黨不講，石介對滿朝那麼多文武官員都未涉及，偏偏舉出十位官員加以讚美，也會或多或少地引起衆多文武官員孤立此十人的作用。特別是那些身居要職，未被石介詩所讚美，甚至反遭鞭撻的人，自會懷恨在心，伺機報復。事情的發展證明，反對新政者確實利用宋仁宗忌怕朋黨的心理指責范仲淹等結黨營私。反對派又抓住新政集團成員蘇舜欽等細小過失小題大作，而范仲淹等卻爲朋黨輿論壓制，不能全力救助，最後不得不自動辭職。

反對派還抓住石介在新政期間四處奔走游説的情況，編造石介曾爲富弼撰寫廢立皇帝詔草的謠言。事有湊巧，不久揭發出徐州人孔直溫謀反事，在孔家搜出了孔直溫與石介的往來信件。反對派又誣陷石介參預謀反。這時石介已經病死。反對派卻聲稱他是詐死，已逃往契丹，非要開棺驗屍不可。當地數百人聯名保證石介確死，才以羈管子弟作結。

石介一番好意，卻幫了倒忙，還招來災禍，這個教訓真使後世正派人好好記取。

狄青之死

狄青是宋代最富盛名的戰將之一，他最後因被無罪貶出京師，抑鬱而死。關於他的死因，下文詳談，這裏擬先從他發跡的歷史說起。

狄青的出身是很卑微的。史籍中除他是汾州（今山西汾陽）西河人和有個哥哥叫狄素外，關於他幼時的家庭情況未作任何記敍。據說他曾當過小吏，因罪逃跑入京投軍。恰好趕上科舉考試發榜，狄青和伙伴們經過宮廷附近，與被人簇擁着的新科狀元王堯臣相遇，只好避在道旁。有的伙伴羨慕異常地感嘆：「人家作了狀元而我們才開始當兵，窮達懸殊如此。」狄青不以爲然地說：「將來誰高誰低還不一定呢？這要看誰有本領。」周圍的人都嘲笑他，自然不會想到，若干年後王堯臣任樞密副使時，狄青卻當了樞密正使，當年這普通小兵真的超過了狀元郎。

大概是狄青身材魁梧，又善騎射，故被選入皇帝的侍衛騎軍。西夏人侵邊境，

皇帝下詔選擇侍衛軍充實駐邊軍隊，於是狄青被提陞爲下級軍官，派到青澗城（今屬陝西）戍邊。據説狄青曾在名將种世衡帳下効力，受到賞識，得傳授兵法。後來他又與文人尹洙交往密切，尹洙把他引薦給文臣邊帥韓琦、范仲淹。韓、范二人也很讚賞狄青。范仲淹贈送他一部《左氏春秋》，勸他作戰訓練之餘，用功讀書。狄青聽從了勸告，不但知史，且「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

西夏與宋交戰，往往以宋軍受挫爲結果，所以宋軍士氣低落。但狄青自從到了邊疆，每次作戰都主動衝在前面，於是逐漸成了宋軍少有的勇將。他作戰時披散頭髮，帶一副銅面具，躍馬勇猛衝殺，西夏人把他視爲天神下凡，極之畏懼。狄青在陝西前線十多年，前後參戰幾十次，受傷多次，立下許多戰功，他的官職不斷上升。這時宋仁宗也聽到狄青作戰勇敢、屢立奇功的議論，就下令召見他。剛巧命令發出後西夏軍又來進犯，狄青不便離開前線。主管西線軍事的大臣就令人將狄青的畫像進獻給宋仁宗，這一來使狄青的名聲更大了。宋夏議和後，狄青被派到宋遼交界處的定州。以後又被調回西線，晉陞爲節度使、知延州。皇祐四年（一〇五二）六月，狄青被召回京師，任樞密副使。

宋朝軍政分立：政事歸宰相，稱東府；軍隊調動權歸樞密使司，稱西府。樞密副使參預重大軍政事務決策，與宰相、參知政事同屬執政大臣之列，因此地位是非常高的。像狄青從普通士兵晉陞到樞密副使者，在宋代前所未有。他的任命一出，立即就有御史中丞王舉正、左司諫賈黯、御史韓贄等站出來反對。其中賈黯提出五不可：一爲四裔聞之，有輕中國心；二爲小人聞風傾動撼搖人心；三爲朝廷大臣耻與爲伍；四爲破壞祖宗成規，自比五季衰亂之政；五爲功微賞厚，失駕御之術。

正爭論間，廣南發生儂智高叛亂。儂智高本爲西南少數民族酋長，這時舉兵反宋，先後攻佔兩廣許多州郡。宋朝派軍鎮壓，屢受挫折，先後兵敗陣亡的有廣東鈐轄蔣偕、廣東都監張忠、廣西鈐轄王正倫等。儂智高氣焰囂張，聲稱須封他作邕桂七州節度使方肯罷兵。面對出現新的藩鎮割據的危險，宋仁宗下決心盡最大力量戰勝儂智高。於是狄青成爲率軍南征統帥的最佳人選。他率軍征討儂智高，獲得全勝回京，宋仁宗決定將他晉陞爲樞密使，宰相龐籍等人再次反對，宋仁宗堅持己見，以至變顏變態，任命才得頒行。

狄青行伍出身，能登樞使寶座，除了他的勇敢和軍事才能之外，還有一條是

最重要的，即是他的審慎謙和的處世方法。這裏不能不提到宋初以來的重文輕武風氣。宋太祖是軍人出身，通過兵變上台當了皇帝，他和他的繼承者們都特別重視對武將的防範。防範的主要辦法是抬高文臣地位，讓文臣控制武將。宋初規定，殿前軍、侍衛馬軍、侍衛步軍三大帥不參預軍事決策，另設樞密使負責軍事調動，樞密使通常由文臣擔任。三大帥見到宰相、樞密使等執政大臣，「必執梃趨庭，肅揖而退」。路遇侍從大臣，也要退避道旁。宋朝通常不用武將管理百姓，各級行政長官多由文臣擔任，行政長官有權過問本地駐軍事務。在宋遼、宋夏邊界設經略使、安撫使統管一方軍事，稱爲帥臣，帥臣也多由文臣擔任，武將一般只作帥臣的副手或下屬。例如，范仲淹、韓琦作西線帥臣時，狄青就是他們的下屬。狄青對文臣上司或同事如范仲淹、韓琦、尹洙等，歷來十分謙恭，關係處得較好。狄青在定州任總管（一路武官最高官職）時，韓琦任本路帥臣。一次狄青手下愛將焦用犯了法，韓琦要處死他，狄青出面爲焦用求情，說：「焦用打起仗來是個好樣的」。韓琦卻當着衆人駁斥道：「金榜題名者才是好樣，焦用算什麼好樣的！」說罷又下令將焦用處斬。狄青受了如此羞辱，卻默默忍受。在陝西時，有一次主持宴會，會間請來劇團（倡優）演出，其中一個節目諷刺了儒士，文人

劉易大怒，當場摔杯大罵狄青。狄青卻神色自若，只是好言勸慰。次日，又登劉易之門道歉。可見狄青忍耐力之强。他正是憑藉這種甘爲人下的風格才得到一般文臣的歡心，最後進入宰執大臣之列。

嘉祐元年（一〇五六），宋仁宗得了一場重病，這件與狄青毫不相干的事卻把他推向絕境。仁宗膝下無子，皇位繼承問題一直懸而未決。狄青自南征凱旋後，威信更加提高，每當他出行，道旁都有許多人聚觀，有時竟至堵塞交通。狄青平時愛護士卒，又屢立戰功，深受軍隊擁戴。一些文臣看到他威望如此高，又有軍權，仁宗又危在旦夕，不禁生出狄青會不會篡奪皇位的疑慮。議論一起，謠言也隨之而來。有人說，狄青家的狗生了角，有人說狄青家裏半夜火光衝天（其實是按當時習慣半夜祭奠祖先燒紙錢，據說朱全忠篡位前即有人報告其家「多光怪出屋」）。又有人說，夜裏看到慧星橫天了。還有人說，狄青在家裏私下服用只有皇帝才能服用的金黃色衣服了。仇恨狄青者甚至編出歌謠，讓兒童傳誦：「漢似胡兒胡似漢，改頭換面總一般，（闕一句）只在汾河川子畔」。弄得宰執大臣文彥博、韓琦都疑心忡忡，派人私下調查。大臣歐陽修、劉敞則再次提出罷免狄青爲樞密使的建議。不久，宋仁宗病情好轉。但劉敞仍堅持要求罷免他。宰相文彥

博於是要求宋仁宗同意劉敞的建議。宋仁宗不同意，說狄青是忠臣。文彥博反駁道：「太祖豈非周世宗忠臣！」仁宗終於同意了，狄青被封爲使相，離京赴陳州任職。狄青無過而遭貶，心裏明白是朝廷懷疑他圖謀篡位，非常憂鬱。到陳州後，宋仁宗惦記狄青，每月二次派內臣探望，但狄青神經受了刺激，已成驚弓之鳥，每次聽說中使來到，就懷疑是仁宗要處死自己，終日坐立不安。在這樣的心情下，狄青在陳州不到半年就病死了，死時年僅五十歲。

王安石與理財

王安石的「熙寧新法」，是北宋神宗在位時的一件大事。王安石變法之初多次强調「理財爲方今先急」，而新法中又多半都是與理財聯繫的，如青苗法、均輸法、市易法等又直接是與財掛鈎的。

應當指出，宋神宗所以將王安石提拔起來，支持他變法，首先因爲王安石聲稱自己有一套理財妙法。宋神宗即位之初，對司馬光、王安石都有好感，治平四年（一〇六七）九月同時任爲翰林學士。熙寧元年（一〇六八）五月，宋神宗、司馬光籌劃理財事宜，司馬光回奏說：「國家所以用不足者，在於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此五者，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這些話簡直給心氣正旺的宋神宗頭上潑了一瓢冷水。當年八月，司馬光、王安石同時受到神宗接見。談到理財問題，王安石卻發表了一番對神宗極有誘惑力的言論，他說：「國用不足，由未得善理

王安石

財之人故也。」「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這番話同司馬光那番令人沮喪的話形成鮮明對照，宋神宗的最終倒向王安石，與此番話有直接關係。然而，恰恰是王安石打動宋神宗的這番話，已經表示出他採用管商之學的傾向。因爲「民不加賦而國用饒」這一說法的最初發明者是桑弘羊（後來司馬遷等也以此稱讚桑弘羊），而桑弘羊正是一位著名的管商理論實踐家。

人們常講的「管商之術」的要點是什麼呢？筆者以爲管商理財理論與儒學相區別者（相同者不講）主要有二：一是主張「利出一孔」。如《管子·國蓄》：「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商君書·說民》「利出一孔（一作空），則國多物，出十孔，則國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亂」。換言之，就是主張老百姓要想致富，只有走國家指給的那條路。國家掌握每個百姓的生殺予奪之權。二是主張國家運用輕重散斂之術，控制市場，聚斂財富。《商君書·外內》講的「食賤則農貧」理論及重徵商理論即屬此類。《管子》輕重諸篇不但講運用此術的必要性，而且還提到如何進行輕重散斂。

王安石對管商理財理論的兩個要點都是堅持的。他在《兼併》一詩中

批評現實情況說：「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闔開」，他向宋神宗面奏更明確說要「變通天下之財而使利出一孔」。可見他明確主張要「利出一孔」的。對於那些「一歲坐收息至數萬貫」的富戶，他憤憤不平地說：「此輩除侵牟編戶齊民爲奢侈外，於國有何功而享以厚奉？」他也明確提出要「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要「修天下開闔斂散之法」。他制定的青苗、市易、均輸各法，不但原則是依據輕重理論，甚至其具體作法都可從《管子》輕重諸篇中找到藍本的。

官制正規化的功過

宋神宗元豐年間，宋朝的官制發生了較大變更。對此，近年學界褒貶不一。褒者盛讚它是一次偉大的變革，貶者則說它是一次失敗的努力。筆者以爲，這些議論都未中肯綮，因爲他們都忽略了歷史賦予元豐改官制的真正使命，忽略了此次變更的主要任務是使官制正規化，而不是使機構精簡、辦事效能提高等等。

對舊官制的批評，大概開始於宋太宗統治後期，當時版圖大體確定，戰事減少，急需處理的政事也基本有了頭緒，人們的注意力便開始轉到那些不甚緊迫的問題上來。他們對舊官制的批評歸納起來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一是批評官僚機構及官員名稱不雅，有點「土氣」，「未稱朝廷之盛」。宋朝既視五代十國爲「偏霸」，認爲是大唐的正統繼承者，但是官僚機構、官員名稱中許多都是沿襲五代十國之制。例如三司使便創始於五代，它的下屬

稱判官、推官、孔目等，又頗像五代藩鎮屬官的官名。二是批評官名名不副實，用《宋史》歸納這類意見後所作的表述，即「侍郎、給事不領省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下級官員的名屬不符就更加嚴重，簡直近乎荒唐，《通考》曾舉例說到此種情況：「州縣遂至有以京西路某縣令爲階官，而爲河北路轉運司勾當公事者；有以陝西路某軍節度判官爲階官，而爲河東路某州州學教授者；有以無爲軍判官爲階官，而試秘書省校書郎者。」三是批評省臺寺監有名無實，尤其對尚書省及其各部司名存實亡現象的批評最多。士大夫們引經據典，論證尚書省等不能廢棄，以至講「王者六官，法天地四時之柄；文昌列署，體象瑋環拱之文」，如此的「王化之本」令其廢置，簡直是罪過。

批評者的意見雖多，實際可以歸結爲一條，就是元豐年以前的舊制不正規。其不正規的集中體現，又是省臺寺監官僚系統的名存實亡。爲什麼省臺寺監系統會名存實亡呢？其實此種情況的形成決非始於宋朝，溯其源頭，應追罪於唐玄宗。唐玄宗是省臺寺監系統較早、較嚴重的破壞者。在他統治時期，動輒以爲省臺寺監系統的某一部分不適用和某些長官不可靠，於是在省臺寺監之外設置臨時機構、臨時官職。這些臨時官職大多出於皇帝委任，帶有

「欽差」色彩，一般多稱爲「使」，於是在省臺寺監之外出現一套使職官。楊貴妃之兄楊國忠曾一人兼領四十餘「使」。中晚唐、五代，社會動盪，客觀上需要加强皇權，於是使職官越來越多。省臺寺監官的事務逐漸歸入使職官管理範圍，因此其系統也就越來越有名無實。

到了北宋前期，使職官（宋人稱之爲差遣官）已經形成體系，基本取代了原先省臺寺監系統，成爲真正管理國事的系統，而官員的省臺寺監官銜，則僅僅是他們品級地位的標誌。使職官往往不見經典，人們便認爲它們「土氣」原先省臺寺監官名是因其所管理的事務而命名，如今頂着這些官名者卻不管理相應事務，所以「名不副實」。而且其系統不理事，人們便認爲它名存實亡，士大夫們往往崇尚經典、厚古薄今，對於以使職系統取代省臺寺監系統當然不能容忍，以及將之視爲不正規也是很自然的。

擺在宋朝統治者面前有兩種選擇：要麼完全廢棄省臺寺監官體系，用一套新的官階名取而代之，這些新的官階名將不再與職務（差遣）直接聯繫。同時，對現行使職官名加以修訂，使之正規化、高雅化。要麼廢棄現行使職官系統，恢復唐朝省臺寺監理事體制，但是完全廢棄需要一種宏大的氣魄，宋朝統治者缺乏這種與天地更始的氣魄，於是就只好走後一條

路了。而恢復省臺寺監理事體制，又恰好迎合士大夫們崇拜唐朝盛世的心理。

恢復省臺寺監理事就要廢除使職理事，但此官制已經存在了百多年時間，而且與省臺寺監系統又存在着巨大差異，這種變動也絕非容易辦到的。宋神宗自熙寧末年即令人着手謀劃此事，至元豐三年（一〇八〇）才正式公佈新官制方案，真正落實又耗廢了兩三年時間。元豐改官制廢除了文官京朝官的使職系統，恢復了省臺寺監理事系統，省臺寺監官名既主要與職務（差遣）聯繫，又另外建立一套寄祿官階。

元豐改官制對使職官系統的廢棄是不徹底的。首先，它沒有把軍權完全交還尚書省兵部，只是保留了重要的使職樞密使，讓樞密使、兵部、三衙同掌軍事。其次，文官低級官即所謂幕職州縣官（選人）仍沿用舊制。再次，對武官使職系統基本未加觸動。宋徽宗時，爲文官幕職州縣官和武官制定了寄祿官階，才使新官制趨於完善。

宋朝官制正規化的進程經歷了幾十年，耗用了統治集團成員的頗多精力，其效果如何呢？多數研究者傾向於認爲此次變更有利有弊，弊稍稍多於利。這次變更的利多是與正規化聯繫的。首先是新官名名正言順，堂堂皇皇，没有了「臨時設置」的味道。其次是整齊劃一，便於管理。再者，改

變了舊體中不少機構都直接與朝廷聯繫、彼此無隸屬關係的管理層次不合理狀況。新官制的弊病則主要是同舊省臺寺監體制固有弊病和部分過時不適應新情況相聯繫的。例如，三省並立往往互相扯皮，影響重要事務的及時決策。六部與寺監管理職責劃分不清，或政令彼此矛盾，或彼此推諉誤事。另外新官制也未能吸收舊使職系統的許多優點。例如財權集中，統籌安排。再如甄別流品，養育人材等。

哲宗與太后之爭

宋代凡是太后垂簾聽政，則必然與小皇帝發生矛盾，近乎成了規律，例如宋仁宗與莊獻明肅劉太后、宋英宗與慈聖光獻曹太后、宋哲宗與宣仁高太皇太后等都是如此。當老太后去世、小皇帝親政，都要對太后垂簾時的施政有較大改變，其中哲宗親政後的舉措最爲突出，竟興「同文館」之獄，險些追奪宣仁太后稱號。

哲宗對宣仁太后如此反感，很大程度上是受人挑撥。在哲宗與宣仁太后之間搬弄是非的人最主要的是蔡確和邢恕。

蔡確字持正，早年受知於王安石，得到重用。但當他發現神宗對王安石開始厭煩時，就站出來彈劾王安石，因而取得神宗的青睞。此後他又因彈劾文彥博、沈括、吳允等大臣立「功」，爭得御史中丞的高位。其後，他又借主持辦理太學訟案，用殘酷手段將參知政事元絳趕下臺，自己取而代之，

進入宰執大臣行列。元豐五年晉升爲次相。他通過改官制架空首相王珪，獨掌了朝廷大權。神宗病重，他錯誤地估計太后會不讓神宗幼子繼承皇位而讓神宗弟弟繼承，就圖謀當「策立元勳」，在新皇帝身上再撈一把。於是他與邢恕等人密謀準備在高太后決定岐王（即雍王）顥爲皇帝繼承人時發動政變。

邢恕原是程顥的學生，又是司馬光、呂公著的門徒，曾得到呂公著的薦舉，因此，在他進入政界的最初階段而言，他與舊黨聯繫密切。王安石開始主持變法時，他曾公開批評新法，因而激怒王安石，沉淪下僚七年不得陞遷，從這段經歷看，他簡直就是個正牌的舊黨官員了。吳充接替王安石作宰相，對新法不滿，引用了一部分舊黨官員，大概邢恕也是舊黨成員而得到吳充舉薦成了館閣官員，這種官的陞遷機會特別多。吳允作宰相時間很短就被蔡確取代，蔡確對吳允引用的舊黨人大加排斥，邢恕害怕失去館閣職務，正在惴惴不安之際，想不到蔡確竟主動向他表示友好，邢恕大喜過望，與蔡確成爲密友，爲他出謀劃策，早已忘了舊黨朋友，自然也忘了蔡確是舊黨的死敵。

蔡確與邢恕合謀之後，就先後向宣仁太后的姪子高公繪、高公紀及首相王珪

元祐黨籍碑（部分）

探問消息，結果得知宣仁太后準備讓神宗幼子繼承皇位，不禁大失所望。但事後他們還是私下裏散佈說，宣仁太后，王珪原本有廢立之謀，是蔡確據理力爭才爲哲宗保住皇位的。

神宗晚年對推行新法已有後悔之意，宣仁太后則一直反對推行新法。因此神宗去世之後，首相王珪隨即去世，宣仁太后就選拔反對新法的韓維、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入相，蔡確被孤立起來，遂即彈劾罷相。蔡確罷相出外後，一次遊車蓋亭，賦詩十章，詩中除對時政不滿外，還影射攻擊宣仁太后想效倣武則天，被其仇人、另一新黨官員吳處厚揭發。宣仁太后大怒，加上文彥博等早就對他陷害忠良恨之切齒，於是他被貶嶺南新州。不久病死。

蔡確遭貶，邢恕也遭貶斥，元祐年中一直鬱鬱不得志。宣仁太后病故，哲宗親政，邢恕重新得到任用。宣仁太后垂簾期間，舊黨大臣對哲宗頗有不尊重之處，哲宗行爲稍有越軌，舊黨大臣就慫慂宣仁太后教訓他一番（例如哲宗有好色毛病，爲此舊黨大臣反覆上奏，使哲宗非常反感）。哲宗親政後，逐漸疏遠舊黨，親近新黨，新黨乘機舉起紹述熙豐聖政的旗號，爲哲宗所接受。於是舊黨大臣陸續外貶，新黨大臣執掌了朝政。紹聖四年，邢恕出任御

史中丞，乘機提出王珪（開始尚不敢直指宣仁太后）有謀立雍（岐）王主張的老話，並軟硬兼施，迫使高太后堂弟高士京上書作證。於是王珪被追貶。

邢恕並不就此罷休，他又心生一計，找出文彥博兒子文及甫元祐年間寫給邢恕的一封信，當時文彥博與劉摯不合，文及甫陞遷受劉摯之阻，所以在信中罵劉摯「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又說「粉昆」（時以駙馬爲粉侯，粉昆指駙馬之兄韓忠彥，時在吏部）爲其幫兇。邢恕認爲可以在此信上作文章，於是奏請哲宗將文及甫逮捕入同文館獄。迫使文及甫招供：信中所講是指劉摯有助宣仁太后廢掉哲宗的陰謀，「粉昆」係指舊黨大臣王岩叟（臉白爲「粉」）、梁燾（字況之，「況」形與「兄」近，故爲「昆」）參預其事。邢恕又指使人誣告司馬光也曾參預其事，說過北齊宣訓婁太后廢孫立子之事，參與謀劃的還有宰相呂大防和宦官陳衍等。哲宗聽信他們的謊言，更加讎視舊黨大臣，並且令人寫了廢宣仁太后爲庶人的詔書。幸虧其母向太后聞知極力反對，才沒有將詔書頒發。

誣衊舊黨大臣不贊成哲宗繼承皇位並有廢立之謀，是新黨打擊舊黨的有力武器。由同文館之獄等等，我們可以窺見統治階層內部鬥爭和傾軋之殘

徽宗尊道抑佛

宋徽宗是宋朝一位尊崇道教的皇帝，他尊崇道教的程度超過了他的前輩，也超過了以尊崇道教而聞名的宋真宗。他不但尊崇道教，而且還大力貶抑佛教，這在宋朝各皇帝中可以說是唯一的。有人認爲宋徽宗是中國歷史上最尊崇道教的皇帝，也許不算誇張。

徽宗在位的前十年，對佛、道二教都表現出尊敬的態度，偏愛道教的傾向還不明顯。他親自爲《禪門續燈錄》作序，下令各地修建崇寧寺，將相國寺佛牙接入大內供養，且親撰贊文。說明他對佛教尚無惡意。但這當中他與佛教徒之間產生了一些不愉快。例如崇寧三年（一一〇四）有人向他報告在佛教徒中流行《佛說末劫經》，以經揚言世界劫難就在眼前，與徽宗粉飾太平的想法發生衝突，便下令嚴厲禁絕。他對佛教徒燃頂焚指也很反感，幾次下令禁止。當時佛教的發展異常迅速，在士大夫中信奉佛教的人日漸增多，

引起徽宗的不安和憂慮，也屢次下詔誡諭有所批評。大觀元年（一一〇七），他又下令凡有典禮集會，「道士序位令在僧上，女冠在尼上」，這已有厚此薄彼的端倪。但總的說，徽宗的尊抑傾向還不明顯。

徽宗的尊道大約同他與道士劉混康、徐守信、徐知常的交往有頗大關係。茅山道士劉混康早在神宗、哲宗在位時就與皇帝往來密切。徽宗當了皇帝，就開始擔心沒有兒子，於是請劉混康作法事。結果不久兒子一個接一個地生下來，便認爲他道術高超，倍加寵信。今存《茅山志》中收錄了宋徽宗賜給劉混康的詔勅詩章共七十餘篇，可見往來之密切。據說哲宗病重派人找徐守信問繼承人事，徐守信寫了「吉人」（徽宗名佶）二字，徽宗因而得立。另有道士徐知常，是通過與蔡京勾結及供元符皇后符水有驗得到徽宗信任的。

自政和二年（一一二）以後，尊崇道教的活動進入高潮。在引導徽宗由偏向道教變成一位狂熱的道教傳播者的過程中，道士王老志、王仔昔、劉棟、林靈素等人都起了重要作用，其中尤以林靈素扮演的角色最爲重要。林靈素是溫州人，家世寒微。早年曾爲寺院童行。後改學道。政和三年入京。正好這期間徽宗夢見東華帝君和神霄宮，找道錄徐知常詢問，徐知常不能答，

便推薦了林靈素。徽宗與林靈素一見如故，談得非常投契。此後他倆往來越來越頻繁，當徽宗與林靈素的關係發展到非同尋常地密切的時候，林靈素向徽宗講了如下的見解：天有九霄，神霄最高。神霄的主宰是神霄玉清王，而宋徽宗便是神霄玉清王下世。神霄玉清王又是上帝的長子，主宰南方，號長生大帝君。他下世以後，神霄乃由其弟青華帝君代掌。青華帝君主宰東方。林靈素自己則是神霄府仙卿褚慧下世，專爲輔助徽宗。其餘蔡京爲左元仙伯、王黼爲文華吏、盛章爲仙岳吏、范致虛爲東臺典籍、王孝迪爲西臺文吏，宦官伯氏爲園苑寶華吏，徽宗寵妃劉氏（明節后）爲神霄九華玉真安妃下世，等等。

徽宗對他的說法表示欣賞，於是林靈素便成了日後尊道活動的謀主。

宋徽宗效法前輩宋真宗，也表演了一齣得天瑞和天神下凡的鬧劇。他得的天瑞不是天書，而是一枚玉圭。天神也非聖祖，只稱爲「天真」。天神降臨共二次，一次在政和三年（一一一三），當時徽宗正在赴郊外祀天的路上，忽然對隨行的蔡攸等人說，看到天上有樓閣和神仙，他們也都隨聲附和。第二次在政和七年（一一一七），其具體情況衆說不一，多數記載說主要是青華帝君降臨。二次天神降臨後，都舉行了盛大的慶祝。

徽宗自稱教主，是尊道活動的高潮巔峯。政和七年四月，徽宗給道錄院下御

筆：「朕乃昊天上帝之子，爲長生大帝君。覩中華被金狄之教（指佛教），盛行焚指煉臂，舍身以求正覺，朕甚憫焉。遂哀懇上帝，願爲人主……帝允所請……卿等可上表章，册朕爲教主道君皇帝……。」既是教主皇帝，就須親自佈道，次年，他親自召集道徒八百人，給他們「傳度玉清神霄秘籙」之後，親製《九星二十八宿朝元冠服圖》頒行各地，「親授王黼等元一、六陽、神仙秘籙及保仙秘籙」。又先後撰寫了《道德經解》十八卷、《南華真經解》十八卷、《沖虛至德真經解》十二卷、《廣濟經》十卷、《經錄科儀》二卷等等。

皇帝當了教主，道教的地位自然提高。首先，徽宗下令建立道學，設置道官、道職。道官自金壇郎至太虛大夫共二十六階，與庶官迪功郎至中大夫比；道職自凝神殿授經至沖和殿侍晨九級，與文臣貼職相比。大朝會時與文臣混合排列（即所謂「人雜壓」），道官，道職除俸祿外，其他都與庶官庶職享受相等待遇。道學依太學法，定期考試，選拔可任道官、道職者。其次與宋真宗時相似，徽宗也下令在京師和各地大肆興建道教宮觀。在京師的是玉清和陽宮（後改名玉清神霄宮，前者在皇宮內，後者在皇宮外，徽宗令人專門修建複道通此宮，以便經常赴宮作法事。

徽宗在自封教主的同時，指斥佛教爲金狄之教。這種理論其實早已有的，現在卻成了抑佛排佛的根據。據説徽宗的抑佛也是受了林靈素的影響，林靈素幼年學佛，曾受僧人虐待，現在得勢，就想借機報復，改造佛教的建議也是由他提出的。根據他的建議，宋徽宗下令：將佛刹改爲宮觀，釋迦改爲天尊（後又稱大覺金仙），菩薩改爲大士，（文殊稱安惠文靜大士，普賢稱安樂妙靜大士等），羅漢改爲尊者（又稱天漏），金剛稱力士，和尚改爲德士，並蓄髮戴冠。之後，又下令審察佛經，將與儒道二教矛盾的經卷經文删除銷毁。僧人慣用的禮器銅鈸被説成是「胡人之凶具」，禁止使用。另外，在各地强制性大建宮觀的過程中，因時間急迫且詔敕許可，很多寺院都被直接改造爲道教宮觀。佛教徒們對官方如上作法以不同方式進行反抗，甚至有的僧徒曾對徽宗行刺（未成功）。結果朝廷將帶領抗拒詔旨的高僧或杖殺、或刺配。雖然宋徽宗口口聲聲對佛教要「不廢其教，不害其禮」，但如上所述的行爲，實際是兩宋三百年中對佛教的一次大規模排斥運動。佛教徒與宋廷的矛盾達到非常激化的程度，最終迫使宋徽宗陸續撤消大部分排佛抑佛的規定。

徽宗的風流文采

歷來末代皇帝、亡國之君都要遭受世人較多的責罵。宋徽宗雖非末代皇帝，但因他兒子宋欽宗在位不到二年，宋朝便亡國了，所以人們仍把他看作是亡國之君，更何況宋朝亡時他還未死、成了可耻的金軍俘虜，就更加遭人唾罵。縱觀宋徽宗統治宋朝二十五、六年的所作所爲，他確實該遭人罵：他信任奸臣蔡京、王黼、高俅等壞亂朝政，放縱宦官童貫、楊戩、梁師成胡作非爲，又伴同林靈素等裝神弄鬼，好端端的將大宋江山完全葬送。他的罪過無論如何也是掩蓋不了、洗刷不掉的。但是，人們也注意到宋徽宗的另外一面，他還是一個文墨氣頗濃的風流才子。

有這樣一則傳説：宋神宗一次在秘書省看到南唐後主的畫像，覺得李後主風流倜儻、氣度超凡，感嘆不已。當夜又夢見李後主來拜謁。次日下人來報後宮又產一子，即是宋徽宗。這顯然是後人的杜撰，特用以影射宋徽宗與

李後主爲一類。宋徽宗與李後主頗爲相像，這並非妄言。

宋徽宗與李後主都有文才。據蔡京之子蔡絛記：「國朝諸王弟，多嗜富貴，獨祐陵（徽宗）在藩時，嗜玩早已不凡。所事者，獨筆硯丹青，圖史射御而已。」這雖含諛意，然與史籍所記徽宗後來所爲對照，又似可信。據李心傳記，南宋紹興年間曾編輯宋徽宗的文集，共百卷，其中四十卷與道教有關，餘六十卷中大部分爲文學作品。可惜，宋徽宗文學作品大多失傳，難見其水平。但宋人筆記中收有他北遷後兩首題壁詩，一爲：「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山南無雁飛。」另一爲：「九葉鴻基一旦休，猖狂不聽直臣謀。甘心萬里爲降虜，故國悲涼玉殿秋。」凄楚之情溢於言表，與李後主《虞美人》等詞相比，也未見得遜色多少。至於宋徽宗擅長書法繪畫，又似勝過李後主。據說，他初學書畫於駙馬王詵及宗室趙令穰，後學於端王府吏吳元瑜。又曾反覆臨摹前代名畫（今尚有存世者）。後來在畫壇上終成一家。宋徽宗作品現今存世者頗多，據說有《芙蓉錦雞圖》、《柳鴉蘆雁圖》、《瑞鶴圖卷》、《山禽臘梅圖》等，上面各有題辭，被鑒賞家稱爲詩書畫三絕。宋徽宗的書法也自成一家，世稱「瘦金體」。他還親自主持了《宣和書畫譜》等的編纂。

宋徽宗繪的
《芙蓉錦雞圖軸》

說宋徽宗像李後主一樣親近女色，人們總愛舉李師師一事爲例。這裏，筆者卻想爲宋徽宗作些辯解。李師師是東京名妓，據記載，與李師師往來的多是當時名流，如著名詩人周邦彥、秦觀、晁沖之等，這說明李師師的文化素養是不低的，宋人稱「李師師慷慨飛揚，有丈夫氣，以俠名傾一時」（《汴都平康記》）也說明她並非尋常女流。宋人稱「看舞霓裳羽衣曲，能歌玉樹後庭花」，是說李師師能歌善舞的。南宋詩人劉子翬詩云「縷衣檀板無顏色，一曲當時動帝王。」也是說她唱歌技能高超的。可知李師師所以能吸引宋徽宗，主要是由於她具備高超的藝術才能和較高的文化修養。宋代士大夫與藝妓往來已成風氣，宋徽宗顯然也是受了這種風氣的影響。所以，他和李師師的關係雖然不應褒獎，但也不必深責的。

儘管宋徽宗與李後主有相似之處，卻不能掩蓋兩人之間的巨大差異，可以歸結爲一點，就是李後主是位不思進取之輩，宋徽宗卻是位很想立功建業的人。宋徽宗親政後，重新舉起「紹述」神宗「富國强兵」新政的旗幟，大改舊制，無疑是想勵精圖治。他積極策劃西攻夏蕃、北伐遼朝，無疑是想實現前代未能恢復幽燕的夢想。他這些舉措的後果不好，都是構成亡國的重要原因，但是難道我們能因此而完全否定他的初衷嗎？

宋徽宗主觀上想有所作爲，尤其突出地表現在對文化事業的推動上。他在京郊創立辟雍，把太學生人數增加到三千八百人。他下令創立武學、小學和書畫、算醫四學，總人數也超過千人。他又下令擴充州學，增設縣學（大縣五十人、中縣四十人、小縣三十人），各路設提舉學事司。學生五十人以上設教授一人、五百人以上設教授二員。據負責此事的官員葛勝仲的奏札，大觀三年（一一〇九）宋朝各種官學在籍總人數達到十六萬七千多人，學舍近十萬楹，歲支錢三百零五萬餘貫、糧六十四萬餘石，有學田十萬多頃。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他又創設大晟府，置大司樂、典樂等官職，令人研製許多樂器，編撰了不少音樂著作。

然而，無論宋徽宗如何想大有作爲、垂名青史，到頭來卻完全是南轅北轍、妄費心力。他推行新政激化了社會矛盾，發動戰爭造成了引火燒身，就連他大辦文化事業也變成了害民之政：因爲學校、學生太多，超過國家和社會所能承受的限度。事實證明，宋徽宗的多才多藝沒有促成他作個好皇帝，反而使他幹了許多荒唐事。

岳飛如何觸着逆鱗

《韓非子・説難》説，龍的喉下有逆鱗，觸者必死。君主也各有逆鱗，臣下觸之亦必死。近年學界爭論着一個問題：誰是殺害岳飛的元兇？筆者傾向於認爲宋高宗是元兇，因爲認真考察史料，即可知道，岳飛遇害的主要原因是他觸着了宋高宗的「逆鱗」。

要了解岳飛的死因，先要了解宋朝防範武將的傳統政策。宋朝開基者趙匡胤是由武將通過兵變奪得皇位的，他自然特別防範其他武將步自己後塵。江山穩固以後，對武將的防範應適當減弱，然而反倒日益加强，竟形成一整套制度。其中包括：以文官管制武將，分散兵權，委派監軍等。南宋初，情勢異常，防範武將的制度受到破壞。例如，韓世忠、張俊、岳飛等大將因屢立戰功，官階都高出一般路州縣三級行政長官，以文臣管制武將的格局被打破了。戰爭中各大將的軍權越來越大，打破了歷來兵力分散、互無統屬的格

局。爲了便於作戰，軍隊的各級隸屬關係相對固定，武將在自己部下中都較有威望，以致出現了「韓家軍」、「岳家軍」等說法，這在北宋時期是不能想像的。宋高宗本人對這些反「常」現象憂心忡忡，大多數文臣對此也有一種恐慌感，連著名抗戰派大臣張浚也是如此。要求恢復北宋舊制在當時形成一股暗流，宋高宗無疑是其積極推動者，而宋軍主要將領實際已處於這股暗流的潮頭了，他們受到衝擊只是時間遲早的事了。

除了傳統政策對宋高宗的影響外，個人經歷中也有一件事對他刺激頗深，那就是「苗劉之變」。在他剛剛當皇帝不久，擔任侍衛任務的宋軍頭目苗傅、劉正彥發動兵變，强迫宋高宗退位。幸虧在平江府的知樞張浚迅速率張俊、韓世忠諸軍平叛，才使高宗脫離險境。此事使他更加認爲武將不如文臣可靠了。

岳飛出身農家，對宋朝傳統抑武政策體會不深，對官場勾心鬥角之事也不熟悉，對宋高宗內心活動更不甚了了。他完全被皇帝表示親近、信任的話蒙蔽了，言語行動殊少顧忌，結果一次又一次地觸動了宋高宗戒備武將的那根敏感神經。

岳飛引起宋高宗反感的第一件事，就是岳家軍的不斷擴充。在擊敗楊么

農民軍後，無論是軍隊人數還是裝備，都是宋軍中最强者之一。但是岳飛認爲要戰勝金、僞齊軍，還應進一步擴充兵力。紹興七年（一一三七），統兵八萬餘的大將劉光世因故辭職，搞不清是岳飛主動要求還是宋高宗一時高興，岳飛竟收到接管這八萬軍隊的密令，當然是喜出望外。不久高宗卻改變主意，派別人去接管，岳飛爲此與朝廷發生爭執，使高宗頗起疑心。不久他又上奏請求增兵，高宗便加以拒絕，並對身邊人講了尾大不掉的憂慮。此後，岳飛言語中又流露出想統率全部宋軍主力與敵決戰的意向，高宗心中的疑忌豈能不濃？

與前事時間接近，岳飛聽到一個消息：金朝想在所侵佔的原宋統治區內建立新的僞政權，立宋欽宗的兒子作僞皇帝。岳飛聯想到高宗膝下無子，便去見高宗，要求確定皇位繼承人。高宗聞聽，立即斥責道：「你統率重兵在外，此種事豈是你參預的！」顯然，宋高宗認爲岳飛是在謀求「策立」功。後來高宗選定了皇子，讓岳飛去晉見。岳飛與皇子談得很投機，事後盛讚皇子聖明、中興有望。此事本無異常，但據說卻使高宗很不高興，他對岳飛的疑忌就可想而知了。

由疑忌到起殺心，大概岳飛執行高宗命令不堅決於中起了重要作用。紹興七

杭州西湖的岳飛墓

年岳飛應召入行都，參預軍事決策。岳飛主張調淮軍北上抗金，用其他軍隊一舉消滅僞齊。高宗譏笑說：「若依你，恐怕僞齊未滅，我的淮南先丟了。」岳飛很生氣，寫了奏疏，也不待朝廷允准，便逕自回家服母喪去了。此事使高宗火冒三丈。後來雖經張浚等人調停，矛盾暫得緩解，但高宗對岳飛的疑忌肯定又加深了一步。高宗召見岳飛，一面說「朕無怒卿之意」，一面又說「犯吾法者惟有劍耳」，言語中已對岳飛發出警告。

岳飛對高宗的暗示似未留意。紹興十年（一一四〇）岳飛率部下北伐，高宗卻下令他原地駐守，岳飛認爲機不可失，違命出征。北伐大勝，高宗不許岳飛軍乘勝前進，他不願受命，致使高宗連下十二道金牌。紹興十一年，宋高宗命岳飛進軍淮西，岳飛時有病，且對高宗調度不滿，耽擱若干天才出兵，高宗一連下十五（一說十七）次御札催他。宋高宗要解除韓世忠、張俊、岳飛兵權，召他們進行都，岳飛比韓、張又遲進行都六七天。諸如此類，在高宗看來，都是難以駕馭、「有不臣之心」的表現，高宗豈能容忍！他把這些和岳飛無意中說與太祖一樣是三十歲作節度使等話聯繫起來，心中產生要除掉岳飛的念頭也就不足爲怪了。

中國有句老話，講「伴君如伴虎」。在「家天下」的體制下，大臣若在君主

心目中被認爲是個威脅，那他遭難的日子也就不遠了。至於說充當殺害岳飛劊子手的秦檜，當時剛作宰相三四年，黨羽尚不豐，勢力尚不大，若無宋高宗幕後撑腰，要殺一位當朝一品的大員，恐怕也是很難辦到的。

孝宗敬佛

在宋朝皇帝中，真宗、徽宗尊崇道教，舉措頻、影響大，近乎無人不曉。宋太宗尊崇佛、道二教的事知道的人不多，宋孝宗敬佛的事知曉的人就更少。在大部分人的心目中，孝宗是一位積極主張收復失地、勵精圖治的皇帝，說他信佛，可能很多人都會懷疑。然而這確是事實。

孝宗在即皇帝位之前，就已經和僧徒們有較深的交往，其中與臨安府徑山能仁禪院的宗杲禪師最爲密切。據說孝宗被封王以後，曾派人去找過宗杲禪師，當時高宗究竟選擇誰來繼承皇位還神祕莫測，孝宗想讓宗杲幫他出主意，或者是爲了讓宗杲代他求神問卜。宗杲就寫了兩句偈語：「大根大器大力量，荷擔大事大尋常。」這語義含混的辭句可作多種理解，如果我們認爲宗杲很有遠見或與神相通，則這句話就可解釋爲讓孝宗不動聲色的默默忍受，繼承皇位乃是不久將來的事情。要說宗杲也確非尋常庸僧，他與主戰派宰

相張浚關係非同一般，張浚遭貶，宗杲也被編置嶺南。秦檜垮台才得返回臨安。不少朝廷要人如湯思退、李邴、汪藻、張九成、馮楫等都與他有交往。孝宗晉封晉王，曾派人給宗杲送去親筆寫的「妙喜庵」三個大字和讚辭。孝宗繼皇帝位以後，又派人將這些取回，加蓋皇帝玉璽，然後重新賜給宗杲。然而宗杲卻未能在孝宗的庇護下過一些好日子，他在孝宗即位之初的隆興元年（一一六三）就「示寂」了。孝宗非常悲痛，親自命名宗杲的塔名爲「寶光」，命宰相張浚爲宗杲撰寫塔銘，還命將宗杲語錄收入大藏經，追賜宗杲「大慧禪師」稱號。孝宗較早地接近佛教，可能與宋高宗晚年由不信佛轉向信佛有關，高宗在退位前的一段時間和退位後，經常往來於臨安的各寺院，這對孝宗不無影響。

孝宗當了皇帝，雖然國務繁忙，卻經常抽空與僧徒談經說法，或獨自閱讀佛經。乾道元年二月，召見靈山子琳法師，問道：「朕欲讀經，以何爲要？」子琳法師答：「《金剛》、《圓覺》最爲要道。」孝宗又向他請教參禪之法。子琳答稱：「直須自悟。」子琳法師的答覆使孝宗很滿意。乾道三年孝宗親自來到上天竺寺，問主持僧若訥爲什麼歲首要修光明懺。若訥答稱「佛爲梵釋四王，說金光明三昧之道，囑其護國護人，後世祖師立爲懺儀，於歲旦

奉行其法，爲國祈福。」孝宗聽了頗高興。乾道七年，孝宗又把靈隱寺慧遠禪師召入皇宮選德殿，問慧遠：「怎樣才能擺脫生死。」慧遠答：「須悟大乘。」孝宗又問：「怎樣才能悟大乘？」慧遠答稱：「本有之性，磨以歲月，自然得悟。」孝宗又問：「悟之後怎麼辦？」答稱：「悟了以後就會知道今天我們之間的問答是荒謬的。」孝宗接着追問：「此後又該如何？」答稱：「超脫目前，更無可見之相。」孝宗點頭，若有所悟。淳熙三年，孝宗復將靈隱寺德光禪師召入皇宮，「留五晝夜，數問佛法大旨」。類似上述一起討論佛教經典義理的事見於記載者頗多，都是聽得興致勃勃，津津有味他還親自註解了《圓覺經》和撰寫《觀音贊》等闡發佛教教義的文字，直到退位當了太上皇以後，仍舊時常與僧人在一起談佛說禪，還反覆閱讀了慧光、若訥註解的《金剛般若經》。

孝宗不但與釋徒們一起探討佛法，而且還在宮廷內設置了道場，請釋徒們入皇宮作法事。乾道三年三月，他下令「於禁中建內觀堂，一遵上竺制度」。所謂上竺，即上天竺寺，是南宋皇廷的外道場，每年定時作佛事爲國祈福。次年四月，孝宗「召上竺訥法師領五十僧入內觀堂行護國金光明三昧懺，齋罷說法。」此後「歲歲佛生日賜入內僧（指入皇宮作法事者）帛

五十五修舉佛事。」淳熙二年，孝宗又派人到慶元府迎佛舍利入皇宮，幾次親自頂禮膜拜，次年才送歸原處。

孝宗又屢次撥款興建寺院或寺院內建築。乾道三年，「賜錢即道翊法師故居建十六觀堂，命內翰樓鑰作記」。淳熙元年二月「賜內帑於上竺建藏殿及賜大藏經」，皇太子爲書殿額。

孝宗不但對佛舍利行禮，而且多次到寺院向佛像行禮。在宋朝諸皇帝中，孝宗是親赴寺院次數最多的人，見於記載者不下十數次。有時他還與已退位的宋高宗及自己的兒子皇太子三人一同去寺院禮拜。乾道三年二月的一天，孝宗來到上天竺寺，他忽然問若訥：「觀音大士之前合拜不合拜？」這真是個令人左右爲難進退維谷的問題，但若訥反應極敏捷，立即答道：「不拜則各自稱尊，拜則遞相恭敬。」孝宗對這個不使自己丟面子的回答很滿意，愉快地向觀音大士下拜行禮。此後去寺院都向菩薩行禮了。由於孝宗經常親赴寺院，與僧徒們往來密切，所以不少寺院和寺院內殿閣的匾額都是他親手所書的。

孝宗在位時候，理學家們又掀起了新的排佛輿論浪潮，而他卻在此時公開提倡「三教合一」，實際上抵制了排佛主張。乾道五年，宋孝宗召見僧蘊

聞，明確地說：「三教一也。但門戶不同。」乾道七年，孝宗又提出「以佛修心、以道持身、以儒治世」的主張。淳熙七年孝宗召見寶印禪師時又重申這一主張，並批評排佛的理學家「不識夫子（孔子）心」。次年，孝宗又親自撰《原道論》，指名批評韓愈的排佛理論。孝宗的這些言論激怒了排佛的理學家們，朱熹作爲代表趕忙站出來批評宋孝宗，說宋孝宗敬佛、主張三教合一的言論「害於政事」。這種對立衝突大概是後來導致理學遭到禁錮的一個重要原因。

一段越軌的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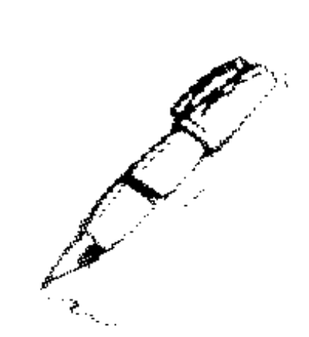
宋高宗母顯仁太后害眼病，朝廷御醫們想盡辦法，始終不能治癒。有人推薦道士皇甫坦，說他善醫。皇甫坦奉召進行都，手到病除。高宗大喜，賞賜他許多貴重物品，皇甫一概拒收。這使高宗越發尊敬皇甫，此後時常召見。一次，皇甫坦回四川家鄉後返回行都，求見高宗。高宗接見時問他來意。皇甫說道：「我給您的孫子說媒來了。」按照皇甫的意見，高宗爲皇孫（後來的光宗）娶了將軍李道的二女兒鳳孃。此事便成了後來一段不尋常歷史的引線。

宋高宗在這之前就已自動退位，把皇位讓給宋孝宗。宋孝宗在作了二十六、七年皇帝之後也自動退位，把皇位讓給了自己的兒子即宋光宗。光宗體弱多病，性格懦弱。而皇后（即前述那位鳳孃）則不愧爲將門之女，性格潑辣、刁恨。在光宗未即皇位前、宋高宗還在世的時候，她就和當時是皇

子的光宗時常吵架，有時她竟到高宗、孝宗那裏告丈夫的狀，搞得滿城風雨。因此宋高宗曾懊悔地說：「我上了皇甫坦的當了。這孫媳婦竟是個將種。」

鳳孃作了皇后以後，妬心倍增。有一次宋光宗讚嘆一位宮女的手白嫩，李皇后竟下令將此宮女雙手斫下送到光宗面前。光宗親近黃貴妃，李皇后就設計將黃貴妃殺死。宋光宗受了這種刺激，病情又加重了。這下子李皇后更加任所欲爲，甚至干預朝政。李皇后見光宗病重，有一次便向孝宗提出要正式立自己的兒子作皇太子。爲日後接替光宗皇位作準備。宋孝宗對此頗有疑惑，就拒絕了。不料這卻激起李皇后的怨恨。

不久，孝宗病重。依照常理，光宗作爲親兒子應到榻前探視，李皇后卻從中作梗，阻止光宗前去。大臣們感到違犯常理，紛紛上章勸諫，光宗迫於輿論，才勉强去看望孝宗一次。後來孝宗病危，光宗本應守候牀前。恰在這時，內臣又有人造謠說孝宗想毒死光宗夫婦，李皇后本來就懷疑孝宗爲何不立自己的兒子作太子，便信以爲真，於是便堅決阻止光宗前去探視。尤其不情理的是，孝宗病死後，李皇后還不讓光宗去主持孝宗喪禮（當時光宗確實也病得不輕）。太上皇死了，兒皇帝不出來主持喪禮，這在古代是極少有的先例，立即引起朝野一片混亂。



宋高宗趙構

這時在朝任首相的是留正，他向光宗和太皇太后（高宗后）提出二點建議：一請太皇太后暫時垂簾聽政，二立光宗子嘉王爲皇太子，代行皇帝事、監國，代主孝宗喪禮。光宗雖表示有退位之意，卻未同意讓嘉王監國，這使留正處於極爲尷尬的境地。於是留正便請求辭職，並離開了臨安府城。他的舉動，客觀上更增加了當時不安的氣氛。這時有一個人挺身站出，決心要擔負起收拾局面、力挽狂瀾的責任，使宋王朝轉危爲安。這個人便是趙汝愚。

趙汝愚是宋朝宗室，太宗八世孫。他在乾道二年（一一六六）參加科舉考試，得第一名狀元，受到孝宗的格外賞識。此後他又編纂了《宋名臣奏議》一書，宋孝宗稱讚此書可與《資治通鑑》媲美。趙汝愚得到宋孝宗的重視，很感激他知遇之恩，歷任辦事努力，盡心盡責，受到好評。孝宗病重期間，趙汝愚正擔任史部尚書，在行都主持科舉考試。當宋孝宗、光宗之間出現隔閡時，他便從中加以調和。這時掌管全國軍事的樞密院首腦出現空缺，孝宗、光宗便一致同意由趙汝愚出任此職。在孝宗去世、光宗閉門不出的關鍵時刻，趙汝愚正在同知樞密院事任上。

趙汝愚與親近的人謀劃，當時唯一的出路是擁立光宗子嘉王爲皇帝，讓光宗退位。光宗既不明確表示退位，要使嘉王取代他作皇帝成爲現實，唯一奪

的辦法是借助宋高宗遺孀憲聖太皇太后的「懿旨」。要使憲聖太皇太后出面干預此事，事先又要絕對保密。這是十分困難的。趙汝愚於是物色了一個能在自己和太皇太后之間充當聯絡者的人，這個人就是負責皇宮保衛事務的知閤門事韓侂胄。韓侂胄是憲聖后的親戚。他的父親是憲聖后的妹夫，他自己又娶了憲聖后的姪女。因此應屬於外戚。由於韓侂胄的協助，憲聖后終於公開表示贊成讓光宗「內禪」，於是在趙汝愚的扶持下，嘉王作了皇帝，即是寧宗。一場嚴重政治危機便結束了。

趙汝愚擁立寧宗有功，很快又得到提升，由同知樞密院事升爲參知政事，又升樞密使，最後晉升爲右丞相。趙汝愚職位的不斷提高，使他的處境越來越危險。因爲宋朝相沿成例，宗室不能作執政大臣，更不能作宰相。趙汝愚對這一點也非常清楚。當他被提升爲同知樞密院事的時候，他先後上書十三次堅持不受，後來宋孝宗、光宗都明確表示堅決要他出任此職，他才勉强接受。此後每次提升，他都反覆推辭，並申明自己的嚴峻處境。然而他既以保全宗室爲己任，形勢又不允許他急流勇退。在他擔任右丞相六個月後，他終於被指控圖謀不軌而被罷免、遠貶，而謀害他的恰是曾協助他扶立寧宗的外戚韓侂胄。此後便是外戚韓侂胄專權的歷史時期。

從宋孝宗病重到韓侂胄專權，前後不過四、五年時間，竟出現了一系列脫離常軌的歷史事件。太上皇病重，兒皇帝不去探望，是違背常理；太上皇病死，兒皇帝不主持喪禮，又是違背常理；宗親不應作執政大臣、宰相而偏要讓他作，是違背常理；擁立新主有功的宰相無故被貶又違背常理；取代宗親宰相而執掌朝政者，卻是一位同樣不應作執政大臣的外戚，又是違背常理。所以，這四、五年堪稱是宋朝歷史上一段反常的時期。

「開禧北伐」的錯誤

宋寧宗開禧北伐受挫，使南宋大傷元氣，各方面的衰壞迹象便顯現出來。南宋立足穩當之後，本應很好地接受歷史教訓，對國政有徹底的改革，但是南宋統治者未能如此。他們對北宋的東西承襲太多，沒有抓住社會大變動的機會對國政施大手術，而把主要精力用於恢復「祖宗之舊」上面。儒家學者陳傅良當時已看出這個問題，他說：「造成北宋衰亡的東西，現在被用來振興南宋，這豈是行得通的？」所以，南宋孝宗時雖有短暫的興旺氣象，但實際許多問題已在潛藏，隨後矛盾逐漸暴露，情況已不甚景氣，但真正地使人感到南宋在走下坡路，卻是開禧北伐受挫以後。

開禧北伐大抵是一次條件不成熟的輕率之舉。由於南宋未能使國政一新，以致舊弊未除，新弊又加。例如，南宋與金和議後，對軍制未作徹底改革，軍隊人數也未能有效裁減，戰鬥力很差。可是百姓因供應軍隊，賦役負擔

卻比北宋增加了許多。官員人多闕少的矛盾非但沒有緩解，反而更加嚴重。沒有差事俸祿就很少，一旦得到差事（官闕）就拚命刮地皮，一方面還以前欠賬，一方面爲日後積蓄。這樣清廉的官便很少，百姓爲此怨聲載道。

開禧北伐的核心人物是韓侂胄。他爲了實現執掌朝綱的野心，除掉妨礙他的宰相趙汝愚，曾利用理學反對派官員對趙汝愚、朱熹等發動攻擊，誣告趙、朱等圖謀不軌。在他和理學反對派官員的慫慂下，宋寧宗曾下詔立「僞學籍」，將趙汝愚、朱熹五十九人列入名單，殘酷迫害。這使理學學者和同情者們非常氣憤。後來雖有糾正，但很不徹底，衆人怨氣未消。韓侂胄爲了動員社會各界一起準備北伐，曾努力改善自己同文人士大夫們之間的關係，但成效不佳。除了韓侂胄曾迫害理學家及其追隨者這方面的原因外，還同他一貫的專橫作風有關。有記載説，韓侂胄所信任者中阿諛奉承之輩頗多，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譏。但也有人不同意這種記載，認爲這種批評多係理學追隨者的誇張説法。無論怎樣，當時的有名望者多拒絶與韓侂胄合作卻是事實。例如韓侂胄派人召王阮，王阮講：「失身匪人，爲萬世笑。」不肯見。韓氏派人找樓鑰，樓氏子弟懼禍，勸樓鑰去見韓，樓鑰卻拿出《顔氏家訓》，訓誡子弟不要壞長輩名節。類似事例頗多，楊萬里、

葉適等均拒絕與韓氏合作。當然，有些較正派的抗戰派官員如辛棄疾、薛叔似、邱崈等因渴望恢復中原，接受了韓氏及朝廷的委任，但這種人在士大夫名流中畢竟只是少數。因而，開禧北伐之前，民心不搏，士大夫們的心也不齊。兵不精，財也不充，出兵的條件是很不成熟的。

然而，韓侂胄卻急於建立功業，出使金朝的使者回來，向他說：「金爲蒙古所困，饑饉連年，民不聊生，中原百姓企盼王師」等，他便信以爲真。開禧二年（一二〇六）五月，宋寧宗終於在他的促使下下詔北伐。北伐開始時是勝利的，先後攻佔泗州、新息縣、褒信縣、虹縣。但之後便接連敗績。這次北伐兵分三路：淮南爲東路，荊襄爲中路，川陝爲西路。中路先敗於蔡州、唐州。東路又敗於宿州、六合。西路復敗於城固縣。特別是東路宿州一戰，主將郭倬爲逃活命，竟將部將田俊邁執送金軍，使宋軍蒙受奇恥大辱。金軍隨即發動全面反攻，先後奪佔宋淮南的濠、滁等州，荊湖地區的棗陽軍、隨州等，州陝地區的西和等州，宋軍敗局已定。

正在這時，又出現了西路副主帥吳曦叛變事件。吳曦是南宋中興大將吳玠之從孫、吳璘之孫、吳挺之子。吳氏幾代鎮蜀，有功於國，有威於民，吳曦謀藉此自立爲蜀王，與金朝私通，博得金朝封王之詔。於是，他便驅逐

宋軍西路主帥文臣程松，公開宣佈脫離宋朝。幸虧金軍統帥大喜過望，疏於警戒，吳曦部下安丙、楊巨源等乘機起兵斬殺吳曦，才爲宋朝保住了蜀地。

吳曦事剛剛平定，朝中又發生重大事變：新皇后楊氏與反戰派大臣史彌遠等共同密謀，假借寧宗旨意，刺殺了力主北伐的權臣韓侂胄。原來，幾年前寧宗皇后韓氏病故，貴妃楊氏與美人曹氏爭當皇后，韓侂胄助曹氏而反對立楊氏，楊氏作了皇后以後，便圖謀除掉韓侂胄。她見北伐受挫，韓侂胄遭到衆人指責，認爲時機已到，便聯絡韓侂胄的政敵，將韓刺死。韓侂胄一死，政局驟變，主和派大臣佔了上風。宋朝便加緊向金朝乞和，結果屈辱地答應了金朝的條件：世爲伯（金）姪（宋）之國，增歲幣爲銀絹三十萬匹兩，賠款白銀三百萬兩，宋朝將倡儀北伐的韓侂胄、蘇師旦的人頭函獻金朝。

開禧北伐以宋朝嚴重受挫而宣告結束了。這次北伐，使宋朝軍民的士氣遭受沉重打擊，主和派甚至重新把奸臣秦檜擡出來加以褒揚，悲觀的調子甚囂塵上。其次，使川北、京湖、淮南地區遭受嚴重戰爭創傷，人民蒙難，土地荒蕪，經濟凋殘。再者，尤爲惡劣的後果，是使宋朝財政落入難以自拔的深淵。巨額軍費開支，賠款和善後費用，使得財政難以維持，只好靠寅吃卯糧、濫發紙幣勉强度日。此後南宋財政的頽敗已成無法挽回之勢。

悲劇性的「端平更化」

在宋朝各帝中，大概没有比理宗即皇位更名不正言不順了。宋理宗本名與莒，雖是宋太祖十世孫，但與宋寧宗關係疏遠，應是與皇位無緣的。宋寧宗晚年，無親兒子，所立景獻太子不幸病故，不得已，將弟弟沂王的繼承人貴和接入皇宮，立爲皇子，賜名竑（貴和也並非沂王親兒子，是沂王死後由寧宗從宗室中指定的繼承人）。寧宗又爲沂王指定了與莒作爲繼承人，與莒於是改名貴誠。皇子竑同宰相史彌遠矛盾很深，史彌遠不願讓皇子竑繼承皇位，在宋寧宗病重期間，假傳聖旨，將貴誠也接入皇宮，立爲皇子，改名爲昀宋寧宗病故，史彌遠又逼迫皇后楊氏同意假傳寧宗遺旨，立皇子昀爲新皇帝。

顯然，宋理宗能當皇帝，完全是宰相史彌遠一手「操辦」的。宋理宗當了皇帝後，對史彌遠感恩戴德，朝政全由他一人説了算。史彌遠本不是正派

人，他重用的也大多是阿諛奉承之徒，朝廷上的事被他們搞得很糟。

宋理宗當皇帝九年後，史彌遠病故。宋理宗清楚地感覺到宋朝面臨的形勢頗爲嚴峻：國內災荒頻繁，百姓生活困苦，不滿情緒不斷上升，小規模的農民暴動和兵變幾乎年年都有。由於史彌遠結黨營私，把許多正直的士大夫排斥在外，他們對朝廷的不滿情緒也十分强烈。北方的蒙古國日益强大，對宋朝逐漸形成威脅。宋理宗決心整頓朝政，改變日漸衰落的頹勢，於是便有所謂「端平更化」。

宋理宗首先選任較爲正直的官員洪咨夔、王遂等作監察御史，利用他們對史彌遠的死黨進行彈劾。又親自下令將史彌遠的三個最得力的同黨梁成大、李知孝、莫澤罷職遠貶。之後，他又將史彌遠同黨薛極、袁韶等加以貶斥。這些舉措給朝野正直之士帶來了希望。然而最得人心的舉措，卻是起用被史彌遠排斥在外的真德秀、魏了翁、崔與之等。真德秀應召入行都，百姓熱情地、自發地歡迎他，街巷填塞，聚觀不散。這一情景使人聯想到北宋元豐末年司馬光應召進京時的場面，在兩宋是很罕見的。人們對真德秀寄予厚望是有緣由的。真德秀一貫以作風正派聞名於世。宋寧宗時，朝廷屈從金朝壓力，將主張北伐的韓侂胄的人頭獻給金朝。真德秀不

避權勢，上書反對此事，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在史彌遠專權時期，他曾多次上書，批評史彌遠排斥異己、不許衆人講話的作法。宋理宗即位後，藉口原先的皇子、後來被封爲齊國公的趙竑參預謀反，將其賜死，剝奪封爵。真德秀又公開站出來爲趙竑鳴不平，因而嚴重地得罪了宋理宗、史彌遠，被罷官奪職，險遭不測。

真德秀還是位有出色政績的地方官。他先後出任江東轉運副使、知泉州、知潭州、知福州等。每到一處，都能革除弊政，懲治貪殘，爲百姓做事。他當地方官時特別提倡儒家的仁政，因而熱心地推廣惠民倉、慈幼倉、社倉、義阡等社會福利設施，深得百姓好感。他在潭州，當地人寫詩讚他道：「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二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修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真德秀被視爲活佛、壽星，其威望之高簡直難以復加。

魏了翁在爲人正直方面與真德秀齊名，他倆都是著名學者，崇尚理學。魏了翁曾因反對宋理宗不公平對待趙竑而遭重貶，做地方官時也有政績。魏了翁是蜀人，真德秀卻是閩人，然而二人之間卻有着許多的共通性。若要找出魏了翁與真德秀不同之處，似乎主要是魏了翁文才更突出些，以及官場斡旋也

能力略遜於真德秀。

崔與之和真、魏卻有較大不同。他對理學的崇尚遠不如真、魏二人强烈，他的著述也遠不及他們的多。但他爲人正直卻和真、魏相似。他的政治經驗似又比真、魏二人豐富。他在廣西、四川、廣東任地方官的政績十分突出。尤其是在防邊、鎮壓兵變等事上，更顯示出他有傑出的治軍才能。

宋理宗端平元年（一二三四），真德秀、魏了翁應召分別擔任翰林學士、直學士院。次年三月，真德秀晉陞參知政事。同年，又召崔與之任參知政事。此外，被時人認爲是德材兼備的李宗勉、徐橋、李惠等也都得到重用。

然而，宋理宗主持的端平更化卻連遭挫折，辜負了廣大臣民的期望。首先，宋理宗錯誤地作出聯蒙滅金的決策。在金朝滅亡之後，又錯誤地作出收復三京的決策。結果導致蒙軍的大舉進攻，四川大片土地及京湖重鎮襄陽失陷，宋朝在軍事上處於極不利的形勢。其次，真德秀任參知政事僅數月病逝，魏了翁則被排斥出行都任督視軍隊之職。崔與之則拒不受命。政治革新大部分化爲泡影。再者，端平初年，會子發行量超過三億貫，貶值嚴重，亟待整頓。宋理宗動用庫存黃金約十萬兩、白銀數百萬兩，連同度牒、官告等兌收整頓，然而收效甚微。之後因軍費增加，會子發行量

大壹碼
行在會子庫
本庫會子今廣
置錢寫寄呼換如不
本費與補換義換
若被中又當載之
本館自告者賞也
事亦支上件賞錢或
願補前項名目者聽
行在會子庫 料例

“行在會子庫”鈔版

又失控了。端平末年又逢特大災荒，經濟整頓的設想也大體落空。

端平更化的受挫使民間不滿情緒滋生。有一首民謠講：「若欲百物賤，直待真直院（指真德秀）。喫了西湖水，打了一鍋麪。」它在行都廣爲流傳，說明了人們的失望和怨恨。當然，這首民謠把矛頭指向真德秀是不公平的，因爲他當參知政事數月便去世了，時僅五十七歲。他的遭遇頗帶悲劇性。他的「同黨」魏了翁被排斥出外，兩年後也逝去了，其遭遇也帶有悲劇性。當然，最具悲劇性的還是端平更化本身。

開慶之戰與襄陽大戰

在南宋末年的戰爭中，襄陽之戰被認爲是關鍵性一戰，此次大戰失利後，形勢急轉直下，國家很快就滅亡了。在這之前，開慶元年（一二五七）的宋蒙大戰，宋朝也險遭滅亡。而且，襄陽之戰的失利，與開慶元年間的戰爭有着密切的聯繫。因此，開慶之戰與襄陽之戰是決定南宋存亡的兩次大戰。

南宋寶祐六年（一二五八），蒙古大軍攻宋，蒙古大汗蒙哥親率主力攻四川，命其弟忽必烈率軍攻鄂州，命塔察兒攻荊山（淮西），又命兀良哈台率雲南蒙軍進攻湖南。蒙哥開始時比較順利，先後攻陷成都、利州等許多州縣，但在合州城下卻遇到宋將王堅所率軍隊頑强抵抗。蒙哥在合州城下停留數月，又遇連日陰雨，加上水土不服，竟死在前線，時爲開慶元年（一二五九）七月癸亥日。此路蒙軍的主要將領只好護送蒙哥靈柩北撤。

塔察兒所率一路面對的是南宋最精銳的淮軍，似乎沒有深入宋境。忽必烈與兀良哈台率領的兩路蒙軍南北夾擊，卻給宋軍造成很大威脅。兀良哈台的一路於開慶元年八月在廣西橫山戰敗宋軍張世雄部，進抵潭州。宋朝湖南安撫使向士璧率軍民堅守。忽必烈一路則突破宋軍淮河防線，由黃陂渡長江包圍鄂州。南宋朝廷聽說蒙軍渡過長江，十分驚慌，急忙令鄂州以西的宋軍向東靠攏，並從淮南和臨安附近調軍隊增援鄂州。於是，賈似道被任命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總督援鄂各路宋軍。援軍高達部最先進入鄂州，其他援軍也陸續接近鄂州。這時，忽必烈得知蒙哥大汗死訊，急於回去爭奪皇位，便停止了對鄂州的進攻。他派一支軍隊接應兀良哈台部，自己率主力提前北撤了。宋蒙開慶年間的戰爭本來到此就算結束。然而卻由此引發出一些情況對下次宋蒙大戰的爆發和結局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這一年多對南宋來說是生死攸關的戰爭中，許多宋朝帥臣、武將立有功勳。四川方面的王堅和劉整，支援四川之後又撥軍東向的呂文德，鄂州方面的高達，潭州方面的向士璧，此外還有將軍曹世雄等，都表現不凡。然而在宋理宗眼裏，功勞最大的卻是賈似道，因爲他是援鄂宋軍的總指揮。宋理宗認爲他有「再造宋室」之殊勳，賈似道從此受到非同尋常的信任。

賈似道實際是個不值得信任的人。他在援鄂過程中，曾背着宋理宗私自向蒙軍乞和，答應割地、輸納歲幣，只是由於忽必烈倉促北向，未能正式簽約。賈似道事後卻將此事完全隱瞞。蒙軍主力剛剛北撤，他就以清查軍費開支（時稱打算法）爲名，在各路帥臣中進行排斥異己的活動。清查（打算）的結果，帥臣向士璧、趙葵、史巖之、杜庶等都因帳目不清受到彈劾，向士璧竟因此被迫害致死。在開慶年中立功卓著的武將中，高達、曹世雄等曾冒犯過賈似道。於是他懷恨在心，設計陷害高、曹二將，高達得到宋理宗保全，曹世雄則被迫害而死。在四川戰鬥中立了大功的王堅也受到排斥，鬱鬱而死。

在賈似道整治不順從自己的帥臣時，四川帥臣俞興也效法清查部將的財務，猛將劉整就成爲重要的清查對象。劉整是南宋名將孟珙的下屬。在宋金戰爭中，曾率十二騎奔襲信陽，俘虜金朝信陽守，被孟珙譽爲「賽存孝」（指賽過唐代名將李存孝），又被時人稱爲鐵猢猻。他有智有謀，屢立戰功。此次被查出問題頗多，劉整急忙上奏宋理宗，申明情況，請求赦免。不料奏疏送出卻石沉大海。這時傳來向士璧等挨整的事。劉整感到處境危險，竟向蒙古投降。

劉整降蒙造成了嚴重的後果。首先劉整控制的若干州郡和數萬精銳部隊也跟隨他降蒙，使四川局勢繼續朝着不利於宋朝的方向轉化。不過這還不是最主要的，更重要的是劉整精通軍事，對宋朝軍隊佈置情況非常熟悉。他降蒙後立即得到信任和重用。他很快向忽必烈（時已奪得皇位）提出把主攻方向從四川移往襄陽的建議，而蒙軍依照劉整的建議開始進攻襄陽，成了南宋王朝走向滅亡的開端。

咸淳四年（一二六八），蒙古派蒙人阿珠與劉整率重兵進抵襄陽城下，歷時五年多的宋蒙（元）襄陽之戰由此揭開序幕。劉整熟悉襄陽的情況，他一到襄陽便派兵切斷襄陽補給線，在關鍵處築城設防，使襄陽和鄰近的樊城外援斷絕。宋朝開始時對蒙軍的行動未加注意，待到賈似道等人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派夏貴、張世傑及范文虎等人率兵支援襄陽時，蒙軍的包圍圈已十分堅固了。夏、張、范等軍與蒙軍交戰都遭慘敗。宋軍所以每戰必敗，同開慶之戰的功臣受到不公正待遇造成軍心離散有直接關係。

鎮守襄陽、樊城的宋將呂文煥、范天順等人都努力對蒙軍作戰，堅持五六年之久，說明了襄、樊軍民的頑强。然而在被圍困多年之後，樊城終於被攻破，呂文煥則以襄陽投降元朝。蒙軍以呂文煥爲先導，由漢水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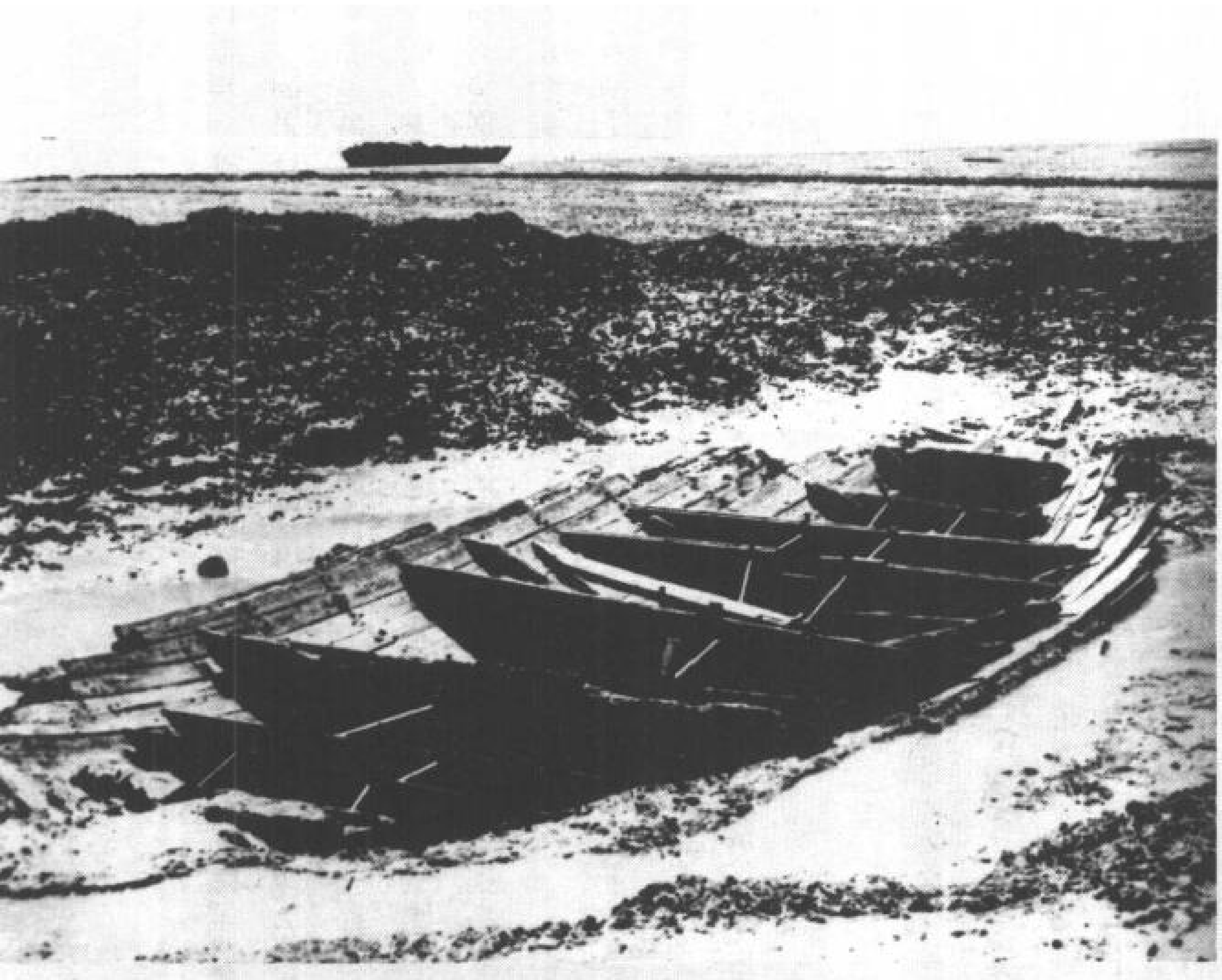
長江，由長江進入浙西，直搗臨安府。由襄陽城破到南宋都城被攻克，只花了二年多時間。

縱觀開慶之戰、襄陽之戰的過程，賈似道的排斥異己實起了最惡劣的作用。

海上貿易與蒲壽庚

一九七四年，福建泉州出土了一艘宋船，殘長二十四·二米，殘寬九·一五米，載重量約三千六百石（約相當二百噸），內有大批瓷器、香料及銅錢等。有人於是作出推論，認爲這艘船的主人是宋末大海商蒲壽庚。由此，再次引起人們對宋代海上貿易和蒲壽庚的濃厚興趣。

宋代海上貿易同唐、明二代相比，顯著的不同之處是有官方的支持鼓勵。宋太宗雍熙四年（九八七），曾派內侍八人分爲四組，分別帶着詔書到海外各國「勾招進奉，博買香藥、犀牙、真珠、龍腦」。這件事頗有點後來「鄭和下西洋」的味道，不過氣勢規模都不如鄭和罷了。宋太宗是個好大喜功的人，他鼓勵發展海貿，或許主要着眼於揚國威，求利的意圖似不强烈。他之後的皇帝，支持、鼓勵海貿的用意，往往是看重海貿帶來經濟上的利益。宋神宗、宋高宗都曾直言不諱地講，國家從市舶貿易中可以得到巨額稅收，



海船

（福建泉州出土）

必須予以重視。實際上，對趙宋皇室來說，發展海外貿易除了獲取大量稅收外，還有一個更直接的好處，就是能直接獲取大量的奢侈品。在當時的舶來品中，香料和藥品是最大宗，另外鑽石、珠寶也佔很大比重。這些都是皇室成員所不能缺少的。宋代上流社會對香料的需求量很大，宮廷更是應用廣泛，海上貿易的發展，使皇室貴族可以無償地或廉價地得到大批高級香料，僅此一項就不知能減少財政上的多少開支。

宋代負責海上貿易的機構稱市舶司，市舶司每年都對市舶收入作出統計，這種計對上貢給皇室的部分往往不能如實反映，僅就現有統計數字來看，北宋時期每年海貿的稅利約爲五十萬貫，南宋時約爲二百萬貫（這中間有物價上漲的因素），約爲財政年總收入的百分之一至五。由於這筆收入直接歸中央調用，其重要性就大於一般項目的收入。

宋代市舶管理制度較前代細密。按照規定，凡出海貿易者，必須事先申請，由官方出具證明，規定期限。每艘船由官方指定綱首、副綱首，發給印章，管理全船人員。出海前，由官方派人審核商品，依例納稅，然後放行。凡外國船隻來港或本國船隻返回，一進港就須先向市舶司申報，清點貨物及人員，按比例抽稅，徵購，然後才能與他人貿易。官方對進口商品

統

按品類規定不同的稅率和徵購比率。凡屬禁榷商品，官方全部徵購。宋朝嚴禁銅製品出口，爲了防範北方的遼、金、元政權，宋朝對東北方向的海上貿易活動作了種種限制。爲了防止有關官吏營私舞弊，宋朝政府也作了許多限制官吏涉足海貿的規定。

宋朝海上貿易範圍較前代擴大，大概與指南針的應用有關，此外與阿拉伯人對南歐、北非一些地區的征服也有重要聯繫。宋朝人把阿拉伯各國往往統稱爲大食國，前文提到的蒲壽庚，就是大食人的後裔。當然有些記載說蒲壽庚是占城（越南）人，很可能是誤記，也可能是蒲壽庚的先人是經由占城轉道中國的。人們很早就留意到，來中國的大食人名字往往以「蒲」字開頭，例如《宋史·大食國傳》載其使者有蒲希密、蒲思那、蒲囉、蒲麻勿陁婆離、蒲加心等，商人及舶主有蒲押陁黎、蒲加辛等。

一些來華的大食人定居於中國，也多爲蒲姓。例如南宋高宗時大食商人蒲亞里先是自稱使者，朝貢後就在廣州逗留不返。之後又娶宋朝武官曹納的女兒，就在廣州定居。岳飛孫子岳珂年幼時曾居住廣州，親眼見到廣州的外國人後裔中以蒲姓者稱首，「屋室稍侈靡踰禁」，「宏麗奇偉，益張而大，富盛甲一時」（《桯史》）。宋朝政府既依賴於市舶利人，對這些外國人後裔

倍加優待，利用他們招徠外國商船。

有記載説蒲壽庚的先輩也曾居住於廣州，其父蒲開宗始遷於泉州。泉州在南宋是僅次於廣州的全國第二大海港。宋人謝履詩「州南有海浩無窮，每歲造舟通異域」。李文敏詩「蒼官影裏三州路，漲海聲中萬國商」等，都是描寫泉州海上貿易之興盛的。描述海外諸國情況的名著《諸蕃志》也是作者趙汝适在泉州寫成的。蒲開宗和他的兒子薄壽晟、蒲壽庚在泉州協助政府發展海上貿易方面作了不少事，同時公私兼顧，自己也成了泉州的巨富，據説還擁有自家的海貿船隊。在宋朝末年，蒲氏父子協助政府剿滅海盜立了大功，蒲壽晟曾被授予知州的官。蒲壽庚也作了官，後來被任命爲泉州招撫使、提舉泉州市舶司。

元朝軍隊於宋恭帝德祐二年（一二七六）進入臨安，謝太后宣佈投降。宋朝至此實際上已滅亡。但一些宋朝臣民不甘亡國，繼續圖謀重建宋朝，於是陸秀夫、張世傑等立景炎帝，堅持抗元。宋軍抵禦不住强大的元軍，被迫乘海船南撤，途經泉州。蒲壽庚到船上朝見，請景炎帝留駐，但張世傑風聞蒲壽晟與元軍有往來，拒絕了蒲壽庚的邀請。後來張世傑要擴編軍隊，不分青紅皂白地把泉州的大批海船强徵爲軍艦，並强取泉州財貨以充軍費。此

舉大大傷害了蒲氏家族的利益，蒲壽庚於是叛變，殺死忠於宋朝的人，不久又正式投降元朝。張世傑又率宋軍反攻並包圍了泉州，蒲壽庚一面堅守，一面向元軍求援，元朝的援軍打敗了宋軍。

有些專家認爲，一九七四年發現的宋船便是在這次戰鬥中被張世傑所率軍隊擊沉的蒲氏家族的船隻。

太祖對士大夫的誓約

南宋高宗剛剛自立爲皇帝，被金人俘虜的徽宗的侍衛武官曹勳就從金朝統治區逃到高宗所在的南京（今河南商丘）。曹勳爲高宗帶來了徽宗的御衣，在此件御衣的衣領中藏有徽宗的親筆：「可便即真，來救父母。」這無疑對高宗鞏固自己的皇位是極有利的。曹勳又傳達了徽宗口諭，其中有一段是：「藝祖有約，藏於太廟：誓不誅大臣、言官，違者不詳。故七祖相襲，未嘗輒易。每念靖康年中誅罰爲甚。今日之禍雖不止此，然要當知而戒焉。」後來，曹勳又把徽宗這段話寫入自己撰的《北狩見聞錄》。南宋撰史者如徐夢莘、李心傳等也對此多加採錄。

此外，又有大文學家陸游抄錄作者不詳的《秘史》的如下記述：「藝祖受命之年，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敕有司，自後時享及新王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自

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漏洩。雖腹心大臣……亦不知也。靖康之變，犬戎入廟……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止高七八尺，闊四尺餘，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又明末清初學者王夫之《宋論》也言及：「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與《秘史》比較，又多「不加農田之賦」一項，不知所據。

宋太祖誓約、誓碑是否真有其事，近年來多有爭論。誓碑實物及搨片均不存世，宋人的有關記述又多是轉錄曹勳及《秘史》的文字，缺乏其他渠道的證明材料，要弄清其真實性是頗爲不易的。但是所謂誓約、誓碑中的多數內容，卻與宋朝統治者有別於其他朝代的作法是大體契合的。不殺不刑柴氏子孫，不殺言官，前人議論頗多，無須贅引。不加農田之賦，也涉及宋朝稅制中的一個特點，即財政增收主要靠禁榷、科斂、代役稅等而不靠增加田賦。這裏想着重談談宋朝不殺大臣、士大夫，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確是很具特色、非同尋常的。

先講不殺大臣。宋朝所謂大臣，係指高級文武臣僚。兩宋宰執大臣被誅殺者，似只有北宋南宋之交的王黼、蔡攸、張邦昌等，都是在非常時期，且這些人誤國害民罪惡極大。另外南宋前期任樞密副使的岳飛被宋高宗等殺害，則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子。此外，再也未見有宰執大臣被誅殺者。宋太宗病逝後，參知政事李昌齡謀立楚王之佐，剝奪宋真宗的皇位繼承權，事敗後不過貶爲忠武行軍司馬。丁謂建皇陵失當、勾結宦官、道士等欺君犯上，收受大量賂賄，罪行纍纍，最後也僅貶崖州。蔡確因「車蓋亭詩」有謗訕朝廷意，初擬貶嶺嶠，時議以爲過重，後改貶新州，不少言臣仍認爲過重。哲宗親政後，清算舊黨大臣更改神宗法度之罪，大肆迫害元祐年間任過宰執的大臣，然而處置厲害者也不過貶逐嶺南。南宋時期也大體如此。

至於不殺士大夫，這似乎要稍爲打些折扣。所謂士大夫，是個模糊概念，大體與文官包含的範圍接近。宋朝文官所犯罪過，除了謀反之外，處罰最重的莫過於貪贓了。宋太祖、太宗兩朝嚴懲貪官，確實殺了不少文官，這些被殺者大多數也可歸入士大夫一類。但自太宗末年始，對貪官的懲處辦法發生了很大轉變，對犯貪贓罪者無論罪行怎樣嚴重，一般都不判死刑。從宋真宗到南宋末年，文官因貪贓罪被判死刑的大體沒有。不議

但不判死刑，甚至連黥刺、打板子也極爲罕見。宋神宗時，知金州張仲宣犯枉法贓罪應判死刑，執法官判定杖脊黥配海島。知審刑院蘇頌反對說：「張仲宣是五品官，若挨板子又黥刺，等於對士大夫與對普通百姓沒有區別，不妥。」神宗就下令免杖黥。此後「遂爲定法」，蘇頌因此受到時人稱讚。清人趙翼讀史至此，非常反感，認爲從此事「可見姑息成風，反以庇奸養貪爲善政」。他還認爲如此姑息贓官是造成日後吏治混亂、民怨沸騰的主要原因。

然而宋代史籍讀多了以後，人們會感到趙翼的認識有些偏頗。首先，宋代官員貪贓的嚴重程度遠不及明清兩代，特別是宋徽宗即位以前，官員尤其是文官，貪贓枉法之事是頗少見的。宋仁宗時的蘇舜欽、尹洙只因爲挪用了小量公款就被議罪，這種事若拿到明清兩代是根本不能想像的。其次，宋代不對犯贓罪的文官打板子、刺字、殺頭，決不等於說對他們完全放縱。相反，宋朝對贓官有一套整治的「軟」辦法。其辦法要點之一是絕其陞遷之路。宋代下級文官稱選人，選人數量很多，約爲全部文官的五分之四以上，號稱「選海」。宋朝規定：選人犯贓罪兩次除名永不錄用。選人可以參加科舉考試，考中者可越級提陞，參加科考的首要條件是無贓罪。從選人變成京朝官是文官陞遷的一大關，過關的主要條件之一就是歷任無贓罪。無論選人

或京朝官，擔任重要差遣可獲得顯示才能的機會，但擔任無論何種重要差遣，首要條件仍是無贓罪。諸如此類，一次犯贓罪，終生的陞遷就受影響。不但本人陞遷受影響，犯贓罪官員的保薦者，上級官也要受他連累。另外，宋朝還備有官員檔案，並規定犯贓罪者不得變更姓名，每次調任都須向有關部門申報自己的贓罪事實。宋朝又曾實行官員前加「左」「右」字的制度，帶「左」字者爲進士出身，帶「右」字者爲其他出身，官名前既不帶「左」又不帶「右」字者爲曾犯贓罪者。這樣，曾犯贓罪者處處受辱，一犯贓罪「終身不齒善良」，永遠受人白眼。非但如此，宋朝還規定，曾犯贓罪者致仕（退休）時不再享受恩蔭，於是使他們在自己子孫面前又丟了臉。這一套對付犯贓罪者的辦法或許並不比殺頭差多少。當然，北宋後期及南宋，文官貪污的現象也很嚴重，但主要原因是制度混亂，罪與非罪的界限弄不清所造成的。

學生干政與學潮

有些治史者發現，宋朝與漢朝有頗多相似之處：有土地兼併問題，都是儒學興盛的歷史時期，也有衰而中興的歷史轉折，等等。學生干政現象也可算是宋朝與漢朝類似的一個小方面。

漢武帝去世以後，在鹽鐵會議上有賢良、文學們批評時政，若把賢良、文學歸入學生一類，或許有人不贊成。但東漢後期的黨錮之變，學生確是參加了的。《後漢書》載，學生領袖郭林宗、賈偉節率領諸生三萬餘人，（漢代太學生即博士子弟多時三千少則數百，此時學生竟達三萬，應是包括了太學以外的在京學生。）擁護李膺、陳蕃，「危言深論，不隱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聽說學生來到，慌忙出迎，穿鞋不及提鞋跟）」。這種情況也同宋代的情況相近似。

學生干政、鬧學潮需要有先決條件，即學生的聚集。宋朝前期學生干政事較

少，因爲學生數量少，又分散。宋神宗時擴大太學規模，行三舍制，太學生人數由數百激增至二千四百。學生干政便有了基礎。最早見於記載的是大臣蘇頌的兒子太學生蘇嘉借策問之機抨擊新法，此事引起王安石的極大不安。爲此，王安石撤換了原來的教官，安插了自己的親信李定、常秩作同判國子監，選用陸佃（王氏學生）、沈季良（王氏妹婿）、葉濤（王氏姪婿）、曾肇（曾布弟）等作教官。然而太學生們似仍不甚服貼。據載，宋神宗曾對舒亶憂心忡忡地說：「頗聞太學生好雌黃人物，雖執政官亦畏其口，何也？」有人認爲「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台」的俗語就是從此時開始流傳的。徽宗初即位，向太后垂廉聽政，曾下詔徵求直言，於是上書議論時政者頗多。這次上書實際上形成了一次對哲宗紹述新政的大批評。徽宗不久親政，對其中官員上書進行分類，擁護新政（所謂正）者僅四十一人，反對者（所謂邪）竟達五百零三人。太學生也參加了這次上書運動，其中上舍生何大正表現最爲突出，受到取消應舉資格的處分。

以上所述兩次學生干政參預人數較少，北宋末年的一次參加人數頗多，著名學生領袖陳東是這次學潮的組織者和鼓動者。陳東十七歲就進入太學，因不滿時政，在太學蹉跎近二十載。北宋末年，金兵入侵，徽宗被迫退位，欽宗即位。

陳東率學生數百人上書要求懲治奸臣蔡京等人。不久，金軍兵臨城下，欽宗爲討好金軍竟罷了抗戰派大臣李綱的宰相職務。陳東連夜寫好書狀，又率學生伏闕請願。百姓、士兵紛紛加入請願隊伍，竟達十萬人以上。欽宗被迫重新起用李綱。汴京陷落後，陳東又上書，要求高宗返回汴京，引起高宗和奸臣黃潛善等不滿，竟被處死。

南宋學生干政比北宋更加經常化，幾乎每次大的政治風波都有學生介入其間，捲入者的人數也頗可觀。例如，紹熙五年（一一九四），已退位的宋孝宗病重，大臣們紛紛要求宋光宗去探望孝宗，光宗爲皇后、宦官所阻，遲遲不去。這時便有太學生汪安仁、陳肖說等二百餘人聯名上書籲請宋光宗探視孝宗。慶元元年（一一九五）趙汝愚外貶，不少太學生上疏請留趙汝愚，其中楊宏中、周瑞朝等六人最突出，因而遭到殘酷迫害，被時人譽爲「慶元六君子」。宋理宗開慶元年（一二五九），太學生陳宜中等六人上書抨擊時政，批評權相丁大全誤國，也遭受迫害，時人譽之爲「開慶六君子」。淳祐四年（一二四四）太學生一百四十四人，武學生六十七人，京學生九十四人，宗學生三十四人相繼上書批評權相史嵩之誤國，形成了一次規模較大的學潮。景定五年（一二六四）反對回買公田的政治浪潮，學生參加的人數也較多。太

學、宗學、武學、京庠都有學生投入其間，形成另一次學潮。此後南宋臨近滅亡之時，學生運動更是如火如荼，與軍民抗戰彼此呼應。至於南宋學生褒貶某位大臣、個別學生上書、寫詩議政等更是難以枚舉。

當然，學生干政，並不是純而又純、只有利沒有弊、只有功沒有過的。宋人羅大經就講過，學生們要作「無官御史臺」，必須先作「有髮頭陀寺」，即首先須生活上較爲清苦，不奢侈，不多欲，這樣才敢能「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臺諫之所不敢攻」，表現出高風亮節。如果一意貪圖富貴，追求享受，就難免居心不正，「或陽爲矯激，或陰有附麗」（《鶴林玉露》）。就當時學生的構成而言，富貴人家子弟佔有相當比例，熱衷於高官厚祿者爲數頗多——須知當時求學者的出路主要是作官——於是，學生隊伍中個別受人賄賂褒貶不公者有之，看風使舵者更是屢見不鮮。

有些執政大臣也看出學生的弱點，也學會了使用通過學生左右輿論的策略，最突出的是兩個奸相秦檜和賈似道。宋人葉適記「秦檜爲相，務使諸生爲無廉耻以媚己，而以小利啗之，陰以拒塞言者。士人靡然成風，獻頌拜表，希望恩澤」。（《水心集·學校》）賈似道在國勢垂危的緊急關頭，仍不關心如何禦敵，一直利用學生控制輿論。爲籠絡學生，不但誘

之以官爵，而且規定學生考試優等賜予錢帛，於是有人寫詩諷刺說：「鼙鼓驚天動地來，九州赤子哭哀哀。廟堂不問平戎策，多把金錢媚秀才」。

學生被奸臣引入邪路，畢竟只是支流。縱觀兩宋學生干政，總還是功多於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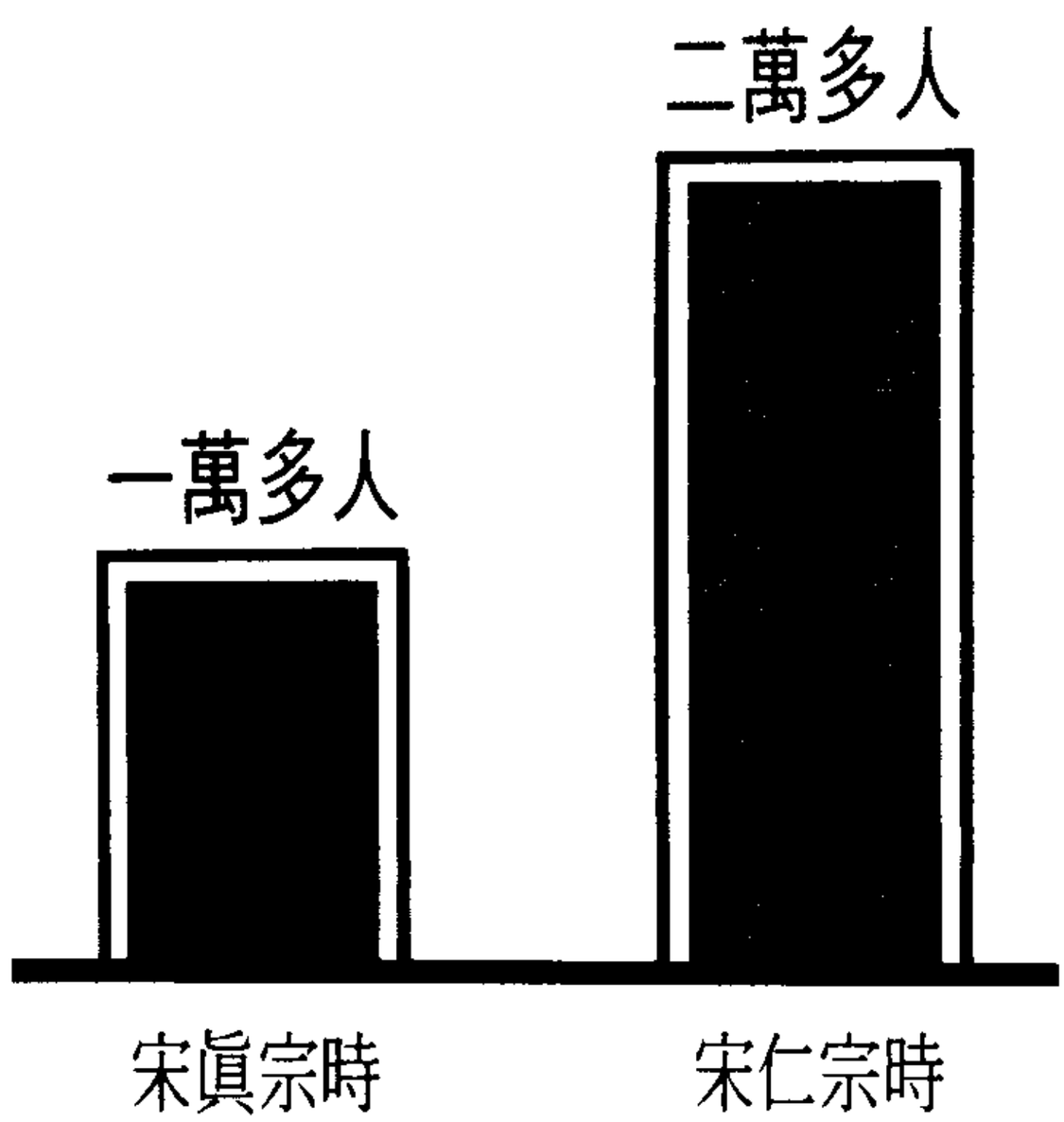
宋代的官冗問題

官冗的弊端，宋人很早就覺察到了。從太宗末年的王禹偁，到仁宗的宋祁、蘇軾，再到神宗的曾鞏和哲宗的蘇轍等都曾反覆論諫，南宋時期論及此者更多，不勝枚舉。他們的論說都很雄辯，言辭都頗激烈，他們的奏疏在朝野都曾造成過相當大的影響，但是官冗的問題卻始終未能得到解決。

爲什麼這弊病始終不能根除呢？我們必須研究一下造成官冗的原因。所謂官冗，簡言之，就是官太多，大大地超過了需要。官爲什麼會多呢？這就要看看宋人入仕的途徑。時人稱「入仕多門」，然而歸納起來大略有三：一是科舉入仕，二是門蔭入仕，三是功勞入仕。

按照一般人的認識，宋代科舉興盛，通過科舉入仕者應是多數。實則不然，科舉入仕者大約僅佔官員總數的四分一以下。例如南宋嘉定年間，吏部尚書所管

《北宋冗官表》



中高級官員六千多人中，有出身者（包括先入仕，後得科舉者）僅一千餘人。科舉入仕者所佔比例不很大，與宋代官員構成有關。宋朝武官人數一直遠遠多於文官，而武官中通過科舉（包括武舉）入仕者是微乎其微的，加上文官中又有近半數的非科舉入仕者，所以他們所佔比例就不可能很大。當然，宋朝重視科舉入仕者，這些人往往佔據重要職位，特別是宰執大臣中科舉入仕者頗多，這又是另外的問題。

統計表明，宋代門蔭入仕者是最多的。而且門蔭名目繁多，有致仕蔭、大禮蔭遺表蔭、特恩蔭等，既可蔭子孫，又可蔭親戚、門客、醫生等。此外，軍人通過軍功、積累年資和長官奏薦入仕者也有相當數量。至於吏人出官、雜流入仕、歸明歸正等的數量則很有限，無關大局。

顯然，要減少官員數量，就要控制科舉、門蔭、軍兵三個入仕途徑。減少科舉入仕者，難免要得罪讀書人；減少門蔭入仕者，就要傷害大批貴族、官僚的既得利益；減少軍兵入仕者，又會挫傷軍隊官兵的情緒。所以儘管宋朝統治者口口聲聲要裁冗，終究是成效不大。

官員人數多，職位（即所謂「闕」）卻有限，就產生了員多闕少的矛盾。按照宋朝俸祿制度，同一級別的官員有職事（差遣）和沒有職事者，擔

任重要職務和擔任不重要職務者相比，其實際收入差距很大，有時相差一倍以上。這就加劇了官員對職事，特別是重要職事的追逐。早在宋真宗時，官多闕少的矛盾早已表現出來。宋仁宗在位前期，宋祁上奏中說：「國家郡縣素有定官，譬以十人爲額，常以十二人加之，遷代罪謫，足以無乏。今則不然，一位未缺，十人競逐，行朱滿路，襲紫成林。州縣之地不廣於前，而陛下官五倍於舊。」稍後慶曆年間大臣張方平，以及英宗時吏部官員蔡抗都論及員多闕少「三員守一闕」的現象。此後這種現象日趨嚴重。南宋版圖縮小，官闕也隨之減少，矛盾更加尖銳。「小郡兵馬之官至於五六人而同一職，小邑徵稅之官至於二三人而共一事」（楊萬里語），「一官闕則十數人守之，其在吏部者大率十餘年僅成一任」（周必大語），周密記載有一姓沈的吏人，精通吏部官闕，官員們爲早日得差遣（職事），就以貴重物品作賄，或訂立契約，如期得到委任，則酬以重價。沈某人以此爲謀生手段，一人「指」。當時像沈某一樣以此謀生者爲數不少，則知官員們謀求差遣（職事）之心切。

根本解決問題的方案雖然誰也提不出，但緩和矛盾、小修小補的辦法卻並不少，有些辦法還影響頗大的。其中最應提出的是添差制度和宮觀官制度。

所謂添差，就是正式編制額之外添置的官員，譬如，大的州府按編制設通判二員，現在添加一員，就是添差。添差有的有事做，大多數都是無事可做，甚至添差之時已規定是不許管事的。因爲正式官員已是人浮於事，額外增加者再從中爭權奪利，分明是成事不足、壞事有餘了。

所謂宮觀官，是指設於道教宮觀中的官。宋初這種官極少。真宗時官方出錢修了玉清昭應宮、景靈宮、太極觀等宮觀，又製造輿論説宋朝祖先是道教系統的天神，這樣就開始在京師内重要宮觀設置官僚機構。此後逐漸推廣到在外地重要宮觀内設官。開始時宮觀官僅爲其他官員的兼職，後來變成專門設官。擔任宮觀（包括嶽廟）官職者大抵無事可做。王安石變法，爲了減少阻力，增加了宮觀官的數量，把一些資格老又不到退休（致仕）年齡的反對派官員安排去當宮觀官。之後，隨着員多闕少的矛盾越來越大，宮觀官數量就不斷增加，成爲給無職事官員找職事的重要出路。由於宮觀官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宋朝允許宮觀官不到宮觀管事，甚至允許宮觀在此州而宮觀官居住於彼州。宮觀官職大抵純粹成了給任此職者增加點俸禄的名目。

宗室、外戚所得的禮遇

「無內亂」是宋朝統治勝於其他朝代的一個重要方面。所謂「無內亂」是指宋代宗親、外戚恃勢干政、發動叛亂或圖謀篡位的事較少（決非完全沒有）。漢有王莽篡位、晉有八王之亂，唐有太平公主亂政等，類似的事例在宋代較少發生。究其原因，在於宋朝堅決防止皇室嫡脈之外形成任何權勢中心的國策。在這國策之下，宋朝有一套嚴格細密的宗室和外戚制度，其內容雖多，核心卻只是厚養而不用。

所謂「厚養」，是指宗室、外戚得高官厚祿，物質生活待遇非常優厚。宗室成員滿五歲就「賜名授官」，授官品級依在皇族中親疏地位而定。

宗室近屬一律授予南班宮，南班宮除定時上朝（所謂奉朝請）外並無實際職掌。這樣宗室成員就無法依照勞績陞官晉級。爲了解決這個矛盾，宋廷開始規定除遇盛大慶典依例晉級外，南班官每十八年定期晉級一次，後又縮

短爲十年一次。這樣，宗室近屬雖無勞績，仍有陞官晉級的機會。

宗室疏屬雖無自幼授官的特權，但在參加科舉考試方面卻受到優待。宋廷專門規定了「宗子試法」，實行「別試別取」，考試內容少、錄取機會大，錄取後不入末等而遞升一甲等等，都不同於普通考生。而且，在正式科舉考試之外還有降低標準的「量試」。據南宋人洪邁記，孝宗即位後連續三次量試，錄取宗子超過千人，「皇親得官不可以數計」。

皇親既得官，晉級又有保障，在最高層次的官員中，皇親所佔比例相當之大。例如北宋末年計有節度使六十人，其中宗室三十七人，外戚十人。據李心傳記，南宋嘉定年，歸隸吏部尚書左右選的高中級官員六千二百五十八人中，宗室共四百四十九人。

皇親在俸祿上也享受優待。宋朝規定，皇親與庶族若官階相同，皇親的俸祿要多於庶族，例如皇親大將軍月俸六十貫，庶族大將軍月俸僅二十五貫，庶族官員俸祿一般三分之二折支，在京每貫支六百文足，在外支四百文足，而宗室一律每貫支七百七十文足。還須說明一點，宗室升官至大將軍以上晉爲節鎮官（刺史、團練、防禦、觀察、節度等使）。宋朝的節鎮官是俸祿特別優厚的，例如節度使的俸祿比宰相還高。在正式俸祿之外，皇

親還享受遠比一般庶官優厚的生日、郊祀、婚嫁、喪葬的例賜。皇族近親雖不理事，卻支給本該用於公事的公使錢，庶官的公使錢支用受到嚴格限制，而皇親的公使錢實際卻是俸祿的一部分。

對於沒有授官、也沒有通過科舉入仕的宗女和疏屬宗室，宋廷也包養起來，按年月依人口數支給錢米，爲此還專門撥給官田建立宗室莊園。宗女出嫁還依等級支賜裝奩等。由於宋廷對宗室一律按人口支給錢米，以至宗室「無賴者至縱其婢使與閭巷通，生子則認爲己子而利其請給」。

所謂「不用」突出地表現在：宗室近屬一律不得出任外官，宗室疏屬及外戚雖可擔任外官，卻受到諸多限制。宋神宗熙寧二年以前，宗室一律不出任外官，即完全沒有負責管理具體軍政事務者。此年始規定，宗室疏屬不再授官，且可以通過科舉入仕，擔任外官，宗室近屬仍舊不許出任外官。宗室通過科舉入仕者，除了成績特別優異者外，都授予武臣系列的官。雖授武官，卻又不許其統率軍隊。在有職無權的添差官、宮觀嶽廟官中，宗室成員佔了很大的比例。極少數獲得文臣職位者，在使用上也多受限制，特別是不允許任執政大臣和宰相。孝宗時宗室趙師揆希望出任福建轉運使，孝宗認爲他有兄弟在附近任知州，就下令「以高爵厚祿使之就閒」。寧宗時，宗室

趙善湘以文臣爲制帥，立刻受到臺諫官的反對。宗室趙汝愚光宗時破例擔任執政大臣，寧宗即位又因定策功被任命爲宰相。趙汝愚本人對於擔任執政大臣、宰相感到惶恐不安，反對者羣起攻之，當宰相僅半年，終因「宗室不當爲相」得罪，貶死衡州。除他以外，整個宋代再無宗室任執政、宰相者。

不能出任外官的近屬，不但沒有爲國效力、施展行政才能的機會，而且行動也要受到嚴密管束和監視。說到宋朝對宗室近屬的管束，首先要涉及宋朝創設的與宗正寺並立的宗正司。本來，唐朝設有宗正寺，專門管理宗室事務。但宗正寺卿爲九卿之一，依例位在六部尚書之下，地位較低。宋朝自開始，又相沿成例用非宗室官員任宗正寺卿。這樣，宗正寺卿就很難管理官高勢重的宗室近屬。爲此，宋仁宗時期就在宗正寺之外又設宗正司，與皇帝血緣關係較近、官爵較高的人出任知宗司。宗司與宗寺的分工是：宗寺負責制定政策、編寫譜牒、賜名授官諸事，宗司則負責具體管理宗室成員。宗司下設士、戶、儀、兵、刑、工六案，與尚書省六司對應。宗司的創設顯然意在加强對宗室的管束。

宋朝規定，宗室近屬一律不得隨意卜居，而要住在官方統一建造的宮宅之內。其中太祖太宗之後名睦親，秦王之後名廣親，英宗之後名親賢，神宗之

後名棣華，徽宗之後名蕃衍。南宋時南班宗室一律住在睦親宅。居住在宮宅內的宗室，不許隨意出入，要宗司批准。也不允許外人隨便進宮宅訪問宗室成員。仁宗無子，問宰相韓琦，哪個宗室適合作自己繼承人，韓琦答道：「宗室不與外人接，臣等何由知其人。」說明宗室成員與外界很少接觸。神宗時，南班宗室趙令褫上奏，請求在爺爺安葬處守靈百日，詔旨允准，卻申明不許「出入接見賓客」。同年，近屬宗室趙世獎因「私接賓客」，議罪竟要判「徒二年」。南宋前期，宗室趙士褒挺身出來營救岳飛，結果被秦檜一伙指爲「交結將帥」，遭貶。之後又被指責遭貶後「賓客日盈其門」，竟被拘禁，因而悲慘死去。對男性近屬如此，對女性近屬也不放鬆。宋廷規定，凡外嫁近屬宗女返京、進入宮宅，都要事先申請，並且登記出入時間。

北宋後期及南宋，又在京師以外設立兩處外宗司，各有宮宅，管理和收養疏屬宗室。對這些疏屬宗室的管理雖不如近屬嚴格，但也頗多限制。例如宋徽宗時規定，外宗司所轄宗室凡省親、參加科舉考試等，須外宗司開具證明，限定在路時間，不許誤期或變更抵達地點。

宋朝對外戚的限制不如對宗室嚴，但原則卻大體一樣。與宗室有所不同的是，外戚可以統兵，但一般也不能作文官，尤其不能作執政大臣，其他方

面的限制也與宗室大同小異。

宋朝對宗室外戚的管理辦法，直接影響到明朝，尤其在養而不用這原則上，明朝更沿襲了宋朝之舊。對於這種養而不用的方針，今人或稱許其有利社會，或從人性論角度批評它殘忍狠毒，是非曲直倒是一時難成定論的。

火藥在戰爭中的應用

火藥爲中國四大發明之一，但是發明火藥的確切時間衆説不一，有可能早於宋代，因爲宋朝前期火藥已被應用於兵器。

全世界最早明確、直接記載火藥的著作是曾公亮等奉宋仁宗之命撰寫的《武經總要》，成書於慶曆四年（一〇四四）。它記載了火兵器多種，並具體記述了引火球、毒藥煙球、蒺藜火球三種火兵器所用火藥的配方。火藥雖早見於此書的記載，但使用火藥的火兵器根據史籍記載卻在此書問世以前許多年就已經出現了。

宋太祖開寶三年（九七〇），「兵部令史馮繼昇等進火箭法，命試驗，且賜衣物金帛。」（《宋史·兵志》）馮繼昇所進火箭是否使用火藥不敢貿然作斷，但可能性不小。宋真宗咸平三年（一〇〇〇），「神衛水軍隊長唐福，獻親製火箭、火毬、火蒺藜。」（《宋會要·兵》）與前引《武經總要》

對照，唐福所獻火兵器，毫無疑問是使用了火藥的。二年後，將軍石普，又獻火箭、火球新式。這說明至少在《武經總要》成書四十多年前甚至更早，就已經有使用火藥的兵器了。

根據《武經總要》和前引記載，最初使用火藥的是火球和火箭。火箭的使用不難想像，火球的使用難以知詳，據有關專家分析《武經總要》所載三種火藥的配方，估計火球的主要作用是燃燒、發散煙幕和產生刺激性氣體。但火球是用人力拋擲還是另有發射裝置則不大清楚。人們一般認爲火球是用人力拋擲的，否則就與火炮難以區分了。

宋神宗熙寧九年（一〇七六）前沿奏報：遼朝燕京每天檢閱火炮，並派人到宋遼交界處通過榷場向宋境購買硫黃和焰硝。於是引起宋廷警惕，下令禁止硫黃焰硝流出宋界。宋朝此時期也正在大造軍器，其中也有相當數量的火兵器。元豐七年（一〇八四）下令調撥給陝西熙州、河州邊境的李憲部駐軍神臂弓火箭十萬隻、火藥弓箭二萬隻、火藥火炮箭二千隻、火彈二千枚。又召募商人去日本購買硫黃，一次便買五十萬斤。可知此時宋、遼雙方的火兵器都有相當發展。在上述雙方的火兵器中，都有火炮一項，這是以前未見記載的。當然，這裏的火炮與近代火炮有本質區別，當時的炮乃是一種

拋擲機械，火藥是用作被拋擲物的，並不是用於發射。這種火炮大體是火球或火彈與拋擲機械的結合。儘管如此，火炮比火箭、火球威力大增，成爲攻城和守城的重要武器。在北宋末年的保衞汴京的戰役中，宋軍就使用了霹靂火炮，金軍由於沒有足够的火炮而稍稍延誤了攻克汴京的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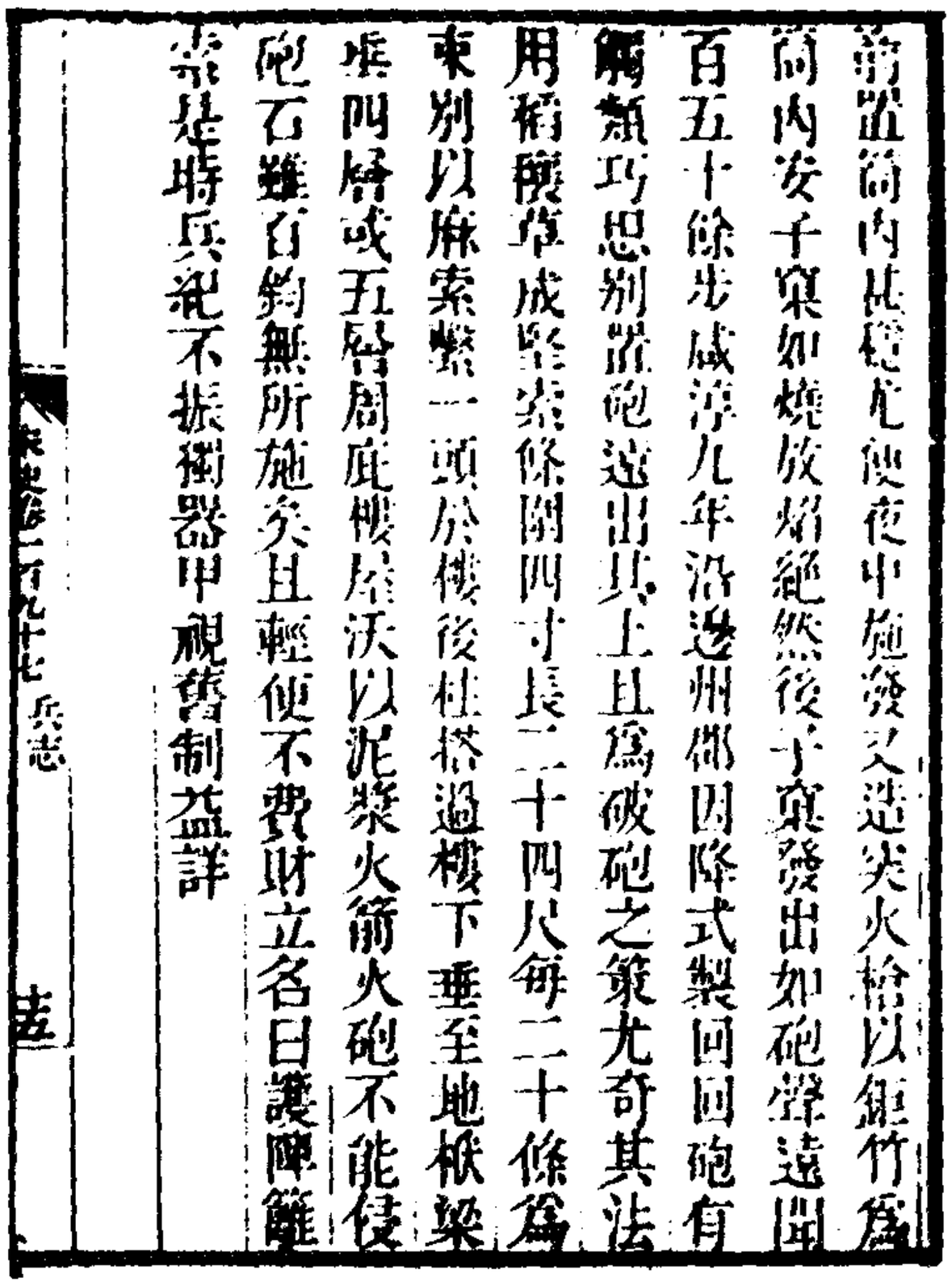
火藥兵器在水戰中也受到重視。當時船大體是木製的，很利於火攻，赤壁之戰東吳敗曹兵就是利用火攻的實例。火炮的發明使在較遠距離處可以引敵艦起火，因而南宋時水軍往往配置火炮。紹興二十一年（一一六一），宋大臣虞允文帥軍在七寶山附近伏擊金兀朮軍，就使用了霹靂火炮。時人楊萬里記，宋軍發射一枚霹靂彈，「自空而下，落水中硫黃得水而火作，自水跳出，其聲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爲煙霧，眯其人馬之目」，宋軍乘勢發起進攻，金軍人馬紛紛落水，宋軍於是大勝。

南宋後期，火藥兵器在各種兵器中的地位進一步提高，數量也大爲增加。據《鎮江志》載，嘉定年間（一二〇八—一二二四）鎮江府駐軍配備有蒺藜火炮二百隻，此外還有火藥弓箭、火藥弩箭等。《建康志》則載，景定年（一二六〇—一二六四）前後建康府「創造添修火攻器具」六萬三千七百五十四件，其中有火弓箭、火弩箭、突火筒、火蒺藜、霹靂火炮彈、大小鐵炮、

火桶、鐵水錐等。其中鐵炮、鐵水錐、突火筒、火桶爲前所未見，尤其是鐵炮難以斷定是否用火藥發射。現存的南宋著名帥臣李曾伯奏疏中言及，「荆淮之鐵火炮動十數萬隻」，他說在荆州任上，每月令人製造鐵火炮一二千隻，並抱怨說眼下靜江府只有大小鐵火炮八十五隻，「不足千百人一番出軍之用」。從他的口氣中我們可以得知南宋後期軍隊配備火兵器數量之多。

南宋後期有兩種引人注目的兵器。一是突火槍，據《宋史·兵志》，是「以鉅竹爲筒，内安子窠，如燒放，焰絶然後子窠發出如炮聲，遠聞者五十步。」這説明突火槍内的火藥是用來發射的。雖然它的彈膛尚是竹製的，但與用鐵製已相隔不遠。突火槍可謂粗具近代槍炮的雛型了。二是所謂回回炮，據載是西北回族人創造獻給元世祖的，元軍進攻襄陽時它曾起了作用。宋軍於是加以仿製和改進，據説改進後的新炮遠遠勝過回回炮。

既大批製造火藥兵器，就必須要有較大的火藥倉庫，宋末元初人周密記述了二次火藥庫爆炸事件。淳祐年間（一二四一—一二五二）大臣趙葵養了四隻猛虎，虎圈恰巧鄰近官府火藥庫。一天，火藥庫起火「衆炮齊發，聲如震霆，地動屋傾」，四隻猛虎全被炸死。陸秀夫、張世傑與宋祥興帝兵敗厓山的第二年（一二八〇），揚州炮庫起火，「火槍奮起，迅如驚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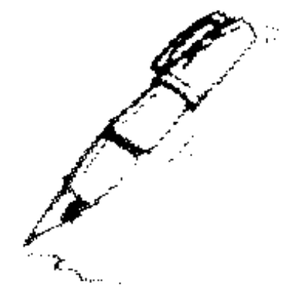


管置筒內其穩尤便夜中施發又造突火槍以鉅竹爲筒內安子窠如燒放焰絕然後子窠發出如砲聲遠聞百五十餘步咸淳九年沿邊州郡因降式製回砲有觸類巧思別置砲遠出其上且爲破砲之策尤奇其法用稍穰草成竪索條圍四寸長二十四尺每二十條爲束別以麻索繫一頭於樓後柱搭過樓下垂至地柢梁垂四層或五層周庇樓屋沃以泥漿火箭火砲不能侵砲石雖百鈞無所施矣且輕便不費財立名曰護障籬宗是時兵紀不振獨器甲視舊制益詳

《宋史·兵志》中有關突火槍的記載

元兵不知厲害，尚當作玩笑。不料一火槍射入炮彈庫，引起爆炸「大聲如山崩海嘯」，使城內一晝夜未得安寧。事後一看，庫房炸成丈餘深的大坑，居民二百餘家少有倖存，守軍百餘名全部殉難。

火藥在來到世界的最初階段，大概是帶給人類苦難，它使戰爭更加殘酷，使無辜平民也蒙受不幸。然而，這大約也是它所必經的發展階段。



軍隊經營工商業

宋代財政收支始終吃緊，於是便允許軍隊「自力更生」，經營工商業取利自豐。這在中國歷史上似不多見，因爲以往自足辦法只有屯田。

軍隊經營工商業，可以尋源到唐代，五代也有的，但似乎都不及宋代普遍。宋太祖收了內地藩鎮的財權，卻沒有收沿邊大帥的財權，他允許沿邊大帥經營商業以補助軍事上不時之需。宋太宗則對他們經商加以取締，但禁令不久也被打破。宋仁宗時邊境戰事驟起，又允許軍隊經商牟利，後來因擴大化，乃加限制。此後直至南宋末，大體一直允許沿邊駐軍有限制地經營工商業。這種經營活動，時稱回易。宋神宗時行市易法，西部駐軍自立市易司，名雖不同，性質與回易是一樣的。

宋代沿邊設安撫司或經略司，總管當地駐軍。由文臣仕使，稱帥臣。回易通常是由安、經二司主持的。范仲淹、尹洙在西北，蘇軾、張舜民在河北，

都經畫過軍隊回易事。回易一般就是經營商業，以長途販運較爲常見，也有開店鋪、設旅館、置酒樓或貨棧等。宋代軍隊回易有三個時期較興盛，即北宋仁宗時、南宋前期、南宋晚期，三時期中又以南宋前期最盛。所謂中興五大將，每個都在回易上動過腦筋。《鶴林玉露》記張俊令人回易事，頗有趣味：張俊遊春，見一老卒晝眠，問其原因，答曰無事可作。問他會作何事？答稱事事粗通。問他能經營回易否？答稱能。張俊給他一萬貫作本，嫌少。給五萬，仍嫌少。張俊調撥五十萬貫給他。此人乃造巨艦，購置大批貨物，並召募能歌善舞的美女百餘人飄洋而去。次年返回，得珍寶無數，駿馬若干匹，獲利近十倍，使張俊軍容大壯。這個帶有傳奇色彩的故事反映了當時軍隊回易的規模。當時文臣們抨擊軍隊回易說：「通都大邑，沽肆成市，巨艦成載，旗幟縱橫」，「居於市則有回易之庫，居於水則有回易之舟」。也說明當時軍隊回易規模大、活動範圍廣。

在軍隊回易過程中，人們感到單純作買賣不如兼營生產穩妥。軍隊中掌握各種工藝者頗多，於是經商同時又營製造。北宋仁宗時軍將楊崇勳曾令部下製造木偶到京師賣錢。南宋前期大將劉寶部下竟有機織匠八九百人。還有軍將令兵士伐木燒磚，造屋出租以謀利者。至於利用兵士造酒出賣，更是

屢見不鮮。

軍隊經營工商業，其好處是減輕國家財政負擔。沿邊地區軍隊將帥要派諜報人員到敵境，有時要招降納叛，有時則要對敵施行反間，有戰事又要論功行賞，若沒有足够的資財是辦不了事的。如果這些開支全靠國家財政，數額又大又不便管理。宋太祖時令邊將理財，許其回易，被後世許多士大夫稱讚，原因在於此。南宋國家得以轉危爲安，用回易方式籌集軍費也起了相當作用。

許多帥臣、軍將確實也把回易所得用於軍隊，起到良好作用。岳家軍所以强盛，與岳飛把回易所得用於軍隊有直接關係。《隨隱漫錄》記載了南宋後期帥臣趙葵的一段趣事：他在揚州，發現一個很勇敢的戰士偷庫裏的錢，當時並未聲張。一天，負責回易的官員送來新賺來的二百袋楮幣，趙葵就偷錢者召來，問：你們各能扛二袋楮幣在操場走三圈嗎？二戰士遵命走了三圈。趙葵說二錢獎給你們。但要記住，好男兒戰場立功有享不盡的富貴，小偷小摸是沒出息人幹的事。」二戰士受到激勵遂立大功。此事說明趙葵還把用回易之利來激勵戰士。

但並非所有將帥都是一心爲公的。把回易之利中飽私囊者有之，利用將士們辛辛苦苦掙來的錢大加揮霍、肆意享受者亦有之。軍隊內部矛盾往往因此就

加深，嚴重影響士氣。特別是有些將帥强迫部下經商，索取利息，造成部下諸多痛苦。又如真德秀曾上書論軍師盤剝部下：看到部下較爲富有，就令其負責軍隊開辦酒樓、藥店、旅店等，向其索要高額利潤，破產後竟繼續敲榨其子孫。南宋時，士兵欠債是普遍問題，而許多士兵欠債都是與回易聯繫的（包括向士兵强制推銷商品所造成的欠賬）。

軍隊經營工商業另一個壞處就是耽誤軍隊訓練。不少士大夫都批評軍隊裏非戰鬥人員太多，其中從事工商業的佔相當比例。例如周必大曾說，池州駐軍將領强迫部下回易要求「差出日本軍借錢五千，回日卻要一十五千送納」。當地找不到賺錢營生，士兵只好販私茶，「須往回三五次，方得錢足」，辛苦異常。（《奉詔錄·奏池州副都統郝政施爲未善》）一些軍將還在部內强制推銷商品，例如「金州都統司例私販茶鹽，月科與軍人，每名三斤，高立價值」，然後在軍餉內扣除，等於變相剋扣軍餉。（《皇宗中興兩朝聖政》）。此外，軍隊經營工商業還有用武力强買强賣等事，影響了正常的社會秩序。有些工商業者與軍將勾結，打着軍隊的招牌進行經營，使國家的稅收大量流失。

通觀宋代的軍隊貨殖，總的說是弊大於利，這至少說明，即使允許軍隊貨殖，也必須限制在較小的範圍內，否則就會造成惡劣的後果。

沉重的軍費

宋英宗時，擔任主掌財政三司使的蔡襄曾專門上奏論軍費，他細緻地分析了軍費在每年財政支出的錢、絹、糧、草四項中所佔比例，錢佔十分之三有餘、絹佔十分之十有餘（不足部分用錢買），糧佔十分之八，草佔十分之八，他的結論是「一歲所用，養兵之費常居十分之六七，國用無幾矣。」他在另一個場合，又曾講：「天下六分之物，五分養兵」。他說的若屬實，那麼宋朝財政支出中十分之六以上都用在軍費。這種軍費開支的比例數在現代人看來，簡直是難以思議，這豈不是有點「窮兵黷武」的味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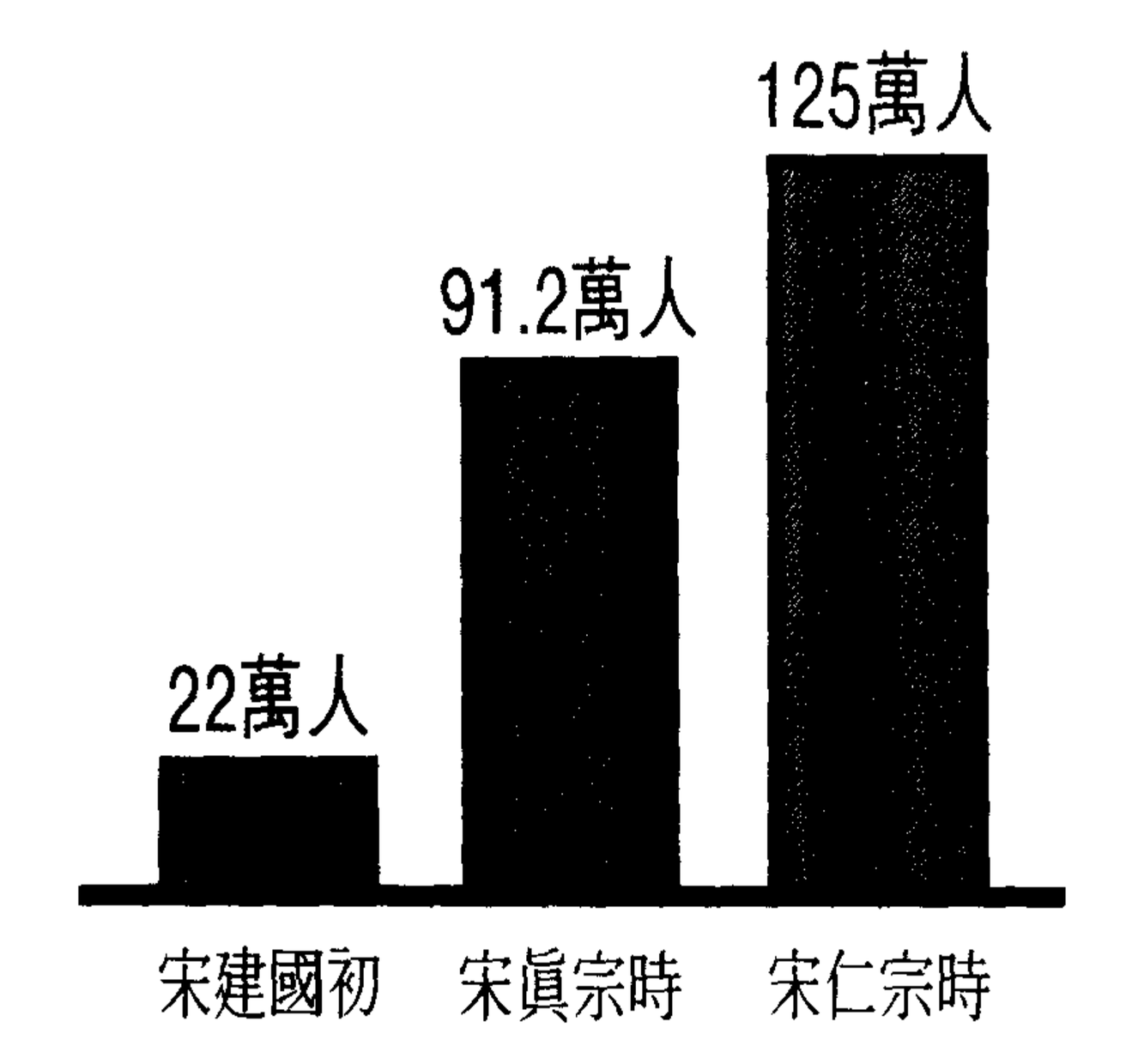
說宋朝「窮兵黷武」，簡直近乎諷刺，因爲翻開宋朝軍事史，簡直是一部不斷失敗史和屈辱史。那麼，是不是蔡襄爲了某種目的在那裏危言聳聽，或是言過其實呢？記載表明，與他持相近說法者大有人在：與蔡襄時代接近的陳襄也曾講：「六分財，兵佔其五」。理學家張載則說：「養兵之費，

在天下十居七八」。此外，南宋初期人王銍、王俁，著名理學家朱熹、陸九淵、陳傅良，後期人王邁等都講過類似的話。不但士大夫們說，連皇帝也說，宋高宗在臨近退位前的紹興三十年曾講：「今天下財賦十分之八耗於養兵。」宋孝宗在淳熙十年下令東南權免招軍時也講：「養兵費財，國用十分幾八分養兵」。其時大臣周必大插話說：「尚不啻八分。」宋孝宗在退位之前，曾專門對當時是皇太子的宋光宗重複了國用十分之八養兵的話，告誡他要控制軍隊人數。

大家衆口一辭，軍費在財政開支中佔十分之六至十分之八的比例應該是可信的了。筆者曾將宋朝存留的各方面財政統計數字進行過分析綜合，最後得出的結論與宋人基本是一致的。筆者只好從另一方面來尋求軍費開支過大的原因所在。於是，便想到古代財政收支基數較小的情況。

確實的，古代（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財政收支數比起現代都要小得多，那是由於當時生產力相對低下造成的。軍費能佔到財政開支的半數以上，從根本上講，還是因爲生產力低下造成的。但是只說這一點顯然還不够，因爲軍費開支佔財政總開支半數以上的情況在前代，至少在唐安史之亂爆發以前大體從未出現過，也從未有人議論，甚至在明代大部分時間中也沒有此

《北宋冗軍表》



種情況，爲什麼偏偏在宋代就如此令人注目地出現了呢？這就不能不使人想起宋代的常備軍制度。

宋朝實行召募常備軍制度，這種制度始於唐安史之亂以後。它的特點是：軍隊士兵不由百姓服役者充當，而是採取召募的辦法徵集。所謂召募，即是令應徵者自由報名。通常情況下，應募者主要是無生活出路，其中災民佔相當比重。軍隊士兵一旦入伍，服役至老（有的甚至是終生），這頗有點類似近代的職業軍人制度。

宋代的常備軍人數大體多於唐代，最多時據載曾達到一百四十萬人。其原因有方面：一是軍事方面。宋朝立都汴京，四面無險，依兵以爲固。宋代馬政不修，騎兵寡弱，依兵數多以對付遼夏金元的騎兵銳。二是宋代的軍隊除打仗、維持治安外還擔負多種任務。首先是郵遞，宋以前郵遞是由百姓服役承當的，宋朝建立遞鋪兵種，免除了百姓郵遞徭役。其次是酒、鹽、礦冶開採、軍器等生產，常常使用軍兵，特別是造酒，還有專業士兵。再者如漕運、修治街道橋樑、維護水利工程等也往往有專業的士兵。至於軍隊經營工商業佔用大批士兵又當別論。宋代軍費主要部分不是用於軍事裝備，而是用在上百萬士兵及其家屬的生計，所以宋人往往稱軍費爲「養兵之

費」，就包括了這一重要含義。

對宋朝這種召募常備軍制，歷來褒貶不一。褒揚者主要稱許二點，即使民無兵役少勞役，使動亂構因消弭。其道理三朝宰相韓琦講得最充分，他說：「方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夫婦長有生死別離之憂。論者但云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詩中《石壕吏》一首，讀之殆可悲泣，調兵之害乃至此。今收拾一切强悍無賴游手之徒，養之以爲官兵，絕其出没閭巷、嘯聚作過擾民之害。良民雖稅賦頗重，亦已久而安之，樂輸無甚苦也，而得終身保其骨肉相聚之樂，此豈非其所願哉？」（《寓簡》卷五）近人又有所謂「社會進步説」，他們認爲百姓用代役代替了服兵役，是地租形式的一種進步。

批評宋代召募常備軍制者主要攻擊它給百姓、國家造成沉重負擔。類似言論頗多，無須舉例，特別是儒士們，他們嚮往古代的兵農合一，對兵農分離的現實批評尤多。這裏應特別提到蘇軾的意見，他提出，宋代士兵終生服役的制度很不合理，因爲士兵最適合打仗的時期是青壯年階段，年歲稍大即不能作戰，一律由國家養起來是很不合算的。撇開古人的議論不講，客觀地分析宋朝歷史，召募常備軍制使宋朝財政經常處於緊張狀態。爲了籌措軍費，

不得不增加田賦、增加禁榷品種類，不得不允許軍隊和地方在一定範圍內經營工商業。這就使百姓賦役和賦役以外負擔空前沉重，僅就賦稅負擔量而言，每戶百姓每年要負擔十貫錢以上，相當於二十畝地的收穫量，百姓的貧困化趨向是十分明顯的。

關於兵出於民好還是僱傭兵制好，已經爭論了幾百年，今天似仍在爭論。筆者不能同意宋代召募常備軍制爲「社會進步」說，因爲他們混淆了賦稅與地租的嚴格界限。

奇特的計量制度

早年讀《湘山野錄》，有一則文字怎也讀不通，其內容如下：歐陽修爲亡友石曼卿撰畢墓表，請詩人兼書法家蘇舜欽謄寫，又請道士、篆書家邵餗題額，然後由僧秘演主持，將其刻石。歐陽修囑咐秘演，不許將此刻石作拓片外傳。數日之後，歐陽修卻見到了此石刻的拓片，問持有者，答稱用半貫錢買的。歐陽修便去責備秘演：「我費了那麼大勁兒，你就賣了半千錢！」秘演自知理虧，卻詼諧地辯解道：「有個朋友急等錢用，我才讓他作拓片賣的。再說我這次比你那次還多賣了三百八十三文呢？」歐陽修生氣地問：「我什麼時候賣過文章？」答：「當初您參加科舉考試，省試得了頭名，您的試卷被人拿去印賣，京師裏到處都能聽人吆喝：『歐陽省元賦二文錢一份。』我這次豈不是比您那次賣得貴多了嗎？」歐陽修被他的詭辯逗笑了。這段記述中使我不解的是：爲什麼半千比二文多三百八十三文，五百等於

二加三百八十三，多麼奇怪的等式！後來我終於明白了：這是宋人計算錢數慣用的作法，即以七百七十文作一千文（一貫）。

這種計錢法，源於唐代的墊陌。當時官府徵收錢稅，每一百文徵二十文，民間便以八十文作一百文使用，大約是爲了表示此錢已經過抽稅。誰知此後竟成了官私計錢的常用辦法。五代後漢時，又徵錢稅，每陌（即八十文）抽三文，此後官私又常以七七文作一百文行用了。宋太宗即位後，乾脆下詔規定，以後官私用錢一律以七七文作一百文計，這就是所謂省陌，意即官方規定的錢陌。

宋太宗的詔旨並未能貫徹到底，因爲情況複雜，一刀切是行不通的。此後官私行用，多數是以七十七文作一百文計，以一百文作一百文計的情況也不少，這種錢陌稱足陌。此外，以其他數目作一百文（陌）使用者也時常可見。據歐陽修記，宋真宗某年科考，省試錄取七十二人，殿試錄取三十八人，士人嫌錄取數少，便說風涼話道：「南省解一百依除，殿前放五十省陌。」所謂依除，即指當時京師商業上流行的一種以七十二文作一百文的計錢法。又《東京夢華錄》：「都市錢陌，官用七十七，街市通用七十五，魚肉菜七十二陌，金銀七十四，珍珠、雇婢妮、買蟲蟻六十八，文字五十六陌，

行市各有短長使用。」可見都城之內，計錢辦法已是五花八門、各行其是，外地更無須説。從流傳至今的數學書中可以看出，用各種不同錢陌計價及相互折算，在宋代乃是學習數學、會計的必修課程。

計錢有省陌、足陌、市陌的分別，計算容量也有省斛、足斛、市斛的區別。記載中有兩種省斛：一是數學家楊輝、秦九韶等在他們的著作中所涉及的，每斛八十三升，它又稱官斛或法斛，秦九韶説此種斛「官私所共知者」。二是宋末人方回所記，每斛七十五升。照理省斛是標準的法定容器，不應有兩種。但省斛雖大量地見諸記載，但記載其精確容量者卻十分有限，所以難以知道兩種説法究竟哪一種正確。省斛通常又稱文思院斛，因爲它是宋朝官工業機構文思院統一製造的。

宋代足斛一般指百升斛，但也有稱一百一十五或一百三十升斛爲足斛的，這是因爲各地通行的斛容量差異較大造成的。宋代各地都各有通用的斛，例如吉州斛一百二十升，潭州斛一百三十升、隆興府斛一百一十五升等。有時一州之內不同鄉鎮縣邑用的斛也不一樣，如湖州吳興用的斛一一二合，安吉用的卻一百一十合。這些是通常所講的市斛。

容量單位的混亂同地主收租放貸、官府收稅及頒餉有直接關係。宋代

官府和私人地主「大斗進、小斗出」的現象十分普遍。官府收稅的大斗最多達到十八升以上，私人收租的斗一般也在十一升以上，官府頒餉、私人放貸則多用小斗。《夷堅志》記平江常熟縣有富豪張某，常用大小斗欺詐百姓，一日狂風大作，風定之後他欺詐百姓所用的大小不等的十三種斗竟「悉列門外，若明以告人者」。張氏終遭惡報。同書又載湖州某地主管家沈某收租時使用一百二十合斗，比本鄉通常所用一百一十二合斗大，被神鬼知道，奪去性命。這些傳說雖不足憑信，卻可說明當時容量制度的混亂及與稅租的聯繫。

容器以外，度量、衡量也有省、足、市的區分。《賓退錄》載：「省尺者，三司布帛尺也。」又述周尺一尺等於省尺七寸五分弱、浙尺八寸四分，則一省尺等於一·一二浙尺。方回則講：「近代有淮尺，有浙尺。淮尺禮書十寸尺也。浙尺八寸尺也，亦曰省尺。」二說不同，或《賓退錄》所言省尺爲北宋時省尺，方回所言爲南宋時省尺。以上所言至少有三種尺，淮尺最大、浙尺最小。北宋末年又有樂尺，它是依據宋徽宗左手中指中間一節爲寸確定的，比三司尺略短。

宋代的足秤斤爲二百錢、二十兩，而官司省秤斤爲一百六十錢、十六兩。足秤八斤等於省秤十斤。此外至少還有在薪炭雜物交易中使用的每斤二

十二兩、二百二十錢的秤。藥品稱量中使用的衡量單位也不同於一般使用的。由於宋代錢的計量和度量衡的計算存在如上複雜情況，就使得當時社會經濟活動變得複雜化。買賣東西、簽訂契約都要對有關方面作出詳細規定，否則就會引起爭訟。這種複雜的計量，在秦統一以後的歷史上，或許是不多見的。

錢多還是錢荒

熟悉貨幣史的人都知道，宋代是中國歷史上鑄造銅、鐵幣最多的歷史時期，年鑄造量最高時，曾達銅錢五百萬貫、鐵錢九十萬貫，這是中國歷史上的最高峯。北宋時，一般年份，歲鑄造銅錢額都超過一百萬貫，鐵錢額都超過五十萬貫。南宋時大幅度減少，但一般歲鑄造銅錢仍有十五萬貫、鐵錢仍有四十萬貫。有人作過統計，整個宋代共鑄造銅錢二·七億貫。總重約十三億斤、六十五萬噸，鑄鐵錢約一億貫、總重也有數億斤、數十萬噸。這是其他朝代不能與之相比的。例如唐代最高年份曾鑄銅錢一百萬貫，其他年份僅鑄銅錢一二十萬貫，鐵錢則始終未鑄。

宋代不但銅鐵錢發行量多，而且官方還發行了多種在一定範圍內可以代替銅鐵錢執行其貨幣職能的紙幣和有價證券。紙幣北宋時有交子、錢引、小鈔，南宋時有京會、湖會、淮交、錢引、銀會、銀關等。有價證券則有交引、鹽鈔、便

錢券、茶引等。北宋時，每年發行交子、鈔引各數百萬貫，南宋時紙幣泛濫成災，最多時發行量達十億貫以上。除了便錢券唐代已有外，其他紙幣和鈔引都是前代所未有的。

宋代銅幣、鐵幣、紙幣和有價證券如此多，但偏偏又出現了嚴重的「錢荒」。人們常常感到市場上錢幣短缺，經常議論錢幣不敷使用，絞盡腦汁想辦法解除「錢荒」。

爲了解決錢荒問題，宋朝政府多方面採取了措施。按照一般的思維邏輯，錢荒就是錢少，解救錢荒的基本辦法就是增加錢幣生產。於是宋朝政府積極增加銅鐵礦的開採，增設鑄錢工場（錢監）、詳細制定獎懲條例以刺激有關人員的積極性，還設置了專門機構。南宋時期，出現了鑄錢賠本問題，政府甘心貼補，也要努力增加鼓鑄。

考慮到錢荒主要是主幣銅錢短缺，所以在增加鼓鑄的同時，必須堵塞銅錢流失的渠道。於是，宋朝政府又頒佈銅禁、錢禁的法令：嚴格禁止銅製品和銅錢外流，禁止私人鑄造銅器特別是鎔化銅錢鑄造銅器，又禁止大量儲藏銅幣。這類詔敕真可謂史不絕書，大約不下幾十次。有關的刑罰也相當嚴厲，例如《嘉祐編敕》規定，將銅錢一貫以上攜出西北邊境以外，或將銅錢二十貫攜出

其他邊界，爲首者處死，私鎔煉銅九斤以上處以刺配。

然而，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儘管市場上已經出現了錢幣短缺現象，宋朝政府很早就頒佈法令，嚴禁銅錢的外流、銷毀和儲蓄。但是銅錢外流、銷毀、儲藏之風卻禁而不止，且有愈演愈烈之勢。尤其嚴重的是銅錢的外流和銷毀。據記載，有時一次私自用船運往海外的銅錢就達十萬貫以上。而用鎔化銅錢造的銅器，幾乎是各主要城市包括行都臨安在内的市場上或公開或暗地都有出售。

以往，人們對錢荒的解釋，都説是商業大發展所造成的貨幣供不應求。這也並非全無道理，宋代因市場開放，商業確有新的發展，對貨幣的需求是有所增長的。但是這種解釋卻無法説明如下的歷史現象：如果錢幣真的短缺，則錢幣購買力照理應向上浮動，但是事實卻相反：自宋初到南宋末，銅錢購買力呈不斷下跌形勢。北宋初，買一匹絹約需銅錢六七百文，北宋中期已增爲千文足陌，北宋後期增爲一千五百文，南宋時又增爲三千文（即省陌四貫）以上。宋代銅錢與唐代銅錢大小、重量都彼此接近，唐代買一匹絹卻僅需三四百文。在錢幣嚴重短缺的情況下，錢幣購買力卻如此大幅度降低，真令人難以置信的。此外，錢幣供不應求的説法，也同人們冒着被殺頭、被流

交子，
是世界上
最早發行使用
的紙幣。

放的危險、大量銷毀、外運銅錢的現象有矛盾。

其實，錢幣購買力下跌，錢幣大量地被銷毀、外運、儲藏的唯一合理的解釋是錢幣太多。然而，錢幣既已太多，爲什麼當時人卻感覺錢荒呢？這主要應從特殊的稅收方面去找原因。宋朝稅收中錢幣所佔比例不斷增大。而且政府規定：金、銀一般不能用來納稅，納稅也不能全用紙幣，一般是銅錢、紙幣各半，有時則全要銅幣，拒收紙幣。所以，在日常商業交換時，不少東西都能代替銅鐵幣，到納稅時，則往往是非銅（鐵）幣不可，所謂錢荒，主要是作爲支付手段的銅（鐵）幣的缺乏。所以，紙幣發行越多，銅錢的「荒」就越明顯、越嚴重。這充分說明：市場上短缺的並不是一般的貨幣，而僅僅是人們要以之完納稅務的銅錢或鐵錢。

人們爲什麼感覺銅錢短缺呢？這是因爲，銅錢的擁有者與需要銅錢來納稅的人之間存在不協調的情況。需要銅錢者（主要是農民）出賣的產品或貨物，往往不是銅錢擁有者所急需的。於是就出現了前者急於得錢而得不到錢，後者卻寧願把錢銷毀製爲銅器、或向外商換取奢侈品使其外流以及大量儲藏等情況。

這就是宋代錢多與錢荒並存的癥結所在。

使用紙幣的利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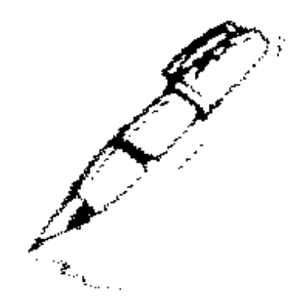
紙幣的發明，本是一件好事。紙幣的應用給人們帶來莫大的便利。前文述及，一貫大鐵錢重二十五斤（後減爲十二斤十兩），一個壯漢背負着一貫錢走十里路也難免汗流滿面。銅錢輕於鐵錢，但一貫也有五斤重，它的價值僅與一兩白銀略相當。現在改用紙幣，一貫錢引儘管有一尺見方那麼大，但重量卻很輕。以往人們要攜帶十貫以上的錢遠行，就須肩挑車推，甚至使用畜力。現在攜帶百貫、千貫的紙幣，簡直不算什麼。

一般百姓固然受益匪淺，商人巨賈得利就更大。以往商人要作長途大宗販運，光是運輸錢幣就要耗用一筆可觀的開支。有時商人們也想避免此項開銷，往返販貨不運錢，但往返都能獲得有利可圖的貨物決非易事，稍有失策就有虧本之憂。現在有了紙幣，運輸錢幣的開銷便没有了。非但如此，以往商人運錢經過關卡時還要依例納稅，現在商人將紙幣藏起來還可以瞞稅。

受益較大是各種遠行者，其中官員、讀書人最爲顯著。宋代官員是實行全國統一調配的，今年天南，明年海北，每次調任都要走很遠的路，有時在路上要花上數個月以至半年以上的時間。以往官員們調任要攜帶錢幣很麻煩，現在攜帶紙幣無疑方便多了。讀書人要赴州、京參加科舉考試，路途也是很遠的，紙幣給他門帶來的便利大體與官員類似。

紙幣發行的最大受益者恐怕還是宋王朝政府。以很少的準備金發行多於準備金數倍以至數十倍的紙幣，無疑政府是有利可圖的，相當於政府新增加了一個新的稅項，而帶來一筆很可觀的收入。以往政府最發愁的事，就是供給駐防邊疆軍隊的薪餉，北宋時爲此實行了入中制度，即讓商人運錢、運糧於邊境，用專賣品食鹽等償還。南宋有了紙幣以後，軍隊官兵的薪餉按比例支發楮幣，減少了長途運輸錢幣的麻煩。紙幣的發行給了政府一種特殊的財政上的應急手段，每當前方或某個局部急需大量資金時，政府立即派人送去大量楮幣，問題便迎刃而解。

發行紙幣有利也有弊。製造紙幣成本很小，但它本身價值卻頗高，於是就刺激起僞造紙幣的慾望。如何對付僞鈔這個問題？據陸游記，北宋末年的富豪胡某，曾派僕人去經營一樁買賣，賺得錢引五千貫，拿回來仔細一看，竟全是僞造的。



可知僞造紙幣北宋末年已有之。南宋初年四川財政長官趙開曾破獲一起僞造錢引案，數額達三十萬貫，案犯五十餘人，足見規模之大。孝宗淳熙十三年（一一八六）曾下詔：「僞造會子凡經行用並處死。」雖刑法如此嚴厲，仍未能禁絕。到宋寧宗時，僞造楮幣已有泛濫之勢。值得注意的是，佔據京東地區自立山頭的混世魔王李全（他忽而降宋，忽而降金，叛附不常），竟令部下僞造宋朝楮幣，持之到宋境購物，引起市場很大的混亂。到南宋末年，「僞會充斥」，竟成不治之症。

自從宋政府知道發行紙幣可以從中取利，可以向百姓轉嫁財政虧空，因此，發行紙幣便成了一個重要的生財手段。發行交子的初期，在數量上大體還是有所控制的。交子雖有貶值，但不足十分之一，到了宋徽宗時，發行數量逐漸失控，特別是交子改爲錢引後，出現了嚴重貶值現象。南宋初期對它加以整頓。情況有所緩和。南宋發行會子，幾乎是一開始就出現貶值情況，但不甚嚴重。到了開禧北伐前後，軍費開支劇增，紙幣發行失控，會子、錢引都出現了嚴重貶值。嘉定年中政府對它們又下力大加整頓，情況稍有好轉。不久宋金開戰，情況又復變壞。到南宋後期，紙幣發行總量竟達十億貫以上，會子一貫只可兌得銅錢數十文，錢引一貫僅可兌銅錢數文。紙幣出現了

嚴重的信用危機，竟出現了在公開場合焚燒紙幣以示抗議的情況。

紙幣的貶值、紙幣與銅鐵錢並行。造成了「物有二價」的情況，即貨物以紙幣計價同以銅錢計價相差很大。以往人們總習慣講南宋後期通貨膨脹如何厲害，其實並不很恰當，因爲所謂通貨膨脹，只是以紙幣計算的物價在上漲，若以銅錢計算，物價大體是並未上漲的。例如絹價以會子計，南宋中期是每匹四貫，後期增至六十貫以上，漲幅爲十五倍以上。但以銅錢計，則從南宋中期到後期每匹絹價始終維持在三貫足上下。

紙幣幣值的不穩，使經濟造成很大的混亂。市場物價處於經常變動之中，給各種投機活動大開方便之門，其他經濟活動也受到影響，例如有人典當房地產取得紙幣，持紙幣經商獲利，待紙幣出現大幅度貶值後再以原額紙幣去贖自己的房地產，就引起典當者與承典者之間的爭訟。士兵因紙幣貶值實際收入受損，也削弱了鬥志。有時政府用行政命令手段强制規定紙幣與銅錢的比價，弄得商店關門，商人停業，更是亂上加亂。

最後還應提及因使用紙幣社會上出現的另一種新情況，它不應歸入使用紙幣的弊病的範圍，但卻是令人討厭的情況，那就是伴隨紙幣的使用出現了偷錢包的現象。在這以前，人們背負着沉甸甸的錢串，要偷是

很困難的。現在人們把紙幣掖在囊中，就給小偷們提供了方便。他們「以小刃取之於稠人中如己物」。據大儒程顥記，成都地方官彭思永對此頗有辦法，曾一舉抓獲偷錢包的小偷十餘人。這也是前代史籍上未曾見到過的。

楮幣的產生

宋代創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這曾引起我很大的民族自豪感。不久學世界史，就產生了疑問：中國紙幣的發行要比西方早數百年，那麼宋代的經濟是否真的先進了數百年呢？後來，接觸了經濟學，又產生了新的疑問：宋代的商業信用並不十分發達，比當時西歐商業信用似乎差距不小，爲什麼宋代發行了紙幣，西歐各國卻沒有發行呢？如今，作爲一名宋史研究者，我對這個問題得出了有別於一般史學家的結論：中國紙幣發行得早，與其說表明中國古代商業異乎尋常地先進，倒不如說反映了中國與西歐各國中世紀在社會經濟方面的深刻差異。

我們先看看世界最早的紙幣（按宋人習慣應稱爲楮幣）是怎樣產生的。關於交子產生的記載，分歧不小，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交子的產生與四川行使鐵錢有直接關係。五代後蜀末年，因財政困難，鑄行鐵錢與銅錢並行。宋滅後

蜀，將後蜀存留的銅錢大部分輸送京師，於是强迫四川百姓使用鐵錢。之後，又宣佈禁止四川地區行使銅錢。鐵錢的弊病很快便顯露出來，便是它購買力低下、易銹蝕，行使中諸多不方便，尤其是購買力低下帶來的問題特多。按照北宋前期的幣制，小鐵錢一貫重六·五斤，購買力僅爲銅錢的十分之一。後來鑄造與銅錢購買力相同的大鐵錢，每貫重十二斤，一枚大鐵錢購買力雖與一枚銅錢大致接近，但前者的重量卻是後者的二倍半。當時的絹價每匹約需銅錢〇·五貫足陌，這些銅錢約重二·五斤，若用大鐵錢則重六斤多，用小鐵錢則重三十多斤。不用説，人們日常生活用鐵錢相當不方便，稍大一點規模的商業貿易就更加困難。例如購買絹一百匹，就需用大鐵錢六百多斤，這真是使人啼笑皆非了。而當時東西兩川成都府附近的地區恰好又是北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交子的創行，顯然也是勢所使然。

交子最初是由十六戶百姓創行的。大體是一種滙兌票據，不能直接作爲貨幣使用。十幾年後發生信用危機，官方便接收，改爲官辦。官辦以後有了强制使用的特性，交子由滙兌票據演變爲紙幣。雖變爲紙幣，但仍以鐵錢爲本位，因此不能在四川以外的地區行使，法償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後來北宋政府看到發行紙幣的利潤頗大，就想把它推廣，幾次試驗都失敗了，北宋後期，政

府終於把它推行到內地，但很快就引起幣制混亂、市場危機，隨即宣佈廢止，只保留四川地區仍行使紙幣。

南宋高宗統治末年，臨安地區試行以銅錢爲本位的楮幣會子，之後又推行到江浙閩等路。後來經過整理，仿效交子制訂了較完備的發行制度，會子逐漸被推行到除四川外所有南宋統治的地區。會子的發行，使整個南宋都開始使用紙幣（與金屬貨幣並行）。但是政府很快就發現，隨着紙幣發行的增多，市面上行使的銅錢逐漸減少。人們樂意自己儲存銅錢，而使用紙幣納稅或買東西。政府擔心這樣下去會使國庫裏紙幣越來越多，銅錢全都流入私人囊中。但紙幣既爲官方發行，且發行紙幣又有許多好處，因而不能不適當地維持紙幣的信用。於是，政府頒佈納稅和國家財政其他收支中銅錢必須佔一定比例的制度，即所謂「錢會中半」制度。

錢會中半制度的樹立，更爲明顯地表示了宋代楮幣與近代紙幣的差異，即楮幣沒有完全的法償能力，通俗地講，楮幣不能隨時隨地代替金屬貨幣。由此產生了楮幣面額和它實際所能兌換到的金屬貨幣數量之間的差異。每貫會子按規定應能兌得七百七十文足銅錢，然而實際上正常情況下只能兌得六七百文足銅錢，最糟糕時僅能兌得三四十文足銅錢或更少。

南宋時爲了防止銅錢流入金朝境內，在長江以北的淮南、京湖地區鑄行鐵錢，與之相配合，則有淮南交子和湖北會子兩種楮幣。它們連同四川錢引（交子自北宋末改名錢引）的法償能力除受錢會中半制度的限制之外，還要受地區限制，其地位和信用又不如會子。

顯然，楮幣的創立和推廣都清楚地表明：一方面楮幣固然是適應當時社會經濟生活的需要而產生和發展的，然而在它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卻不能忽視國家行政權力所起的作用，或者甚至可以說，它是社會經濟生活需要與國家行政權力交互作用的結果。中國至少自漢武帝以後，社會經濟活動受到政府活動的影響極大。任何一種社會經濟現象，在分析其構因時，都不能忽視政府活動的作用。這是中國中世紀經濟的一個顯著特點，是世界上同時期其他地區很少見到的。因此，筆者認爲，宋代的楮幣是中國中世紀經濟特點的一個重要體現者。

打破闤闠的局限

中國古代商業與西方古代商業的一個顯著差異，是中國古代的商業區在相當一個歷史時期內會被國家限制在官方設置的被稱爲「市」的狹小區域之內。從先秦到漢唐，「市」的格局大體是這樣的：在矩形圍牆的某個部位開設市門，市門有官吏和士兵把守。市內有旗亭，又稱市樓，市的行政長官在裏面辦公。樓上有人監視市內人的活動。東漢張衡《西京賦》：「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就是講此種情況。市內又分爲隧、肆、場等，商人的經營活動依貨物種類的不同而分別歸入不同的隧、肆、場等。市有固定的啟閉時間，如唐代規定：「日中擊鼓三百以會衆，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而散。」由於市的圍牆古稱爲闤，市門則稱爲闠，所以闤闠就成爲這種商業區的代名詞。在都市中，市只佔據很小的地盤，例如唐代長安城內一百多坊，東西兩市僅佔四坊之地。朝廷又規定市的設置一定要由國家安排，任何

人不得隨意設市交易，農村和縣以下小鎮一般不得設市。在時間上和空間上都受到嚴格控制的市，逐漸成爲商業發展的桎梏。

宋代商業發展的一大飛躍，就是突破了闤闠的局限。國家不再把商業活動束縛在官方設置的市進行，商業在時間上和空間上都得到了開放。

在城市，每條主要街道上都有經營商業的店鋪。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述，東京朱雀門外諸街、潘樓街、馬行街、相國寺周圍等，到處都是店鋪、酒樓、金銀鈔引鋪、當鋪等，居民區（坊）與商業區（市）之間已沒有什麼明顯的界限。宋代都市之內也有定期舉行「商品交易會」，最典型的是在大相國寺及其周圍每日五次的盛會。《東京夢華錄》對它作了如下的描述：

「大三門上皆是飛禽貓犬之類，珍禽奇獸，無所不有。第二三門皆動用什物，庭中設綵幕露屋義鋪，賣蒲合、簟蓆、屏幃、洗漱、鞍轡、弓劍、時果、臘脯之類……佔定兩廊皆諸寺師姑賣繡作、領抹、花朵、珠翠、頭面……殿後資聖門前皆書籍玩好圖畫及諸路罷任官員土物香藥之類。」

城市有店鋪，城郊有草市。東京沿汴河草市的繁華程度一點也不差於城內繁華街道，以致有學者認爲「清明上河圖」所反映的不是汴京城內，而是汴京城郊草市河市的情景。詩人們常常詠及草市，如「草市朝朝合，沙城歲

歲修」（舒亶）；「草市人朝醉，畬田夜火明」（陶弼），「遠尋草市沽新酒，牢閉篷窗理舊書」（范成大）；「草市寒沽酒，江城夜搗衣」（陸游）等。

益州人與梓州人吵架，只見前者眼一斜、嘴一撇，顯出不屑一顧的神態說道：「梓州還比不上我們益州城東門外的草市，小地方的人就是沒有見識。」可見大都市市郊的草市規模是相當大的。其他都市大體也是如此，中小城鎮和鄉村的集市貿易十分興盛，即所謂「十家之聚，必有鹽米之市」。這種集市因時地不同而有墟市、亥市、廟會等等。詩人云：「已向三辰觀亥市，便從雙井向寅庵」（謝諤），「逢人問墟市，計日賣薪蔬」（陸游）。四川地區還盛行一種定期舉行的以某一類商品爲主的集市。據北宋在四川作過地方官的趙汴說：「當地一年十二個月有十二種集市：正月燈市，二月花市，三月蠶市，四月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寶市，八月桂市，九月藥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其中蠶市與藥市最熱鬧。川眉州人蘇軾蘇轍兄弟離開四川到外地作官後，曾在異地分別寫詩回憶幼年到蠶市游逛時的快樂情景，可見蠶市給他們留下的印象之深。詩人田況寫詩渲染蠶市氣氛的熱鬧：「物品何其夥，碎璅皆不遺。編籥列箱筥，飭木柄鎡錤」，「名花蘊天艷，靈藥昌壽祺。」可知蠶市雖以經營蠶具交易爲

《清明上河圖》局部

主，但也兼營其他各種商品。蠶市在春季，藥市則在秋季重陽節前後舉行。宋人張仲殊有《望江南》詞述及藥市：「成都好，藥市晏游鬧，步出五門鳴劍佩，別登三島看神仙」，陸游也在詩詞中詠及重陽藥市。

商業活動不但在地域上不再受限制，而且原先在時間上受到的限制也被消除，於是便出現了「早市」，「夜市」、「鬼市」。「夜市三更燦爛，樓臺之燈火；春風萬井喧闐，帘幕之笙歌」即是時人描寫夜市熱鬧的情景。南宋時杭州某些街道的商業活動往往通宵達旦地進行。

商業活動打破了闤闠的局限，就給商業稅收帶來極大的麻煩。爲了解決這個問題，宋政府想出了一個好辦法，即讓工商業者按行業組織成「行」、「團」，按行團設簿籍，登記資產，分攤稅役。於是就出現了「一百二十行」「三百六十行」之類的說法。過去有人把宋代工商業的行團等同於西歐中世紀的行會，其實這是很不恰當的。西歐中世紀工商業者的行會（基爾特），是工商業者自發地組織起來保護自身利益的，而宋代的行團則是在政府强制之下組織起來的，它最基本的作用是解決分攤稅役。當然同行業的工商業者既然組織在一起，不免開展一些其他方面的活動，但較之前者，畢竟只佔次要地位。

商人的復興

商人自從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或者說在商鞅變法以後）即遭受厄運。歷朝既執行重農抑商的方針，對商人有歧視、打擊的政策。移民時先移商人，徵稅時重徵商稅，還不許商人穿好的服裝，把商人人另册——市籍，諸如此類，他們簡直被視爲賤民，低人一等。宋代此種情況頗有改觀，商人的地位有明顯上升。

首先，宋以前不准商人子弟參加科舉考試，宋代不但允許他們參加科舉考試，甚至還允許商人中「有奇才異行、卓然不羣」者參加考試，文籍且記載有曾經商又科舉中第的實例，如《夷堅丁志》中的黃安道。其次，宋以前的商人服裝，就制度而言只許著皂白二色，宋太宗時解除此項限制，又規定「今後富商大賈乘馬漆素鞍者勿禁」。再者，史籍記載，宋代制定有關商業的法令，常常召集商人共議，例如鹽鐵使陳恕就曾召茶商議茶法。這種情

況也是前代所無。最後，宋代不時公開賣官鬻爵，不少商人因此得到官爵。這些都直接反映了商人地位的提高。

還有一些情況可以間接地反映商人地位的提高。例如與商人通婚的士大夫、貴族爲數頗不少。時人丁騭上奏抨擊新科進士論財娶妻，言及「市井駔儈，出捐千金，則貿貿而來，安以就之」。（《宋文鑑》卷六十一）可知新科進士被商人招爲女婿者有之。洪邁記與他同時的宰相留正、吏部侍郎諸葛廷與泉州商人王元懋結爲姻家，則大臣與商人聯姻者也有之。商人們往往還同宗室、外戚聯姻。茶商馬季良就與外戚劉美聯姻。宋哲宗時，京師富商帽子田家娶了「十縣主，每五千貫買一個」。（《長編》卷四七二）宋徽宗時，京師富商大桶張家竟娶了三十餘位縣主，又超過了帽子田家。朱勔之父富商朱沖與帝族結姻的事更爲人們所熟知。有些商人竟直接同皇帝本人聯親。如宋徽宗的鄭后、宋高宗的吳后以及宋太宗的孫貴妃，都是出自商人之家。

與商人地位提高的社會現實相呼應，在輿論上也出現了反抑商的潮流。人們首先對妨礙商人經營的鹽茶等法提出批評，指責其「網利太密」，「取利過細」，是霸政而不是王政。之後，又有歐陽修等鼓吹「官商分利」，他們公

開主張國家應與商人共同瓜分鹽茶礬等國家專賣商品的壟斷利潤。

與此同時，公開明確地反抑商言論也出現了。著名政治家范仲淹寫了《四民詩》，士、農、工、商各一首，在《商》詩中，他爲商人鳴不平道：「吾商則何罪，君子耻爲鄰？」並爲商人辯白，指出那種認爲商人敗壞社會風氣的作法是不對的，真正敗壞社會風氣是權貴。北宋末、南宋初人鄭至道提出百姓自古即分爲士、農、工、商四民，士讀書明理管事爲業，農以耕稱爲業，工以製作器物爲業，商以貿通有無爲業，「此四者皆百姓之本業」。只有四民之外不務正業者，才應稱之爲「浮浪游手之民」。他的話使商人重新回到士、農、工、商四民之中。商爲四民之一，這原本是早期儒家的觀點，後世的儒者接受了管商學派的重本抑末觀點，竟把自家經典中商爲四民之一的話淡忘了。思想家葉適也是依據儒家經典的話爲根據反對抑商，他說：「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習學記言序目》）講「抑末厚本」是歪論，這恐怕只有宋人才敢講。

爲什麼宋人公開反抑商言論呢？是否說明宋代商人勢力已非常强大，即將走上政治舞臺、組成像西方中世紀的「第三等級」呢？顯然不是的。

宋代商業較前代有較大發展，在市場方面可稱是發生了革命性變化，但

是總的說，商人還沒有控制生產，他們的經濟實力遠沒有達到左右整個社會的地步。宋代工商業者的人數在全部社會人口中所佔比重是不大的，汴京號稱居民百萬家，而工商、服務業者加在一起不過一萬五千餘戶，比在京的八品官員數量還要少。工商業者雖有時可以議政，但是他們在管理國家、城市等方面仍處於完全無權的地位。官方之所以允許一些人替商人說話，並不是畏懼商人的勢力，而是想利用他們的力量。

正如前引歐陽修所指明的，宋王朝要想通過禁榷制度聚財斂財，非有商人合作就不能成事。因爲歷史證明，官府直接經營商業是弊病極多的。明智的辦法，是將禁榷品產運銷中困難的、經營性强的環節和部分交由商人代辦，而將禁榷利潤的一部分也交給這些商人，官府才能最大限度地獲取利潤。唐代劉晏變革鹽法，正是成功地貫徹了這樣的意圖。此外，宋代在邊境駐紮大量軍隊，軍需供應中有相當部分也要靠商人入中（在邊境繳納實物、到內地索取報酬）解決。因此，任何一位明智的當權者可能看到：在宋代，商人與國家的關係同前代相比已發生了變化，商人對國家不再是光有害處，相反國家的許多事務都要依靠商人，他們是有功於國家。對於這樣一個「有功之臣」，像過去那樣一味地壓制、歧視，豈不是太不公平了嗎？

紙的大顯神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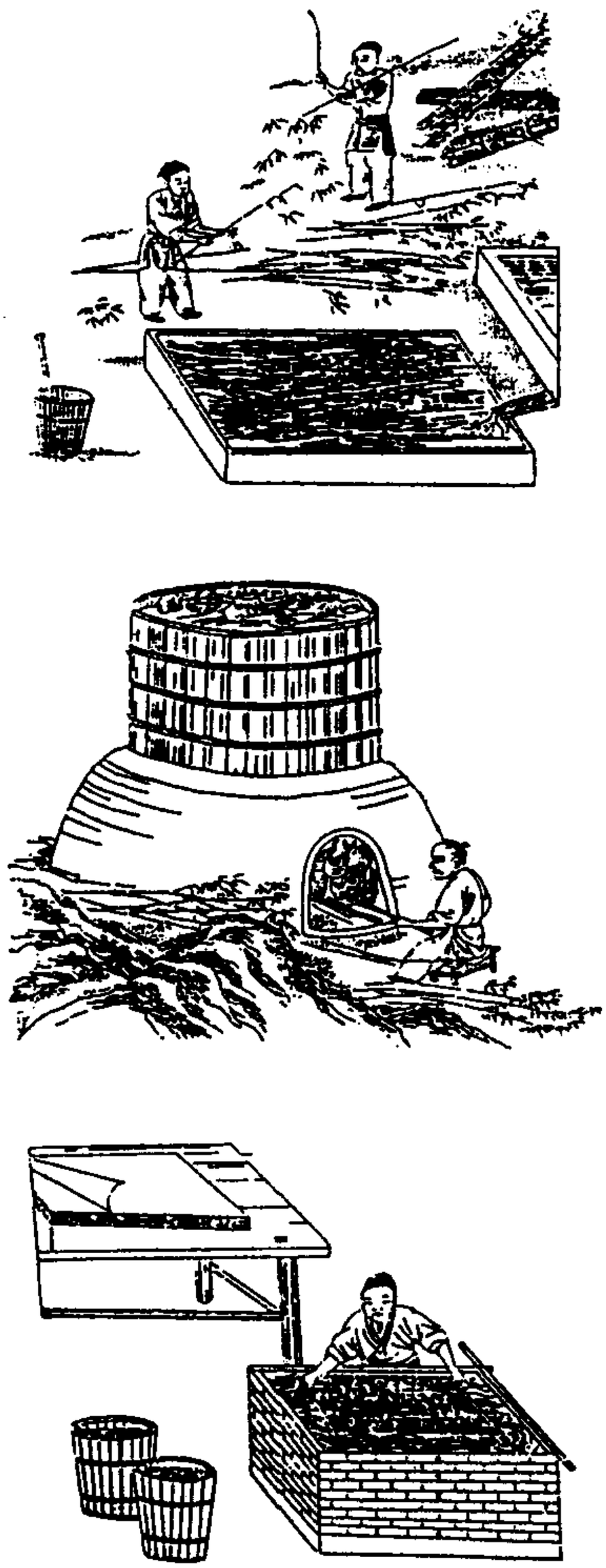
南宋人宋伯仁《楮先生》詩，詠道：「先生邂逅龍亭（蔡倫封龍亭侯）目，多少雲仍滿世間。千古典謨文猶記，九流毫髮事相關。代庖阿堵名尤重，製甲防邊職未閒。只與道人爲鶴帳，始能清夢繞湖山。」所謂楮先生，即指紙，唐宋造紙多以楮皮，韓愈撰《毛穎傳》以楮先生代紙，楮先生遂爲紙之代名詞。詩中言及紙的四種功用，即印書、印紙幣、製紙甲、製紙帳，此外詩中又言「九流毫髮事相關」，則又兼顧了上述四種以外的其他功用。

紙在宋代社會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頗不尋常的。宋以前雖早就有造紙技術，但規模的印刷書籍是始於宋代。宋代三百年中究竟印製了多少書籍，恐怕不易精確統計，但不用說，那肯定是個天文數字。就拿大部頭來講，佛藏、道藏、史書、經書、醫書及諸子百家，見於記載在宋代印製者似就要以十萬百萬卷計。有些大部頭的書還要反覆印刷（例如佛經），有的同一種書則

在不同地點同時印刷。除了正式的書籍之外，宋代還有大批的公文也都印刷頒行。《編敕》、《敕令格式》、《條法事類》等每隔幾年就要修訂一次刊印頒下，而它們照例也都是部帙浩大的。總之，是造紙業支撐着印刷業，不然，出版業也沒有那麼發達了。

印刷楮幣的功用是前代所沒有的。宋代的楮幣是「大票子」，長寬各一尺有餘，每界的發行量少則百萬張，多則千萬以上，紙的質量當然是最好的，每隔若干年就要收舊易新。楮幣之外，還有各式各樣的鈔引，其數量也不比楮幣少。崇寧元年（一一〇二），有一次就令河中府等處造解鹽鈔紙六百八十四萬張，由此可見一斑。此外又有度牒、官告等，它們都需要耗用大量的紙張。

說到紙甲（又稱紙鎧），前代已有之，然數量似不比宋代多。康定元年（一〇四〇）「詔淮南江浙州軍造紙甲三萬，給陝西防城弓手」。三萬紙甲，其數量是何等巨大。宋代還流行紙衣，蘇易簡《文房四譜》載：「山居者常以紙爲衣，蓋遵釋氏云，不衣蠶口衣也。然服甚煖，衣者不出十年，面黃而氣促，絕嗜慾之慮，且不宜浴，蓋外風不入，而內氣不出也。」他還記述了「造紙衣法」：「每一百幅用胡桃、乳香各一兩煮之」，「陰乾，用箭幹



宋代造紙的幾個程序

橫卷而順蹙」。他說歙州、池州一帶還有專門生產用以縫製紙衣的原料紙——「紙衣段」的工匠。他講穿紙衣是受了佛教的影響是有根據的，據說唐代宗時就有和尚號稱「紙衣禪師」。但宋代著名道士甄樓真卻也是「衣紙衣臥磚塌而卒」。另外，宋代貧寒者也時有衣紙衣事。例如宋太宗時廉吏郭元振任知白州，清苦厲節，愛惜民力，啜菽飲水，縫紙爲衣，受到官方嘉獎。王安石曾講邊方士卒生活艱苦，有「衣紙而擐甲者」。有的地方官賑濟貧民時也有製紙衣頒發事。說明紙衣常用以解決貧寒者的困難。當然，紙衣後代似不多見，紙能用以製衣當較爲結實，不然連半日也穿不住就不會有人再穿了。對此，筆者思索再三，不得答案，推想起來或許當時紙內含絲綿或其他纖維質成分較多吧？

宋伯仁講到紙可用來製道士的鶴帳，宋人朱敦儒《鷓鴣天》詞中也有「道人還了鴛鴦債，紙帳梅花醉夢間」的句子，可見道士用紙帳頗爲普遍。然而宋代用紙帳的不止道士。蘇軾《自金山放船至焦山》詩中講到他的一位同鄉作了僧人「自言久客忘鄉井，只有彌勒爲同龕。困眠得就紙帳暖，飽食未厭山蔬甘」。可知和尚也用紙帳。他們用紙帳，取其清雅，士大夫崇尚清雅者也多用紙帳，於是便常有「紙帳梅花歸夢覺」（辛棄疾

句）「紙帳白如雪」（文天祥句）之類的句子入詩詞。《遵生八牋》載有紙帳製法：「用藤皮繭紙纏於木上，以索纏緊，勒作綯紋。不用糊，以線拆縫之，頂不用紙，以稀布爲頂，取其透氣。或畫以梅花，或畫以蝴蝶，自是分外清致。」

紙帳近世雖没有，似尚不足爲奇，宋代還有紙被（又稱紙衾），則頗令今人詫異。宋代詩文中頗有些因互相餽遺紙被而作者，李新有《謝王司戶惠紙被》，劉子翬有《答呂居仁惠建昌紙被》，陸游有《寄謝朱文紙被詩》，謝枋得有《謝張四居士惠紙衾》等，説明紙被時時被用作禮品。士大夫們用紙被，大約也是取其清雅。故謝枋得謝友人贈紙衾寫道，「雅志孤高，亦有紙衾之惠」，「得此琪圃瓊林之物，稱其玉壺冰壑之懷」云云。今人看來以紙製被必不暖，但陸游卻有「紙被圍身度雪天，白於狐腋煖子綿」的句子。真德秀有《楮衾銘》内言「一衾萬錢，得之昌繇。不有此君，凍者成丘」。也提到紙被有禦寒的功能。真氏此銘言及紙被可濟寒者，貧寒者用紙被自與士大夫們追求高雅的本質不同。據《繁盛錄》、《四明志》等記載，官方和私人都在雪寒季節救濟窮人紙被的舉措。士大夫們遇一時困窘，「初寒無衾」，也有「買紙被以紓急」（《章泉稿》四）者。

紙被、紙衣等並不是士大夫必用的，而箋紙、彩箋卻是他們離不開的。紙、

彩箋以蜀、吳越兩地區所產最爲聞名，蜀箋與吳箋爭奇鬥妍，幾乎平分秋色。彩箋一般有底色、有花紋、有淡淡的圖畫，四周有精美的研花。花紋或爲花木，或爲蟲鳥，或爲文物形，皆因時之宜。有的十色爲一套，有的原料中攙有香料，芳香四溢，有的還飾有金銀箔花，極盡奢華。

紙在宋代應用的廣泛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某些用途似乎對今人來說是難以思議的，或許可說仍是個謎。

以茶易馬遺事

翻看宋朝與遼夏金蒙元的戰爭史，或會發現：宋軍在裝備上存在着一個很大的欠缺，便是戰馬過少。因此，不少重大戰役的敗北都與此有關。

宋仁宗時，擔任過專門管理馬政的羣牧使的宋祁講：「今天下馬軍，大率十人無一二人有馬」。宋神宗也曾對王安石抱怨說：「今馬軍多不精，一營（三五百人）或止有數十匹馬」。南宋時期國力衰弱，戰馬的缺乏自又比北宋時嚴重。相比之下，遼夏金蒙元的戰馬卻配備充足，因爲它們大都是以畜牧爲主業的。遼朝軍制是正軍一名配馬三匹，其盛時在册戰馬達百萬匹以上。金朝南遷後（世宗時）在籍戰馬有四十七萬匹（宋朝最多時有二十萬匹）。蒙元出軍之時，往往「有騎而無步卒，人二三騎，或六七騎」。對立雙方一方是三人合不上一匹馬，一方是一人三匹以上的馬，差距是何等懸殊！

然而戰馬又是當時最重要的軍事裝置，其地位與現在的坦克、裝甲車略相當。

南宋初任過宰相的呂頤浩講，在平原上作戰，「騎兵之一可禦步兵之十」，這是不算誇張的。遼夏金蒙元的鐵騎，使宋軍將領感到十分頭疼，兩翼包抄的拐子馬，更使宋軍談虎色變。宋人也曉得騎兵重要。宋仁宗令人編撰的《武經總要》內，專列「用騎」一節，對騎兵在戰鬥中的地位和如何恰當使用騎兵都有精當論述。據記載，宋軍著名將領狄青就善用騎兵。朝廷令他去討伐儂智高，他便堅持要從西北前線調精銳騎兵參戰，結果在決戰關頭騎兵起了一定作用。

騎兵重要，宋朝卻缺乏戰馬。馬性喜寒惡熱，宋朝統治區內大抵不產馬，少數地區產馬又不適合軍用。人們曾嘗試在境內養殖馬匹，也不無成績。但官辦養殖場（孳生馬監）一般都是投資過大、生產過少，得不償失。例如，宋仁宗時，同州沙苑監每年得駒三百，卻要支出四萬貫錢，佔用牧場千頃，軍兵數百人。宋神宗時，黃河兩岸口馬監三年共產駒一千六百四十匹，可軍用者二百六十四匹，費用竟達五十三萬貫。據當時宰相王安石估算，官馬監每繁殖一匹軍馬，約費錢五百多貫，相當於到境外買三四匹馬的價錢。

官養成效不佳，有人就建議民養。於是，便有戶馬、保馬、給地養馬等法。但也有問題。一是不少百姓不掌握養馬技術，馬死了要賠錢，平時也頗多

花費，造成沉重負擔，甚至破產。於是民怨沸騰。二是民間所養馬往往可用爲畜力而不適於戰陣馳騁。

官養、民養都行不通，只好向境外買。遼夏金蒙元同宋處於敵對狀態，自然不會賣好馬給你。宋朝無奈只好打西部少數民族的主意。於是在西部邊境地帶設置了買馬機構，召誘西蕃、回紇、大理等國的人前來賣馬。兩宋三百多年中，宋朝不斷地向西部境外買馬，多時一年買數萬匹，少時也不下四五千匹，一般年份買馬都在一二萬匹之間。

買這麼多馬匹，就要支付巨額的費用。政府不願銅錢外流，而西部少數民族似乎也不樂意要銅錢（這與遼、金等希望宋朝銅錢大量流入的情況不同），他們想要黃金，宋朝又不肯給。於是雙方議定，宋朝以茶、錦（包括小量其他種類絲織品）、鹽和白銀支償馬價。四者中以茶、錦爲大宗，故此因馬而起的貿易史稱「茶馬貿易」。四種支償馬價物品的使用又因地而異，大抵偏北的地區「多用錦而少用茶」。鹽、白銀更是受缺鹽不缺鹽、用銀器不用銀器等情況的限制。西部少數民族以肉食爲主，茶葉可助消化。漢族的絲織技術發達，絲織品歷來頗受歡迎。有記載說，一些地區少數民族百姓視錦爲寶物，人死了要裹一塊錦才得安息。富人死了更要多裹幾塊以求升

天堂。類似這種習俗更刺激了他們對錦的需求。頗令人注意的，是有些少數民族的人竟對漢文書籍也產生興趣，用賣馬的錢買了不少書籍帶走。

有買有賣就是商業，商業活動中總免不了攙雜一點欺詐，茶馬貿易也不例外。大抵說來，少數民族的人較爲誠實，漢族人則稍多僞詐，尤其是那些貪官污吏，更是不擇手段。漢人用陳茶、次錦、夾有銅塊的白銀欺騙少數民族的人，他們便用病馬、弱馬來「回敬」。雙方信用受到破壞，價錢的議定就困難起來。結果，馬價逐漸增加，吃虧的是宋朝國家。

茶馬貿易在促進漢族與西部少數民族的關係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爲了交易，人們不得不學習對方的語言，了解對方的民俗等，這無疑給此後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礎。茶馬貿易也促進了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秦州（今甘肅天水市）、興元府（今四川漢中市）、邕州（今廣西南寧市）等都是進行茶馬貿易的重要基地，它們的興盛繁榮都同茶馬貿易有直接聯繫。也使西部交通狀況得到改觀，許多道路都是適應茶馬貿易而開通的。當然，人們不會想到，後來蒙元軍隊竟從西部少數民族地區沿着因茶馬貿易而開闢的道路迂迴到宋朝西南部，使宋朝遭受南北兩面夾擊，加速了走向滅亡的厄運。

理學出現的時代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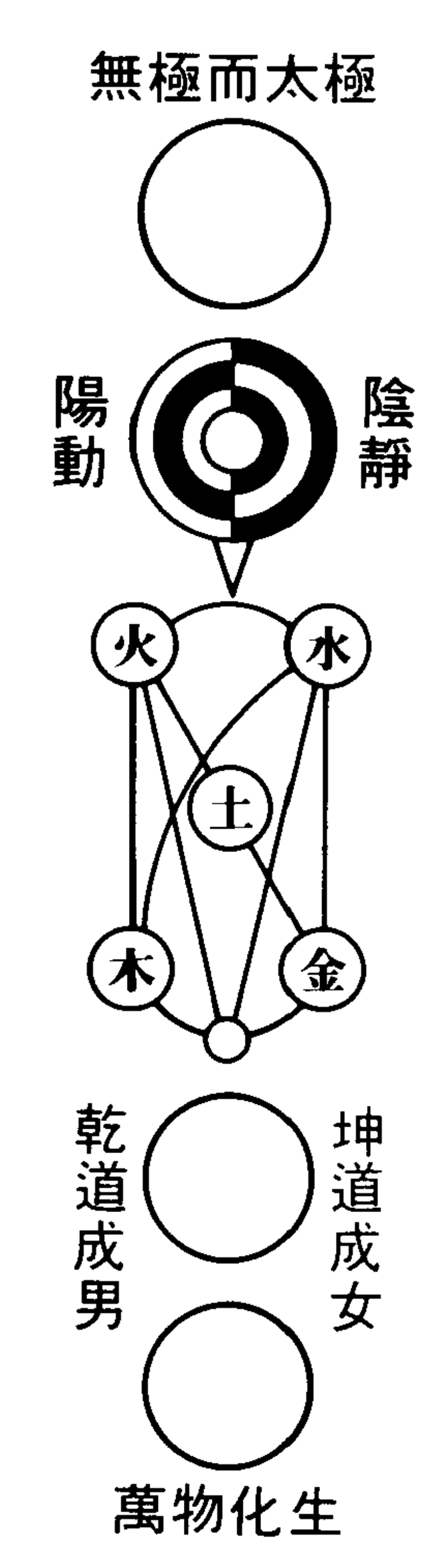
理學的產生，宣告儒學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理學爲什麼會在宋代產生、發展呢？筆者長時間以來反覆考慮這個問題，其中實與寬鬆的政策、殘酷的競爭及士風的日下有直接關係。

宋代理學產生發展過程有兩個重要時期，一是宋仁宗統治時期，它是理學的初期代表人物周敦頤、邵雍、張載及程顥等著書立說的時期，二是宋孝宗統治時期，它是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以及另一些著名理學家如陸九淵等積極活動的時期。宋仁宗、宋孝宗都被公認爲是最開明的君主。特別是宋仁宗，更以「仁恕」著稱。有人推薦四川學者龍昌期，說他有才學，仁宗就委以官職，後來有人指出龍昌期有異端理論，宋仁宗只是免去龍昌期的官職，對他的異端理論全不加追究。他還容忍年青氣盛的蘇轍公開指責他好色。這些都是史所罕見的。由於宋仁宗的寬容，歐陽修等人才敢公開對儒家經典提出疑問，

掀起了疑經的浪潮。當然宋孝宗對各種不同的學術流派也採取寬容態度。他喜歡蘇軾卻沒有因而排斥程頤。呂祖謙、葉適、陸九淵、朱熹等許多學派的同時並存，說明了當時文化政策的寬鬆。如果宋朝由始至終都處在秦始皇、宋徽宗、宋寧宗那樣對所謂「異端邪說」採取剿盡滅絕的政策，大約理學就難以產生、更難以發展了。

宋代理學的出現標誌着儒學進一步哲學化。當筆者面對理學創始者周敦頤的太極圖和閱讀他的太極圖說時，首先的感受也是這一點。儒學爲什麼恰在宋代才哲學化呢？恐怕主要是受了佛道二教的壓迫。宋太宗、真宗、仁宗都對佛道很尊崇，又譯經，又瞻拜，據說宋仁宗的死即與赴寺觀行禮時蒙受風寒有關，可見其虔誠程度。當時的士大夫或信禪（如王旦、王安石）或信道（如王欽若），百姓也多信向佛道，儒學的存在和發展受到很大威脅。與佛、道的學說相比，儒學最主要的薄弱環節就是在哲學方面。佛、道對宇宙的本原、萬物運行之規律都各有一整套理論，特別是道教它所奉爲祖師的老莊都是典型的哲學家，這就刺激了儒家學者對自己經典中哲學色彩最濃的《易經》的興趣。周敦頤的太極圖、二程的天理說，朱熹的理氣說都是從《易經》中闡發出來的。

周敦頤的太極圖



有人說，宋代理學不過是援佛道入儒，即在儒學中揉進了佛、道的理論。這種說法也是不恰當的。不錯，周敦頤、二程、朱熹等理學家都曾受到佛、道二教的影響，他們中有的（例如周敦頤）甚至曾拜僧道爲師，但他們在對佛、道二教思想資料的取捨上，卻有極嚴格的原則性。只有那些與儒家思想體系不衝突的東西才被吸取，與儒家思想體系不合的東西卻被揚棄了。就拿太極圖來說，據說唐朝的道士就已造出了《太極先天之圖》、宋初道士陳摶也曾造《無極圖》，周敦頤的《太極圖》無疑在形式上借鑑了前者，但他的《太極圖》卻完全是依據對《易經》的理解而畫出的。儘管他創造了「太極即無極」的命題，但這一命題仍然是對儒學理論的合理推衍和發展，並不同儒學的基本原理相衝突。正因爲這點，當有人反對這命題並懷疑它不是周子提出的，朱熹毅然站出來爲之辯護，並且反覆論辯撰文數萬言。理學家們從佛道二教學說中吸取營養是爲了最終戰勝佛道二教。理學發展的歷史就是它與佛道二教激烈競爭的歷史。

理學優於前代儒學的另一主要原因，就是關於修養的理論，即所謂性命之學。性命之學的衍出，與士大夫中不良風氣的流行有很大關係。關於士風日下，宋人多有議論。蔡襄曾講，仁宗後期，士大夫

們求財利之心甚切，往往一面作官，一面經商，毫無廉耻。蘇軾在金陵曾對王安石講：「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二程弟子游酢上書論「天下之患，莫大於士大夫至於無耻」。「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雖殺人而謀其身，可爲也；迷國以成其私，可爲也。」南宋大理學家朱熹請著名學者陸九淵到白鹿洞書院講學，陸九淵選了「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爲題，他激情地講：「今人讀書便是爲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爲利」，他問在場的學子：難道這種風氣是正常的嗎？他的話竟感動得聽講的人熱淚直流，朱熹也盛讚他的話「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理學家黃震上書言四大時弊，其中也有「士大夫無耻」一條。士大夫無耻的代表人物，有替長官揩鬚的丁謂，有公開聲稱：「笑罵從汝笑罵，好官我須爲之」的鄧綰，有甘心爲秦檜作莊客的徐宗説，有學狗叫的趙師睪，至於爲謀官而獻媚，爲避禍而屈膝者，是不勝枚舉。理學家們提出「存天理、去人欲」，首先就是針對這些人的，也正因爲如此，理學所講的修養理論才受到許多正直士大夫的擁護。

當然，理學家的修養之學也是針對君王的，在他們看來，宋朝不少事情弄得更

不好，都是由於皇帝有問題，他們希望皇帝能帶頭修養，以身作則，即所謂「聖德修而萬民化」。在當時政治上越來越集權的形勢下，對君主提出較多的要求也是合乎客觀需要、具有合理性的。

幾經磨難的理學

理學是創始於宋代，但在兩宋的大部分時間裏的遭遇都是不佳的。理學在發展的過程中幾經磨難，在一定意義上或許可以講：理學由儒學的一個分支，最後發展爲儒學的主幹，它所受到的磨難起了重要的作用，因爲非理的遭遇給理學贏得了廣泛的同情。

當周敦頤開創理學的時候，他和他的學說都沒有引起當時人的特別注意，周敦頤官階最高時爲郎中，差遣最高爲提刑，並不算高，且未入京師作侍從或擔任給皇帝講讀之職。程顥在學術上比較成熟的時期，正遇上王安石變法，程顥作御史，當面頂撞王安石，又指責新法違背民情，被王安石斥出京師，擔任外官。此後又屢因事被彈劾，最後被貶爲監汝州酒稅，死於仕所。他在仕途上的遭遇，又不如周敦頤。

程頤在政治態度上也傾向於舊黨，但他趕上了舊黨揚眉吐氣的「元祐更化」

時期，是有希望受到重用的。事實上程頤也一度受到特殊的禮遇，他得到宰相司馬光、呂公著的極力推薦，一下子由普通百姓被委任爲通直郎（朝官），崇政殿說書。這種禮遇在宋代是前所未有的。當初蘇軾之父蘇洵也受到破格禮遇，被任命爲秘書省校書郎，但其官階既低於程頤，又無給皇帝講讀之殊榮。然而好景不長，程頤擔任崇政殿說書不足一年半就被罷免，調出京師。

關於程頤被罷，人們往往歸咎於蜀、洛黨爭。表面看確實不無根據。蘇軾公開指程頤爲「奸」，程頤則指使門生劾蘇軾的不忠，兩派確實撕破面皮地鬥。然而仔細分析，程頤被摒出京師，與其說是蜀黨整他造成的，毋寧說是他自己造成的。程頤、蘇軾，恰是士大夫的兩種類型。蘇軾是文人氣質，富有浪漫性格，腦子中條條框框較少。程頤則是學究氣質，處世極爲嚴肅、謹慎、刻板，腦子中條條框框極多，不但嚴於律己，而且苛於待人。他和蘇軾水火不相容是勢所必然的。程頤的被逐主要也是因爲他的學究性格（這一性格與理學本身有直接關係），即因爲他的苛於待人得罪當權者。他給皇帝講課，每每以師道自居，動輒以教訓人的口吻說話，早就引起了年幼的宋哲宗的厭惡。有一次宋哲宗在宮中折樹枝，程頤就趕忙跑來勸諫說：「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獻給宋哲宗的講義中有哲宗

舊日嫌名，內侍爲了避諱，用黃綾蓋住，程頤强求取下，並講了一番臣下不當過尊君主的道理。他用類似的方式規諫太皇太后、宰執大臣，使不少人都厭煩他，最終把他逐走了事。

宋哲宗親政後，貶逐舊黨，對程頤處置尤厲害。理學被列入元祐學術被禁止流行。宋徽宗變本加厲地迫害舊黨人士，理學仍在被禁範圍。直到南宋初理學門人趙鼎爲相，理學之禁才暫得解除。但隨着趙鼎的下野，張浚、秦檜兩相雖對戰和各持異議，對理學都全持反對態度。特別是秦檜，他竟慫慂宋高宗重新對理學頒佈禁令。直到宋孝宗即位後才真正解除。

朱熹十九歲便中了進士，這在當時是很幸運的。但他的仕途卻頗坎坷，在此後的五十餘年中，他只有約十年是作有實際職務的官，其餘的四十年都是作有名無實的宮觀岳廟官(奉祠)。在五十九歲那年才被任命爲接近皇帝的崇政殿説書，但很快即遭罷免。六十五歲時被任命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但同年又被罷免。在他仕途浮沉的五十年中，雖屢次地被人推薦，卻又屢次地遭人彈劾，直至被列入慶元黨籍。

在宋孝宗統治的二十多年裏，理學始終是不得寵的。他雖解除了對理學的禁制，但對理學「正心誠意」那一套説教大體是始終不感興趣的。朱熹曾批評孝宗，説他「悅功利之卑説」，惹得孝宗大怒。但平心而論，朱熹的話並非毫

無根據，宋孝宗在北伐失敗後大體注重務實，對理學確實不太感興趣。不只是他，大多數宰相也對理學敬而遠之。這使朱熹和其他理學家們感到找個政治靠山的重要性。他們的期望沒有落空。傾向於理學的周必大、留正、趙汝愚先後出任宰相，確實使理學家們興高采烈了一陣子，朱熹也正是在周必大等的推薦之下擠進「侍從大臣」行列，擔任侍講職務的。但這卻埋下了理學遭受新的磨難的禍根。

在擁立寧宗的過程中，趙汝愚出力最大，他因而出任宰相。但趙汝愚是宗室，依照趙氏家法，宗室是不宜任相的。他功大權重，遭到寧宗猜忌。而另一在擁立寧宗時出了力的外戚韓侂胄卻野心勃勃，陰謀排擠趙汝愚。他和同黨抓住機會把趙汝愚趕下台，捎帶把擁護趙汝愚的理學家們一起定爲奸黨。這就是所謂慶元黨案。理學因捲入了政治鬥爭而又一次遭到打擊。朱熹的得力助手蔡元定被貶死偏遠，朱熹也在鬱鬱不樂中死去。

慶元黨禁雖不久就鬆弛，但正式解除卻在開禧北伐失敗之後。周敦頤、二程、朱熹被官方尊崇，大體是在宋寧宗統治末年。理宗雖說尊崇理學，他給周敦頤、二程、朱熹都封了很高的爵位，但他卻又尊崇佛教、道教，理學是以排斥佛、道爲己任的，理宗卻在二者之中合稀泥，可知理宗尊崇理學的心也是不夠誠的。

書院的發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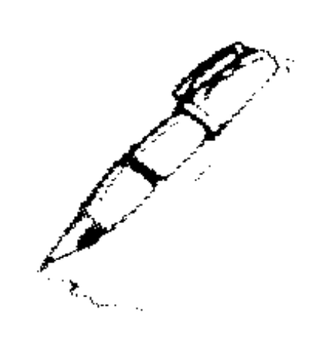
宋代著名書院一般認爲有四個，但究竟哪四個，卻有歧議，於是有人出來調和，改爲六個，兼容並存。這六大書院是：白鹿洞、嵩陽、岳麓、睢陽、茅山、石鼓書院。當中白鹿洞、嵩陽創於五代，其餘創於北宋前期。北宋中期以後至南宋初書院轉向消沉。南宋中期以後，書院又開始增多、興盛。宋理宗時書院增加到二百所以上。

書院之名始於唐代，宮廷內有麗正書院、集賢書院，是藏書修書之所。私人家中也有只供自家人讀書的書院，可知最初的書院並不一定聚衆教學之所。然而私人家的書院既有弟子讀書，難免要請先生輔導，也難免有外人請求聽讀，於是藏書、修書、讀書之書院就有演變爲教學之書院的可能性。到了宋代，書院便成了聚衆講學之所的專用名稱。書院之形成發端很早，因爲書院既以聚衆講學爲主要特徵，所以它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孔子、孟子的講學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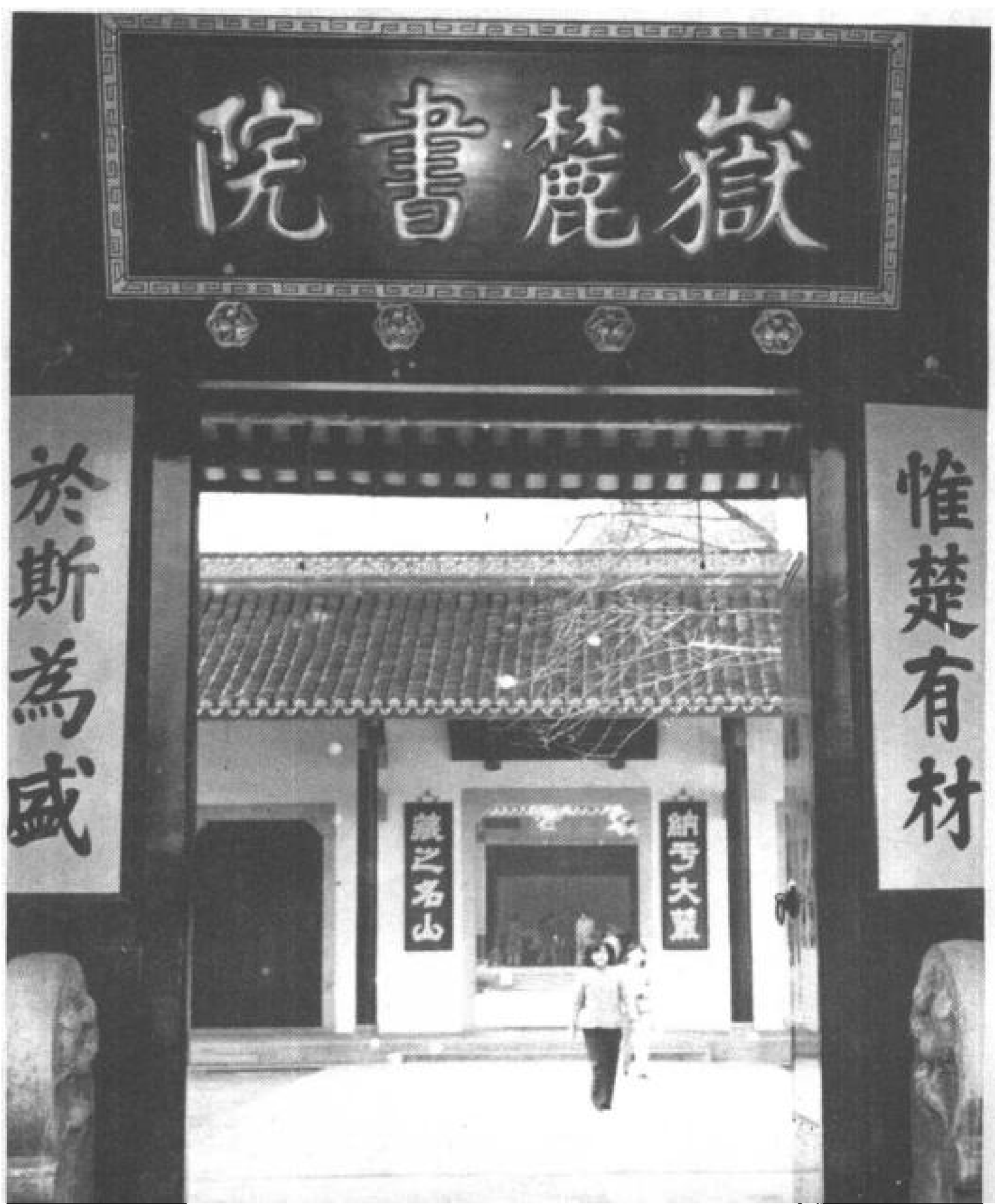
徒。即便不如此，也可追溯到漢代的精舍，因爲它也是由著名儒家學者任教，聽課的學生達數十上百人等等，與宋代書院有頗多相似處。

書院所以在宋代得到發展，是有其原因的。首先，書院的發展與科舉取士有直接關係。宋代科舉考試內容中儒學所佔比重有不斷加大的趨勢，這無疑刺激了學子們學習儒家經典的熱情。北宋初期官學很少，書院就作爲官學的補充應運而生。後來官學盛行，書院就受到漠視。南宋時，官學衰落，已有官學紀律渙散，風氣不正。書院就重新發展。其次，書院的發展與儒學的復興有直接關係。宋代儒學爲了對抗日益發展的佛道二教，由注重字句轉向注重義理，這使儒學進一步哲學化。儒學爲了對抗釋道二教、儒學內部的各個派別爲了擴大自己的影響，都努力發展書院作爲自己的陣地。此外，宋代重文輕武的風氣、出版業的發展等都對書院發展有積極作用。

說到宋代的書院，人們往往把它等同於私人學校，其實是很不確切的。仔細分析可以發現，它與一般私人學校有很大的區別，就是它只講研儒學，儒學以外的如墨家、道家、法家原則上都不在講研傳授範圍之內。宋代書院大都禮先師、祀先賢，先賢也都是儒家學者，其中絕大部分又是理學家。



岳麓書院（湖南長沙）



例如，岳麓書院等都有孔子和十大弟子像，象山書院專祀陸九淵等，儒家以外的學者一個都不在禮、祀之列。說宋代書院是私人所辦，不無道理。它創立之初大多是私人出資的，官府一般也不直接干預書院管理。但是，還應看到，書院的半官辦的色彩也是頗濃厚的。絕大多數書院的創立都得到官方的認可、支持甚至贊助。以上述六大書院爲例，白鹿洞在五代後唐時已成爲官辦的國學。宋初沿用舊制，委官任教，南宋朱熹重建此書院時，也是運用了他知南康軍的行政權力，並曾上奏朝廷。應天府睢陽書院是宋真宗時百姓曹誠之投資重建的，但他不久即捐獻給朝廷，朝廷委員主管，宋仁宗時更乾脆把它改爲府學。岳麓書院的創辦者爲潭州知州，中曾停廢，宋真宗即位後下詔令本州設法恢復，後來又御賜院額。嵩陽書院得御賜院額及印本九經，宋仁宗時朝廷出資重建校舍。茅山書院宋仁宗時得賜官田。石教書院宋仁宗時得御賜院額及官田。南宋時新建書院也往往如此，朝廷任命官員爲書院山長的事屢見記載。這些都說明書院中有不少帶着濃厚的官辦色彩。

由於人們往往把書院看作是民間的私學，書院的學生年齡又較大，所以有人便將他們視爲近代的私立大學，甚而有人把書院作爲中國私立大學的發端。這使得筆者不禁想把宋代的書院同西方中世紀的私立大學

作些比較。西歐最早的私立大學例如波倫亞大學、巴黎大學、牛津大學等出現於十一世紀末至十三世紀初，正好與宋代時間上彼此接近，但是，西歐最早的私立大學的熱心支持者主要是城市工商業者和一般城市居民。他們雖富有，子弟卻無法擠入專爲貴族子弟開辦的官學，於是，他們便積極推動私立大學的開設。而私立大學要想維持長久，就不能不迎合這些人的需要，在開設課程方面，除了神學（相富於宋代的儒學）、文藝（相當於宋代的詩賦）之外，一般還設有法學（因爲工商業者需要懂得民法及與經營有關的立法）、財會、物理以及實用性科學如醫學等。宋代的書院造就了許多出色的政治家、哲學家、官員，西歐的私立大學固然也培養了一些政治家和官吏，但更多的卻是爲工商業者服務的律師、科學家和經營家。其中私立大學培養的律師特別多。

宋代書院與西歐中世紀私立大學的區別，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當時中國與西歐社會制度的深刻差異，這種差異最終導致中國與西歐分別走上了兩條不同的道路。

科場面面觀

如果您經常閱讀有關宋代科舉的書籍，必定會對主考官錄取考生過程中的陰錯陽差的事頗有印象，這種事在唐代是極罕見的，但在宋代卻屢見不鮮，有些故事更帶傳奇色彩。

《夢溪筆談》載有陰錯陽差故事二則。其一說鄭獬作國子監監生時，本監考試時他被列爲第五名，鄭獬自視甚高，對此頗爲不滿。在給國子監官寫的感謝信中竟寫道：「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巨鼇不靈，因頑石之在上」，把自己比作李廣、杜牧，而把監官比作頑石。監官閱後大怒。在殿試時，監官恰好又當了考官，他下定決心要報復鄭獬，看到一張考卷上的文筆像是鄭獬，就不管怎樣判爲不及格。然而後來考試結果公佈，鄭獬竟是頭名狀元，被那位考官刷掉的乃是另一個無辜的考生。

其二說，仁宗時歐陽修倡導改革文風，太學生中有一名叫劉几者卻恃才與歐陽

公唱對臺戲，專寫浮華艱澀文字，還有不少青年效法他。這一年科考，恰好歐陽修是主考官、劉几是考生。歐陽修憋着勁兒要教訓劉几。試卷收上來，歐陽修看到有一考生試卷文筆類似劉几，就將其黜落，又將一文風頗正者，選爲頭名。考試結果一公佈，歐陽修親手選的頭名狀元竟是劉几（時改名爲劉輝），被歐陽公黜落的卻是一名叫蕭稷的人。原來，歐陽公不知道，劉几已經改變了華而不實的文風。

以上二則頗帶喜劇色彩，還有不少宋人筆記中記載的則是科場悲劇。其中爲人談論最多者，就是蘇軾學生李薦落榜的故事。元祐三年，蘇軾的學生李進京參加科舉考試。主考官是蘇軾，考官中有蘇軾的學生黃庭堅等，李薦認爲，自己無論是講才學，還是講師友作考官這個得天獨厚的條件，都是必定被選中的。誰料到科考結果李薦卻名落孫山了。蘇軾痛心疾首地寫詩責備自己：「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目還迷日五色」，黃庭堅也寫詩自責：「今年持槖佐春官，遂失此人難塞責」。李薦的悲痛懊惱自不待言，李薦的母親聞聽此事經受不住打擊，竟永辭人世了。

爲什麼會出現如此多的陰錯陽差事件呢？爲什麼唐代沒有這種事的發生而宋代卻頗多見呢？這就要講到宋代科舉制度與唐代相比一個明顯的差異：

宋代科考更强調公平性，制度因之較唐代嚴密了許多。首先，考官得到任命要在考試之前數十天就進入考場，不許回家，稱爲鎖院。考題要在鎖院期間擬出，以便嚴格保密。其次，考生考卷在評判過程中要把名字、籍貫等封住，稱「彌封」，以防考官知曉是誰人。爲了防止考官從筆跡上認出考生是誰，又規定每份考卷須另找人謄抄，稱「謄錄」。這樣，考官要知道所評判的考卷爲何人是非常困難的。他們往往憑藉平時對考生的了解來推斷考卷的主人，於是便經常出現想取甲結果取了乙、想刷掉甲卻刷掉了丙的情況。

除此以外，宋廷還規定了考卷須經初評、覆評、叅評三級評審的程序，使考官要想作弊都非常困難。爲了防止權勢貴族干擾科考，宋朝規定宗室子弟另設考場，執政大臣的子弟在考取後再加一次覆試等辦法加以防範。爲了防止考官、地方長官子弟參試時舞弊，宋廷還對有牽扯官員的子弟另外組織考試。宋朝考試制度的嚴密化，使不少出身貧寒的學子得以通過科舉步入仕途。

宋代科舉還有一些不同於唐代的。首先是宋代科考强化了君權。宋代在州試、省試之外，增加殿試一個層次。禁止入選者稱考官爲座主及自稱門生，考生一律視爲「天子門生」。其次，科考中詩賦的地位下降，

經書與策論的地位上升。唐代最重進士科，而進士科主要考詩賦。宋代王安石新法規定進士科以經義、策論爲主，元祐年間及南宋將進士科一分爲二，並立詩賦進士、經義進士二科。通過考經義而作進士，這是唐代没有的。再者，宋代科舉錄取人數多，三年一次，一次少則數百，多則千人以上，唐代每年一次，每次通常不過數十人。最後，唐朝科舉得中者一般並不直接授官，宋代凡得中者一律直接授官，狀元和名列前茅者例授高官。待遇一般也優於唐代。

宋代科舉制度雖很嚴密，但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總是有空子可鑽，更何況權大於法的事也難以避免，所以科舉的弊病還是不少。宋真宗時有人告發大臣王欽若作主考時貪贓枉法錄取任懿事，王欽若設計命任懿誣供另一考官，此考官被削籍流配海南，可見確有作弊事。又有記載説，李薦參試時，蘇軾曾派人洩露考題給他，結果寫有考題的紙爲章惇兒子得到，章惇兒子得中而李薦落選。又據載汪應辰淳熙年任主考，憐惜一老相識屢試不中，曾密囑此人參試時在考卷某一部分用三個「古」字。結果此人臨考病重，被錄取的寫有三個「古」字的考卷乃是旁人考卷。蘇軾、汪應辰都是正派人，或許不會幹此事，但時人編出此等故事，顯然是當時確有如此作法。根據記載，

當時科場作弊的方法還有：考官私自用假試卷替換真試卷、考生與考官勾結請人代試、考官在鎖院前就將所擬題目洩露於人等。至於權貴給考官施加壓力，使考官不得不千方百計使權貴子弟或門客入選的事，都是時常可見。尤以奸相秦檜的所作所爲，更是不耻於後世。

從蘇軾看文人際遇

蘇軾在臨終前看到畫家李公麟爲自己畫的像，題詩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有些治文學史者，曾就此大發坡仙一生坎坷的感慨。其實，平心而論，蘇軾此詩是出於一時激憤，用黃州惠州儋州來概括坡仙的一生遭遇，是不恰當的。縱觀蘇軾一生，應該說是有幸、有不幸，也有不幸之幸。他的遭遇在並非職業政治家的文人士大夫中間具有一定代表性。

說蘇軾的幸運，首先是他年青時正好遭逢宋代思想統治最寬鬆、政治最清明的宋仁宗統治時期。那時期造就了一批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等，他們中的一些人對蘇軾的成長起了重要作用。蘇軾的父親蘇洵，少而不學，長乃發奮，科舉不中，著書立說，卻遇到了張方平這位極有眼力、有責任心的地方官。張方平向京師文壇領袖歐陽修熱情推薦蘇洵，歐陽修與張方平

在政治上分屬「新政集團」和反新政集團，但歐陽修卻樂意與張方平共同舉薦蘇洵（這也與當時社會風氣較正有關）。蘇洵得到張、歐陽兩位名人的舉薦，名聲大振。蘇軾恰在此時隨父進京參加科舉考試，主考官又恰是歐陽修，蘇軾初次參試便一舉得中，可稱一幸。蘇軾得中進士後回家居母喪，喪期結束，正趕上朝廷舉行制舉考試。蘇軾參試，在試卷中抨擊時政頗激烈，他卻又一次得中，且被列爲第三等。制舉考試人第三等是非同尋常的好成績，自宋朝開國至此時，連蘇軾在內只有二個人。蘇軾因而直接晉陞爲京官，又可稱一幸。由於歐陽修盛讚蘇洵父子文采非凡，三蘇一下子「文名動天下」，產生了轟動效應，「自京師至於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曾鞏語）。年僅二十六歲的蘇軾一時竟同父親一起成了社會名流。連宋仁宗也曉得了蘇軾兄弟才能非凡，竟預言他們有朝一日要出任宰相。

宋仁宗去世，宋英宗即位，英宗也久聞蘇軾文名，在蘇軾剛作了三年地方官之後，便迫不及待地要調他回京，擔任替皇帝起草詔令的知制誥。宰相韓琦從愛護人材的角度出發，提出反對，但蘇軾從此卻得到了可以接近皇帝的直史館頭銜。

蘇軾

說蘇軾幸運，還表現在他在元祐年間舊黨得勢階段得到重用。在舊黨執政的八年中，他有四年多是在京師，所任職務都是頗重要的。他長時間擔任知制誥，寫作才能得到充分發揮，也爲他廣泛結交文人提供了條件。此時他也多次遭到政敵的攻擊，但都得到宣仁太后等的保護。這時他的最高官銜是禮部尚書，已是朝廷二品大員了。蘇軾的幸運顯然得益於宋朝重文。

說蘇軾不幸，正如他詩中所言，主要是被貶黃州、惠州、儋州。地方雖是三個，遭難實是二次，一是因烏臺詩案，二是因舊黨失勢。烏臺詩案之起因，資料頗完備，白紙黑字，言之鑿鑿。蘇軾此次挨整，是因爲他在詩文中達了反對王安石新法的主張，他的供辭便是最好證明。烏臺詩案險些使他喪命，是他一生中遭受的第一次重大不幸。

紹聖年間，哲宗親政，扶植新黨，摒斥舊黨，舊黨大臣紛紛遭貶，蘇軾是其中之一。先貶惠州，三年後再貶昌化（儋州）。蘇軾被貶海外，是被貶得最重者之一，究其原因，絕非如某些人所講，是因他與新黨宰相章惇有私怨，而是由於他在元祐年間反對新黨最堅決、出力最多。許多舊黨官員如呂大防、梁壽、劉摯等都死於貶所，蘇軾勉强得以生還。

蘇軾兩次遭貶，處境都十分險惡，可謂九死一生、十分不幸。其原因何在？

表

蘇軾曾寫《洗兒》一詩：「人皆有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蘇軾的不幸是否因他聰明呢？這裏所謂聰明，意思是說不糊塗、辦事太認真。所謂愚魯，也並非指真的呆傻，而是會裝傻，裝糊塗。蘇軾總結的這條教訓不無道理。但是要在新舊兩黨激烈政爭中、在一系列重大政治原則問題上裝糊塗、不置可否，這卻與蘇軾的性格截然不符。所以，蘇軾不幸的原因可以歸結爲兩方面：殘酷激烈的政治鬥爭和蘇軾本人的「兼齊天下」的積極有爲的思想。

清人趙翼在讀元好問詩集後寫了一首詩抒發感慨，內有「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兩句，頗爲後人徵引。爲什麼國家遭難會玉成大詩人呢？是因爲社會動盪、矛盾暴露，容易使詩人對世界的認識變得深刻。同樣道理，蘇軾的遭貶，對於他的文學創作也有好處。試想，如果不是遭貶，蘇軾能有《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題西林壁》那樣的傑作嗎？不是遭貶，蘇軾能有那麼多描寫嶺南、海南風情的佳作嗎？遭貶是不幸的，蘇軾卻又從遭貶中得到好處，因而超越了同時代的其他人，此又是他不幸之大幸。

此外，宋代居官者的飄浮不定、待遇優厚、閒逸多暇等，也對蘇軾成爲偉大文學家有重要影響。至於宋代其他文人，就其幸不幸而言，或許與蘇軾有頗多相似點的。

水運儀象臺的發明

在宋代科技史上，有兩位巨人，一位是《夢溪筆談》的作者沈括，另一位便是主持創製水運儀象臺的蘇頌。近年國內外科技史研究者驚奇地發現：宋代水運儀象臺在好幾個方面都堪稱「世界之最」：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鐘。它的機械動力傳輸部分的擒縱器，是近代機械表關鍵部件的最早雛形。儀象臺的活動屋頂，是世界最早的天文臺活動屋頂。於是，蘇頌的名字便越來越多地爲人所知曉。

在蘇頌的《新儀象法要》未被人注意之前，歐洲人羅伯特·胡克、方和斐在天文學史上倍受稱譽，前者是第一個提出天文鐘製造原理的人（一六七〇年），後者是第一個成功地使這一原理變爲現實的人（一八二四年）。但當人們讀了《新儀象法要》和有關記載後，才了解到：蘇頌早在胡克之前五六百年，就已經主持設計和實際製造了類似的儀器——儘管蘇頌的儀器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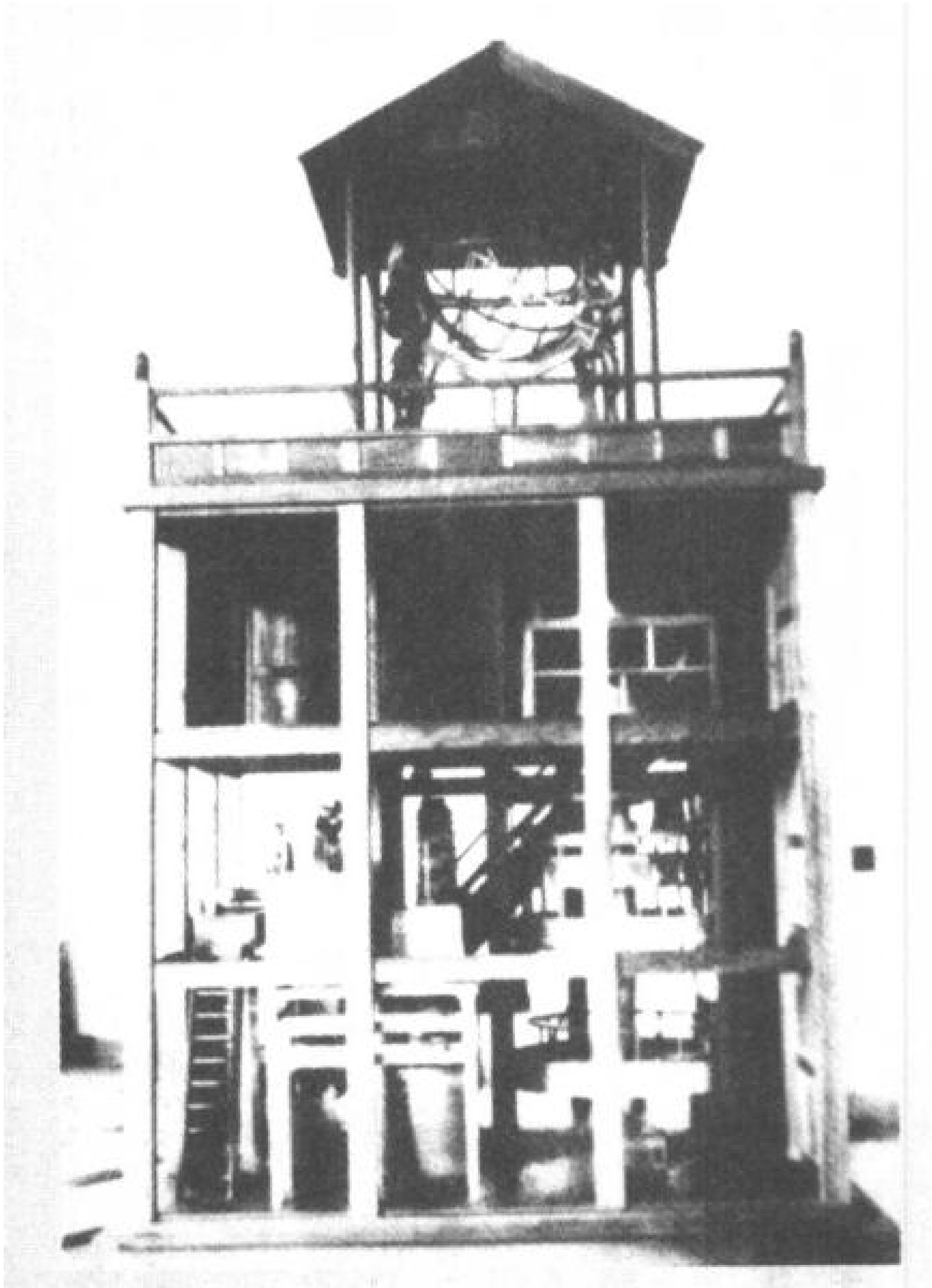
分原始、頗不精密，但卻已經解決了使觀測儀器與天象同步運動等關鍵問題。在蘇頌的《新儀象法要》爲人們所留意以前，人們一直認爲鐘錶是從歐洲傳入中國的，中國人似乎同鐘錶的發明絕對不會有什麼瓜葛。然而當人們閱讀了《新儀象法要》以後，便發現此書所載水運儀象臺的天關、天鎖等機件的運動方式及原理，竟與近代機械鐘錶的關鍵部件錨形擒縱器的運動方式及原理十分接近。不少人因此斷定：中國人對鐘錶的發明曾作出了最重要的貢獻。顯然，蘇頌的《新儀象法要》和書中記載的水運儀象臺使人們對古代中國人有了新認識。

《新儀象法要》是一部怎樣的書呢？簡言之，它是中國古代流傳至今的一部完整的天文學和研究天文儀的巨著。全書分三卷，完整地記述了水運儀象臺的結構、工作原理和各個部件的尺寸等，書中附有總圖、分圖五十餘種，還附有星象圖十四種。中國天文學發展歷史悠久，天文儀器的製作也起步很早，但是以前卻沒有專門記錄這些天文儀器的專著問世。例如東漢張衡創製的渾天儀，就只有史書上極簡略的描述，以致後世很難了解其詳細構造，更無法複製。詳細記錄巨型天文儀器的書，《新儀象法要》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正是通過它，人們才得以確切地了解水運儀象臺。

水運儀象臺是個身高將近十二米的大傢伙，它結構複雜，兼有多種功能，用蘇頌的話講，即「備存儀象之器，共置一臺中」。宏觀地劃分，全臺可分爲三部，即渾儀、渾象和司辰。三部相互貫通，聯爲一體。渾儀設在臺上，由於臺頂由九塊活動木板組成，所以操作渾儀者可以直接觀察天象。渾象是一個巨大的球體，在球面布列衆多星宿，類似近代的天體儀。所謂司辰，實際是以水流作動力的時鐘。它有報時的功能，每一刻鐘由司辰木偶擊鼓，每個時辰的開始有司辰木偶搖鈴，時辰過半則敲鐘。此外，它又是渾象、渾儀緩慢運轉的時間控制器，渾象、渾儀的運轉與天象變動大體同步。

水運儀象臺的研製用了將近三年時間。元祐元年（一〇八六）蘇頌正式接受命令，之後設置專門機構。其構成人員主要有蘇頌熟悉的下屬吏部令史（蘇頌時任吏部尚書）韓公廉、壽州州學教授王沇之，太史局官員周日嚴、于太古、張仲宣，太史局生袁惟幾等，學生侯永和等，都作（大約是技師）尹清等。顯然，水運儀象臺像中國古代許多發明創造一樣，嚴格講，是集體創作的結果，而並非僅僅蘇頌的個人功勞。

然而蘇頌的貢獻又是不可抹煞的。他活到八十二歲，二十三歲中進士，在官場混了將近六十年。他作過許多地方的地方官，又曾任過不少要職，在元



水運儀象台（模型）

祐年中更擔任刑部尚書、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和宰相。但是他在政治上卻絕少建樹，尤其跟他擔任過如此多的要職相聯繫，使人更覺其政績平平。他最爲時人稱道的是在宋神宗時擔任知制誥時作的一件事。當時王安石推行新法，凡贊成者例必破格提拔。有一名叫李定者，對新法和王安石讚揚備至，大得王安石好感。於是李定由選人晉級爲京官，又跳越數階，破格被任命爲監察御史裏行。此事激起許多正派大臣的反對，擔任起草詔命的包括蘇頌在內三名知制誥一起堅決拒絕草擬命令，被當局罷官。於是人們稱讚蘇頌等爲「三舍人」。

但是類似的事情在蘇頌一生中是極少的，或者說，在重大有爭議的政治問題上，蘇頌的態度往往是曖昧的。大約正是因爲此種處世方式，使他在宋神宗、哲宗兩朝激烈的黨爭中，始終未受重大挫折。特別是哲宗親政後，元祐年間擔任過宰執大臣者例受打擊，蘇頌却獨得倖免。

與他的政績平平形成對照，他在科技史上的貢獻卻是頗爲突出的。他在主持創製了水運儀象臺之後，便撰寫了《新儀象法要》一書。如果說水運儀象臺是集體智慧的結晶，那麼《象法要》一書卻主要是蘇頌的勞動成果。從此書我們也可體察到他在水運儀象臺創製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絕非僅僅掛名的

領導。在這以前他還參加和主持過醫藥書籍的編撰和整理，其中《本草圖經》在中國醫學史上的地位尤不容忽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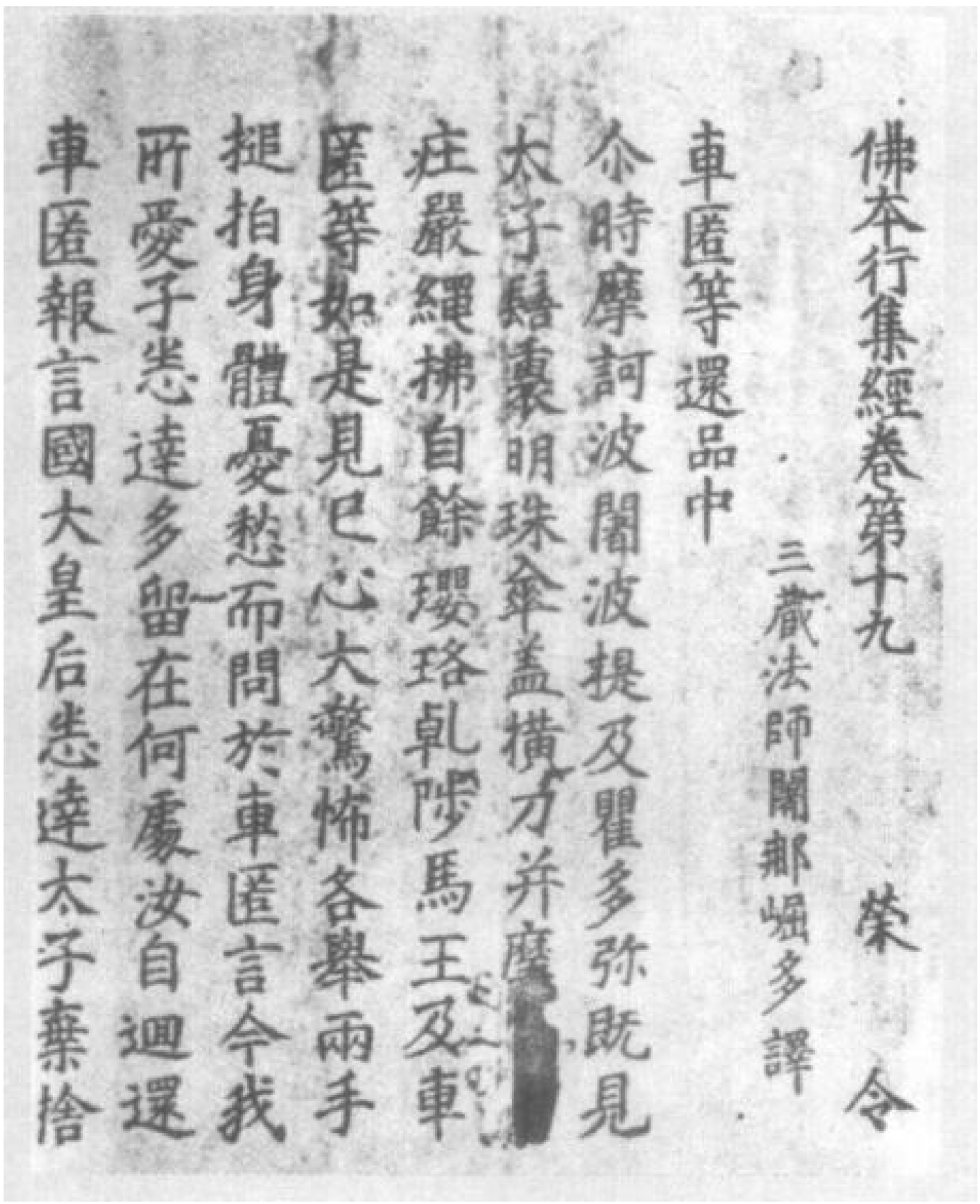
傑出的科學家和平庸的官僚，這就是蘇頌作爲一個歷史人物的兩個側面。

發達的印刷業與「江湖詩案」

中國人引以自豪的四大發明之一——活字印刷術始於宋代，這決不是偶然的。它顯然與宋代印刷業的大發展有最密切的聯繫。書籍的印刷不始於宋，但書籍的大規模印刷卻始於宋。

如果列舉宋代印刷業的成就，簡直可以令今人瞠目。就拿大部頭的書籍來說，宋代刻板印刷者就決非少數。宋初編成四部大書，即《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册府元龜》，共計三千五百多卷，在宋代都曾刊印。宋代科舉興盛，考生們需要經書和史書。宋真宗時，國子監的儒家經典刻板世達十餘萬片，隨時刷印出售。官方還先後將《史記》、《漢書》、《三國志》、《新唐書》、《通鑑》等刻板印刷。它們總共也有數千卷。宋代儒道佛三教並舉，佛道經典也大量印刷。宋太祖末年益州雕成中國歷史上第一部佛經總集，共有印板十三萬片。宋徽宗時在福州雕成中國第一部道經總集，共收

北宋開寶七年（974）
在四川雕印
的“佛本行集經”



佛本行集經卷第十九　　榮　令

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車匿等還品中

尒時摩訶波闍波提及瞿多弥既見
太子髻裏明珠傘蓋横刀并麾
莊嚴繩拂自餘瓔珞乾陟馬王及車
匿等如是見已心大驚怖各舉兩手
搥拍身體憂愁而問於車匿言今我
所愛子悉達多留在何處汝自迴還
車匿報言國大皇后悉達太子棄捨

入道經五千三百八十七卷。此外，宋代還刊印了許多大部頭的醫書、農書、地理書等等。從書籍印製者的複雜構成上，我們也可體會到當時印刷業的興旺發達。現存的和清代以來人們所看到的宋版書，大都標明印製單位或印製者。有人把它們劃分了種類。從大的方面講，有官府印製、私人印製和團體印製三類。官府印製的書籍又可細分爲國子監印製、秘書監印製、各殿院司局印製、漕司印製、憲司印製、倉司印製、帥司印製、州郡印製、州學印製、縣衙印製、縣學印製等。私人印製書籍又有家室印製和坊肆印製之別。團體印製書籍則主要包括佛教寺院、道教宮觀、書院和家族公社所印書籍。

書印得如此多，好處是不少的，宋代文化事業的發展與出版印刷業的迅速發展是聯繫在一起的。但是書印多了也會出現問題，首先是給當局造成一些麻煩：有些涉及遼宋關係的文字被印出來了，難免引起事端；有些涉及核心機密的文字被印刷、張揚出來了，弄得統治者頗感被動；有些離經叛道的言論也被印刷出來了，更有動搖民心的作用。於是宋朝政府不得不時常頒佈一些關於出版印刷方面的禁令，開始是規定某些種類的書籍不許印，這樣的規定不可能照顧到各個方面，最後乾脆下達了凡出版物在出版之前須經有關方面

審批的命令。

宋代政治鬥爭常波及文化事業，北宋後期的黨爭最終導致蘇東坡、黃庭堅等人的作品毀板遭禁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南宋也有一個典型事例，那就是所謂「江湖詩案」，因爲它涉及一位著名的出版家，所以有必要在這裏講得細緻一些。

宋寧宗親生兒子於嘉定十三年死去，爲了防備萬一，他在姪子輩的宗族中選了一位作爲養子，這就是趙貴和（後改名竑）。但到了宋寧宗去世時，宰相史彌遠卻自作主張，另立一位皇姪趙貴誠（後改名昀）爲新皇帝（理宗）。將原先的皇子趙竑封爲濟陽郡王，令他出居湖州。不久，太學生潘壬等在湖州起兵，打出擁護趙竑作皇帝的旗號，並强迫趙竑在湖州即皇帝位。趙竑知道潘壬等成不了事，就偷偷派人到臨安向朝廷告變。潘壬部隨被剿滅，而趙竑也被賜死。儒家學者真德秀、魏了翁等紛紛站出來爲趙竑鳴不平，遭到史彌遠的打擊排斥和迫害。不久，又有人向朝廷揭露說，新近臨安府刊出的詩集《江湖集》內有影射史彌遠陰謀廢立及逼死濟陽郡王的詩句。這類詩句有：「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風楊柳相公橋」。它的作者一說爲曾極，一說爲陳起，一說爲敖陶孫。「未必朱三能跋扈，都緣鄭王欠經綸」。「春風謬

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二句均爲劉克莊所作，前題爲《黃巢戰場》，後題爲《梅花》）「九十日春晴景少，百千年事亂時多」。（曾極作，《詠春》）這些詩是否作者有意抨擊時事，當時人似未講清楚，後代人更是說法不一。

不管罪行是否屬實，當時卻正是按「影射時政」定的「謗訕罪」。《江湖集》被宣佈爲非法，毀報並禁止發行。與此案有關的劉克莊、曾極、敖陶孫、周文璞、趙師秀等人均遭到嚴厲處理，其中被處罰最重的就是此書的刊印者陳起，他被黥面流放到邊遠地區。這件事一出，嚇得文人們很長時間不敢作詩。

《江湖集》的刊印者陳起，字宗子，號陳道人，錢塘人。有人稱他爲陳解元，非諛辭，他還在科舉鄉試中得過頭名。在臨安睦親坊開了個不小的書肆。今傳宋版書中，據說有許多是他書肆刻印的。他不但刻書賣書，自己也能撰文寫詩，有些詩寫得很不錯，傳世有《蕓居乙稿》一書。他既能文善詩，就和文人接觸比較多，尤其是和官位較低的文人接觸較多。他編印的《江湖集》所收錄詩的作者，大都是地位卑微者，《江湖集》也由此得名。

史彌遠死後，政局隨之扭轉。真德秀一派當權，《江湖集》一案得到平反。

江湖派詩人揚眉吐氣。人們想把《江湖集》重新刻板，但此時陳起已逝世，最初《江湖集》收了哪些詩已不大清楚了。於是，《江湖小集》，《江湖前集》、《江湖後集》、《江湖續集》、《中興江湖集》紛紛問世。其中哪些是毀板前就有的，哪些是後人增補的，這成了許多治文學史者議論不休的一個問題。

金字牌・遞鋪・邸報

宋高宗一日發十二道金牌令岳飛撤軍的故事，或許使人對金牌有一種神秘感，以爲它一定是黃金鑄成的。其實，金牌是金字牌的簡稱，並非金鑄而係木雕，長一尺有餘，漆以紅色，上面書金色字：「御前文字不得入鋪」。除了金字牌專供皇帝用外，宋代還有樞密院用的雌黃地青字牌、黑地紅字牌以及尚書省用的雌黃地青字牌和前線用的黑漆白字牌。此時，對金牌的神秘感消釋了：原來金牌與民間雞毛信上那根雞毛的作用是一樣的。

金字牌等都是用於傳遞命令或情報的。宋代一般命令或情報的傳遞是不用「牌」的，一用牌就帶有緊急性。金字牌上所書「不得入鋪」四字的含義是：傳遞命令或情報者不得入遞鋪歇脚。馬跑不動了怎麼辦？換馬。不進遞鋪怎麼換？當時人想出了如下辦法：在馬上繫銅鈴，沿途遞鋪一聽見鈴聲就須備好馬在門口迎接。這樣，緊急命令或情報一日可行三五百里。自臨安

至成都最快時只須十五天。

身繫金字牌（或別種牌）傳遞命令或情報的是遞鋪兵，他們傳遞這類信函要負很大責任，晝夜兼程，辛苦異常，賞重罰也重。北宋時規定，傳遞附金字牌信函者四次無事故，即可晉昇一級或賞絹五匹；耽擱一天，卻要判處刺配流放的重罪。

遞鋪這個名詞，宋以前很少見，大體是宋代才較多見於記載的。以前有驛遞，到宋代驛與遞卻有了區分：「遞」又不役使百姓，改用專業士兵即遞兵，遞兵若干人爲一鋪，分佈在交通線上，於是便有了遞鋪；驛館主要用於居住，遞鋪主要用於傳遞。遞鋪除了傳遞命令、情報外，還傳遞官員的奏疏等其他公文。宋政府又明確規定，官員可以通過遞鋪傳遞家信。

宋代遞鋪又擔負運輸物資的任務。四川、廣南向京師輸送的物資中有相當部分是由遞鋪運輸的，廣南運往京師的物資中香藥是重要的一種，沿途遞鋪因此被時人稱爲香藥遞。西線和北線軍事物資的運送也往往由遞鋪負擔，爲此，政府專門爲沿途遞鋪配備了人力小車，稱爲車子鋪。此外，鑄錢用的原料，用於作茶馬交易的茶葉等，也多用遞鋪運輸。遞鋪兵運輸物資十分艱苦，特別是戰爭期間運輸軍用物資，時間緊、任務重、飲食不備，常常造成大批士兵傷病或死亡。

宋代的遞鋪分佈全境，構成一個大的網絡。遞鋪數量常有增減。宋真宗時擬祀汾陰，一次便增置遞鋪兵八千四百五十人，事後又作裁減。每有戰事，也大量增置，事後裁減。遞鋪之間的距離一般爲十八至二十華里，每鋪約有十餘人，粗略估計，全宋大約有三五千個遞鋪，遞兵數萬人。南宋前期軍情緊張，時人估計全宋有遞兵十萬以上。遞鋪依交通線設長官，稱巡轄遞鋪，一般是武官。宋朝規定，凡過往信函、物資，各遞鋪都要詳細記錄其名稱、到鋪時間、送抵下一鋪的時間、輸送者姓名等。北宋徽宗大觀元年（一一〇七）頒佈《大觀馬遞鋪敕令格式》，共有一百卷，說明有關制度相當細密完備。

在宋代遞鋪傳遞的公文中，有一種是邸報。邸報前代已有之，多爲手抄，宋代多是印刷，很像近代的報紙，流傳比前代廣，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比前代也有明顯提高。宋人唐庚有《讀邸報》詩：「當今求多聞，取士到蓬蓽。時時得新語，誰謂山縣僻。昨日拜御史，今日除諫官，立朝無負漢恩厚，論事不妨晁氏安。臺省諸公登衮衮，閉門熟睡黃紬穩。」蘇軾貶官黃州，友人船經過，蘇軾登舟相訪，在邸報中得到關於司馬光、歐陽修的消息，頗興奮，有「坐觀邸報談迂叟，閒說滁山憶醉翁」的詩句。從唐庚、蘇軾的作品以及其他宋人的作品我們可以得知，官員的任免是邸報的

司馬光

主要內容。據說邸報還刊載非保密性奏疏的題要，而官員的任免和奏疏又同政局的變動密切相關，在這意義上邸報有新聞性。

邸報的編輯者爲門下後省，由給事中審核，都進奏院發行。凡事干機密者嚴禁刊載，宋朝爲此制定了詳細的制度。由於邸報所載多爲已行之事，有時竟成「舊聞」。邸報編製時往往不敢涉及重要政事，以免招引麻煩，編製後經審查，又删去許多重要內容，這使讀者覺得很不滿足。

適應人們的心理需求，都進奏院的官吏私下裏又編印一種「小報」，它上面登載的消息涉及許多重要機密，但多得之於傳聞即「小道消息」，缺乏準確性、可靠性。儘管如此，因爲它刊載的內容往往披露一些事情的內幕，而且又非常及時，因而很受歡迎。小報內容分爲「內探」（專載宮廷事）、「省探」（專載朝省事）、「衙探」（專載某一官司事），它的發行人常常因此致富。宋政府曾屢次頒令禁止，然而禁了不久又再出現，不能根除。最後，爲了掩住官府耳目，逃避重刑，小報又改名爲「新聞」，暗地繼續發行。筆者未作深考，不知宋代的「新聞」與近代的「新聞」之間是否存在源流關係。由邸報、小報、遞鋪可知，宋人不懂信息論，但對信息的掌握還是重視的。只可惜當時人們重視的信息過分偏重政治，對經濟信息、科技信息卻似乎重視得不那麼夠。

神御殿・景靈宮・功德寺觀

有關宗教在宋代政治生活、社會生活中的地位，衆説紛紜。其中流行的説法，即認爲宋朝以儒立國，釋、道都遭排斥。究竟對此應持何種看法，筆者不敢冒然立論。不過，如果了解宋代的神御殿、景靈宮、功德寺觀，那對此問題的認識一定會有所加深。

所謂神御，是指死者的塑像、或雕像、或畫像，而神御殿即是指供奉神御的殿堂。宋代不少寺觀内都有本朝已故帝后的神御殿。這件事發端於宋太祖爲其父（宣祖）建神御殿。宣祖死後葬於汴京城南，太祖即位後遷於新址，即在原地建奉先薦福禪院，内建宣祖、杜后神御殿。宋太宗即位後，在誕生地建啓聖院，他死後，真宗就在院内建了太宗神御殿。宋真宗感到只爲太宗建神御殿、不爲太祖建，易引起議論，便訪得西京太祖誕生地建應天院，於内建太祖神御殿。然而不知出於何種意圖，後來又在院内陸續增設太宗以下

諸帝神御殿，大致上每死一帝，就在應天院內增設其神御殿，因此，應天院成了北宋的一個小宗廟。無獨有偶，西京的會聖宮也有自宋太祖以下各帝神御殿，成了北宋另一個小宗廟。應天院在西京城外十里處，每月留司、知府要赴神御殿拜謁二次，天未亮就起牀，拜畢每人賜酒三杯，故有「正好睡時行十里，不交談處飽三杯」的詩句。

北宋除奉先寺、啓聖院外，京師玉清昭應宮等十幾處東西兩京以外，南京鴻慶宮、揚州建隆寺、滁州天慶觀、并州資聖院、澶州開福院、鳳翔上清宮等多處，也各有帝后神御殿。南宋行都景靈宮、萬壽觀、佑聖觀、開元宮、龍翔宮等處也有帝后神御殿，外路帝后神御殿減少，只有成都、福州兩處的寺觀還有存留。

景靈宮原是宋真宗建造、專門供奉聖祖的。真宗病重，皇子（仁宗）在宮內建萬壽殿、企求延長真宗性命。他死後即改爲真宗神御殿，此時景靈宮與京師內有神御殿的寺觀尚未顯出太大差異。不過真宗選址時是經過精心策劃的，景靈宮所在地正是太宗作晉王時的府第，又恰是真宗出生地，上聖祖地位異常，所以景靈宮自非一般寺觀可比。仁宗、英宗以及他們的皇后死後，也分別在宮內建了神御殿，宮內神御殿數量漸增。宋神宗時，乾脆擴加

建景靈宮，把京城其他寺觀內各帝神御殿撤消，全部移入此宮，把它改造成第二太廟。然而宋朝的景靈宮與漢代原廟不同，漢代原廟不是道教宮觀，而景靈宮卻是地道的道教宮觀。它在宋徽宗即位後又進行擴建，突出了宋神宗的地位。

北宋滅亡，汴京的景靈宮被毀。宋高宗建行都於臨安後，紹興十三年又在臨安建新景靈宮。宮內除有北宋諸帝后神御外，又陸續增加了南宋各帝后神御。

自仁宗時起，一直到南宗，每逢已故帝、后忌辰，景靈宮內都要用僧、道或三七或四七人作道場追薦亡靈（景靈宮本爲道教宮觀，然而相沿成例，僧人也在宮內作道場，宋徽宗時一度取締，南宋時又復舊）每年四季的第一個月和郊祀之前，皇帝都要親自赴宮行禮。南宋宗室趙師羿有詩云：

「風傳御道蹕聲清，兩道紗籠列火城，雲護帝尊天未曉，衆星環拱極星明。」

即是描述皇帝親禮情景的。元豐五年曾頒佈《景靈宮供奉敕令格式》六十卷、《景靈宮四孟廟獻儀及看詳》十五卷、《大禮前天興殿儀及看詳》十九卷，可知有關禮儀制度是非常複雜的。此外，新執政大臣任命後也要赴景靈宮行晉謁禮。

功德寺觀，是指專爲某人某家作功德事的寺觀，唐代雖已有，但不多見，宋代則相當廣泛。宋朝規定、親王、后妃、長公主、現任兩府大臣、入内内侍省都知押班、元勳、戚里均可建功德寺觀。從記載看，同一家也可有兩處或兩處以上的功德寺觀，如北宋名相富弼家有南奉親院、北奉親院兩個功德寺院，北南宋之交名相李綱家有常州普利院和邵武軍興聖院兩處功德寺院，南宋僧人思廉致書宰相，稱當時權貴們往往一家「影占數寺，稱爲功德」。由於戚里、兩府大臣等經常易舊更新，而功德寺觀一旦建立就不再毁廢，所以它數量有不斷增加之勢，《吳興志》、《武林舊事》、《赤城志》記載湖、杭、台三州的功德寺就有六七十所。功德宮觀的數量從記載上看比功德寺院要少，比較有名的有歐陽修家的瀧岡西陽宮。

功德寺觀的主持僧道由主家聘請。僧道徒所以甘心隸屬主家，當然主要是爲了求得保護。此外，寺觀一旦成爲功德寺觀，在賦役、度僧、頒給紫衣師號等方面都能得到特殊照顧。然而功德寺觀既隸屬主家，就不能不爲主家效勞，除了作法事之外，往往還要送糧、茶等農副產品給主家，甚至爲主家服勞役。有些權勢者貪圖好處，就奏請朝廷把一些有較多資產的寺觀變成自家的功德寺觀，引起僧道徒的强烈不滿。爲此，宋朝政的

府曾頒佈法令，明文禁止佔用舊寺觀爲功德寺觀，並禁止主家任意侵吞功德寺觀的財產，然而成效不大。

寺觀中的神御殿、寺觀中的「原廟」、權勢家的功德寺觀，這些事物的存在清楚地向我們展示了一種趨向，即世俗政權與宗教勢力向一起靠攏的趨向，這至少可以說明二者之間的排斥是不徹底的吧。

摩尼教種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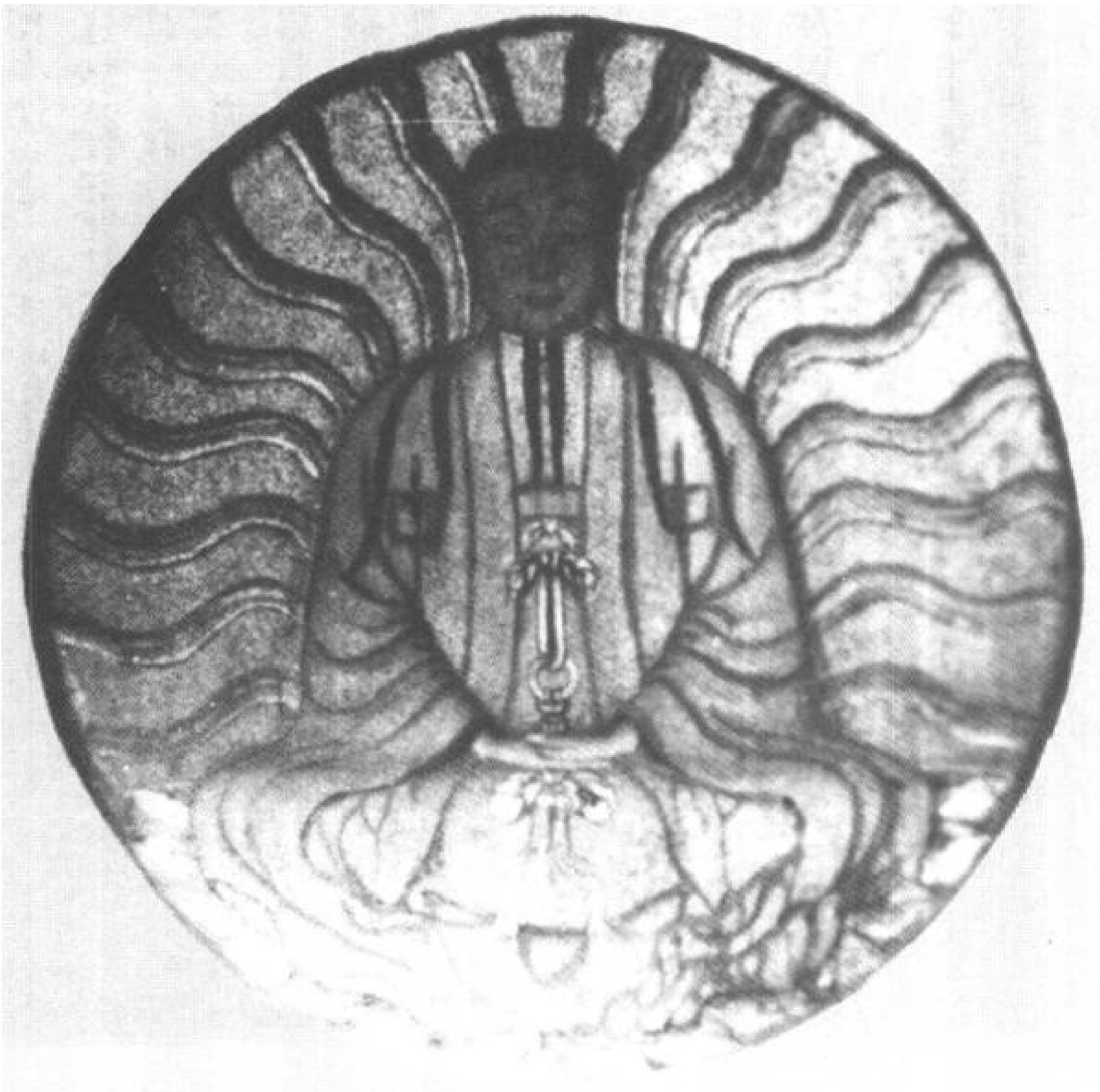
一九九一年春，某國際學術考察團體在泉州晉江縣華表山發現宋末摩尼石雕像，此像散髮披肩，高一·五二米，寬〇·八三米。他們在那裏還看到了全世界僅存的一塊摩尼教碑文。這消息在國內外產生了不小的震動，摩尼教一時又成了學界的熱門話題。

摩尼教是公元三世紀中葉波斯人摩尼創立的，今天已基本不存在了。但在中世紀，它曾廣泛地流行於中東、北非、歐洲及中國等地，擁有衆多的信徒。它在唐代以前就流入中國，在唐代一度得到官方的承認，唐武宗以後，又遭官方禁絕，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銷聲匿迹。到北宋中期，摩尼教又悄悄地隨着國際貿易的商船來到中國福建地區，又從福建流行到浙江、南地區。北宋末年及南宋前期，摩尼教在上述地區的傳播極盛。

這裏又牽扯到一樁歷史公案：方臘農民暴動究竟同摩尼教有怎樣的聯繫？方

江

福建泉州華表山摩尼神廟裏
的摩尼教神像



臘農民暴動發生、擴展的地區有摩尼教流行，這一點是沒有疑議的。參加方臘農民軍的農民中有信奉摩尼教的，這也是沒有疑議。有記載說，方臘起事後，「其徒（摩尼教信奉者）處處相煽而起」，嚮應暴動，這也是可信的。宋朝官方幾乎在派兵鎮壓方臘暴動的同時，頒佈了取締摩尼教齊堂（聚衆進行宗教活動的地點）、禁止夜間進行宗教活動（據記載摩尼教徒往往夜聚曉散）等命令，也說明方臘暴動與摩尼教有某種聯繫。這些都不是爭論的焦點。爭論的焦點在於，方臘本人是不是信奉摩尼教的，他在發動和組織暴動的過程中是否借用了摩尼教的力量，他統帥的農民軍是否依摩尼教教規組織？

說到農民暴動利用宗教，人們便自然想到漢代的張角、張道陵。他們利用太平道、五斗米教發動和組織了黃巾軍等。也有宋人認爲摩尼教徒是張角、張道陵的後繼者，不過除了對摩尼教不了解外，主要是看到教徒間講究互助與太平道、五斗米教有些相似罷了。他們並未言及方臘利用摩尼教發動、組織暴動的事。有人看到方臘農民軍首領有稱「魔王」、「太子」等，便聯繫到摩尼教，認爲「魔王」即是「摩王」，又摩尼教經書上講摩尼曾爲太子。如此聯繫，使人感到有些牽强。當然，不少史籍都記載方臘曾以「左道惑人」，但他的「左道」是否就是摩尼教，卻找不到證據。

有人則根據溫州、台州摩尼教最盛行，卻沒有爆發農民暴動，來說明方臘農民暴動同摩尼教沒有直接聯繫。這種說法也似嫌武斷。總之，方臘農民軍同摩尼教的聯繫問題還是個尚待進一步搞清的問題。

不管方臘暴動是否利用了摩尼教，宋朝的許多士大夫都感到它的廣泛流行對社會安定構成了威脅。當時不少士大夫建議，要求取締摩尼教，其中也包括南宋大文學家陸游，他曾寫了一篇幅不算小的奏狀，表示對摩尼教首領變成漢代張角、晉代孫恩一類造反帶頭人的深切憂慮。士大夫們爲何對摩尼教如此反感呢？這同摩尼教的教義及活動方式有直接關係。摩尼教講究「二宗三際」，二宗指明與暗，他們堅信光明定會戰勝黑暗。三際指修行的三種境界。摩尼教並不明確反對暴力，相反卻强調「大力」的作用。有些記載說摩尼教徒崇尚殺戮，似不可靠。因爲摩尼教反對吃肉，主張素食，所以攻之者講其教徒「喫菜事魔」。每星期日（時稱密日）夜裏舉行宗教儀式，被指責爲「夜聚曉散」，給人一種搞「秘密活動」的感覺。摩尼教有一定的組織形式，其首領定期向教徒徵收一定數量的錢財，教徒遇到困難，則可從首領處得到救濟。摩尼教還强調信徒間彼此團結互助，這些都同漢代太平道、五斗米教有着明顯的類似。士大夫們怎能沒有疑慮？

摩尼教還流行裸葬。對於教徒的葬禮，有一位宋人作如下的描述：一位摩尼教徒死了，家人給他穿好衣服、戴上帽子。另二位摩尼教徒立於屍體兩側，其中一位問另一位：他來到世上時戴着帽子嗎？另一位答：沒有。於是便把死人的帽子取下。又問：他到世上時穿着衣服嗎？答：沒有。於是又脫光死人衣服。再問：他到世上時有什麼東西？答：有包衣。於是便將死屍裝進布袋。摩尼教徒還反對厚葬和祭祀死人。摩尼之摩與「魔」諧音，因此宋人常把信奉摩尼教講爲「事魔」。這同「摩尼」的希臘文寫法與「瘋子」一詞接近，基督教徒便罵摩尼教徒爲「一羣瘋子」是這個道理。

南宋政府對摩尼教以及佛教中的異端白雲宗等採取取締政策，經過一段時間以後，摩尼教便衰落了。爲了在困境中求生存，有些摩尼教徒便向佛道二教靠攏，佛教徒對之多取排斥態度，道教徒們似乎態度較好，這也是有其歷史原因的。東晉道士王浮寫的《老子化胡經》是道教經典，不知是此書原本就有還是後人添加，書中竟有一段提及摩尼，還以肯定的口氣引錄了摩尼教教義。北宋真宗時修道藏，據說其中也收錄了摩尼教的經典。於是南宋後期某些摩尼教徒便自稱道士，僞裝成道教的分支。理學家黃震曾爲慶元府崇壽宮作記，據他講，這個崇壽宮實際便是摩尼教的活動基地。

話題回到本文開頭講的報導。事後有人指出，此報導失實，因爲泉州的那尊摩尼石雕像並非一九九一年的新發現，而是許多年前早已被人發現並作過介紹的。我想大約是寫報導的人不熟悉情況罷。儘管如此，此則報導總是使更多的人注意泉州一帶的摩尼教古遺蹟，或許也是有益於世的。

尚茶、製茶與鬥茶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植茶的國家，但最初只被視爲藥物，東漢以後才被飲用。但飲茶的習慣似不廣泛。尚茶之風興於唐、盛於宋，已有定論。茶在宋代是禁榷品，國家可以從中獲取專利，因而官方很重視發展茶葉種植。民間則無論南北，均有飲茶習慣。王安石講：「茶之爲民用，等於米鹽，不可一日以無。」（《議茶法》）理學家楊時講：「二浙窮荒之民，有經歲不食鹽者，茶則不可一日無也，一日無之則病矣。」（《論時政札子》）由於官方重視、百姓需要，宋代茶葉種植遍佈淮河以南廣大地區，年產數千萬斤。

像任何一種飲食一樣，一旦爲衆人所接受，人們就會對它評頭品足，區分優劣。唐宋飲茶風氣盛行，對茶葉的品種也十分講究。唐代人最推崇湖州的陽羨茶，宋代人則最推崇福建的北苑茶。官方將北苑產好茶的地域圈佔，立爲官茶園，

專產貢茶。北苑貢茶遂爲宋代茶品之最。

說到北苑茶，人們又自然會想到龍鳳茶，它在宋代是最負盛名的，也是唐代所没有的。有記載說，宋真宗時的奸臣丁謂是龍鳳茶的發明者，其實是不正確的。丁謂爲討好皇帝和權貴，在福建轉運使任上確實爲翻新貢茶式樣動了一番腦筋，後來他把鑽研成果寫成了一本題爲《茶錄》的書。但龍鳳茶卻不是丁謂發明的，據熊蕃《宣和北苑貢茶錄》，早在宋太宗即位之初，就已「特置龍鳳模遣使即北苑造團茶以別庶飲」。《宋會要》也記載了宋太宗時建州歲造龍鳳茶事。丁謂如何翻新花樣已難考究清楚，繼他之後，翻新花樣者層出不窮。首先應提的是蔡襄。蔡襄是慶曆新政集團的骨幹，被時人視爲「君子」。但他任福建轉運使時，卻步丁謂後塵翻新龍鳳茶花樣。他把龍團的形制改小，選擇更精，改制前龍鳳團茶每八餅重一斤，改制後每十餅方重一斤。於是龍鳳團茶有大小之分。歐陽修聞聽此事，對蔡襄頗有微詞，他的情緒影響了弟子蘇軾，以致蘇軾有「前丁後蔡相籠加，爭新買寵務出意」的詩句。人們的譏諷並没有斷絕丁、蔡的效法者。宋神宋時，又創出密雲龍一品，每斤二十餅，質量又超過大小龍團。此後又有「瑞雲翔龍」，品質形制又勝密雲龍。

以上所言爲福建貢茶，貢茶之外，福建茶中又有乳、京梃等品種，乃是民間飲用茶的上品。福建茶的茶株高大似樹，江浙一帶的茶株一般較爲矮小，稱草茶。日鑄（又作日注）、雙井等又爲草茶中的上品。福建茶的製法與草茶不同，草茶一般不磨成碎末，也不製成團塊，故稱散茶。福建茶則要碾碎與香料摻合製成團塊，團塊上印有花紋，外塗脂膏，時人稱之爲臘面茶（也有記載說，福建茶稱爲臘面茶是因爲茶水上浮有一層油脂，如臘面）。

飲茶既成風氣，士大夫們飲茶又勝於普通百姓，於是便有了所謂茶文化。他們到皇帝賜給的龍鳳茶，難免要感激涕零，吟詠一番。今存宋人詩集中以此爲題者爲數頗不少。士大夫們之間也互贈新茶，或以茶具作爲饋贈禮品。某一位士大夫得了皇帝賜茶，或者得了遠方親朋餽贈的上品新茶，往往要邀朋友一同品嘗。當場賦詩撰文，於是有茶詞、茶令、茶會。茶有優劣之分，由茶製成茶水也有技術問題，同一種茶製成的茶水也有優劣之分，宋代士大夫們慣於親自烹茶待客，且以烹茶技術高明自榮自矜，這同唐代是有所不同的。唐代陸羽號稱茶聖，其尊號大約是後人給的。他生前頗受文人士大夫們的冷眼。當他烹茶招待名士李季卿時，李季卿竟因陸羽親自烹茶而看不起他，命僕人送陸羽三十文茶錢，還稱他爲「茶博士」，

得

以此來羞辱陸羽。宋代士大夫們完全沒有以親手烹茶爲耻的觀念，相反卻以烹得好茶水爲榮耀，連宋徽宗也時時在臣下面前表演一下烹茶技術，以示高雅。於是便有了「鬥茶」的習俗。

宋人鬥茶講究四個環境條件，即泉甘、器潔、天色好、客人佳。蘇軾《石塔寺試茶》：「樿窗麗午景，蜀井出冰雪。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潔。」就言此。比試茶技而以坐客佳爲條件，反映了鬥茶是一種高雅脫俗的活動。鬥茶也有自帶泉水的，相傳蔡襄與蘇舜欽鬥茶，舜欽初鬥不勝，換自己所帶另一種水再鬥，便鬥勝了。上述四條件外，最重要的就是準備上品茶，宋人謂「凡芽如雀舌、穀粒者爲鬥品」，可見擇茶之精。

鬥茶所用器具有燒水爐、水壺（時多稱湯瓶）、水盃（時稱茶盞）、茶筅（攪動盃中水的竹片或湯匙）。以建茶爲鬥茶品時，還要外加茶碾、茶羅。因爲建茶爲餅狀，須先將其碾碎，用羅篩過，取其茶末。參加鬥茶者先把茶末放入茶盞，注少許水，使茶末濕透，再先後點湯七次，使水注滿茶盞，邊注邊用茶筅攪動，使茶水浮出白色湯花。鬥茶的勝負，據蔡襄《茶錄》：「視其面色鮮白，著盞無水痕爲絕佳」，誰的茶盞內先出現水痕，誰就輸了。輸一次稱一水，晁補之詩「建安一水去兩水，相較豈如涇和渭？」（《次

韻魯直謝李左丞送茶》）只在微末差異之間，即決出勝負。宋人有許多描寫鬥茶的詩作，其中最受人稱道的是范仲淹的《和章岷從事鬥茶歌》其中「黃金碾畔緣塵飛，紫玉甌心翠濤起」，是描述鬥者點茶的，而「勝若登仙不可攀，輸同降將無窮耻」則是描寫參試者心態的。鬥茶者勝同登仙輸同敗將，說明了人們對鬥茶的看重。

宋代風行的運動

當我看到現代球迷們爲球星的出色表演而歡呼吶喊，便聯想到中國古代的蹴鞠，聯想到《水滸傳》中高俅的所作所爲，也聯想到《東京夢華錄》中「舉目則鞦韆巧笑，觸處則蹴鞠疎狂」的記述。看來，球類運動能使人着迷發狂是古今相同的。

《水滸傳》中的高俅，可能是在宋人王明清《揮麈錄》有關記述基礎上演繹出來的。至於王明清的記述是否準確可靠，史料稀少，已難知曉。《水滸傳》中把高俅描述爲一個壞得出奇的惡棍，這可能帶有不小的藝術誇張的成分。王明清對高俅的記述較爲客觀，特別是記述了他的一些可取處，如對舊主蘇軾後代如何照顧等。高俅很可能比童貫、楊戩、朱勔等稍好些，修《史》者未將高俅列入佞倖傳，北宋末年童貫、朱勔等都因民憤過大被處死，高俅卻得倖免，或與此有關。

蹴鞠不始於宋代，有説始於黃帝者，有説始於戰國時期者，總之是歷史久遠。但宋代蹴鞠頗盛，又有據記載起始於南北朝時期的擊鞠（即馬球）和宋代首創的捶丸，球類運動之盛或許是空前的。高俅擅長的是踢球，即蹴鞠。宋代蹴鞠玩法是多樣的：有搞分隊對抗賽者，有單純技藝表演性質者（與雜技項目並列），有日常遊戲性質者。後者頗多見，無比賽那種競爭味道，婦女也參加，大約視之爲踢毽子、蕩鞦韆一類活動。現存的宋代銅鏡中，有些鑄有男女相對踢球的紋飾。故宮博物館收藏的宋代陶枕，上面有民間少女踢球的圖案。這些都反映了蹴鞠的廣泛流行。

宋代又流行擊鞠，即馬球。官方舉行盛大典禮，往往同時舉行馬球賽助興，軍隊則以開展馬球運動促進軍事訓練。宋代馬匹缺乏，馬球出現改弦更張之變，或騎驢、或騎騾、或徒步。

《水滸傳》講宋徽宗酷愛蹴鞠，大體近實。高俅之外，他任命的宰相中有一位是浪蕩公子李邦彥，此人自誇「踢盡天下球」，似也是徽宗的球友。愛玩球的皇帝在宋代不止徽宗一人，元人錢選畫了一幅宋太祖、太宗、趙普三人一起蹴鞠的圖畫，不知是否有根據。然而《宋史·郭從儀傳》卻記宋太祖曾批評郭從儀，説他擊鞠技藝雖精，「然非將相所爲」，讓郭氏鬧了

蘇漢臣所繪的蹴場叢戲場面

個大紅臉。

宋太祖對球類運動態度是個懸案，宋太宗提倡馬球卻是見諸史册的。《宋史·禮志》載，他親令議定皇帝參加擊鞠的禮儀：皇帝親自騎馬下場發球，親王、近臣、武臣節度使以下都可參賽，「馳馬爭擊」。皇帝若是進了球，場上人須山呼萬歲，其他人進了球，場上人須叫好助興。書中也附載「有步擊者、乘驢騾擊者」一條，對此筆者頗有疑問：官方擊鞠，若參賽者都騎驢，豈不滑稽？然亦不敢斷言其無。

宋神宗也喜歡蹴鞠、擊鞠，他曾在宮內設「打毬供奉」，應是專門陪他玩球的。有一則流傳很廣的故事說：有一次宋神宗和弟弟岐王顥、嘉王頵一起打球（不詳是蹴鞠還是擊鞠），神宗提議打賭，賭一條玉帶。嘉王頵卻講：「我若贏了，不想要您的玉帶，只求您廢罷青苗法和市易法。」宋神宗立時變了臉色，兄弟之間鬧得頗不愉快。

在宋朝皇帝中，熱衷球類運動，似乎宋孝宗的名氣超過宋徽宗。在存留至今的宋人奏疏和史籍記載裏，勸諫宋孝宗不要迷戀擊鞠者頗不少。見於記載者有陳俊卿、單時、劉夙、薛季宣、王十朋等，還有些名不見經傳者。宋孝宗愛好打球，可能與他尚武、幻想恢復中原等有關。有一次宋

孝宗親自參加馬球賽，馬驚了，突然從一低矮建築物下鑽過，孝宗急中生智，雙手抓住建築物的楣木，終於脫險，隨行者個個嚇出了一身冷汗。但此後孝宗並未停止參加打球，還讓皇太子也學習馬球。

士大夫中喜歡打球的也不少，才子加奸佞的丁謂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曾總結出「背裝花屈膝，白打大廉斯」，「進前行兩步，蹺腳立多時」等口訣，可知是行家裏手。他當權時，有名柳三復者想巴結他，知他嗜球，就頭頂着球去見他。柳氏向丁謂跪拜，每次伏下球就滚到後背，起立時球又回到頭頂，球始終不落地。丁謂拍手稱絕，便納柳氏爲門下客。

又據載，滕元發自幼才華出衆，受到范仲淹的賞識。但滕元發迷戀打球，常常耽誤學習。一次范仲淹搶過球令僕人當場用鐵鎚擊碎，不料球是牛角所製，一錘打偏，高高蹦起，擊在僕人臉上。滕元發見狀擊掌稱快，范仲淹氣得説不出話來。不過滕氏畢竟没有辜負范仲淹栽培，後來他以文臣出任邊帥，爲國家作了不少實事。

南宋時期有個著名的蹴鞠社團，稱齊雲社，又稱圓社。時人有《滿庭芳》詞讚之：「若論風流，無過圓社，拐賺蹬躡齊全。門庭富貴，曾到御簾前。灌口二郎爲首，趙皇風流上下傳，人都道齊雲一社，三錦獨爭先。花前并

月，全身繡帶，偷側雙肩。更高而不遠，一搭打秋千。球落處，圓光賺。拐雙佩劍，側躡相連。高人處翻身結伴，天下總呼圓。」齊雲社的活動詳情已難確知，想來應和近代西方的足球俱樂部有些相像吧。宋人汪雲程撰有《蹴鞠譜》，不知是否是世界最早的足球專著？

捶丸似是由馬球步擊轉化而成的。山西洪洞縣廣勝寺水神廟壁畫有捶丸圖。元初人著有《丸經》，詳細介紹其比賽規則和玩法。不少專家指出，捶丸與近代西方高爾夫球頗相像，如兩者都有球穴，都用球杖擊球等。人們正在探討：高爾夫球是不是由中國古代的捶丸發展、演變而成的。

活躍的伎藝人

宋代的「伎藝」包括各種表演藝術，用當時人的術語，它包括嘌唱、說史、傀儡、影戲、相撲、球杖、踢弄、舞旋、大曲、散樂、商謎、說渾話、雜扮、諸宮調、雜劇等。用現今的講法，大體包括音樂（含器樂、聲樂）、舞蹈、木偶戲、皮影戲、雜技和戲劇。

說到伎藝，應當首先述及教坊，它是官方所設演出機構。宋代教坊成形於宋太宗時，有三四百人，集中了全國最優秀的演員，即所謂「四方執藝之精者皆在籍中」。教坊的首腦是教坊使，他通常也是伎藝人出身。宋代最著名的教坊使名叫丁仙（先）現，主要活動於宋神宗至宋徽宗在位時期。他「捷才知音」，精通樂律，又是一名出色的雜劇演員和編劇。然而，丁仙現最難得的是，他身在末流，卻不枉自輕賤，理想甚高，律己甚嚴，頗有操守，具有超乎尋常人的品格。他在演出時，以卓絕的技法和詼諧的言語，逗得臺下

人捧腹大笑。但演出之餘，「則容貌儼然如士大夫」。他堅持編劇、演出都要「以達下情」爲原則，要反映百姓的疾苦和要求。宋神宗時王安石行新法，弊病百出，多有殘民之政。他便編寫並命教坊演出揭露新法弊病的節目。例如，熙寧年中，負責水利事務的都水監侯叔獻推行農田水利法倉促上馬，決堤引汴河水淤田，結果措置失當，造成兩縣農田遭洪水淹没。丁仙現就編了戲在皇帝誕辰那天公開演出，予以抨擊。由於丁仙現屢次讓教坊演出諷刺新法弊病的戲，激怒了宰相王安石，他下令要逮捕丁仙現。宋神宗考慮到宋朝允許優人諫諍（稱演戲諫諍者爲「無過蟲」）的傳統，便暗地下令把丁仙現藏起來避難。當時臺諫官員對新法弊病很少有敢於揭露的人，而丁仙現敢於如此不怕風險地勇敢揭露，受到時人的讚揚，所以有「臺官不如伶官」的諺語。丁仙現晚年，儘管年老體衰，力不從心，仍時時惦念不能「無補朝廷」，期望能作些益國益民之事。

在京師隸屬官府的伎藝人除隸教坊者外，還有隸屬内廷和隸屬軍隊「鈞容直」的伎藝人。外路州府和駐軍則又有衙前伎樂和伎樂營等設施，也有相當數量的專業藝人。至於民間伎藝人，大約數量更多，他們大多活躍在勾欄瓦舍之間。

男女伎樂壁畫

（河南禹縣趙大翁墓出土）

所謂勾欄，有二說，其一講舞臺之上三面有圍欄，故以勾欄代指舞臺。其二講演出場地設欄以隔開觀衆與非觀衆，則勾欄代指場地。瓦舍，又稱瓦子、瓦市，據說係取像瓦一樣「易聚易散」之義。大都市的勾欄瓦舍頗多。《夢華錄》講北宋後期東京角樓附近桑家瓦子即有「大小勾欄五十餘座。內中瓦子蓮花棚、牡丹棚，裏瓦子夜叉棚、像棚最大，可容數千人。」據此，每一勾欄有一棚，大的勾欄容數千人，可見規模宏大。《武林舊事》記南宋臨安有瓦子二十三處，每個瓦子包含勾欄多座（如其中北瓦有勾欄十三座）。勾欄瓦舍既是演出場所，往往又兼酒樓、妓院，後世伎藝人的不好名聲，大約也與此有關。此外，宋代還出現了一些在街頭表演的藝術團體，他們使伎藝人的活動範圍不僅包括了宮廷舞臺、都市的勾欄瓦舍，還拓展到中小城鎮的衆多地方。

在宋代的伎藝中，最值得重視的是與後世戲劇發展有關的幾種藝術形式。因爲宋代是中國戲劇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在這時期裏，說唱、表演、舞蹈、音樂四者互相滲透，逐漸融爲一體，從而給元明兩代的新的戲劇形式的產生和發展奠定了基礎。這裏首先應當講到宋雜劇。宋雜劇的藝術形式頗類似於現今的相聲劇、小品和小喜劇。它「全以故事，務在滑稽」。每場出臺演

員四人或五人。角色通常有末泥（主角）、引戲（介紹劇情、人物，連貫情節）、副淨（又稱參軍，通常逗哏扔包袱）、副末（又稱蒼鶻，通常捧哏湊趣）、裝孤（扮長官、君主等）和旦（扮婦女）。雜劇經常針砭時弊。徽宗時大搞黨禁，凡與「元祐」沾邊的人或事都成爲指責對象，不少人因此遭殃，使得人人自危。在這種恐怖氣氛中，有一齣雜劇上演。登場者共六人：宰相、一僧、一道、一家人、二官員。僧人被喚入宰相府檢驗度牒，宰相發現度牒爲元祐年間頒給，立即宣佈無效，令人扒下僧衣，强令還俗。道士情況相類，下場相同。然後是官員求職，宰相發現其官告爲元祐年中頒發，乃宣佈：就此除名，削職爲民。衆人正稱頌宰相「紹述」之德，家人來附耳報告：「今天從國庫裏領來相爺薪俸，共一千貫，可全是元祐年間所鑄錢，請您定奪。」宰相眼睛一轉，卻低聲吩咐道：「速從後門搬運回家」。不想被侍候在旁的另一官員見到，失聲喊道：「宰相對元祐怎麼兩樣態度！」這齣戲不但諷刺了時政的荒唐，也揭露了官場的齷齪，深受正直人士的歡迎。類似的事例在宋人筆記中有頗多記載。

宋雜劇以故事情節見長，另一種名爲諸宮調的藝術形式，也注重故事情節，但表演動作較爲單純，演員也少，以唱見長。它是用多種宮調曲子聯套

演唱故事的，先以同調的若干曲聯成短套，再用若干不同調的短套聯成長篇。有樂器伴奏。據說這種藝術形式是宋神宗時孔三傳在傳統大曲舞絕的基礎上創的。

有人認爲，元明戲劇是宋雜劇、宋諸宮調進一步融合的產物，似乎是不無道理的。因爲前者的角色配置、唱腔等都可在後二者之中見到其雛型。

近四十年來，中國在戲曲文物的發掘方面取得了可喜的進展。人們不但發現了不少反映宋代伎藝人生活的繪畫，還發現了許多反映伎藝人生活的石刻、磚雕等，這些發現使我們對宋代伎藝、雜劇等的了解不再停留在書本的枯燥的概念階段，而是較爲形像化了。

多才的官妓

舊時有一種看不起女演員的輿論，似乎女演員必定作風不端。追蹤尋源，大約與古代妓、娼不分有關。宋代的官妓本是演員，往往有很高的文化修養，有很深的藝術造詣，有高超的表演才能，但她們社會地位低下，常常被人蹂躪，有時難免淪爲暗娼。這也是妓、娼相混的表現。

宋代官妓屬藝妓，藝妓產生很早，但多是私人家的。隸屬官府的藝妓，似始見於唐、盛於宋。後代雖有，卻已衰落，清朝康熙帝更曾明令取締。在這意義上，官妓多少有些宋代「土特產」的味道。宋代官署多有官妓，有兩個原因：一是宋代自州縣幕職官以上，都由朝廷統一調配，官員流動性大，飄忽不定，他們赴任多數不帶家屬。到任後生活不免寂寞，需要有文化娛樂。宋代職業軍人頗多，其中多不能帶家屬，所以也有類似需求。二是宋代財政制度有公使錢一項，可用於官員、軍兵的宴飲娛樂。這樣，需求與條件的吻

合便使官妓普遍化了，大多數州郡和大的軍營都有官妓。

能歌善舞、能演奏樂器是妓女的本分，宋代官妓自不例外。但她們往往又有較高的文學修養。《苕溪漁隱叢話》載：四川漢州有一官妓小名僧兒，與知州戴某有情，戴某改任提舉成都玉局觀離境，僧兒乃作《滿庭芳》送別，詞云：「團菊苞金，叢藍減翠，畫成秋暮風煙。使君歸去，千里倍潸然。兩度朱幡（戴某兩任知漢州）雁水，全勝得陶侃當年。如何見，一時盛事，都在送行篇。愁煩梳洗懶，尋思陪宴，花月湖邊，有多少風流往事牽牽。聞道霓旌羽駕，看看是玉局神仙。應相許，衝雲破霧，一到洞中天。」辭句精當不俗，感情纏綿悱惻，顯示出僧兒填詞的功力。《後山詩話》記杭州官妓胡楚有詩云：「不見當時丁令威（按丁某爲漢朝才子，後成仙羽去），年處處是相思。若將此恨同芳草，卻恐青青有盡時。」比喻貼切，聯想豐富。像僧兒、胡楚這樣有才氣的官妓宋代頗多，其作品完全可同士大夫媲美的。

有些官妓不僅能歌善舞、會吟詩填詞，而且擅長書法。據載楚州官妓王英英即是其中佼佼者。她曾受教於著名書家蔡襄。詩人梅堯臣寫詩讚曰：「山陽女子大索書，不學常流事梳洗。親傳筆法中郎孫，妙畫蠶頭魯公體。」蘇軾

於徐州建黃樓，弟蘇轍爲作賦，蘇軾書之於碑，中間小休，官妓馬盼索筆模倣蘇軾筆體續寫「山川開合」四字，蘇軾看了非常滿意，稍加修飾，便予以保留，可知馬盼書法功底不錯。

官妓雖多才多藝，但地位低下。官妓繫籍於官，按規定須隨喚隨到，有時稍有遲緩，即遭斥責甚至鞭笞。《古今詞話》載，蘇軾作杭州通判時，州中宴會，召官妓全來助興。一名叫秀藍者遲到，申報說剛洗過澡，身上疲倦，故耽擱了。州中官員卻不依不饒，認定秀藍有意怠慢，主張重責。秀藍含淚申辯，蘇軾也從旁說情，秀藍才被放過。秀藍爲討好衆官，去庭院折了一束石榴花獻上，不料反倒激怒了衆官，他們責怪她「不恭」。秀藍滿腹委曲，哭泣不止。蘇軾見狀，知秀藍擅唱，立即填《賀新涼》詞一首，令秀藍唱以侑觴，才使衆官怒氣平消。從秀藍的遭遇可窺見官妓不幸之一斑。南宋楊萬里作監司時，巡視屬州，本州舉行宴會，令官妓唱曲佐酒。歌辭中碰巧有「萬里雲帆何日到」一句，楊萬里開玩笑說：「萬里昨日到」，引得滿座大笑。說者無心，聽者有意。知州認爲官妓唱此歌辭是對自己上司的不恭，就禁閉了她好幾天。官妓挨板子，也不稀奇。知宣州呂士隆就以經常打官妓板子出了名，梅聖俞特作《莫打鴨》詩諷刺他。

官妓既地位低下，多有苦痛，便渴望除籍從良，宋人記述此類事頗多，其中尤帶傳奇色彩的是蘇軾判鄭容等從良事。元祐年中蘇軾自知杭州任上奉召還京，途經潤州。知州林子中（一説許仲塗）設宴招待他。席間，官妓鄭容、高瑩乘機請求落籍從良。因蘇軾官高名盛又係貴客，林子中便請蘇軾決斷。蘇軾揮筆寫下《減字木蘭花》：「鄭莊好客，容我樽前先墮幘。落筆生風，籍籍聲名不負公。高山白早，瑩雪冰勝那耐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其各句首字相聯，恰爲「鄭容落籍、高瑩從良」，鄭、高二人由此得脫苦海。《侯鯖錄》又載：宋神宗時大臣蘇頌因公到杭州，知州陳襄設宴招待，官妓周韶侍宴，請求蘇頌幫她落籍。蘇頌當即指着廊下籠内白鸚鵡對周韶説：「若能以它爲題吟一首好詩，我就替你向陳太守求情。」周韶沉吟片刻，題筆寫道：「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白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女（周韶其時恰著白紗舞衣），長念觀音般若經。」衆人齊聲喝采，陳襄當即宣佈爲周韶脫籍。當時蘇軾也在場，後來寫詩憶此事：「去年柳絮飛時節，記得金籠放雪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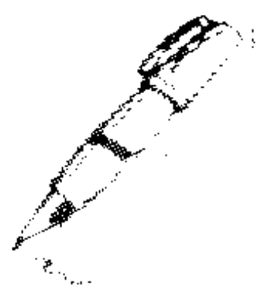
儘管官員依勢霸佔官妓的事屢見記載，但依照宋朝制度，嚴禁官員與官妓有不正當關係。官員違犯此規定一經發覺，就要從重懲處。北宋神宗時知杭

州祖無擇就是因被指控與官妓薛希濤私通而遭罷斥的。然而辦案過程中，薛希濤卻始終不承認有此事。雖被毒打，終不改口，贏得人們廣泛同情。當然，薛希濤事又遠不如南宋台州名妓嚴蕊那樣流傳久遠。嚴蕊拒不承認與知州唐仲友通姦，被朱熹及其同黨嚴刑拷打，嚴蕊也像薛希濤一樣堅强，她還寫下了「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那篇極富感染力的千古名篇。

由葑田看人口問題

宋人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一位北方人當了蘇州某縣的知縣，上任第一天剛上堂坐定，忽有人手拿狀紙前來告狀，問他告什麼狀，答稱昨夜有人偷去若干畝田。知縣聞聽大怒，以爲是刁民故意戲弄自己，急令手下差役將其捆起來，關進牢房。事後手下偷偷告訴知縣，告狀者並非刁民，所言乃是實情。原來蘇州太湖水面上有一種葑田，又稱架田。是以木材爲框架，以水草根莖爲底墊，上面鋪一層土，漂浮於湖面上的一種特殊的田。這種田一般面積不很大，可以用篙像船一樣撐來撐去在水面上行走。夜間主人不在，葑田被別人偷偷撐走，這在當地並非什麼新鮮事。葑田不止蘇州有，兩浙地區都有，陸游《入蜀記》卷四記述長江中下游江面上也有這種葑田。北宋詩人林逋作有《葑田詩》：「淤泥肥黑稻秧青，闊蓋深流旋旋生，擬倩湖君書版籍，水仙今佃老農耕。」這種葑田既在湖

它



君、水仙的版籍之上，其最大的優越性就在於可以免除稅租。所以，它實際是無田產貧困者尋求到的一條生路。

葑田的存在還反映一個問題，那就是江浙地區人多地少。除了在水面上開闢葑田之外，江浙地區還普遍地將沼澤改造爲田，沼澤用完了，就圍湖造田，圍湖造田的結果引起環境失衡，成爲當時引起爭議的社會問題。圍湖遭到禁止，人們就去築堤圍海造田，稱塗田，去開墾沙灘地，稱海沙田。與浙江相鄰的福建也是人多地少，但地勢高而多山，人們便去鑿山建梯田，詩人朱服詠道：「水無一滴不爲用，山到崔嵬盡力耕」，即講泉州開墾梯田的情況。

人們如果把江浙閩一帶（還應加上四川的成都附近）的類似情況作爲宋代農業墾的一般情況，就會得出「地無寸土不爲用」的結論，似乎是不但全部可耕地被墾植，而且許多不可耕地也被改造成爲可耕地，完全實現了「地無曠土」了。實則非如此，還有另一種情況，北宋時以京西爲最典型，南宋時以京西、湖北、淮南爲最典型。北宋時期「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歐陽修《通進司上書》）「自楚之北至於唐鄧汝潁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避，不生五穀，荆棘布野」（蘇轍《應詔集·進策》）。南宋時期，

「淮楚荆襄與夫湖廣間沃野綿亘不知幾千里，然禾黍之地鞠爲蒿萊，肥饒之壤蕩爲荒穢。」（《客亭類稿・墾田》）顯然，無論北宋還是南宋，在一些地區還存在大片無人墾耕的荒地。也就是説，一方面是大面積荒地的存在，另一方面是見縫插針地利用，連水面也被用來種莊稼，這兩種矛盾的現象不合協地同時存在於宋朝版圖之内。

上述兩種土地開墾情況無疑是同人口分佈不均匀相聯繫的，土地充分得到利用的地區人口是密集的，而土地荒蕪的地區人口是稀疏的。例如據統計北宋崇寧元年（一一〇二）京西南每平方公里只有九人，而兩浙路每平方公里卻有三十・七人，南宋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人口密度最大的成都府路五十七・八人，江浙地區三十人，而京西南〇・二人，淮南西八人，湖北七人，故南宋人稱「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可耕之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可耕之人。」移民之事，想來容易，做起來很難，讓當大官的率先移民更是蘇軾的天真幻想。所以，兩宋儘管議論移民者不少，移民大體並未實行。除了上述被人爲地荒蕪的土地之外，宋代川南、湘西、廣南的少數民族居住區也是人口密度相對稀疏地區，但是當時人認爲那些地方都是「煙瘴之地」，去那些地方會讓人送命的，很少人願意去。因此，兩宋人口分

佈「偏聚而不均」的傾向始終存在。

除了分佈不均之外，宋代在人口方面還存在一個明顯問題，那就是戶數多、人口少。根據記載，宋代在籍戶數最多時曾達二千九百萬（一說二千零二十六萬），但是最高在籍口數卻只有四千五百三十二萬，每戶平均只有不足二人，這在當時的社會來說簡直令人難以想像。而且，按在籍戶數算，宋代超過漢唐一倍；按在籍口數算，宋代又遠遠比不上漢唐。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許多研究者試圖回答這個問題。於是有在籍口數僅爲男丁（即不含女口）之說。這種說法不算沒有道理，但卻存着一個很大的疑點，即宋代戶多口少這一現象在北宋末和南宋時就已發現，但是宋人卻沒有講到女口問題。究竟怎樣解答宋代在籍戶數多、人口數少這一問題，似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有人依據宋代在籍戶數最高額三千九百萬，按每戶四人計，推斷宋代有一億一千六百萬人口。這比見諸記載的官方統計數四千五百三十二萬多了一倍半有餘，是否可信，是很令人懷疑的。

不同種類的節日

初讀《宋史》的人，往往被衆多的「節」所困惑，宋人稱爲「節」的日子不下五六十，確實有點使人眼花繚亂。然而宋代的「節」雖多，大體不外三類：一是皇帝、垂簾聽政太后的生日，統稱誕聖節；二是與天書、聖祖、帝君等有關的節，都是宋真宗、徽宗創建的；三是傳統節日。

宋代皇帝的生日稱爲節，自太祖至度宗依次爲長春節、乾明節（後改爲壽寧節）、承天節、乾元節、壽聖節、同天節、興龍節、天寧節、天祐節（後改爲瑞慶節）、天基節、乾會節，垂簾太后的生日也稱節，計有長寧節（章獻后）、坤成節（宣仁后）、壽慶節（慈明后），壽崇節（壽和后）。

皇帝生日在宮場上是個重要節日，宮廷裏照例舉行盛大的祝壽活動，其程序主要有：誕聖節前一個月在各地佛寺建祝聖壽道場，北宋時京師是在大相國寺，南宋時行都是在明慶寺，請僧人作法事。宋徽宗時，除在寺院建佛教道

場外，又在各地神霄玉清宮觀建道教道場。宰相率文臣、樞密使率武臣分批到建道場處焚香。到了誕聖節那一天，龐大的樂隊高奏祝壽曲，然後各地和僧道代表、少數民族代表、外國使者進獻貢品。賀壽之後舉行盛大宴會，說來有趣，宋代相沿成例，都是以教坊藝人學百禽之鳴作爲宴會序曲。

宴會過程中，藝人要表演雜劇、百戲，還有軍卒表演擊毬，這擊毬據說很像近代的足球，雙方各有隊員十餘人，還有球門，不過球門不是一隊一個，而是球場中央共設一門。酒共九巡，節目分九場，以圖九九之吉。出家人的剃度受戒和紫衣師號的頒給，也安排在這一天，大約是想討好以求延壽的。京師之外，各府州縣也舉行類似活動。有些州郡還召集舞女數十跳祝壽舞，組成「天下太平」等吉祥圖案。垂簾太后的生日，慶祝活動與誕聖節相近，有時規模更大。

宋真宗搞天書降、聖祖降，立有天慶等五節。天慶節，正月三日，大中祥符元年立，爲天書初降日。天貺節，六月六日，大中祥符四年立，天書降於泰山日。先天節，大中祥符五年立，七月一日，聖祖後唐天成元年初降日。降聖節，十月二十四日，建立日期與先天節同，聖祖降內廷延思殿日。天禎（後避仁宗諱，改禎爲祺）節，四月一日，天禧元年立，天書降內廷功德

閣日。

宋徽宗尊崇道教，立天應等五節。天應節，十一月五日，政和四年立，徽宗親祀途中見到天神示現之日。貞元節，二月十五日，重和元年立，太上混元上德皇帝（老子）生日。寧貺節，五月十二日，政和元年立，徽宗祭方丘又見天神之日。元成節，八月九日，重和元年立，青華帝君生日。天符節，十月二十五日，宣和元年立，徽宗親自佈道日。徽宗在如上五節之後又立一節，與道教關係較小，即開基節，宣和二年立，即太祖登基作皇帝之日。宋高宗即位後，在輿論壓力下宣佈廢除天應諸節，單獨保留了天基節。天基節本是趙宋王朝創立紀念日，在宋代卻始終未受特別重視。或許可以證明當時人與近代人的觀念存着很大差異。

天慶、天應等十節，主要是官方舉行活動，無非是作道場、焚香禮拜等，與百姓關係不大。

以上兩類節日大體是官方的節日，百姓不甚重視，百姓最重視的是第三類節日，即傳統節日，其中又最重視元日（陰曆正月初一）、寒食、冬至三大節。元日爲一歲之首，其受重視在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宋代元日與前代相比沒有太多分別，飲宴之餘，拜年是最重要的活動。值得一提的是，

由於發明了火藥，於是有了裝藥爆竹和煙火，這無疑給節日增加了歡樂氣氛。除夕夜的驅儺也頗具特色，京師裏官方組成一支一千多人的驅儺「大軍」，一律戴假面具、著各類盔甲，手執金槍銀戟雕劍大刀及五色旗幟，有扮鍾馗者，有扮天神者，有扮天將者，有扮六丁六甲、判官小鬼、灶君、土地、門神者，鼓號震震，由皇宮出發，繞城一周，將「妖魔」逐出城外，頗有點像近代西方狂歡節的狂歡隊伍。百姓大戶也有組織驅儺隊伍者。外路州縣大體仿效。這實是時人的一點快樂。

寒食、冬至受重視與今人習慣相差極大。過寒食節的主要活動是祭掃先人陵墓。冬至被宋人認爲陽氣萌生之始，稱之爲小年、亞歲，慶祝的方式全依元日而略減。

三大節之外，又有三元節、四立、春秋二社二分、上巳、端午、重陽、夏至、臘日、人日、中和、三伏、七夕、授衣等節日。其中以上元節（元宵節）最熱鬧，這一晚各處張燈，辦燈市，設雜劇，人們紛紛到街上觀燈看戲，熱鬧非常。人們置身於夜幕繁燈的環境中，不免幻然有如在仙境之感。常常激發詩人詞客的靈感，於是有「火樹銀花合，星橋鐵索開」、「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一夜魚龍舞」的名句佳

篇傳世。因爲上元張燈，又引出許多故事。蔡襄任知州因强令百姓備燈一盞，故有「風流太守知不知，惟恨笙歌無妙曲」之譏。陳登任知州，因不許百姓説張燈，故有「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之諷。諸如此類，都是因張燈而起的話題。

公職人員的假日

今天總把節假日連稱，因爲節日往往同時又是假日，但其中也有與節日不相關的假日，例如學校的寒暑假日、職員或工人們的病事假、產假等。宋代的假日也與今類似，與節日相聯者頗多，也有與節日無關的，例如官員的喪假。

宋代與節日相連的假日大體分爲三個等級。一是元日、寒食、冬至三大節，放假七日，即所謂「前三後四」。這顯示出時人對三大節的特殊重視。二是誕聖節、上中下三元節、夏至、臘日，各放假三天。春秋二社（立春或立秋後第五個戊日）上巳（三月初五）、端午、重陽、立春、人日（正月初七）、中和節（二月初一）、春分、立夏、三伏、立秋、七夕、秋分、授衣、立冬等各一日。真宗時創立天慶等節時規定，天慶、先天、降聖節各放假五日，天禎、天貺節各放假一日，但此制似未久行。宋代官方規定假日又有休務

假和不休務假之別。例如三大節放假七日，休務五日，誕聖、三元節各放假三日，休務一日。一日假當中，春秋二社、上巳、端午、重陽爲休務假，餘爲不休務假。假日與休務假日的區別，記載中未交代明確，有可能是不休務的假日需留人值班，也有可能假日指不辦公日，休務才是近代意義上的假日。

在與節日無關的假日中，最常見的是旬假。據記載旬假發端於漢代，漢代官吏每五日一休沐，給假。唐代玄宗時改爲十日，宋代的旬假似是沿襲唐制。按規定，旬假是休務假。逢旬假日，皇帝也不上朝，緊急情況有司須報入內廷，在後殿處置。旬假一年中有三十六天，數量最多。旬假之外，國家規定的國忌日也依例給假，讓官員們去參加祭祀活動。據南宋高宗紹興末年大臣何溥講：「著令諸休務假，一歲之間百司七十有七日」，朝廷的休務假又比百司多三分之一，此外還有「前後相因爲例不入省者」，可知當時的節日假和旬假合起來數量是不小的。

以上所述，是全體公職人員都能享受的節日假、例假。還有一類是個別人才能享受的例假。現今這種例假頗多，如婚假、產假、病假、婦女例假等。宋代這種例假（時稱式假）似不像現代多，但也不算太少，且有專門的《假寧令》，列有詳條。南宋孝宗乾道九年吏部修正頒行了《行在百司假式》。然此

類文件今已不存，只能從零散記載中知其部分。宋朝禮法，官員父母死，須解除公職，守喪三年。這三年「停薪留職」，守喪完畢另聽調遣。但有些官員因公務需要，不能解職守喪三年，就給喪假料理喪事。喪假長短因人而異。例如邊防將士中級別較高者父母去世給假一百日，級別較低者僅十五日。到廣南、川陝、福建等地駐防或公務的軍官，無法奔喪回家而又不能解職返鄉者，只給假三日。內侍因侍侯皇帝起居，按規定不許回家守喪，一律給假一百日，

父母以外的近親亡故，按規定也有喪假。宋真宗時規定：京師倉場庫務坊監監官因親喪給假五日、聞哀二日；大功親給假三日，聞哀一日，緦麻親給假一日在家聞哀。這裏聞哀的日子計算在假日以外，其含義尚不清楚。其他官員也應有類似規定。家中人晚輩亡故，也有假，例如記載中有官員女兒病死式假五日的規定。

按照宋人習慣，亡故親人的周年紀念日即私忌日要祭奠，因此私忌日也有式假。宋太祖開寶九年（九七六）規定，文臣郎中以上，武臣刺史、將軍以上，文祖忌日給假。宋真宗時，又將範圍擴大到全體入品官員。私忌各給假一日。

官員得病、不能理務，則有病假。官員病假不得超過百日，超過百日，

要停發或減發俸祿。皇帝常常用給病假已滿百日的官員續發俸祿的辦法表示對此官員的特殊恩寵。宋代有一種式假是今天所沒有的，那就是同僚餞行假。宋真宗時規定：中書門下（政事堂）和樞密院五品以上官，中書省四品以上官，其他官司三品以上官員遇同僚出使，可給假一天餞別同僚。這種假享受者範圍很小，但頗有人情味。

近代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每周都有一天休假，有些地區還有每周休假一天半或兩天者。那古代的勞動者有沒有類似的休假呢？據史籍記載，宋代的體力勞動者也有休假。自宋真宗以後，官方規定，鑄造錢幣的工匠每旬休假一日，自五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因暑熱只幹半天活。宋神宗時，侍御史周尹講，鑄錢工匠「一年之內除節假、旬假、實有（工作日）三百日」，則鑄錢工匠每年休工的假日約有六十五天，這雖比不上文武官員們的七十七日，但也不能說爲數過少。享受旬假的還不只是鑄錢工匠，北宋時，在福建運輸官物的軍卒也享受旬休假和節日假。宋太宗時規定，事材場、八作司工匠，每月給一天請糧假。京師鑄造務的工匠，夏天暑假也放半天假。宋廷又規定，四川官方僱用的井鹽工匠遇元日、冬至、寒食三大節各給假三天。宋真宗時還規定，四川井鹽工匠遇天慶、天賜、先天、降聖四節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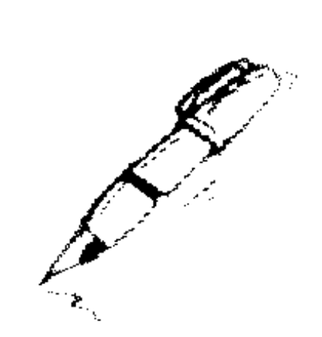
放假一天。從這些零散的記載，我們可以大致得出結論：宋代爲官府服役的工匠也享受節日假和旬假等。

當然，有假日者僅限於公職人員，或者說，僅限於「吃官飯」的。個體農民是沒有固定休假日的，古今無二。服役於私人者記載中也未見有法定休假日。但是，須知宋代「吃官飯」者人數頗不少，一百幾十萬軍隊將士，數萬官員，數十萬在各級官署中服役的胥吏（像宋江一類的押衙等），數以萬計的官工匠，連同他們的家屬，決不是個小數目。因而，休假日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也是不容忽視的。

火葬與風水

以往看《水滸傳》，讀到武大郎死後被火化一段頗持疑：中國古代也有火葬嗎？後來才曉得，中國古代不但有火葬，而且歷史很悠久，據說新石器時期就出現了。不過火葬現象中間有一段時間幾乎消失，東漢以後隨着佛教傳入才再出現，到了宋代又相當普遍。

自從佛教傳入中國，便開始對社會生活發生影響。反對佛教的勢力，極力對佛教加以排斥，佛教則竭力使自己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日益扎下根基，在這種鬥爭中，佛教逐漸佔領了一些陣地。分析宋代（或許宋以後亦如此）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人們不難發現，要數死喪這一領域受佛教影響最深。司馬光說：「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期年、再期、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佛，修建塔廟，云爲死者滅彌天罪惡，必升天堂，受種種快樂。」（《書儀·喪儀》）與他差不多是同時代人的鄭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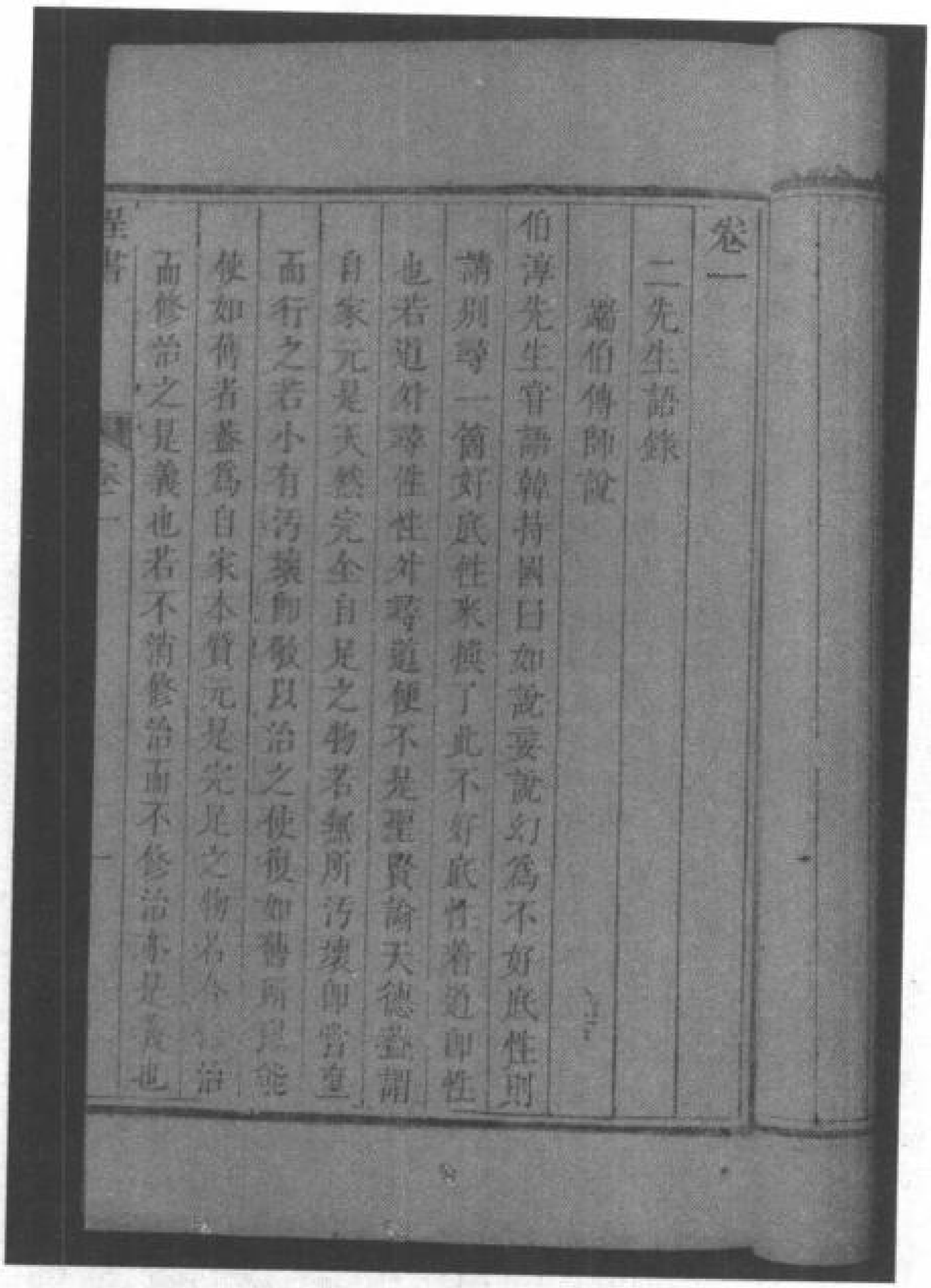
也說：「今之舉天下，凡爲喪葬一歸之治屠氏，不飯其德，不誦其書，舉天下詬笑之，以爲不孝，紐習成俗，沈酣潰爛透骨髓入膏肓。」（《宋文鑑·禮法》）南宋王柟也抨擊此種現象：「喪家命僧道誦經、設齋、作醮作佛事，曰資冥福也。出葬用以導引，此何義耶！」（《燕翼詒謀錄》三）據史籍記載，不但民間如此，皇家也是如此。皇帝、皇后死了，常常要請僧尼作法事。南宋孝宗、寧宗死，朝廷還下令要各地寺院建七天道場。皇室重要成員的忌日，禮法上更是明確規定要到佛寺啟建道場。

宋代的火葬也是因佛教流行而興盛的。從記載看，凡是佛教特別興盛的地區，如北宋的河東、京畿、江浙閩等以及南宋的行都附近及東南地區，都盛行火葬。佛教提倡火葬，據說佛經有記載說，火神是死神的朋友和祭司，死者須經火神引導才能見到死神獲得轉世或升入天堂。然而火葬卻與儒家經典和中國傳統習慣尖銳對立，因爲根據儒家學說和中國傳統看法，將父母的屍體火化是一種殘忍和不孝的行爲。宋朝政府曾頒佈嚴厲的法律禁止火葬在民間流行，但沒有奏效。宋代佛教在火葬這一點上戰勝了儒學和中國的傳統習慣。在一些盛行火葬的地區，有一些寺院專門從事火葬，被人稱爲「焚化院」，有一些寺院內則專設「化人亭」，有的還建造了存放骨灰的骨灰堂或者

依照某些佛經而設置了盛放骨灰的水池。

客觀地講，有些百姓傾向火葬也未必完全出於信奉佛教，其中也有火葬節儉省費的原因。宋高宗時有人再次提出禁止火葬事，大臣榮蕤就反對說：「貧下之家送終之具唯務從簡，是以從來率以火化爲便，相習成風，勢難遽革。」要禁火葬，官方就須爲貧苦百姓找出土葬的地方，而事實上臨安城內外已很難找出多出來的土地供土葬了。於是禁止火葬的提議被否決了。因此，時人講火葬「其間無資營葬者半，惑於釋氏之說者半」，是有道理的。

道教在喪葬這一領域的影響大不如佛教，但他們與陰陽家結成聯盟，卻佔據了卜葬的陣地。用中國老百姓的話來說，要找塊風水寶地和選擇合適的下葬時間就須請教道士和陰陽先生。宋代此風很盛。司馬光作爲儒家的代言人也曾批評過當時卜葬講風水的習俗。他曾講：「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爲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繫於此。」他舉例揭露講風水八字之虛誕，說他和哥哥葬自己父親時，族人都主張要他們去請葬師張生來指導選擇墳址、時日、方位等。司馬光的哥哥不便違抗族人之意，就找到張生，將自己事先決定的墳址、時日、方位等交給張生，要張生編一套話來哄族人。張生照辦。儘管父親的墳址



卷一

二先生語錄

端伯傳師說

伯淳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爲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若道性即也若道好惡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汚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汚壞即當用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見能使如舊若蓋爲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今治而修治之是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事是義也

《二程全書》書影

等都没按照風水之説確定，自己家族的興旺卻絲毫未受影響，可見風水之説不足憑信。通過司馬光反對卜葬講風水等的議論，我們不但可以看到儒家學者對這種惡習的反對態度，而且還可看到當時卜葬講風水風氣的盛行，因爲連書香門第的司馬家族也不得不向此風氣妥協讓步，講張生來作假騙人。

據南宋人羅大經等講，爲了找一塊風水寶地葬親，有死了拖延十幾年不下葬者，有已下葬後認爲選址不當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將棺材掘出重新下葬者，更有兄弟數人因選址意見不合而變成冤家仇人者。講葬期、論風水在宋代成爲一種專門的學問，據説總結記錄此種理論的葬書僅見於史籍的就有一百五十部之多。有的葬書爲「取信於民」，竟署名爲諸葛亮撰。

值得注意的是，以最正統的儒家傳人自居的理學家對風水之説所採取的妥協態度。程頤著《葬説》，大講下葬要「卜其地之美惡」。並講「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還提出卜葬的標準是土色光潤、草木茂盛。朱熹不但繼承此説，又補充了「拱揖環抱」的形勢一條標準。他還曾上書批評宋孝宗攢宮選地失當，指責朝廷當政大臣不爲孝宗「體魄安寧」、「社血食久遠之圖」着想。理學家們關於卜葬的理論顯然是對孔孟原始儒家理論的「豐富發展」。

開放的社會與婚姻

人們習慣用「土地一年一換家」、「千年田換八百主」來說明宋代商品經濟發達造成的地權的頻繁轉移，其實這是不大能說服人的。因爲與其說是宋代商品經濟發達造成地權頻繁轉移，毋寧說宋代社會流動劇烈造成了地權頻繁轉移。而宋代社會流動劇烈，本質上卻不是由於商品經濟發展造成的，而是由於政治制度、社會制度的變化而造成的。

造成宋代社會流動比唐代劇烈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唐代的門閥仕族制度被宋代的官僚制度取代。在門閥仕族制度下，官吏的選拔、任用都要講究門第，門第的人容易入仕、容易顯示自己的才能，能較快地陞遷，高官都被名門顯貴所壟斷，寒門賤族很難擠進官僚系列，即使擠進官僚隊伍也難以陞任高級官職，在這制度下，統治集團帶有較濃的封閉性、世襲性特點。宋朝的情況卻與此有很大的不同。宋朝除皇族之外，很少有世代爲官的家族。雖然

也有高級官員子弟可通過門蔭入仕的，但通過門蔭入仕者有一部分不能當文官，即便當了文官在任用和陞遷方面的待遇也遠不如通過科舉入仕者。即司馬光所謂「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宋代的科舉考試，大體遵循唯才是舉的原則。這使很多出身貧賤者通過科舉入仕作官，又依憑官員任用和陞遷制度上對科舉入仕者的優待而扶搖直上。

由於宋朝有別於前代的官僚制度和科舉制度，使得宋代官僚與庶民之間經常發生相互變化。理學家程頤講：「朝廷無世臣」、「無百年之家」，就涉及了士庶之間的經常性變動。史籍中記載了不少名臣宰相死後家道迅速沉淪的事，例如在真宗初年還任宰相的呂端，死後十餘年家裏已靠變賣產業維持生計。真宗時另一宰相王旦死後，他的兒子竟靠變賣父親遺物過活。

關於貧富貴賤交互變化，人們常常舉章良能兄弟與沈該兩家的榮辱浮沉變化故事。沈該是南宋前期有名的宰相，他的家學與本地鄉學相鄰，他的子弟看到在鄉學裏讀書的章氏兄弟嚴冬只穿一件夾衣的可憐相，就譏笑說：「二位才子大冬天怎麼就穿上了春季的時裝！」沒想到時隔不久，章氏兄弟雙雙金榜題名，獲得高官，而沈家卻因沈該去世而生活無靠被迫變賣家產，買

者卻恰好又是章氏兄弟。這使了解內情的人都大有人世滄桑的感慨。

既然人們的社會地位變幻無常，傳統的「婚姻先問閥閱」的風氣就有所扭轉，變成婚姻「不問閥閱，貴人物相當」了。所謂「人物相當」，是個複雜的混合體，它既包括一定程度上的門當戶對的考慮，也包括男女雙方的財產豐寡，還包括郎才女貌方面的考慮。既然宋代被稱爲「官人世界」，作官是生財之道也是顯貴之途，既然科學登第者可以直接入仕、較快陞遷，人們在擇婿時便特別熱衷選那些科舉得中者，於是有「榜下擇婿」之說。

王安石詩云：「卻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郎」，寫的是自己科舉得中之初，在赴皇帝賜宴的路上，被暗地擇婿的女郎偷看的情景。據說每逢科考揭榜，京師福貴之家便打點起「擇婿車」爭相去擇婿。凡是未婚進士，都成爲擇婿者爭奪的對象。在競爭過程中，不免鬧出許多笑話。例如宋仁宗時外戚張堯佐看中了新科狀元馮京，帶着家人、抬着厚禮、拿着陪嫁物品清單和皇帝賜給的一條金腰帶風風火火地來到馮京住處，親自把腰帶束在馮京腰上，對馮京說：「是皇上的意思，要我把女兒許配給你。」不想馮京心中有底，婉言謝絕，給張堯佐一個下不來臺。類似的情況據說也曾發生在奸相蔡京和新科進士傅察之間。這不能不使人聯想到京劇《秦香蓮》中忘恩負

義的陳世美，他被榜下擇婿看來是有史實根據的。有女待嫁者榜下擇婿，新科進士們便榜下擇翁、擇妻，有的進士選擇翁多財者，有選擇女方陪嫁多者，也有選擇貌美者。真宗時尚書趙晃想招進士劉燁爲婿，劉燁得知趙家九小姐最美，就拒絕娶七小姐而執意要娶九小姐，趙夫人非常不樂意，卻也不得不表示同意。宋真宗借此類事提倡苦讀，作詩道「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可謂不算太誇張。

男擇女貌，固爲多見。女擇男貌，宋代也不乏見。祖無擇甚有文才，只是貌醜。有人依男才女貌之說，爲其物色得美女徐氏。徐氏風聞祖學士相貌不佳，非要先見面後議婚。主事者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他讓祖無擇的同事、美男子馮當世與祖無擇併馬而出，令媒人故意誤指馮當世爲祖無擇，哄得徐氏同意了婚事。祖無擇是歐陽修的文友，歐陽聞聽祖氏與徐氏喜結良緣，特寫詩相賀道：「無擇聲名重當世，早歲多奇晚乃偶。」然而祖無擇與徐氏結婚以後很不和睦，最終還是離異了。

宋人的「貴人物相當」，反映了宋人務實風氣較濃，也同儒家禮教尚未被過分强調、推崇有關。

婦女改嫁與貞節觀

談到古代制度對中國婦女的摧殘，人們往往想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人道莫大於三綱，而夫婦爲之首」等説教，這些説教的製造者無疑都是宋朝的理學家，人們又往往想到婦女的纏足，它是婦女受古代制度摧殘的最直觀、最生動的證明，它萌生於五代，推廣於兩宋。由此人們便推想，宋代的婦女地位，必定是中國歷史上各朝代中最低下的，宋代婦女所受的摧殘，必定也遠遠超過其他朝代。然而實際的情況與上述的推想，是有頗大距離的。

人們對宋代婦女社會地位的新認識，來源於宋代史料中對當時婦女改嫁現象的大量記述。以往，人們曾作過這樣的比較：唐代有婚史的公主一百三十人中，曾改嫁（包括改嫁超過一次者）共三十人，佔有婚史者總數的約四分之一。而宋代有婚史公主四十一人中，改嫁者僅二人，在已婚者總

數中不足二十分之一。以此作爲宋代婦女比唐代婦女改嫁率低的重要論據。但是，後來人們對宮廷貴族婦女的情況是否可以代表整個社會的婦女一般情況，這一點發生了懷疑，因爲人們發現，宋代婦女改嫁非但不是個別現象，而且是具有相當普遍性的。

議論某種社會現象，人們自然要先留意發生在名人身上或周圍的情況，於是人們發現與宋代名人有關的婦女改嫁事是頗多的。例如范仲淹的母親謝氏，杜衍（仁宗時宰相）的母親，王安石的兒媳龐氏，神宗朱皇后的母親，理學家邵雍的母親，岳飛的前妻劉氏，參預迫害岳飛的南宋初期著名將領張俊的兒媳，著名女詞人李清照，陸游的前妻、表妹唐婉，賈似道的母親等都曾改嫁，最使人感到意味深長的是，最早提出「餓死事極小、生節事極大」的程顥，當他的親姪媳婦王氏和他的外甥女喪夫後，先後改嫁，他都未加反對。至於民間普通百姓的改嫁事見於記載者，就更加不勝枚舉。有人對南宋人洪邁《夷堅志》一書中關於改嫁事作過統計，全書共載婦女再嫁者五十五人，三嫁者六人，可知當時婦女改嫁並非什麼新鮮事。

人們注意到，儘管有某些限制，宋代的法律也允許婦女改嫁的。宋朝法律規定，丈夫去世，妻子要爲丈夫守喪二十七個月，守喪完畢即可改嫁。家庭窮

困者守喪期還可縮短到一百天。丈夫在外長期無消息、或犯罪被長期拘管外鄉，法律上也允許妻子改嫁。不但國家的法律允許，一些家族的族規、家法也允許改嫁。例如《袁氏世苑》中就講到允許「夫亡改」、「寡婦再嫁」。范仲淹家族所立《義莊規矩》中規定本家族婦女再嫁可支錢二十貫，可知不但允許改嫁，而且還要支給津貼。

當然，以上所述多爲丈夫死亡或犯罪判刑後的婦女改嫁，在丈夫未死時婦女離婚改嫁，特別是女方主動要求離婚改嫁的情況就相對少多了，但在當時卻也絕非罕見。在古代社會裏，男人有休妻的權利（宋代法律對男人休妻有限制），被休棄者通常是要改嫁的，當時通行的休妻文書中，照例有「任從改嫁」的條文。也有女方主動提出離婚要求的。特別典型的例子是北宋仁宗時著名文士祖無擇因相貌醜陋，夫人徐氏就要求同他離婚。在女方主動提出離婚的事例中，以女方有錢有勢、男方貧寒卑賤的情況較爲多見。在這種情況下，男方通常處於寄人籬下的景況，一旦爲岳父岳母所白眼，自然要將女兒「收回」，提出離婚要求。例如南宋孝宗時，向滈的岳父「惡其窮，奪其妻以嫁別人」，向滈於是發出「人情甚似吳江冷，世路真如蜀道難」的嘆息。據說辛棄疾初娶大官呂正己的女兒爲妻，後因事得罪了岳母，被迫離婚，懷念妻子，就

寫了《桃葉渡》一詞以抒情懷。

婦女改嫁既相當普遍，人們習以爲常，對曾經離婚者便没有歧視態度。北宋中期出了兩個聞名朝野的大孝子，即朱壽昌和劉瑄。他倆的事蹟大同小異，都是幼年母親改嫁後不知去向，待長大成人後歷盡千辛萬苦尋找生母，以盡孝心。他們的事蹟廣爲傳揚，且受到朝廷表彰，説明當時人對他們母親的改嫁並不掛在心上。南宋孝宗時，單夔的母親改嫁耿氏，生耿延年，單夔、耿延年後來都作了大官，他倆的母親病故，二人「爭葬其母」，感動了孝宗，於是下令：「二子無爭，朕爲葬之。」皇帝親自爲再嫁婦女舉行葬禮，充分説明當時對婦女再嫁並不歧視。

如果再嫁婦女貌美或握有巨資，人們還公開地爭相聘娶。最典型的事例是宋仁宗時向敏中、張齊賢兩位宰相爭奪薛惟吉的遺孀、擁有巨額財産的柴氏。南宋魏了翁的女兒才貌出衆，丈夫死了以後，媒聘者不計其數。劉震孫雖僥倖得佔花魁，卻因遭嫉妬者的惡語中傷，屢受挫折。民間如此，皇室也不例外。曾垂簾聽政的真宗劉后和仁宗曹后，實際都是再嫁婦女。

顯然，儘管宋代有理學家們大事提倡女子的貞節，但並未被整個社會所接受。

整個社會都講究婦女要守貞節，形成一種强大的、難以違拗的社會力量，那是明清兩代的事。當然，講宋代婦女改嫁現象較爲普遍、社會對婦女的貞節還未提出過苛的要求，決不等於説宋代男女兩性的社會地位是平等的。實際上，在宋代，婦女地位是呈下降趨勢的，其典型表現便是婦女纏足。

婦女纏足，一般認爲始於五代，其時詩人唐鎬詠云：「卻於宮裏看金蓮」，金蓮即指纏足。查纏足風氣之形成，似從宮廷開始，再傳入教坊，轉入城市上流社會的姬妾，最後才爲民間所接受。纏足不是由國家頒佈法令强制施行的。起初人們以纏足爲美，竟相仿效，逐漸普及。據説北宋新黨宰相章惇講過：「近世有古所不及者三事：洛花、建茶、婦人腳。」所謂「婦人腳」應指纏足。南宋初期張邦基撰《墨莊漫錄》，明確地講：「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南宋時纏足已相當普遍，也出現了最早的纏足反對者，例如時人車若水便撰文稱：「婦人纏腳，不知起於何時？小兒未四五歲，無罪無辜而使之受無限之苦，纏得小束，不知何用？」然而他的批評並未引起人們廣泛共鳴，以致纏足這種極其醜陋之惡習，竟在中國存在了近千年之久，實在令人痛惜。

醫官系統與王繼先

《清明上河圖》中的「趙太丞家藥肆」，令人想到詩人陸游記錄的有關南宋行都藥鋪的對聯：「王防禦契聖眼科，陸官人遇仙風藥」，「三朝御裹陳忠翊，四世儒醫陸大丞」，「樂駐泊藥鋪，寇保義卦肆」等等，其中大丞、防禦、駐泊等都是醫官名，這説明宋代醫官在當時社會生活中還是有一定地位的。

宋朝的官分文官、非文官兩大系統，非文官中又包括武官、內臣、女官和技術官等子系統，而醫官系統又是技術官的子系統。技術官除包括醫官外，還包括天文、書畫、教坊等方面的官。技術官在當時大體被人看不起，其地位不但遠不如文官，而且也不如武官。但醫官在技術官中有些特殊，那就是他們的醫術往往能決定人的性命，一般人都懼他們三分，皇帝老兒也不例外。本來，宋朝規定，技術官最高不得超出六品，不許帶遙郡刺史、

團練使、防禦使等武官銜。但是，這些規定經常被醫官打破，因爲皇室成員有求於他們，有時便顧不得什麼制度不制度了。於是，醫官帶刺史等銜者便時常可見，前文言及的「王防禦」，就是帶了遙郡防禦使的銜，其官品就是五品（比六品高一級）。下文講到的王繼先曾帶承宣使，則是四品。

宋朝中央的醫官是以翰林醫官院爲核心的，其職務自上而下依次是醫官使、副使，直醫官院、醫官、醫學、祇候。醫官若兼殿中省的尚藥奉御頭銜，則序位在一般醫官之上。宋神宗熙寧年中，又增置太醫丞，序位在直院、尚藥奉御之下。前文講的「大丞」，即是指太醫丞。以上講的官名都是講職務官名，或按宋人說法，是差遣官名。宋朝官員除了標誌實際職務的差職官外，還有標誌等級的本官。醫官的本官系列相當混亂，宋仁宗以前，多用文官名，前加「同正」二字以相區別；宋仁宗以後至宋徽宗政和年以前，多用武官名。宋徽宗政和年間，專爲醫官制定了自和安大夫以下的單獨的寄祿官系列，南宋沿用之。但醫官得寵幸者往往官階超過和安大夫，這些人便又以武官官階寄祿。

翰林醫官院的醫官往往被派隨軍，或隨要員外任，時稱這些醫官爲「駐泊」醫官。前文所言「駐泊」即指此。宋神宗時又創立太醫局，太醫局首腦通

常由普通文官出任，有時則以受寵而級別高的醫官出任。太醫局設九科教授，一般由翰林醫官兼任。太醫局又有局生，多時三百人，少時數十人，無官而有祿，邊幹邊學。宋朝京師醫官人數最多時曾達千人以上，這一數字尚未包括太醫局生和宋徽宗時新建的醫學的學生。

宋朝地方州郡也各有醫官，多稱博士、助教。此外州郡也有醫生，情況與京師太醫局生類似。

醫官往往因醫術得寵。據載，宋仁宗時有位名叫沈常的士人，屢考不中，潦倒京華。一日在東華門見一官員「躍馬揚鞭，從者雄盛」，一問，乃一得之醫官。嘆道：「吾窮孔孟之道，焉得不及知甘草大黃輩也？」乃棄儒學醫。然而這僅是事情的一個方面。醫官又往往因醫術招禍，每次皇室的人死了，都要有幾個倒霉的醫官受責罰，輕者貶官，重則流放充軍，不管是否屬於醫療事故。

王繼先是宋朝特別出名的一位醫官，他的出名，一是因爲他醫術高明，二是因爲他幹了許多壞事。王家世代行醫，繼先祖父因賣黑虎丹聞名京師，故後來人稱王繼先爲黑虎王醫師。宋高宗爲金兵追逼，逃亡海上，不服風水，染重病，他醫醫治無效，王繼先卻藥倒病除，從此受到高宗殊寵。

後一次高宗欲行郊禮，頭上長了一個大腫瘤，無法戴冠冕，高宗不勝憂愁，王繼先開了藥，高宗的腫瘤很快消失。這使宋高宗對王繼先的醫術更加信服。又一次暑期高宗便瀉不止，王繼先診脈之後卻不開藥，竟向內侍索要西瓜吃。他當着高宗的面大啃大嚼，引得高宗直流口水。高宗禁不住問他自己能吃不能。王繼先答曰可以。高宗吃了幾塊西瓜後，肚子也不痛了，瀉也止住了。人們問王繼先搞的是何名堂，答曰：皇帝便瀉是因爲中暑，我引他吃瓜是爲了消暑，暑消了病也就除了。經過多次實驗，宋高宗簡直對王繼先佩服得不得了，竟對大臣們講：「王繼先乃朕之司命。」

又據宋末人周密記，他的族叔祖與王繼先是好友。王繼先晚年因罪被强迫福州居住，這位族叔祖仍不避嫌，繼續與之來往。後來此族叔祖進行都得了潭州通判的官，赴任途中遇到王繼先。王繼先爲他診脈，鄭重地講：「好朋友不說假話，你的病情嚴重，趕快回家療養，切莫遠途赴任。」此族叔祖將信將疑地回家中，不幾天便去世了。此事也說明王繼先的醫術確實高明。

但是這位醫術高明的王繼先在得寵之後卻幹了不少壞事。他在行都內外廣造第宅，佔民居數百家，奪良家婦女爲侍妾有百人以上。他在官員中結黨營私，特別是在軍將中廣收義子，敗壞風氣。他與奸臣秦檜勾結，認秦檜夫

秦檜鐵跪像

人爲本家。在金軍入侵的關頭，他帶頭轉移家產，並主張用殺害抗金將領的辦法向金人乞和。他的倒行逆施激起民憤，宋高宗不得不把他貶出行都。

一個醫術頗高明的醫官何以幹了許多壞事、對百姓犯了如此的罪行？追究起來，顯然首先要講王繼先的個人素質不佳。但一個個人素質不好的人爲何被賦予如此大的權勢，這就不能不從當時的社會制度的弊病中去找原因了。

火德・火災・防火

宋朝立國之初即宣佈：周朝是木德，宋因周而立，當以火德王，色尚赤。宋仁宗時，又在宋朝發祥地南京應天府建祭壇，祀大火，以閼伯配享（一說閼伯爲高辛氏火正，一說爲陶唐氏火正）。宋徽宗時，又令各地崇寧觀建火德真君殿。南宋時南京陷落，仍令望祭大火壇。

宋朝雖自稱火德，對火神倍加崇奉，然而卻未能得到火神爺的照顧。相反，宋朝的火災似乎比其他朝代都多，尤其是南宋，火災竟成爲嚴重的社會問題，真像是火神爺故意同宋朝君臣開玩笑。

皇宮和官署，戒備森嚴，然而宋代皇宮和官署（包括皇親宮宅）火災次數頗不少。宋仁宗明道元年（一〇三二），皇宮起火，燒毀八個大殿，其中包括宋仁宗及皇太后當日就寢的大殿，宋仁宗和皇太后被內侍們簇擁着倉皇逃命。事後宋仁宗對執政大臣講：「如果不是王守規（內侍）等人及時

開路砸去宮門鐵鎖，我恐怕今天就見不到諸位了。」驚恐之情溢於言表。宋徽宗重和元年（一一一八）後宮起火，「大雨如傾，火益熾」。燒毀宮殿五千餘間，許多宮人被燒死。南宋時皇宮內也幾次遭受火災。皇親宮宅遭受火災的次數又多於皇宮。有幾次宮宅被火焚毀而難以及時修復，宋廷不得不破例允許宗親僦民宅暫時居住。

宋代省臺寺監及開封府、臨安府衙發生重大火災約二十次。北宋神宗時三司火災，焚屋一千零八十楹，檔案帳籍全部焚毀。宋欽宗時尚書省起火，六部中有五部遭焚。南宋幾次臨安大火，官署都是受災較重的。北宋大中祥符八年（一〇一五）榮王宮起火，延燒左藏庫、內藏庫、崇文院和秘閣，造成錢帛和圖書的嚴重損失。事後宋廷不得不暫時停頒官兵時服，減發官員薪俸，以燒損絹帛代支薪俸，並召募筆工二百餘人抄寫書籍。宋真宗一時氣惱，竟下令要將與火災有關的數百人一齊處死，幸虧宰相王旦勸諫才收回成命。

宋代宮觀寺廟也是火災較多發生的地區。有人分析過宋代火災多的原因，其中重要一條就是燒香拜神引起火災。宋真宗時官方出資修建的玉清昭應宮，共二千六百一十區。原訂每日用工三萬多，用十四年建成。後連夜施工，

調軍隊參建，結果用七年時間建成。此宮修建不但調集了全國的能工巧匠，還調集了全國最好的材料。時人認爲其豪華盛大超過古代的阿房、建章等宮殿。天聖七年（一〇二九）一場大火，全部化爲灰燼。宋仁宗時歐陽修上奏言及，僅他所知，京師被火焚毁的寺觀即有玉清昭應宮、洞真宮、上清宮、鴻慶宮、壽寧觀、祥源觀、會靈觀和開寶、興國兩寺的塔殿，他所不知及外地寺觀被燒毁者尚不知有多少，此後遭火災者又不知有多少。歐陽修還講了一則笑話：

皇宮舊有玉石三清像，原在宮内祭神的真游殿。此殿遭火災，移像於玉清昭應宮。昭應宮火災，又移此像於洞真宮，洞真宮又遭火災。移此像到上清宮，結果上清宮又毁於火災。於是人們便認爲此像到處必生火災，稱之爲「行火真君」，各處都不敢供奉，只好安放到四面是水的一個所在。

宋神宗元豐八年（一〇八五），朝廷舉行科舉考試，考試是借開寶寺的地方。不料正當開考之時，開寶寺起了大火。監考者和考生被燒死四十多人，考官翟曼等三人也在其内，試卷三分之二也未收上來。宋廷只好宣佈重新舉行考試。

南宋都城臨安火災是出奇地多，幾乎年年不斷，有時更一年數次。有人認爲，

這是由於居民住宅擁擠，房屋多用竹木所致。僅據《宋史·五行志》記載，臨安百多年中燒毀民居萬戶以上的火災就有六七次。其中嘉泰元年那次大火整整燒了四天，「燔御史臺、司農寺、將作軍器監、進奉文思御輦院、太史局、軍頭皇城司、法物庫、御廚、班直諸軍壘，延燒五萬八千九十七家。城內外亙十餘里，死者五十有九人，踐死者不可計。城中廬舍九燬其七，百官多僦舟以居」。其悲慘情景可以想見。

火災多，防火就受到重視。北宋人魏泰記，京師火禁甚嚴，夜深不許有火光。時人有半夜設醮祭祖習俗，官方規定此種事事先必須關報。狄青家半夜祭祀未申報，引起有關人員注意，招致許多流言。又有記載說，京師遇火災，須察出責任者，若察不出，有關官吏要被判罪。有人與有關官吏結怨，便在自家製造火災，故意嫁禍有關官吏。這些記載都說明當時有關防火的立法頗細密。又有記載說，宣仁太后垂簾聽政，對本家人要求嚴格。其嫂求她在兄家設置專門防火的兵營——潛火鋪，宣仁后認爲這樣作太出格，給回絕了。《東京夢華錄》載，北宋後期汴京每隔三百餘步就有一巡鋪，負責火警。城內有望火樓，樓下有防火兵百餘人駐紮，配備有大小桶、斧、鋸、梯、鐵錨、火叉等。每遇火災，防火兵先動，其他駐軍都參加滅火。南宋防火立法增

加火災責任者（非故意）要判徒刑的條款。臨安除設防火樓、巡鋪外，又設火十二隅、潛火七隊、潛火四壁等專業防火兵，總數達五千人。都城設置如此多的專業防火人員，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見的，在世界其他國家或也不多見。

社會保障設施

宋代百姓賦役負擔比前代沉重得多，但宋代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卻少於前代，主要原因之一，是社會保障事宜受到重視。

如果較多地閱讀宋人傳記、墓誌銘或其他記錄時人事蹟的文字，便會發現，被歌頌者的事蹟中，有相當數量是與社會保障問題聯繫的。無論是朝廷大員還是地方小官，無論是職業官僚還是理學家，往往大家都對卹貧賑災作過貢獻，似乎名氣大的人尤其如此。這多少說明了時人的風尚。

在中國古代，控制糧價是保持社會穩定的最重要槓杆，宋朝對此可謂不遺餘力。每逢災歉或青黃不接之季，政府便千方百計地籌集糧食出糶以穩住糧價，有時竟動用部分庫存的軍糧。在這方面，地方官們往往各顯神通。有的硬行規定糧食價格，以嚴刑峻法强制貫徹。有的則反其道而行之，放開糧價任其增長，還將最高糧價派人到附近地區張榜公佈，糧商見有利可圖，蜂湧而

至，糧價自然下跌。據說趙抃、范仲淹都曾有過如此舉措。也有的地方官設法籌措款項，調集車船去外地購糧返銷本地，據載包拯、朱熹都曾如此作。講平抑糧價人們不會忘記常平倉。它創始於東漢，宋朝更推而廣之。宋神宗初年，常平倉貯糧和購糧錢本共達一千四百萬石貫（時人習慣將不同計量單位的統計數加在一起，今人已無法將其分開）。常平倉之外，南宋地方政府又分別建立了平糶、平糴、平濟、平止等倉，名目雖多，管理方法也有差異，但平抑物價的宗旨卻是一樣的。

一般說來，以平抑物價爲宗旨的常平等倉，百姓須花錢才能從它們那裏得到糧食然而遇到災荒年，百姓無從得錢，也就難以從它們那裏得到糧食。因而常平等倉在賑災方面作用有限，於是便又有主要以賑災爲目的的義倉、社倉、民倉等。它們的區別是，義倉糧食是通過官方徵收兩稅附加稅渠道獲得，因而歸官府掌握。社倉糧食是通過本鄉集資方式獲得，因而由本鄉百姓共同推舉人負責。大儒朱熹是社倉的創始者之一（另一位是他的朋友隱士魏掞之），他對社倉的優點即可避免官府移作他用及設倉鄉里方便百姓等大加宣揚，所以後來的理學家們也往往成爲社倉的鼓吹者和推廣者。惠民倉也是官辦的，它與義倉主要區別似是貯糧來源的差異。

宋代城市人口衆多，爲了使城市貧民中生計無靠者得到救濟，官方設置了福田院等機構。北宋時（英宗即位以後）東京有福田院四所，收養老疾孤窮者一千二百人，其規模頗可觀。宋徽宗時，又令各州分置居養院，性質與福田院近似。

元祐年間，蘇軾任知杭州。一次，他爲人撰寫文章，對方送來「潤筆」（大略相當現今的稿酬或勞務費），宋代「潤筆」頗豐厚，蘇軾名氣大，「潤筆」尤豐。蘇軾便用這筆錢開辦了一所社會福利設施，專門收養無依無靠的病號，時稱病坊。宋徽宗時將此種病坊推廣各州，改稱安濟坊。南宋時，國力有限，各州多將居養院與安濟坊合併，稱養濟院，兼顧貧困孤苦無依者和無人照顧的病號。有些州郡則仍保留安濟坊，建康府的安濟坊則稱安樂廬，有百楹，規模可觀。

城市有福田院、居養院、安濟坊，鄉村則有廣惠倉。它的糧米主要取之於戶絕田地的租入，救濟對象是本鄉老弱病疾不能自給之人，每年冬春兩季頒糧，夏秋停止。

遇到災荒年，城鄉便有遺棄幼童的現象。南宋不少州郡都設置了專門收養棄童的機構，多稱慈幼院。官方僱傭婦女照料這些幼童，給他們餵奶。然後

爲他們尋找撫養人。在鄉村，又設舉子倉，凡貧困婦女懷孕者，爲防其遺棄不育，乃預先頒給錢、米。此項措施兼有濟貧、鼓勵生育的意義。

由以上所述我們可以得知，宋朝社會救濟想得頗周到，既照顧到老人，又照顧到幼童，還照顧到病號和殘廢人，既照顧到城市，也照顧到鄉村。這裏還應補一句：即不但照顧到活人，而且照顧到死人。在那個時代，凍餓疾疫而死、棄屍路旁的人總是有的，災荒年尤多。這些棄屍暴露街頭或野外，難免有傷「和氣」，且易引起瘟疫。宋朝政府很注意動員人們掩埋棄屍。官方還劃定一些專門的葬地，稱之爲漏澤園。北宋時京師各畿縣都有漏澤園，南宋行都屬縣有漏澤園十幾處，地數百畝。

瘟疫往往與饑荒相伴，也是社會安定的嚴重威脅。每當瘟疫發生，宋朝政府都及時調撥資金、藥品，委派醫官和其他人員，組織救治。特別當京師發生瘟疫，更動員較多醫官分坊巷散發藥物、救治病人等。南宋時有些地方還常設施藥所，在疾疫易流行的季節免費散發藥物。

由於濟貧賑災受到重視，宋人創造出一門新的學問，即荒政理論，並有了它最早的代表作——《救荒活民書》。此書作者是南宋人董煟，他在書中記述了歷代救荒卹災的措施，總結了前人成功的經驗，也指出了某些

措施的缺欠和弊病。此書對後代影響頗大，明清兩代多有仿傚者。

宋代的社會保障設施是較爲成功的，它使絕望者得到少許安慰，使身處絕境者依稀看到一線求生的希望，也確使不少飢寒者勉强逃脫死亡的威脅，從而它也就使人們對朝廷、對官府的仇視、怨恨情緒淡化，甚至在某些糊塗人心中造成「皇恩浩蕩」的假象。當然，它也有使社會安定的積極作用。

大事年表

年份	政治大事	文化大事	世界大事
九六〇	陳橋兵變，趙匡胤稱帝，建立宋朝（史稱北宋），定都汴京，是爲宋太祖。		
九六一	太祖罷石守信等禁軍將領，史稱「杯酒釋兵權」。		
九六二			日耳曼國王强迫羅馬教皇約翰十二世爲他加冕爲皇帝，建立神聖羅馬帝國。
九七一		太祖下令在益州開雕佛教《大藏經》。	
九七九	宋太宗滅北漢，結束五代十國紛亂局面。		
一〇〇四	遼國侵宋。遼宋訂「澶淵之盟」。		
一〇〇七		文學家歐陽修出生。	
一〇三七		文學家蘇軾出生。	塞爾柱突厥人攻佔花剌子模。

一〇三八	党項族李元昊稱帝，建西夏。	畢昇發明陶活字印刷術。楊維德《坐原總錄》載指南針使用方法，這是世界有關的最早記載。	
一〇四一			
一〇四四	范仲淹上「十事疏」，建議改革政治，獲仁宗支持，史稱「慶曆新政」。	曾公亮編成《武經總要》，內載三種火藥配方，是世界上關於火藥的最早記載。	
一〇四九		河南開封開寶寺塔（鐵塔）始建。	
一〇五一		書畫家米芾出生。	
一〇五四			
一〇六六		司馬光開始編著《資治通鑑》。	
一〇六九	神宗任用王安石，主持變法。		基督教會分裂爲天主教和東正教。法國諾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國，即位英王。諾曼王朝之直系統英國六十餘年。

一〇八四			詞人李清照出生。
一〇八五	司馬光爲相，盡罷新法。		
一〇八八		沈括寫作《夢溪筆談》。	
一〇九四		蘇頌完成《新儀象法要》。	
一〇九六		李誡編成《營造法式》。	
一一〇〇			
一一〇二	蔡京爲相，立元祐黨人碑，是爲「元祐黨禁」。		
一一一五	女真阿骨打稱帝，國號大金，是爲金太祖。		
一一二二	方臘起事。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歷時四年，最後攻陷耶路撒冷。	

一一二五	金兵攻入汴京，次年徽、欽二宗被俘北去，北宋亡。	詩人陸游出生。
一一二六		
一一二七	康王構即位於南京，是爲宋高宗，史稱南宋。	
一一三〇		哲學家朱熹出生。
一一三八		福建晉江安平橋始建。
一一三九	宋金第一次議和。	哲學家陸九淵出生。
一一四〇	宋金郾城大戰，岳飛大敗兀朮主力騎兵。	詞人辛棄疾出生。
一一四一	宋金第二次議和。宋向金稱臣。岳飛被殺害。	
一一四七		第二次十字軍東征，至一一四九年結束。

一一四九		
一一六一	金撕毀和議南侵，宋將虞允文大敗金軍於采石。	
一一六三	宋將李顯宗北伐，大敗於符離。	
一一六四	宋金訂立隆興和議，宋對金改稱「侄皇帝」。	
一一六八		
一一八九		
一一九二		
一二〇二		陳男寫成《農書》。

英國牛津大學創建。

第三次十字軍東征，至一一九二年結束。

日本征夷大將軍源賴朝，在鎌倉設司令部，號令全國，也稱「鎌倉幕府」。自是幕府操國政大權，天皇徒具虛名。日本進入幕府政治時期。

第四次十字軍東征，至一二〇四年結束，最後攻陷君士坦丁堡，建立拉丁帝國。

一二〇六	南宋韓侂胄主持北伐，史稱「開禧北伐」。	東羅馬帝國退保小亞細亞部分地方。
一二〇七	宋金議和，韓侂胄被殺。	
一二一五		貴族和教士强迫英國王約翰簽署「大憲章」，保護人民基本權利，這是英國有憲法之始。
一二一七		
一二二七	蒙古滅西夏。	
一二二八		第五次十字軍東征，至一二二一年結束。
一二三二	蒙古與宋議定聯合滅金。	
一二三三	宋將孟珙率部出襄陽，與蒙古軍隊會合。	
一二三四	宋蒙滅金。宋軍進入汴京、鄭州、洛陽，因糧援不繼，陷入絕境。	第六次十字軍東征，至一二二九年結束。

一二三五	蒙古軍第一次南侵。		
一二四七		秦九韶完成《數書九章》。	
一二四八			
一二五八	蒙古軍第二次南侵。		
一二六一		楊輝完成《評解九章算法纂類》。	
一二六五			第七次十字軍東征，至一二五四年結束。
一二六九	蒙古軍第三次南侵。		
一二七一	蒙古改國號爲元，定都大都。		英國首次召開議會。
一二七六	元軍攻入臨安，俘宋恭帝。文天祥等迎立端宗於福州。		第八次十字軍東征，至一二七〇年結束。

一二七八

端宗死。陸秀夫等立趙昺爲帝。

一二七九

陸秀夫背帝昺投海，南宋亡。